

2008年，假如你曾参与抗议家乐福，曾参与抗议CNN，曾认为受到西方的迫害，那么，建议你不要阅读此书，以免引起不适



大脚印儿 关军 著

见证

奥运

阴影下的

2008

Under

The Shadow Of

Olympics

大脚印儿

见证奥运阴影下的 2008

目录

前言 把 2008 交给我吧

上篇 跌宕

一月·雪国

广场

死也要回家

巨大的窟窿

郴州死过一回

警钟的一次鸣响而已

二月·窥私的狂欢

假如生活欺骗了他

U 盘疯了

错误的道歉？

三月·拉萨不语

被夸大的与被掩盖的

当偏见遭遇谎言

西藏可以说“不”吗

四月·残忍的季节

火被点着了

奥运到底是谁的

中国为什么愤怒

两面都太锋利

就像白天与黑夜

请讲“世界语”

五月·八级强震

志愿者上路

黑色三分钟

有限度的欣慰

中篇 无与伦比

六月·全民运动

烈焰灼人

中国特色的付出

必须做出的牺牲

七月·闪开，奥运来了
为了“平安奥运”
不存在的示威区？
准备了好多天
权利的让渡

八月·高潮体验
体育暂时归位
君临天下以后
现在可以说了
形象工程之最
规则是用来……

下篇 加油

九月·“阻燃剂”
升天
感谢新西兰友邦
黑名单上的人
结石的灵魂
海啸来袭

十月·危局（经济困境）
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与奥运无关
巴士司机的两难选择

十一月·非典型奥运奥运
有形的遗产
渐变
志愿者丢了
人本精神的烛照
“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

十二月·纪念日（改革开放三十年）
河里的石头
当“疯跑”无法继续
谁的“普世价值”？

尾声 wire 上的中国

人物列传

国家的儿子 刘翔（奥运退赛者）

最耀眼的普通人

“超级身不由己”

假如没有人抢跑

中国还需要代言吗

我的家没了 景雪自述（在奥运拆迁中做出牺牲的居民）

看，一个优秀公民 金晶（巴黎站火炬手）

“天使”与“汉奸”

百毒不侵

不想要的名人生活

不抱希望的诉讼 方寿威（北京奥运口号创作者，在与奥组委的维权官司中被判败诉）

CNN 里的“观象斋” 吉米（CNN 北京站负责人，驻华首席记者）

一个“中国通”的审慎态度

讨伐风暴

批评并非意味着敌意

他们（一个叫苏坚的画家及他一幅画中的四个奥运民工原型，画家拍卖画作作为四个民工观摩奥运的经费，与他们一同经历了梦幻般的奥运之旅）

首席代表与桥 李红（国际奥委会驻北京奥运会首席代表）

配稿：**东京对北京说**

前言

把 2008 交给我吧

1

2007 年秋季，利用一次午间的便餐，我向我的上司、《体育画报》执行出版人程益中提出辞职，理由是自己准备集中精力，用两年时间完成一本书的采写，记录北京奥运年的历程。

“那你靠什么生活？”

“我掂量了自己的积蓄，两年不工作，应该还能活下去。”

从那一年的夏天开始，我就萌生了书写 2008 社会实录的念头。做了十几年的新闻人，追逐一个又一个新闻人物、新闻故事，虽然教科书上说，那都可能是“瞬间的历史”，但渐渐无法满足自己的野心。

自己在《南方周末》做过深入社会生活细节的特稿记者，在《体育画报》又有奥运报道的资源优势，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形成了：你正是适合记录北京奥运的那个人。

“你没必要辞职。”程益中当即表明态度，“我觉得一份媒体有义务成就自己的记者。”

这位中国知名媒体人的开明和坚持，动摇了我原本抱定的辞职念头。我虽疯癫，却也明白有收入比坐吃山空好，而且我很清楚，真要成为所谓自由记者，在中国的环境下将寸步难行。于是我留下来，只是适度减少了工作量。

生于 1970 年代初期的我，自认为人格分裂，证据之一，就是血管里混杂着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血液。下决心记录北京奥运的动机里，本身就体现着这种“混血儿”的复杂欲望；而最终选择留在《体育画报》，同样呈现出“混血儿”的自我妥协。

2

原以为，奥运的主题已让 2008 年足够厚重了，没想到这会是如此跌宕的、无与伦比的年份。这一年，更像是一个过分迷信戏剧冲突的编剧的剧本，而不像一段真实的生活。人们为八卦疯狂，为灾难哀伤，为危机焦虑，为道德缺失恐慌，为奥运紧绷神经然后极度释放……其中的每一例，都达到了几十年里相关体验的极致。

在中国近当代史，1976 年浓缩了太多的爱恨悲欣，而 2008 的戏剧性，丝毫不输给 1976。

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难的道路。我要完成的，应该是一部全景的社会实录，不是关注某一切面，也不局限于体育本身——虽然我很清楚，那样操作起来要轻松得多——是的，如果是悉尼或雅典那样的奥运会，不足以唤起我记录的冲动，那仅仅是“game”而已；在中国，奥运可以是一切。人们最熟悉的那首奥运歌曲写得很到位：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北京奥运激荡了许多中国人不切实际的梦想，也让本书作者成为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3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标准概念里的体育记者。通过体育来体察人性，通过体育来感知时代，是我的兴趣所在。本来挺轻松的东西，被无趣的我搞得沉重不堪。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某些时候，体育确实不止是体育。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只能是镜花水月。罗格说过，如果要找出北京奥运会最成功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更了解世界，世界也更了解中国”。这评价超出了体育范畴，如果是奥林匹克的原教旨主义者，其结语应该是“在北京破了一箩筐的世界记录”。

正如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所言，正因为体育看似与政治无涉，才更容易为政治家所用，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别忘了，中国还曾在 1980 年抵制（当时的官方说法叫“放弃”）过莫斯科奥运会。

体育确实可以超越它自身，对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施以更大影响，比如奥运会就是如此。北京奥运会更是雄壮得无以复加，如前所述，在中国它可以意味着一切。身为体育记者，很荣幸恭逢盛事，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

4

2007 年 8 月，我写下一篇题为《北京奥运需要不支持者》的博客，引起较大反响，我也被网民贴上了标签：奥运反对者。我想他们搞错了至少两件事，其一，不支持未必就是反对，其二，我认为奥运该容忍不支持的人，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其中一员。

当然，我其时的确对北京奥运忧虑多过憧憬。那篇博客的结尾，代表了我当时的立场：反对奥运的过度政治化；反对个人利益为奥运做出牺牲；反对锦标主义；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那个阶段的我，觉得北京奥运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劳民伤财，弊大于利，我甚至担心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被严重误读。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实在浅陋。

随着奥运从临近到完结，我对北京奥运会——这个地球上最盛大的 party 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渐渐地，我开始更乐观地看待奥运与中国的这次相遇——尽管我当初忧虑的情况并没有完全避免——这个自闭太久的国度必须迎着阵痛走向现代文明，我亦深信，国人对美好世界的本能追逐，也最终会演化为一种内生的力量。

北京获得奥运会承办权的同一年，中国加入 WTO，它们都是中国回归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正如“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言，在当代中国，“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

渐渐地，我也放弃了对奥运意义的过度阐释。现代奥运会本就没什么神圣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全球狂欢节，并在危机时代很好地实现了商业化、成功自救而已。生活经验告诉我，凡是被标榜为神圣的，都是可怀疑的。

我试图更平和地看待在奥运年发生过的一切。如果说还有什么阴影在我内心挥之不去，那就是依然激烈也依然容易被操控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很想知道，一个社会假如到了万众一心的地步，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同仇敌忾了？

5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力图以某一个时间切片来管窥更宏大的历史，这种审思角度给我颇多启发。不过，《万历十五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1587 年的历史，这个平淡无奇的猪年只是表达作者大历史观的一个基点。

尽管 2008 年不知比 1587 年激越多少倍，但我还是相信，真实的历史隐藏于细节中，隐藏于具体的人的故事。所以，在我的写作中，更多出现的是一些看上去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故事。他们是我的切片。

你会看到，人的活动贯穿整个叙述，而除此之外，我也写就了相当篇幅的人物列传，希望人们看到几个更完整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命运乃至价值观，被北京奥运不同程度地改变，或轻缓，或剧烈，但无不耐人寻味。

这一年里，我曾前往旧金山的火炬传递现场，前往境内原定传递城市本溪（最终都因故与火炬缘慳一面）；我曾前往雪灾所累广州，两次前往四川地震灾区；我曾前往刘翔备战的上海莘庄基地，前往唐山搜寻残奥运动员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我忙碌于奥运主办城市北京，它包容的奥运元素纷杂、丰富、奇妙得令人激动，也令人茫然。

难度最大的反倒是北京的采访，头绪庞杂是一个问题，无处不在的防火墙是更大的问题。这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即使去观摩一次首都职工文明拉拉队的排练，也要设计一个复杂的破解路径。而对于更多难以接近的隐秘世界，我只能求助于当事人的描述。

我很欣赏长平 MSN 签名上的那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所以，呈现在这本书里忧思或许要多过称颂。

我并不承诺自己的客观公正。确立采访方向的过程，甄选写作素材的过程，都要依靠主观的价值判断。我只是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说假话，并避免那种“选择性失明”。

“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是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名言。在这本书中，你看到的同样是这样一些“人”。我们的国家，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世界，也适合这样下定义。

6

你经历了 2008 年，以为一切都已经刻骨铭心了，但是重新捡拾记忆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许多事情仍不甚了了。至少对我而言，几个月的查阅、整理、补充采访和思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复杂事物真相与本质的过程。

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些朋友在 MSN 上问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奥运的书，怎么还没印出来啊？他们替我着急：奥运一结束，事过境迁，书可就不好卖了。那时候，我的书何止是没印出来，采访计划还未完成一半呢。

我秉持的是另一种功利心：既然搞，就要搞出够分量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把一段岁月看得更真切需要足够的距离感。

2008 年倏忽而去，我开始投入写作当中。其实，距离还远远不够呢，我知道自己下笔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功利心在作祟，可是又难以摆脱。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许多话未能以方便读者阅读的方式直白说出。只好再许一个宏愿：在完成本书以后，我要继续关于 2008 的挖掘、沉淀与追问，在若干年后重新记录这个复杂的年份。我甚至想对着树洞故做豪迈状地高喊：把 2008 交给我吧！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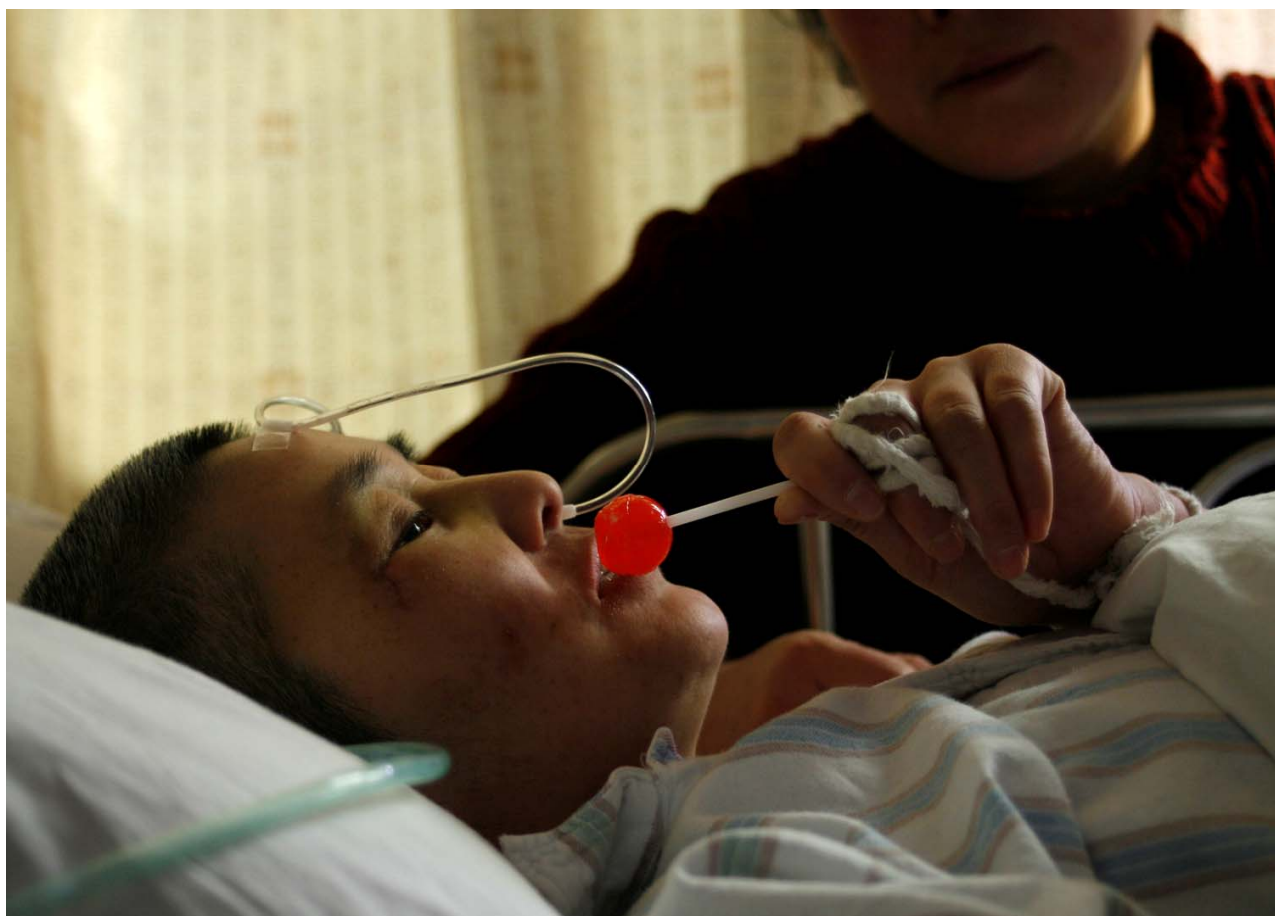
很欣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忠告：中国使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



我老人家

上篇 跌宕

2008年1月—5月



受伤民工赵宝琴舔舐一只棒棒糖以缓解痛苦 关军 摄

2008年1月，“鸟巢”的固定座椅安装完毕，80000个分别呈“中国红”和“长城灰”的座椅，各就各位，早早摆好了迎接各方贵客的姿态。

一月·雪国

直至腊月刚开始的时候，温度计上呈现的都还是暖冬的迹象。春节和奥运都不远了，中国人从未如此忙碌而期盼。

一月中旬起，天气突变，罕见的冰雪不断堆积到南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而且没有消融的迹象。1月27日，在武汉市友谊大道徐东路附近，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斜拉式的钢索终于不堪负荷，比篮球场还要大一些的顶棚轰然垮塌。没有人把它当作新闻，在此前后的一个

月里，被压垮的房屋超过 20 万间。仅徐东路附近，27 日当天就有两个加油站的顶棚坍塌。冰雪的持续侵袭下，在喘息中渐渐不支的，又何止房屋的梁柱，整个南中国都亮起红灯。

广场

再过十几天就是春节了，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拥挤的女工宿舍里，人们唧唧喳喳地说笑着，虽然很晚收工，身心疲惫，但还是难以掩饰即将回家的兴奋。44 岁的赵宝琴仔细地收拾着行李，总担心遗漏什么——与多数工友不同，过完年，她不会再回来了。女儿雪莉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这个家庭快熬出头了。

赵宝琴又拿出车票看看，没记错，1 月 27 日 20 点 45 分。她无法预见的是，这张火车票将引领她接近的，不是遥远的甘肃老家，而是一个家庭巨大的悲剧。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冰雪覆盖了纵横交错的轨道，人民铁路粗重的喘息声渐渐代替了列车轮子的铿锵之音。

1 月 25 日，从广州开出一列 K326/27 次列车，它抵达终点站温州时，晚点整整 3 天 3 夜，而且遍体鳞伤。56 块双层中空玻璃被砸，餐车里，冰箱被丢弃，炉具被捣毁，桌椅被掀翻。按列车长陈小雄的说法，直接损失达 50 多万。

只要能上车，红了眼的乘客们不择手段。冰雪中，列车走走停停，乘客的焦急与暴躁不断升温。那可怜的十多节车厢，成了随时都会被引爆的巨型火药桶。

那批前往温州的人们不该有什么不满，比起赵宝琴这样的乘客，他们已经足够好运气了。

1 月 27 日，正是武汉友谊大道上的加油站接连坍塌的日子，南中国和西北地区的东部纷纷告急，灾情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等地尤甚。

奥运筹备也受到轻微波及。

中国赛艇队在 1 月 26 日由云南转往浙江千岛湖备战，但训练船只的运输受阻于湖南，运动员被迫进行了几天陆上训练。受大雪影响，俞卫民、宋晓丽和岳敏 3 位女足队员一度滞留在南京和武汉机场，没法按时向国家队报到。

1 月 31 日原本是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购票人提交照片和身份信息的截止时间，当日，北京奥运票务中心宣布，将截止日期推至 2 月 22 日，以照顾那些因雪灾滞留路上的预订者。

大雪使高速公路瘫痪，冻雨令电力设施损毁，紧接着，铁路告急，能源告急，生活物质告急。现代社会的脆弱瞬间凸现，灾难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向下一个相关链条传导。

京广南段等铁路动脉瘫痪，广州火车站广场塞进了 20 余万人，混乱和拥挤程度超过政治风潮中的那个北京的广场，这片原本就以混乱闻名的区域，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京珠南段等高速公路，则成为地球上最壮观的停车场。

每年的春节前后，中国都是“在路上”的状态，几亿人往返奔波，形成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08 年年初，大迁徙遭遇大麻烦。

赵宝琴和几个同乡听说了铁路上的麻烦，但他们还是包了一辆私家金杯车，每人 50 元，赶到了广州。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就再也走不动了。前面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她甚至连广州火车站的轮廓都看不见。

20 点 45 分临近了，20 点 45 分过了，赵宝琴依旧在人海的边缘。幸好此前听说了好消息——持 1 月 25 日至 2 月 6 日之间车票，随便坐哪趟列车回家都可以——否则，赵宝琴可能早急得疯掉了。

1 月 30 日，电台 DJ 陈晓琳开着红色富康车，无意中跟着值勤警车开进了火车站南广场的人海。

须臾之间，一浪人潮涌过来，人与包裹像流沙一样堆在红色富康车周围。真是流沙也还好，可怕的是这“流沙”还有眼神，齐刷刷地俯视下来，陈晓琳从里面读出的，是绝望，无助，冷漠。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发现车窗留了一条缝，赶紧神经质地关死。

“我绝对相信，这个时候，但凡有人起哄，这些像马蜂一样扒在车身上的人会迅速把我给吃了。”

曾有一部讲述中国重大事件的西方记录片，注意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于是把当下社会划分为中国 A 和中国 B，他们差异巨大，泾渭分明。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 2008 年达到最大。超过了 3 倍。几亿农民涌向城市，但他们仍然是 B 面，只有个别类似雪莉那样的孩子，鲤鱼跃龙门，得以跻身 A 面。

中国 A 和中国 B 相互陌生，像一条铁道的两根钢轨，极少有接触机会。在那辆红色富康车前面，A 面和 B 面意外地交错 30 分钟，陈晓琳壮着胆鸣喇叭，蚯蚓一般从流沙里爬出来。她感到“头皮发麻”，接着又哭了起来——她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幼小的孩子，被挤来挤去，那孩子和陈晓琳的孩子差不多大。

由于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的骚乱，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竭尽全力，做着火车站滞留人群的劝返工作。广场的高音喇叭里，电台广播里，手机短信里，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善语气不时传递出来，劝慰民工们留下来过年，还帮他们计算回去与留下的成本对比。

高音喇叭忽略了另一样重要的成本——情感需求。比如赵宝琴，她必须回去过年，那里有亲人、尤其是读大学的女儿，那是她活着的意义所在。与赵宝琴一样，很多农民工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没有成本概念。

《南方周末》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的这么一段场景——

战士贺柳明与同伴组成人墙，极力阻挡着失控人潮的一次次冲击，不断有战士遭到攻击。民工们相信，只要进到车站，就可以回家过年，这信念几乎碾碎了文明社会的所有规则，在凄风冷雨中受困多日的人们快疯掉了。

许多人冲着贺柳明他们喊：“你们没有良心！”

贺柳明怒了：“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竟传来这样的嘶喊：“死也要回家！”

农民工的思乡情，与战士的并不是一回事。在城市，农民工只是工厂里、工地上的一件零件，只有回到故土，他才成为家庭的一员，成为亲情的载体。生存残酷，尤须情感的微光以取暖。

劝慰措辞中严酷的一面——比如极言铁路瘫痪的严重程度，运力恢复的不可预期——反倒更容易让民工们放弃回家的执拗念头。既然可以免费退票，那就去退了吧，很多人无奈地做此选择。曾拥塞近 20 万人的广场，一度只剩下 3 万多人。

死也要回家

31 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承诺，滞留广州旅客 5 天内可全部返乡过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太过乐观的信号升空，局势重新复杂起来。

受官方承诺的鼓舞，人潮又涌回广州火车站，而铁路运力恢复得有限。这次滞留的人数，甚至比退潮前还要多。

赵宝琴也攥着火车票，重新站到危险的边缘。

离上一次吃东西（拳头大的一块馒头）已经 48 小时了，而与广州火车站的距离，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赵宝琴快支撑不住了。在她前面，不断有昏厥的妇女、儿童、老人，被人们举过头顶，手手相传递出来。

据说，个别对广州站熟门熟路的人，靠带人从小路进站发了财，最高的时候，“引路费”叫价为 500 元。赵宝琴的老乡们也在寻找找突破的办法。

2 月 1 日白天，老乡得到一个消息：有人爬上头顶的高架桥，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缺口，跳进火车站。

在庞大的焦躁而绝望的人群中，任何一点新消息的闪现，都会导致人流的蜂拥。哪怕有

人说，井盖下面有进站的路，周围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跳下去。

那天夜里，赵宝琴与杨小英等老乡一起，由一个出口进入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脚下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潮依旧躁动不安，赵宝琴她们加快脚步，产生了一种逃脱地狱的复杂感受。

高架桥有两条分支，一高一低，类似于“水立方”里错落的10米台和三米板，水平与垂直方向各有两三米的距离。要通往火车站，需要从高的分支跳到低的分支。近50小时没吃没睡了，赵宝琴有点眩晕，她让其他人先跳，自己壮壮胆。

同在毛织厂打工的杨小英跳了过去，其他老乡也跳了过去，就看赵宝琴的了。跳过去，坐火车，换巴士，再换小三轮，就能到家了。

赵宝琴的家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安远镇大城村，毗邻新疆，那是一块贫瘠得连野草都鄙夷的土地。赵宝琴三代同堂，年迈的父母卧病在床，二弟瞎了一只眼，小弟从小智力有缺陷，全都讨不到媳妇。只有妹妹嫁了邻村相对宽裕的人家，但每次偷偷贴补娘家被发现，都要遭丈夫一顿暴打。

命运赐予赵宝琴的是另一种不幸——女儿5个月的时候，丈夫就离家出走，此后20多年再未见过。

2004年，赵宝琴开始达到足以抵消一切苦难的奖赏——女儿雪莉考上了郑州大学。为了支持女儿读书，赵宝琴离开村子，外出谋生。她在内蒙古捡过辣子，在北京做过小保姆，在兰州推车卖过凉面，做什么都无所谓，她只需要保证每年给郑州的女儿寄出不低于2000元的生活费。但这些零碎的工作，很难给她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年多以前，听村里人说，广东打工比北方能多挣一两百，赵宝琴就随别人到了东莞。赵宝琴身体羸弱，三四年还切除了子宫，加之没有什么技能，在工厂里只能胜任最低级的工种——查衫，就是检验产品的质量，月收入1000元。

临去车站前，赵宝琴跟女儿通了电话，她请雪莉放心，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而且，再也不出来了。

赵宝琴背着包裹，忐忑地站到了“十米台”的边缘，她调动全部的力量和勇气，奋力一跳，却没能如愿踏上“三米板”。她所跳离的位置，确实差不多有10米高，她疾速下落，下面不是碧蓝的水池，而是坚硬的沥青路面。

在跌落的瞬间，她张开一只手，本能地去抓高架桥道路旁的花草，而另一只手，还死死攥住那张火车票。

腊月的最后几天，南中国的不安在加重，而2月2日这一天，噩梦更是频繁造访几近崩溃的广州火车站。

是日凌晨1点40分，赵宝琴高空失足；5点20分，32岁的湖南人李满军死于复合伤，他试图从广州火车站的天桥跳下，结果触碰高压电线；也是在这一天，17岁的湖北女子李红霞被宣告死亡，她在前一晚车站外广场的人潮蜂拥中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死也要回家。震撼了贺柳明的那声嘶喊，竟一语成谶。

截至2月12日，来自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此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已造成107人死亡，8人失踪。志愿者宋志永在赶往郴州救援的路上看到，真的有人被活活冻死在野外。

巨大的窟窿

“咚”的一声闷响，赵宝琴跌落到地上，就像一个大包裹掉下去，杨小英等人连一声叫喊都没听到。那把被她揪下的花草，也在须臾之间落地，零散地分布在赵宝琴身边。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时，赵宝琴的包裹已经不见了，里面有她的身份证。

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赵宝琴头部肿胀，比原来大出一圈，嘴角还在流血。广州的一些媒体，以及英国《卫报》，都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生死未卜的女工。两个海外的《卫报》

读者，捐出善款，这也成为后来赵宝琴手术的主要经费；一个在广州做保安的甘肃甘谷县男子，热心地跑到病房，他说在报纸上看到赵宝琴有难，都是老乡，过来帮帮忙。

2月4日，妹妹和二弟赶到了医院，赵宝琴并未因此而醒来，依旧处于深度昏迷中。

诊断的结果，赵宝琴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医生完成了一侧的手术，然后停了下来——第一次的手术费61782.25元，赵宝琴家属虽得到资助，仍无力全额支付，欠下了28782.25元。医生提醒说，左髌部的手术必须尽快做，但目前欠款太多，他们爱莫能助。

妹妹记得，赵宝琴在村里的时候，缴过2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若遇到特别重的病，好象报销的上限是1000元。但对于此刻的大窟窿，实在是杯水车薪。

二弟想不出办法，哀求院方说，我可以留下给你们打工，一分钱不要。院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很显然，类似的想法他们经常遇到。

医院催促赶紧筹措手术费，接着，他们显出比较通情达理的一面：要是实在连第一次手术费都补不上，你们起码得赶紧出院。

赵宝琴继续昏迷，不知道春节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家人身处困境。她大小便无意识，每天要用去二三十条尿布，这笔开销太过沉重，以至于赵宝琴弟弟妹妹每餐共用一盒2.5元的白饭充饥。

弟弟妹妹从来没到过城市，去买尿布的时候，不敢过马路，得拉着魏二林的衣襟——瞎了一只眼的弟弟说，担心自己再出事儿。

魏二林显得见多识广一些，他帮着跑相关部门，又联系毛织厂，希望得到救济或补偿。

跑了一圈，魏二林带回一个难题：民政部门说，按规定，可以发放5000元的救济，但是要见到医院的发票；医院方面说，要开发票得把账先结清。赵宝琴的弟弟妹妹不晓得什么外国文学，但毫无疑问，他们遭遇了海勒描述的“第22条军规”。

昏迷10天以后，赵宝琴睁了一次眼睛，从此进入半苏醒状态。稍微清醒的时候，赵宝琴会因身体里的巨痛而呻吟，这时，妹妹把一支棒棒糖递过去，44岁的赵宝琴把大樱桃一般的红色糖球含在嘴里，不停地吮吸，世间之忧愁痛苦仿佛也在缓缓融化。

吮吸完毕，赵宝琴把左前臂举到嘴边，当作了电话话筒——一只缠着厚厚绷带的话筒——“女儿女儿”地喊，她含混地叮嘱：“女儿，你将来要做医生，要记得对病人好一点。”

一位面目清秀的男记者进来采访，赵宝琴将其当作女儿，拉住了他的手。

元宵节到了，赵宝琴病情渐渐稳定，只是家人无法筹措到更多的费用。“回家吧。”弟弟妹妹下了决心，虽然不知道回去以后，他们的姐姐有没有可能修复碎裂的左髌骨。

对于忙前忙后的老乡魏二林，赵宝琴的弟弟妹妹先是感激，接着是依赖，再后来，就暗自提防起来——一个所谓的老乡，又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热心？直到被魏二林送进火车站，赵家人也没想明白，这个不相识的老乡有什么图谋。

回家的列车上，赵宝琴更清醒了一些。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了，只有那张火车票还在，它是赵宝琴无奈之下从“黄牛”手里买的，成交价410元，票面价格271元，那个“黄牛”她还认识。当初被广场广播劝返的那次，赵宝琴曾去退票，但没有成功，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一张假票。

郴州死过一回

灾难其实是一个链条，赵宝琴在广州遭遇的不幸，或许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出解释。如果要选一个很特别的城市，那就去京广线上的湖南郴州吧。

1月13日，细雨飘飞，是南方冬季偶有降临的冻雨。只一个晚上，郴州的屋顶、路面开始结冰——通常，只要次日太阳出来，薄冰自然消融。糟糕的是，第二天，雨没有停歇，太阳也没有出来。1月16日，郴电220千伏东朝线72号铁塔的观测数据显示，导线覆冰已达到10毫米，逐渐接近电网建设时的高压导线覆冰值标准——15毫米。

赴郴州调查的发改委专家组曾发现，一座原来只有六吨重的双回线铁塔，结冰后重达五十吨。那些被冰层包裹的铁塔和电杆，就像长坂坡上披着厚重铠甲的常山赵子龙。

72号塔的人工除冰1月24日早晨8点开始，19时结束，可还没等电业局松一口气，暴雪不期而至。仅仅两天之后，1月26日，观音阁观冰哨传来的信息是“覆冰再次超过40毫米”，“铁塔已经不行了”。

铁塔倒塌，京广线阻断。

冰灾罕见，许多倒塌、断裂都在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范畴。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好解释的怪现象。比如在湖南的一条输电线路路上，1971年架设的电力线路杆没折断，1996年修建的却率先断了，而且，脆弱得如同苏打饼干。在折断的水泥杆中，人们发现，所谓的钢筋只不过是筷子那么粗的铁丝。而在贵阳，一些倒掉的水泥杆里面则干脆连铁丝也省略了。一些倒塌的铁架子，居然会一下断成三截，而且齐刷刷地断在了焊接处，不像折断的，倒更像是用刀切开的。

100多天以后，在四川大地震的现场，类似的“豆腐渣”也绝不鲜见。

水泥电线杆倒了，铁塔也倒了，原本存在的电力紧张，此刻已升级为电力的灾难。而郴州则是电力设施损毁最严重的地级市，城乡居民开始了物质匮乏的漫漫长夜。

关于郴州农村的情况，记者韩咏红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家住荷叶坪村的杨姓老夫妇现在能娴熟地在黑暗中从农舍一个屋子摸到另一个屋子。在厨房里点蜡烛烧饭做菜，勉强看清锅子里的食物，碗中的饭菜，模糊分辨出猪肉、鱼肉。

“有电就好了。”杨老太太说。荷叶坪村虽然离市区仅20余公里，城乡差距泾渭分明。入夜，驱车经过山村，四周无声仿佛无人烟。晚上9点在一些村口鸣车笛兼大声叫唤，除了家犬吠声回敬，无人搭理。

此地的手机讯号上周刚恢复，村民总算有了和外面直接沟通的渠道。

少数熬不住“黑”的人家自己买了柴油发电机，但成本很高，一个800瓦功率的发电机每小时耗油本钱将近2元，何况电力不足时，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是夹生的。

在无电的农舍转两天，记者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黑夜降临时，身外两米处全看不清，背包放哪里去了？手中拿什么、用什么把握不住。电视和电一起歇业，村民晚间娱乐只剩下烤火聊天。但夜夜如此，也没有那么多好聊的，一小群人很快陷入寂静。

在城市里，对电的依赖尤其严重。这些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

约65万人口的郴州市区，1月26日开始全面断电、断水。

对于这段晦暗日子，外贸商人肖峰说起来一肚子不快：“当时就很烦躁。冷，到哪里坐也坐不住，躲也躲不了。后来手机也打不出去，货不能进出，股票没法卖。找一个有电的饭馆吃饭，找遍整个郴州市。”

生产和正常生活一般瘫痪，人们用矿泉水煮饭，很多天不洗澡。有人住进有自备发电机的宾馆，宾馆有热水，但开不动空调。南方天气湿冷，白天室内比户外还冷，出了门又忍受风寒。很快的，物价开始失控，比手指略粗的一根蜡烛从两毛钱暴涨到两三元，一块蜂窝煤也从一个5毛钱暴涨到五六元，倒是年关偶有发生的盗抢行为，那一段很少听说。

郴州成为一个孤岛般的城市，时光也好像倒退到30年前，发电机等物质需要政府批条子才能购美。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暂时告别了城市文明，由于机器无法运转，出现了用原始工具石头碾米的场景。

胎内的婴孩不会因为生活多艰，而推迟降临人世。在郴州，由于多数医院自主发电难以保证，产妇大多涌入人民医院，有49张床位的产科，最高峰时安置了149名产妇，他们还曾在凌晨3点紧急将23名加护婴儿从分院转移到中心医院。

大年初一，在市内两个尚未复电的地区，部分市民上街抗议，政府被迫封了两条路，并进行安抚。当晚，全城通电。

春节期间，外界报道郴州恢复供电，事实上，主要是 65 万市区居民的节日夜晚温暖和明亮起来，在部分县城及广大农村，灯火在春节后的一个多月里才次第亮起。

农历大年三十，唐山玉田县东八里铺村的 13 位农民包下一辆面包车，星夜赶往湖南郴州，他们要去帮助灾区抢修电力设施。义举的发起人是 35 岁的宋志永，他独自承担此行的全部费用。

由宋志永、魏二林等人开始，志愿者的光辉一再照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警钟的一次鸣响

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后，痛定思痛，舆论开始关注天灾之外的灾难因素。

2005 年 2 月初，湖南部分地区遭遇过一次严重冰灾，被多位湖南省电力专家确认为“五十年一遇”，覆冰超出了设计标准。那一次，湖南中部的宁乡县与益阳地区部分主网铁塔倒塌，所幸没有引发电网的全面崩溃。湖南的电力系统后来还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强化防冻融冰工作。

只能说，这是一大片命运多舛的电网，在三年之内就出现了两次“五十年”。

在郴州，其实有两张电网，一张是电业局管辖的隶属省电力公司的国电网，拥有火电和水电两种电能来源；另一张是市属郴电国际的地方电网，依靠小水电。国家电网处垄断地位，占郴州 70% 的市场份额，而作为地方支柱企业的郴电国际则占据了中心城区 2/3 以上的市场。

由于背后的财政归属不同，两张电网时有利益纠葛，有媒体指出，不同电网间难以相互支援，也加重了灾难的危害。除了电力系统，整个政府部门条块分割的弊端，也在大雪灾面前充分暴露。

多数人忽视了冰雪造成的另一重灾难：生态的破坏，它可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可以恢复的。

在覆冰的重压下，铁塔纷纷倒掉，参天大树同样无法幸免。《南方周末》记者丁补之看到，在湖南省境内，生长了十几年的乔木成片成片地倒下，“嘎巴一下，断在那里，就像一根大牙签。”

长期的低温，无论树木、农作物、牲畜还是野生动物，都面临生死考验。仅安徽一省的不完全统计，就有 29 万野生动物冻死、冻伤。广州花都的 10 万亩鱼塘，八成以上陷入严重灾害，200 万余斤热带鱼冻死。

这个冬天，欧美部分国家也遭遇罕见的暴风雪。有专家提醒说，我们不过是听到了一声警钟的鸣响，随着环境恶化，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将更频繁地造访。

雪灾消退时，一些媒体替中国公众向大自然表达了一丝嗔怪之意：天公竟不作美，破坏了这个国家欢庆奥运的美好心绪。当时也出现一种中国式的自我安慰：这只是好事多磨。

人们并不知道，对于整个 2008 年，雪灾也仅仅是警钟的一声鸣响。

2 月 6 日，中国农历除夕夜。为慰问坚守岗位的奥运建设者们，北京奥组委、北京团市委、北京志愿者协会在“鸟巢”工地为建设工人们献上了一场新春晚会。寒夜里，工人们毛线帽子上套上安全帽，略显滑稽，他们挥舞荧光棒，露出很满足的神情。

2 月初，“鸟巢”外的几千盏景观灯调试完毕，春节期间放射光芒，烘托喜庆的气氛。

二月·狂欢节

2008年春天，耶和華准备原谅一个28岁的年轻人，接纳他为基督信徒。这是一个看起来最需要上帝拯救的人，他属于光怪陆离的世界，有过放浪的私生活，这种放浪还不慎走光，导致几乎整个华人世界方寸大乱。

没错，他就是史上最震撼娱乐新闻的男主角，娱乐明星陈冠希。他向上帝求解人生，他也记得曾对公众的承诺：做一点慈善之事。

据香港《东周刊》描述，成为基督徒的背后故事也很符合陈冠希的个性——引领他走向教堂的是美国加州年轻的牧师马正远，也是一位香港富家子弟，叔父是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马牧师也是媒体所称的“潮人”，生活时尚，特立独行，曾用Rap的方式唱颂歌。

如果教堂的钟声真的可以帮这个年轻人找到内心的安宁，它真应该在更早的时候为他敲响。

假如生活欺骗了他

1980年10月7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一个皮肤白皙的华裔婴儿降生。这孩子取名陈兴华，英文名Edison，他的曾用名还包括陈兴——拥有多个名字的好处，会在遭遇麻烦的时候得以体现——差不多20年以后，他成了一个名叫陈冠希的娱乐明星。

不过在那个时候，他的出生平淡无奇，其父陈泽民尚未成为香港娱乐圈左右逢源的大人物。

时至今日，陈冠希都不太愿意回想童年，它动荡、贫苦而破碎，9岁之前，他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甚至家里人都很少提到父亲。童年仿佛是在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货车上度过的——他和母亲、姐姐的生活总是漂泊不定，由于经济窘迫，陈冠希一家不断地搬进更廉价的房子里，平均每年至少要搬一次。

在这个母系主导的单亲家庭里，陈兴华渐渐变得孤僻、任性。世界可能是美好的，但不属于他。

10岁那年，陈兴华被父亲接到香港，生活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已在香港出人头地的父亲成了家庭主角。而美好的世界来得太突然，陈兴华住进了豪华的房子，坐的是高级轿车，随时有菲佣服侍。

父亲终日周旋于名利场，陈兴华以一个更放纵的少年形象，来报复孤寂，也报复自己贫困、落魄的童年。

14岁，一个恰好逆反心理萌动的年纪，陈兴华遭遇了人生第一个巨大打击。他发现自己竟在谎言里生活了十几年——父母其实早已离异，只是找各种借口蒙骗他。所谓善意的欺骗，终究也是欺骗，陈兴华难以再相信这个世界。他在父母眼中变得更加桀骜不驯，性情乖戾，甚至一度与他们势同路人。直至成为大明星陈冠希之后，他仍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

还有比家庭残缺更恐怖的噩梦。在香港，陈兴华无法回避周围人的猜测和私语，他们怀疑着父亲陈泽民的性取向并津津乐道。一个十几岁少年眼中的世道，充斥的只有两样东西：欺骗和嘲笑。

这个钟爱Hip hop的少年，眉目俊朗，扮相新潮，在获知父母情感真相之前，他已开始了自己的罗曼史，并把它搞得复杂而迷乱。他曾把好友的女友据为己有，在此之前，他说自己也曾是类似故事中的受害者，气得快要疯掉。

在陈泽民的庇护下，香港娱乐圈在2000年冒出了陈冠希，他迅速窜红，也一直是八卦新闻的常客。比如邮包被查出藏有大麻，比如在街头被人追打，比如与其他男星争夺女星……

他以相机和 DV 记录与多位女明星的最私密生活，在维修电脑的时候，那些影像资料被窃取并外泄，媒体把它们称为“艳照”、“床照”或“淫照”。

U 盘疯了

1 月 28 日早晨，香港某基金公司 25 岁的职员晓兰照例打开电子邮箱，惊异地发现里面几乎要爆掉，很多朋友给她发来了内容一致的照片，是一对男女青年的床上照片，看上去像极了香港艺人陈冠希和钟欣桐（艺名阿娇）。晓兰还在错愕间，其他同事的电子信箱陆续打开，办公室里顿时乱作一团，人们大呼小叫，就如同收到了白色粉末邮包。

晓兰和她的同事看到这些照片的时间不算晚，要知道，前一天晚上，它才在网上“香港讨论区”的“成人贴图区”出现，并引起争论——这是电脑合成的，还是来自现实？一些人像侦探一样，搜索出陈冠希住处的视频短片，与照片背景进行对比，更多的人则忙于转贴，发邮件，兴奋地投入传播。

当然，晓兰也绝对算不上先睹为快，几乎在一夜之间，那张照片像核爆一般扩散开来，互联网的“分享”精神得到完美体现。

1 月 28 日早晨，大陆地区打开电脑的人们同样大呼小叫。在此之前，他们生活中的八卦焦点还是电视台主持人胡紫薇，她在 CCCTV 的奥运频道启动仪式上抢过话筒，指称仪式主持人、自己的丈夫张斌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香港“艳照”事件不仅瞬间覆盖了电视主持人的八卦，而且高潮迭起，最终成了中国娱乐新闻的一个极至。

2 月初，香港知名娱乐评论人查小欣带着儿子去商场买衣服，导购小姐问另一位男性导购：是否看过“艳照”。男导购竟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叠打印出来的“艳照”。

更多的年轻人不需要打印，他们随身携带 U 盘，满足身边渴望看到“艳照”又苦于上网不便或不擅搜索的人。那些大容量的 U 盘，装得下几百张像素不高的图片，潘多拉的匣子打开了，周围一切随之疯癫。

中国没有狂欢节。但 2008 年的农历新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度过了心理上的狂欢节。如果这节日需要一个吉祥物的话，就该设计成一只卡通形象的 U 盘。

当时流传的调侃说法是，春节期间，一个网民假如不是被雪灾困于路上，那他就一定守在电脑前，不断地刷新……人们以不同方式从“艳照”狂欢中获得满足——要么忙于辨别真伪，要么等待“艳照”更新，要么与他人比较收藏照片的数量，要么加入激烈的讨伐或论战。

你想象得出，在幽暗的房间里，电脑显示屏的微光下，依稀看得清的，是一张亢奋的脸，和一双放电的眼睛。

乐趣不止于偷窥和“分享”，网络上到处是恣意的品评和调侃。比如某某女星的毛发过重，某某胸部的尺码太小，比如陈冠希的摄影技术与周正龙之比较。

据报道，一位香港的中年男子，在高度亢奋中连续搜索“艳照”10 小时，竟致昏厥。

在深圳，市民李先生曾申请注册“冠希”、“阿娇”商标，他说自己通过报纸得知，有人借“艳照”事件非法刻光碟牟利，于是受到启发，想出一个可以合法赚钱的方式，那就是注册商标。

一位网民在帖子中写道：“这个春节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和烦恼，跟冠希一起娱乐了一回，以下是我春节的生活安排：凌晨二点至中午，睡觉；午餐，打开电脑，上新浪、QQ（腾讯）、搜狐、网易浏览冠希新闻，收索艳照；晚上，上百度陈冠希吧关注最新动态，晚蹲“天涯社区”静候最新一批艳照的出现，上 Q 跟朋友交流，期间也满足了很多对陈冠希抱有强烈兴趣的女同学、女同事、女性朋友的要求，一一给她们打包上传照片。就这样过了一个春节，电脑里最后多了四百多张的照片！”

另一位网民说，春节前后，差不多所有能上网的电脑，内存里都多出了 400 多张图片（后来增加到 1300 多张）。

这个喧嚣的农历正月，在陈冠希之外，无疑诞生了新的主角，它们是可怕的网络，和隐于其后的那些可怕的人。

在全球华人最大社区天涯论坛上，艳照帖子的点击率最终被推到了 3000 多万。“这么短的时间，确实创造了历史。”天涯社区总编辑胡斌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坦承，“对于任何一个网站，从点击率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

按照网络世界的语言，这个超长帖子被称为天下第一“高楼”。

“这是一座用低俗和下流建成的大楼，但却闪烁着自由与民主的光辉”。这句来自天涯网友的话，成为“艳照门”中赞颂互联网自由的名言。人们感激着互联网，偶尔也有些许的忧虑：假如隐私被网络无限放大的不是这些明星，而是……

在广州，一个懂懂的广州市民成为新的娱乐对象。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他：“你对‘艳照门’怎么看？”这个男性市民紧张地回了一句：“不关我的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打酱油”以惊人的速度成了流行语，人们竞相以此调笑，像是在嘲弄那个男性市民无厘头的回答，更像是对这个民族久已有之的犬儒主义投以会心一笑。

错误的道歉？

2月1日凌晨，陈冠希更新 blog，主要是发布新片《神枪手》的两幅剧照，剧照中陈冠希端起狙击枪，表情冷酷地目视前方，旁边的英文说明中除了简要介绍影片，还有一行字：“脱掉军帽，你们的 Edison 扛着枪回来了”。

这次 blog 更新被外界解读为陈冠希的“挑衅和反击意味”。人们还联想到陈冠希之前的英文 blog 内容，大意是：我讨厌这场游戏，不过不讨厌游戏中的玩家……如果谁整我，我也会整回来的！在这里我就是冲在最前沿，你最好知道这一点。

农历新年，陈冠希出现在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风波中的男主角身旁紧跟的两位外籍保镖，机警地环顾四周，据说他们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陈冠希低着头，穿着低调，还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

舆论并不准备放过这个跑到北美的风云人物，报章的头版依旧满是打了马赛克的“艳照”，评论栏里则在指斥陈冠希是没有担当的“缩头乌龟”。

2月初，陈冠希终于打破沉默，向传媒发放了一张自拍光碟，他首度向受害人表达了歉意，并认为“事件不但伤害了受害人，也伤害了整个社会”。

那张全长 1 分 23 秒的自拍光碟中，背景为一堵灰白色的墙，陈冠希平日爱穿新潮的、动感服装，那天却换成了不显眼的白恤衫。这位公子哥着装依旧齐整，但头发略为凌乱，面露疲惫。他很严肃地对着镜头开口，像后来的记者会一样，使用的是英文——

“希望所有人能帮助事件中的受害者，如果你也曾下载这些相片，请不要再传给其他人，如果你仍拥有这些相片，我强烈请求你立刻销毁它，这有助她们走出伤痛，我请求你们帮助受害人，不要令情况恶化下去。”

那些传播照片的人，反倒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世间有如此放荡之公众人物，他们必须在惊愕中再多看几眼。

后来传出消息，陈冠希要回港协助警方调查。2月21日凌晨，他以“陈兴”的身份购买机票，由洛杉矶取道马尼拉飞抵香港。

当日 15 时，在香港九龙湾国际贸易展览中心，金碧辉煌的圆形大厅聚集了超过 300 名记者（有香港记者打趣说，当初特首董建华辞职也没这么多人），除了两岸三地的媒体之外，更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欧美驻港的记者到场旁听。前面的讲台被一圈铁栅栏围起，很大的一张桌子铺着银白色桌布，像个巨大的审判席。陈冠希出现了，他身着白底竖条纹衬衫，深色休闲西装。袖子很长，而且长得稍微多了一点，以至于仅能隐约露出指尖。

他拿出准备好的底稿，约 6 分钟的英文朗读中，“sorry”的字眼共出现了 13 次。

当时，身在温哥华的陈母 Carol 在家收看 CNN，才知道儿子已返回香港。“看到 Edison 道歉的那一刻，我好想打电话跟他讲，道歉的应该是我，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我和他爸爸感情出现问题，让他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长大，所以才会让他的性格反叛。”

记者会上，陈冠希宣布将永久退出香港娱乐圈。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近六成网友愿意原谅道歉后的陈冠希，但喧嚣的网络争论并不准备平息下去。该不该道歉，谁更应该道歉，成为人们新的激辩主题。

有人试着揭示娱乐业的本质。专栏作家长平认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消费社会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名人和大众的关系也被越来越多地解释为买卖关系；一个叫“江湖-剑”的著名论坛上，网民“大头大头”认为，陈冠希选择道歉，是因为道歉符合他的商业利益，与道德无关。

有人在叹息公众的道德缺失。某媒体评论发问：参与传播艳照的公众和媒体，难道不应该向陈冠希道歉吗？天涯论坛上，一个化名“该道歉的是谁”的人开始自省：“其实，陈冠希，和他的女友们，一切的所做所为，并没有比你我更下流。”不过，这样的声音仍显微弱。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也很关注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响，他们将陈冠希与美国女星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相比较，称两人都有不雅照片流传，但命运却大不相同，在美国，性丑闻有助演艺事业，在亚洲却面临道德审判。

21 日的记者会之后，查小欣有点懵懂：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陈冠希为什么要向公众道歉？查小欣接受采访时说，陈冠希的公开道歉，不过是屈从于儒家文化下的道德压力。

2008 年 12 月，陈凯歌导演的影片《梅兰芳》在中国公映时，一个久已有之的传言也最终被证实：这部影片片长 160 多分钟，但是梅兰芳与青春年代的福芝芳（钟欣桐饰）的戏份全部被删，至少三场与剧情有重要关联。钟欣桐的“艳照门”事件曝光后，迫于梅兰芳家属等方面的压力，这个“有伤风化”的演员从这部她很看重的电影中消失了。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有过多年海外生活经历，让他大感诧异的不是明星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从香港波及内地的民众狂热。“这一场喧嚣不过是中国人身体欲望的扭曲表达”。

学者李银河则在 blog 里评论说，事件当中最有意思的是几种网民心态的呈现——

第一，娱乐狂欢，单纯的高兴，就像狂欢节时人们所经历的感觉；

第二，窥测名人隐私的窃喜，就像所有下流媒体追踪名人八卦受众所感受到的满足；

第三，追寻偶像的阴面品格。迄今为止，人们看到的都是明星光鲜的阳面的品格和表现，网民有发掘某人真实品格的快感。

大陆娱乐媒体《南都周刊》试图做一点心理分析，它把陈冠希定义为“一个少无所依的孩子，一个叛逆极端的公子哥，一个花心自我的明星，一个落寞惊恐的‘逃犯’”。他们以一份娱乐杂志少有的人文笔调，如此描写这个 28 岁的年轻生命：“娱乐圈复杂家族所锻造出的非常躯体，显露着浑浊、扭曲、黑暗，以及少许隐约的悲情……我们不能不说，陈冠希这 28 年，简直是一出华丽的悲剧。”

娱乐业的流水线同时生产着华丽与悲剧，但没有谁会觉得，自己身为看客时，也可能成为悲剧的一部分。

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美国人尼尔·波兹曼认为，在独裁统治下，国家机器会控制人们的思想——就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预言的一样——那当然很可怕；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另一种可怕的情况，那就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娱乐产业让人们满足于简单的、感官层面的愉悦，而不自觉地放弃了思考的权利——就像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在波兹曼看来，后者也是一种“精神毁灭”。

波兹曼意识到了娱乐业的虚妄、扭曲，以及娱乐业对人们思考能力的戕害。但他还无法预见到，网络时代更为可怕，它将放大虚妄，也放大戕害。

娱乐事件终究只是娱乐事件，无论多么剧烈的爆炸，热度也会转瞬消散。陈冠希又去

了北美，人们也转身搜寻新的兴奋点，并不去想自己曾在“艳照门”下的做过什么，更不觉得自己在其中有所失去。

3月11日，国家体育场“鸟巢”周边开始安装外景照明设备。

三月·拉萨不语



铺进拉萨的铁路加剧了两种文明的碰撞 关军 摄

《南方周末》记者覃爱玲于4月13日至5月2日之间住在拉萨，那时城市里早已恢复了平静，布达拉宫前面的路口有手持警棍的值勤武警，也有穿着藏服或西装的从容的转经者。她很想知道，在波及全球的喧嚣之下，拉萨的3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大多不愿谈起3月14日升级的那场骚乱，覃爱玲装扮成普通游客，四处游走，寻找线索。

在大昭寺门前的广场上，两个与手有关的细节让她难忘：广场的某些位置，仍有武警战士持枪站立，几个穿校服的十多岁的藏族孩子几次跑到近前，甚至伸手摸了摸冰冷的枪托，武警回以微笑；一位年迈的藏族老妇人坐在路边，覃爱玲过去与她聊天，老人神态慈祥，还轻轻抚摸了眼前这位汉族姑娘的脸。

这些情感交流让覃爱玲觉得，这里一个月之前应该没有发生惨烈的对峙和攻击，并埋藏下深深的仇恨与恐惧。

被夸大的与被掩盖的

拉萨骚乱最早出现异动究竟是3月10日还是3月12日，说法不一，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异动仅限于非暴力示威，它发生在拉萨几大寺院的喇嘛之中。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早在2006年，哈佛大学就有学生举行了一次会议，主题是如何利用奥运会宣传西藏独立的诉求。他们决定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抵制奥运会，并策划奥运会期间在中国境内组织示威活动。

尚无法判定，那次会议与拉萨的骚乱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3月14日开始，喇嘛的示威开始带有暴力倾向，而拉萨的一些藏民（主要是年轻人）参与其中。拉萨老城北京路附近是骚乱的主要区域，居住在附近宾馆的英国人詹姆斯·迈尔斯（James Miles）目睹了这一切。

迈尔斯是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驻京首席记者。3月12日，刚刚获得官方采访许可证的迈尔斯前往拉萨采访，他成为唯一见证拉萨骚乱并具有“合法”身份的西方权威媒体记者。迈尔斯在华工作十多年，还报道过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1989年的政治风波，2003年的“非典”。

“我看到的是一次有计划的、针对某一民族（或说两个民族）的暴力事件，主要是汉族，也包括居住在拉萨的回族。”迈尔斯在谈到拉萨事件时如是说。

一些藏人也对覃爱玲表示，他们不觉得几乎同一时刻在市区不同地点发生骚乱是一种偶然。现场的目击者还看到，一些藏族女子用布袋背着石头加入骚乱，石头的质地大小比较均匀，而拉萨市区根本不可能随手捡到许多这样的石块。

迈尔斯在街角记录着事态的逐步升级，“参与暴动的人带有佩刀、燃烧瓶和短棍，最初的主要目标是回族（他们基本控制了拉萨的肉菜市场），接着暴力泛滥到汉人的高铺和餐馆。暴乱人群把藏族人开的商店或者餐馆用白色的哈达标记，然后把剩下的商店抢光，砸烂。很多抢来的东西也被堆在街上烧光。”参与骚乱的藏族人向那些来不及逃走的汉族人、回族人投掷石块。迈尔斯亲眼看到一群人向一个10岁左右的儿童扔石块，他跑上去试图阻止。

新华社《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真相》对暴力有着这样的描述：“在江苏东路拉萨大桥车站，民工赵济民刚下公交车，就被一个暴徒用刀捅裂了肝脏。市民冯碧霞被割掉了耳朵。1名无辜群众被暴徒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在中国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中，藏人一直是性情相对温和的族群。迈尔斯接触到的一些拉萨的藏人，也对这样的暴力场景感到震惊。

覃爱玲于4月13日下午前往布达拉宫广场，在正门侧面的一棵大树下，十多个藏民正围在一起唱歌，空口喝着啤酒，其中男女老少都有。看到一位游客打扮的汉族女孩走过来，那些藏人都很开心，极力地劝酒。他们说彼此原来并不认识，有的来自附近县的牧区，有的来自拉萨近郊，都是来朝拜的。他们特意提醒覃爱玲：“不要害怕，上次发生的事只是少部分人干的，现在拉萨很安全。”得知覃爱玲老家是湖南，一位老人马上说，那是毛主席的故乡啊，并唱起了一首歌颂毛的歌曲，周围的藏民都热情地跟着和唱。

这是一个很适合描述藏人世界里信仰选择及汉藏关系的场景。在西藏，达赖喇嘛依旧被很多藏人奉为宗教领袖，而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样被绝大多数藏人所景仰。在许多藏人家庭，同时挂着毛泽东和达赖喇嘛的画像（后者在白天可能被覆盖或翻转过去）。

即使有所不满，也主要是针对政府。比如某些官方媒体“揭批”达赖集团“反动面目”的宣传，多数藏人还难以接受人，认为这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

民间的不满远没有上升到仇恨的程度，它被一次动机复杂的骚乱夸大了。覃爱玲接触到

的藏人中，基本都不赞成以暴力表达不满，更不支持针对普通汉人。在西藏生活 10 多年、网名“聊胜于无聊”的汉人回忆说：“汉族人受到尊重，在西藏是历来的传统，听一些老西藏描述，在很多年里，一些普通的藏族老人，甚至依然保留着见面对他们伸舌头的礼节。”

许多亲历者向覃爱玲证实，汉族人和回族人的确在骚乱中得到藏人的很大帮助。一个与覃爱玲相识的藏族青年 3 月 14 日下午经过青年路口，碰到一个头部流血、伤势严重的汉族人，便骑着摩托车将其送到急救中心。

当偏见遭遇谎言

迈尔斯说他没见到中国警察、军队和藏族暴乱分子的正面冲突，尤其令他惊讶的是，似乎官方没有一开始就强力介入。直到 3 月 15 日中午，他才见到携带武器的武装人员。这与覃爱玲了解到的情况颇为吻合——3 月 14 日白天，维持秩序的武警仅手持盾牌自卫，被手持石块和铁棍的一些藏人从宇拓路逼出八廓街地带，然后就完全撤离了这一区域，八廓街经历了一个放纵的夜晚，参与骚乱的藏人到处打砸抢烧，局势直到次日清晨才被政府控制。

迈尔斯描述说，在拉萨旧城区的中心地带，一群藏族人用石块扔向武装人员，但后者并没有快速前进，而是一直保持克制，多次使用催泪瓦斯。武警“偶有开火，也是零星和有序的，目的在于警告而不是杀伤”。迈尔斯认为，按中国的标准，这次行动“相对克制”。他分析说，如果武装人员一开始就介入，肯定会发生流血冲突，会对正在举办奥运会的中国不利。

一位骚乱期间恰好在拉萨的丹麦游客，向一份叫做《Politiken》的报纸讲述了自己的见闻，他的“证词”和迈尔斯的说法基本一致。丹麦人说自己看到僧侣和一些十五六岁的人袭击汉人商店，砸坏门窗，点燃物品，并殴打汉人，“攻击非常暴力”。他曾看到两个汉人被殴打，并觉得他们可能被活活打死了。开始，警方显得很犹豫，喇嘛和年轻的藏民越来越放纵，直到冬宫附近，他们才遇到配备有武器的军车和警车。丹麦人觉得周围很多东西都被点着了，包括警车、消防车。

这些见证人的眼中，政府在拉萨非但没有血腥镇压，反而显得有些犹豫。一些在八廓街经商的汉族人向覃爱玲表达了疑惑：政府为什么行动迟缓，导致我们遭受严重损失？

按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的说法，被捣毁的都是卖淫场所，而“3·14”之后拉萨实行了逐户搜查，覃爱玲在调查后认定，这些皆非实情。至于流亡政府所宣称的此次事件为“藏人的和平示威”，但“遭到中国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众多藏人死亡”，更是与事实相去甚远。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接近事发现场，出于对中共宣传的不信任，许多西方媒体接受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

拉萨的人们在“3·14”之后沉默以对，迈尔斯的声音则显得弥足珍贵，他先后接受 BBC、CNN 等西方媒体的采访，还在《经济学人》杂志（3 月 22 日）发表题为《TRASHING IN THE BEIJING ROAD》的报道，传播着令西方人信服的信息。迈尔斯成为一个见证者，是他个人之幸，还是中国对外传播之幸？

在 CNN 驻京记者吉米看来，中国政府在“3·14”骚乱后的媒体应对之策，仍是习惯性的封锁，习惯性的用语，这使得他们陷入被动境地，也确实“受了委屈”。

不过，一些秉持客观立场的国际传媒人指出，中共处理方式的疑问手，并不能成为西方媒体错误报道——比如张冠李戴、倾向明显的选择性失明甚至充满“想象力”的描述——的借口。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驻华首席记者吉米、德国《明星》周刊驻华首席记者佳杰思在内的一些新闻人都表示，某些西方媒体人员表现得确实非常主观和不职业。吉米说，CNN 网站裁剪新闻图片的方式让他很难受，也让 CNN 在中国的正常工作陷入被动。

在对中国社会尤其西藏问题的报道上，一些西方媒体确有成见，佳杰思曾在报道中提出“达赖不是天使”、“中国进步巨大”，被总部认为是“被红色收买了”。

3 月 26 日下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集的境外媒体采访团抵达拉萨，来自 9 家外国

媒体、8家港台媒体的30多名记者进行了为期3天的采访活动，这是“3·14”事件后中国官方首次组织境外记者赴西藏采访。

西方舆论对这种滞后的、有组织的报道本来就颇多微词，而采访团在拉萨期间曾遇到喇嘛冲出警戒“控诉”，进一步让西方记者们确信自己的判断——拉萨的“3·14”存在黑幕。

Pankaj Mishra 是《西方的诱惑：如何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实现现代化》一书的作者，也曾前往西藏，深入了解这片土地面对的现代化的挑战。3月22日，他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西藏人的愤怒针对的不是共产主义的统治，而是威胁到他们的传统和圣地的消费资本主义。

Pankaj Mishra 对许多依旧持有冷战思维的西方媒体流露不屑，认为他们“忽略了拉萨街头的暴徒是在攻击内迁的汉族人而不是中国政府的事实；忽视了中国当局目前为止相对克制的表现；更无视这种克制背后中国中产阶级的舆论”。

在 Pankaj Mishra 眼中，“西藏已经被卷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迅速的现代化进程”，宗教自由问题不是西藏的最大威胁。

西藏可以对现代化说“不”吗？

“3·14”骚乱中，主要冲击目标是回族和汉族人的商铺（也有例外，比如内地“小资”津津乐道的、藏族老板经营的“玛吉阿米”餐吧也未能幸免），而且确有许多人临时加入。除了一些有预谋的行动，是什么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暴力当中？迈尔斯、Pankaj Mishra 和覃爱玲得出极其相似的结论——藏族面对现代化的不适和挣扎。他们都不认为这次风波仅仅是历史纠葛的延续。

不妨听听 Pankaj Mishra 的评论——

如同其它地方的农业少数民族一样，藏族人先天就不具有、后天也无法产生对现代化的乌托邦——中国政府承诺的一种城市化的消费生活方式——的狂热信仰……藏族诗人、作家 Woenser 告诉我，文化大革命都比不上现代化给西藏所带来的影响，铁路的通车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影响。成千上万的汉族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涌入西藏的城市，垄断那里的工作，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藏族人担心他们会像北美印第安人一样在保留地内走向衰亡。

《经济学人》写道：“中国希望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可以使‘藏独’的呼声渐渐衰退，结果却事与愿违……西藏在过去七年的 GDP 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12% 以上，2007 年的 GDP 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14%，比全国水平高出 2 个多百分点。但藏人在其中受益多少？他们又是否认为物质生活的提升就是幸福？”

整个拉萨城，如今很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北京路一带的“老城”，藏民聚居，建筑也多为藏式碉房，街道狭窄，满地油污，空气中充斥着酥油和生肉混合的气味，虽然商品经济的潮水正漫进每一处街巷和庙宇，但在风貌与气质上，它依旧是老拉萨；“老城”之外更大范围的城区，以汉民为主，更确切地说，是四川人为主，即使没有满街弥漫的麻辣调料的味，仅从马赛克墙面和蓝宝石玻璃为特色的城市形态上看，也俨然一座中等规模的四川城镇。

铁路加速了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这片土地要面对的裂变，比整个中国 30 年间经历的更为剧烈。

中国内地一些在物质主义中迷失或疲惫的中产阶级，刚刚把西藏和藏传佛教选为寄托理

想主义的乌托邦，他们享受着现代化的馈赠，心情愉悦地乘坐高档列车抵达高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己来追寻的一切，正在现代化的号角下岌岌可危。

一些较早接触现代文明的藏人，也像内地的人们一样陷入茫然。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孔安（Anthony Kuhn）采访过一位转为商人的牧民，那位藏人如此描述转型的心境：“首先，和我家乡的朋友比，我有优越感。我坐着飞机见过了许多大城市。但当我回到家乡，我发现他们虽然一无所有，但极其幸福，而我的新生活却充满了种种忧虑。”

与上述的“现代化的烦恼”不同，城市贫苦藏人的焦虑，更多来自生存困境。

拉萨某职业介绍所门口贴出“急聘藏汉民工 10 名”的广告，标明藏族工资每天 30 元，汉族每天 50 元。一些藏人也向覃爱玲反映，做同样的工作，藏人的工资只有汉人的一半，汉人能吃苦，技术能力也强，即使是一些藏族老板，也更愿意雇佣汉人。

藏民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腐败非常反感——这有点类似内地市场化的早期。那些恪守宗教信仰的藏民尤其不愿意就范于潜规则，比如在竞争中去买通，去贿赂。

与早先的“援藏”不同，21 世纪涌向西藏的移民大多是被市场经济的手推动的。覃爱玲去大昭寺对面小巷的一家理发店里剪留海，来自温州的年轻理发师说，她因为害怕而于 3 月 16 日跑回老家，听说“没事了”，前两天又回来开门营业。理发师很职业地忙碌着，洗头时问水温好不好，剪发时问头发朝哪边梳，不时有藏人喜欢光顾她的小店。

覃爱玲接触的内地创业者大多与这位理发师一样，曾短期离开拉萨躲避骚乱，事态稳定后返回，短暂的动荡无法阻挡商业潮的滚滚洪流。

藏人工作的机会被压缩，其间并不夹杂国家意志和民族隔膜，只能说，来自其他地域的中国劳动力太不辞辛劳、太有竞争力了——这种竞争优势几乎是全球性的，在西藏自然更突出。政府对藏民在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有一些优惠政策，但不足以助其应对来自其他民族的竞争。

西藏感受到的危机，也并非一个特例，在全球视野里，没有哪个族群可以自外于现代化的贪婪的洪流，西藏也肯定会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齿轮。

与不适相伴而行的，则是不可避免的融合。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传统的生活厌倦了，他们的想法更现代。”“玛吉阿米”的老板泽朗王清觉得，年轻人的改变是面对现代文明时的自主选择，“他们喜欢穿牛仔裤、班尼路、看大片，而不是穿喇嘛服研究大藏经，时代已经变了。”

鱼被藏人奉为神物，拉萨河的无鳞鱼大受汉人欢迎，一度让藏人很难接受。不过，现在一些年轻的藏人也开始吃这种鱼了。

拉萨某高中年轻的英语教师罗布曲珍说，由于自己属于公职人员，不能参加日常宗教活动。即便那些不在政府工作的藏族年轻人，也很难像前辈那样虔诚于宗教了。曲珍的父母清晨起来，第一杯水都要先敬佛像，“家里也会经常请喇嘛来做法事。但孩子们一般不会出席”。

在被问到是否也会去磕长头时，在北京中路一家酒吧担任服务员的 18 岁女孩卓玛很夸张地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

做导游的晋美有一件金色的藏袍，非常好看，但也只是每逢藏历新年的时候才会穿，在他家的四口人中，只有妈妈还坚持着穿着民族服装的习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23 岁的晋美基本都穿休闲服，即使全家周三去扎吉寺转经的时候。说起转经，晋美的目光中略有不安和歉疚，他说父母几乎每周三都去，而自己和姐姐因为“工作忙”，一个月只能去一两次。

26 岁的罗布曲珍大学毕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藏文，因为将来想研究一下藏医药。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加，绝大多数藏族孩子都知道掌握中文对于未来更为重要，罗布曲珍所在的学校里，几乎已经没有学生选修藏文了。

27 岁拉萨妇女尼玛从小在拉萨长大，父母是事业单位的退休员工。她初中毕业，和丈夫靠做一些小生意或接待来自内地的游客为生。和覃爱玲聊天的下午，尼玛穿着黑色的皮夹

克和牛仔裤、长发烫了大卷后用头巾扎了起来。她说肯定不会把小孩送到庙里去，希望能进机关单位，“最好是像公安、银行和海关，或者电信公司也不错”。她还感慨说，现在拉萨办事全要靠关系，让人体味到很多世态炎凉。

里库尤克的家位于早已运行多年的西（宁）格（尔木）铁路辐射范围内，这位 52 岁的藏族牧民没觉得铁路直接给生活带来什么，不过他觉得气候越来越不利于放牧了。“天太干了，草场产量下降。”如果只靠 400 多亩天然草滩，里库尤克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 200 多只羊和 20 多头牦牛。从 5 年前开始，他开辟了 8 亩地种草，像农民一样翻耕土壤，关心化肥的价格。现代工业以此方式点滴进入他的生活。

4 月 18 日上午 9 点，“好运北京”国际竞走挑战赛以“鸟巢”为出发地，开始了男子 20 公里的比赛中，鸟巢开放部分座席，第一次正式迎接比赛和观赛者，安全门被调到了最敏感一档，前来采访的记者都要被搜身后才得进入。许多观众不知道进入奥运比赛场馆不可以带饮料和食物，于是在入口处，出现了不少人把带来的食物和饮料强塞进肚子的景象。

四月·残忍的季节



旧金山火炬传递变成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大游行 关军 摄

仅仅在这个下午，旧金山的海滨大道不是民间艺人的天堂。从中午开始，CNN 租用的直升飞机就在头顶盘旋，预示着要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这一天是 2008 年 4 月 9 日，阳光穿透纯净的空气，充分呈现出三个男人古铜色肌肉的质感。他们身材健美，面带微笑，高举着扫帚，一丝不挂地来回游走。其中两个男子差不多 60 岁左右，另一个 30 多岁，他还推着一辆婴儿车，里面的孩子金黄头发。

至少有三万多人，神态各异地观看了这场裸体游行，他们本来是要看真正的火炬和火炬手的，可惜它成了一出“等待戈多”的荒诞剧。三个健美的男子于是一直走下去，走了至少四个小时。

只有少数人看到，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中国湾上闪现了一下，就再也寻不到踪迹。

奥运火炬暗渡陈仓，或许旧金山华人市长的选择是明智的。看看剑拔弩张的两个庞大阵营，它们像两只敞开口的巨型汽油桶，容不得一丁点儿火星的闪现。

“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T·艾略特）”，在 2008 年，它的残忍指向了中国人。如果说，“3·14”事件只是让人们看到少数西方媒体的“别有用心”，那么 4 月的火炬境外传递则显示，居然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

在法国里昂，26 岁的中国留学生李洹也在做出一个明智选择——他克制住自己的愤怒，在思量着怎么说服法国民众放弃对中国的偏见，“用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3 月 29 日，李洹曾在法国电视二台与一位法国驻华记者辩论，他认为自己斗败了对方。4 月 19 日，他将出现在巴黎共和广场，再次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火被点着了

4 月 1 日起，“祥云”搭乘着“CA2008”专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环球巡游。那微弱而执拗燃烧的火苗，让人们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文明的冲突。

酝酿境外传递线路时，国际奥委会认为中国的传递方案过于宏大和铺张，北京方面做了适度的缩减，比如，“祥云”不再需要遍访四大文明古国的遗迹。

2007年4月26日晚上，北京奥运火炬样式及传递路线同时公布，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由于当局对火炬可否登陆台湾岛一直不予明确表态，传递线路直到26日下午仍难确定。在奥运大厦气氛异样的工作间里，每个人都紧张地攥着手机，不断催促其他环节或被其他环节催促——去（台湾），还是不去？悬念一刻不解，许多工作就难以继续。

筹备当晚电视直播的CCTV情急之下制作了两个版本的片子，台湾版和非台湾版。晚会快开始的时候，高层的意见终于一级一级迅速传达下来，答案有了，CCTV的工作人员反倒越发紧张起来，编导反反复复打量手里的两个版本，生怕用错了片子——那对他们而言是不可饶恕的失误——可是越看越觉得眼花，甚至要怀疑自己神志是否还清醒。

高层的决策是，把发布的路线命名为“火炬传递计划路线”，奥妙尽在“计划”二字，主动权和灵活性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把皮球踢给了台湾方面。后来的结果，火炬还是无缘台湾。

即使不去台湾、不去埃及和古巴比伦遗迹，“祥云”拥有的仍是一个堪称壮美的悠长旅程——火炬传递线路拟为13.7万公里，历时130天，火炬手人数21000多名，境外传递城市（不计希腊雅典）21个，路线长度、传递范围、参与人数都为历届之最。尤其是，奥运火炬还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首次被安排登上世界最高峰。

中国方面把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主题定为“和谐之旅”，这是极具中国时代特征与政治标签意义的名字，在特定的语境下，它甚至是唯一之选，当然之选。

在英文表述里，它是“torch relay”，直译成中文应为“火炬传递”，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中国人喜欢称之为“圣火传递”。凡是被神圣化的事物，不仅会引起拥戴者更高规格的推崇，也自然会令那些反对者、“别有用心”人士高度重视。

设计线路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也曾提醒，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可能会遭遇反对的声音，是否可以取消？中国方面很看重这些城市的象征意义，最终没把它们从既定路线中抹去。

北京奥组委的内部文件表明，他们估计到了在西方国家可能面对的干扰，并做了相应的预案。

不过，麻烦似乎比人们预想的要严重。一位参与境外传递的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向《体育画报》中文版记者姜轶透露，即使在伦敦站的传递前后，面对巨大的干扰，整个运行团队仍显得准备不足，工作略显混乱。

这干扰尤其让普通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在火炬传递之前，经媒体不断渲染，绝大多数中国人迷恋于巨大的喜悦、期待与自豪之中，奥运事关一个庞大国家的吉祥，人们不希望也不相信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残酷的现实是，倒霉的事不仅发生了，而且绵延不绝。与它背后的奥运会一道，奥运火炬被各种政治需求挟持为人质，形成了远远超过体育本身的壮观图景。

事态的恶化让国际奥委会颇为忧虑，罗格曾建议，在4月11日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商讨将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路线缩短，更有澳洲委员戈斯帕指出，他一向反对庞大的国际传递路线，建议今后取消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没有消息表明，这些建议在那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和谐之旅”在纷乱中继续，它无情地宣告，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和谐，还只是一个理想与目标，而非对现实的描述与赞美。

“祥云”在伦敦传递的时候，天降大雪，却依旧人潮涌动。

英国电视channel-7的当日转播中安排了一次与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的连线，不巧的是，电话接通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听起来正在和旁边的人愤怒地抱怨：“他们（指火炬

护卫队成员)粗野地推搡我,简直就像——打手!”

塞巴斯蒂安的这一段话无意中经由电视传递出去,恶化了公众对于奥运火炬传递的印象。

火炬手之一、节目主持人 Konnie Huq 也认为,火炬护卫队员太富攻击性。“他们大声对我们下命令,比如‘跑!停!’等,我则在想:‘天哪,这帮人是干什么的?’”《每日邮报》援引她的话说,“在我举着火炬的时候,他们不停地把我的手臂推高,他们真是……有趣。”

对奥运火炬护卫队成员身份的质疑,贯穿着欧美段的传递过程。

尽管奥组委官方一再解释火炬护卫队员的“志愿者”身份,却无法完全消除人们的怀疑。据早些时候的中国媒体报道,这些队员都是武警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并经过艰苦的特殊训练,“文武双全”,他们还被要求熟悉沿途国家的语言和风俗。尽管如此,在护卫火炬的过程中还是无法避免一些误解和冲突。他们的“肢体语言”,被西方人赋予了某种象征意味。

在外界的质疑声浪下,中国的火炬护卫队也在悄悄改变形象和行事方式。他们摘下了墨镜,他们反复强调“只防御、不攻击”的原则。几个月后的奥运开幕式上,中国派出威武的军人护卫并升起五环旗,这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却遭致西方舆论批评,认为五环旗的和平意味受到损害。

在法国巴黎,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受雇于中国媒体,想拍摄一组照片,反映法国民众也有大量的北京奥运支持者,他拿着几面小的中国国旗请现场的一些法国人配合,却遭到了一次的拒绝,甚至有人投来鄙夷的目光。在旧金山,打着支持藏独、反对北京奥运标语的西方人,明显多过现场的藏族示威者,而表明自己支持北京、支持奥运立场的西方人,只占现场人数的不足一成。

《财经》特约记者钱亦楠也亲历了巴黎那混乱的一天。在其看来,这种骚乱在巴黎并不算奇观,不应被夸大。“法国民众将他们习以为常的游行文化、对警察的敌对情绪,以及对政权说‘不’条件反射地带到了这次火炬传递中。抵制奥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情绪释放的借口。”

钱亦楠的感觉是,在巴黎街头,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第一次投入到“全真”的民主活动中,尝试以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并被唤醒公民意识,这是最可珍惜的。

火炬传递过程中,一些小插曲既激化着冲突,也在对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做出某种解释。

奥运柔道冠军、法国运动员大卫·杜耶原本很有热情地参与到火炬传递中,但事后却转为失望和愤怒,据杜耶讲述,当巴黎街头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法控制,来自北京的工作人员未加任何解释,一把就拧灭了杜耶手中的火炬。在杜耶看来,自己视奥运火炬如生命,中方人员如此不礼貌的行为伤害了他作为火炬手的感情。而杜耶的不满被媒体传播出去,形成难以估量的放大效应。

个别法国火炬手曾希望佩带与人权有关的标志,遭到中方反对,当他们提出把标志口号改为“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时,依旧遭到反对。

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交流,在奥运火炬巴黎站的传递中,法国舆论渐渐对中方组织者形成不佳的印象:随意更改路线,行事“霸道”,不善沟通。

传递那天,大批法国各地华人涌向巴黎,但李涸必须留在公司上班。到了中午 11 点,他基本没心情工作了,“想象着大家的国歌声,五星红旗飘荡的样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涸一直用手机上网,看直播,并不在意要花费多少钱。他说每次看到红色的影子,心中会“颤抖一下”。

“3·14 日”事件发生后,李涸不大相信西方媒体“血腥镇压”的说法,开始“帮他们找证据”,他说自己一无所获。让李涸不舒服的除了媒体的不客观,还有周围法国人看到华人时怪异的神情,他觉得“耻辱”。

带着不舒服的感觉，李洹开始行动了。他广泛搜集西藏历史知识，研究中国政府的表态，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宣传的信息。李洹在里尔第二大学开过一门叫做《商业情报》的课程，法国情报专家在课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人释放谣言和假情报，应该怎样识别分辨并进行反驳。这让李洹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时，感觉“像是在做练习”。

在“残忍的四月”，法国的华人申请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抗议，留学生们推荐李洹发表演讲，因为他在电视上有过不俗表现。

当地时间4月9日，美国旧金山呈现出本章开头描述的剑拔弩张的态势。此前的消息称，全美将有数千藏族示威者聚集，而前往“保卫圣火”的华人华侨会超过两万——火炬境外护卫队编制为30人，与他们担负相似使命的，是传递路线上的万千华人、华侨，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圣火”的行动。

旧金山是一座以自由精神和宽容度著称的城市，在奥运火炬这个主角缺席的情况下，整个旧金山北部的海滨大道完全成了两个阵营的表演舞台。为中国加油的华人阵营人数上显然大大多于藏族示威者，而后者的组织性更强，不甘示弱。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阵营都不想给对方自由表达的权利，而是选择了压制，压制对方的声音，压制对方的旗帜。

这种情况在下午三点以后更为明显。双方都苦寻火炬未果，转而开始了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大到几百人的对垒，小到两个人的单挑，到处是激烈的论战。

所谓论战，基本都是自说自话，彼此没法说服对方，甚至也没想说服对方。讲了几句道理之后，论战就升级为较量谁的声音大，谁的感情充沛，渐渐地，双方主辩已经激动到鼻尖顶到鼻尖。似乎，他们之间被一堵无形的墙阻隔。看得出，双方也都尽力避免擦枪走火，每当有人推搡“对方辩友”或撕扯对方旗帜，本方阵营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极力劝阻。

论战只是他们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外围，“China Go Go Go”与“Free Tibet”一类口号此起彼伏，华侨华人偶尔还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对阵双方看重的，就是谁可以制造出更强的分贝。

在遥远的太平洋东海岸，上演了中国人如此熟悉的“拉歌比赛”。

旗帜的战斗也在进行着，看到哪里有“雪山狮子旗”招摇，就会有更多的五星红旗拥过来，接着是“雪山狮子旗”增援，五星红旗再增援，都想把对方的气势压制下去。冷眼旁观，你很难说清这到底像一场针锋相对的政见角力，还是一场孩子气的游戏。

辩论会的外部氛围很是宽松，零星的警察慵懒地晒着太阳，那三个裸体示威者来回游走了三四个小时，也未被干涉。如此宽松的环境，反倒凸显出街头论战的激烈程度有些夸张。

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杨恒均在悉尼撰文指出：“（无论）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者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另一些场景的出现倒是令人欣慰——当某些辩论会结束，双方主辩竟可以握一握手，来一句礼貌的英语：“glad to meet you.（幸会）”在伯克利大学进修的刘鉴强说：“不管怎么样，大家在美国开了眼界，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

火炬不幸成了奥运挫折感的象征。在伦敦，它险些被干粉灭火器击中，在巴黎，它先后多次被熄灭，在旧金山，它几乎穿行于神秘通道。

麻烦在抵达西方世界之前已经偶有出现。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火炬在蓝色清真寺为起跑仪式做着准备，距现场100多米开外，二三十名东突分子举着蓝色星月旗抗议，并曾试图冲击火炬，很快被警方控制。

“祥云”有惊无险，但在通过欧亚大陆桥的欧洲段期间，奥运火炬却由于自身的原因熄灭了。没关系，拿出后面的备用火炬悄悄点燃就是了。

据跟踪火炬传递的记者透露，在希腊境内、甚至3月份在北京传递期间，奥运火炬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小故障，不过，这些信息都被有关方面屏蔽掉了。

欧美之旅多烦忧，接下来的几站亚非拉传递，官方媒体不再以“圆满”形容，不过在特殊的防护下，总体上还算顺利。

在印度，传递线路由最初的9公里缩减到仅有2.3公里，且参与安保的警力达到15000人，藏族抗议者曲英不满地表示，印度的做法就像是“在一个军事基地里面传递火炬”。那些火炬手或许也会很遗憾，因为平均每个人的传递距离最终缩减到约33米——参与传递的多达70人呢。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奥运火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总统与新当选的总理同时手持火炬超过一分钟，籍此显示该国与中国一贯的良好关系。火炬手们手持火炬，在完全封闭的真纳体育中心(Jinnah Stadium)内完成传递，而只有受邀嘉宾才有资格现场观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此次火炬接力看上去像一场训练”。

华人护卫队与当地民众的最激烈冲突，不是发生在前期的西欧与美国段，而是火炬即将返回中国前夕。在日本和韩国，支持者与抵制者的对立升级为肢体冲突。中国与日韩比邻而居，文化同根，但潜藏于民心之中的误解、对立乃至蔑视，还要甚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睦。

满怀着火炬境外传递积累的愤怒与屈辱，人们更加期待着国内传递的开始，那将是真正的“和谐之旅”。

奥运到底是谁的？

4月28日，在北京郊区温泉五中的操场上，2155个人举起同样数量的彩板，拼成一张巨大的“明信片”。

Dear fellow athletes, It's our stage, Let's unite, Let the Games begin! Li Ning, athletes, Beijing

几句简单的英语，一共75个字母，却整整占据了一个标准足球场。这次活动是退役近20年的“体操王子”李宁发起的，一些体育名人到场声援，另有几十位运动明星签名参与。他们代表中国的运动员，邀请全世界的奥运参赛者。

那几句英文非常简练，翻译过来，核心意思就是邀请全世界的运动员：嗨，该我们出场了。

事实上，这一天其实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3天呢。并不是现役的、退役的运动明星们真的急不可耐了，他们只是想强调一个原则：虽然奥运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它首先是运动员的（李宁语）。

奥运临近，大型民间聚会在北京很难获准举办，李宁发起的这次活动很快获得特批，至少说明了官方的默许。而这么巨大的投入，甚至动用了热气球航拍（也是需要特批的），也不大可能由2155个志愿者集资解决。

不过，主办方尽量将官方色彩和商业色彩隐去。

这场大型行为艺术的潜台词至少有两个，其一，反对以政治挟持体育，不希望全世界的运动员由于非自身的原因缺席北京奥运会；其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并让公众了解缺席奥运会给运动员造成的痛苦。此前的太多纷扰，的确让人心生疑惑：奥运到底是谁的？

参与活动的扬扬聊起奥运火炬传递的喧嚣，她说最担心的是那些小孩子，小运动员，“他们对奥运、对体育的感情很容易因此受到伤害，怀疑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国外的多数运动员也非常反感政治对体育的过分介入。美国女足明星欧莱利就说：“如果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可做的事情不是用水浇灭火炬。”

要知道缺席奥运会的滋味，不妨去问问杨凌。在连续两次获得奥运射击冠军之后，杨凌开始接连遭遇命运的捉弄。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杨凌在游戏中竟因为意外崴了脚，失去参赛机会；而2008年，奥运项目没有10米移动靶，宣判北京人杨凌将缺席家门口的奥运会。在接受《体育画报》采访时，前奥运冠军杨凌用“痛心”来形容两次缺席奥运的感受。现在，他等于“赖”在国家射击队，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好歹也是在国家队啊，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杨凌还准备联合一些射击选手，申请下届奥运会恢复10米移动靶，已经两块金牌在握的他，仍有奥运梦——尽管2012年的时候，他已40岁。

中国最优秀的前男排国手汪嘉伟则感叹，抵制奥运会，其实最受伤害的就是运动员。汪嘉伟时代的中国男排，史上最强，曾获得世界杯第五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男排本来通过了预选赛，因为前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政府选择了抵制（官方的说法叫“放弃”）。

那一年，刘翔还未出生，拥有“亚洲飞人”美誉的是俊朗的汪嘉伟。他25岁，正是最好的年龄。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政治也间接捉弄了汪嘉伟的奥运梦。中国男排这次没有获得参赛权，汪嘉伟失望之余前往日本打球。不过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赛前宣布抵制，中国男排竟意外获得了替补出席的资格。此时，效力日本联赛的汪嘉伟已无法应召参赛。

记者问汪嘉伟：“1980年因为政治原因缺席奥运会，给你留下怎样的遗憾？”

“你说我的心情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说出来大家都不愉快，”他的语气有点沮丧，“能说国家不好吗？”

李宁说，他特别为他的师兄们遗憾，“1980年，是他们最好的年龄。”他所说的师兄，应该是这样一批体操名将：李月久（1957），黄玉斌（1958），童非（1961）。

1980，1984，仅以两届而论，多少国家胁迫着它的运动员抵制了奥运会，又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运动生命中的“最好的年龄”？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奥林匹克的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大概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谁都知道，“乒乓外交”对鸿沟两侧的中美有多么重要。

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总团长蔡赐爵就不回避体育与政治的瓜葛，他的看法是：体育可以令政治更柔滑，更人性化。那巨大的明信片，也是一种柔滑的、人性化的语言。

邀请世界的时候，李宁站在“Li Ning”的字母“L”下面。三个月以后，李宁几经周折，最终成为点燃主火炬的人。奥运在那一刻及其后的16天里，暂时回到了体育本身。

中国为什么愤怒

1990年7月3日，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建设。86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环视眼前宏伟的建筑群。视察中，他问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就像近30年中国历史的许多大事一样，这位老人的挥手具有决定性力量。当然，中国两次势在必得地申办奥运会，投入极其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原因不会是担心亚运场馆的浪费。邓小平，这位中国进程总设计师的意思是，我们办奥运的条件成熟了。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刻，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随即，这个国家开始为“最重大胜利”欢歌，激动的人们举着旗帜和标语，冲到了天安门广场，畅行无阻。人们回顾晚清以来的屈辱，也畅想将要到来的又一个“大唐盛世”。

没人怀疑中国历史之悠久，仅封建统治就长达2000多年。然而在当代中国人的内心深

处，中国历史的朝代只有两小段：前唐和晚清。找寻自信力之时，提及前者；感受屈辱之时，念及后者。

半个多世纪前，一个那么真实的中国人被作家鲁迅放到小说里。他认为自己受尽屈辱，并想着“等老子日后发达了……”

21 世纪初，电视片《大国崛起》在中国热播，这个庞大帝国从来就不甘心只做地球上的普通公民，它有一个不熄的大国梦，而且不仅是人口和幅员意义上的大国。现在这个梦迫近了。

获得奥运主办权，对任何申办国而言自然意味着荣耀和胜利，而在中国，它还引发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情感——扬眉吐气。

在中华世纪坛附近，高位截瘫的桑兰坐在轮椅上，人群沸腾的一刻，她说自己“高兴得差一点站起来”；离她不远，时任北京气象台副台长的郭虎正坐在气象监测车里，他忘情地一跳，脑袋撞到了车顶；在遥远的莫斯科，华侨林慕菲冲出酒店，拥抱每一个见到的男男女女，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激动。

早在 1992 年，听说北京要申办 2000 年奥运会，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林慕菲兴奋异常。他想到以征集签名的方式表达对北京的支持。

从 1992 年 5 月 28 日开始，林慕菲用 9 个多月时间征集到了 20 多万人的签名，共有 55 个国家的人士参与活动，后来，写满签名的 21 幅长卷呈现在了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眼前。

1999 年，获悉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时年 53 岁的林慕菲发动夫人和儿子，制作更恢弘的万米签名卷。至 2001 年 6 月 23 日，他们征集到海内外 300 万人的签名，写满了 300 个签名长卷。

林慕菲还创造性地制作了一种申奥礼品。国际奥委会对候选城市的礼品有着严格规定，每件礼品价值不能超过 200 美元。林慕菲夫妇设计出一款镶着奥运五环的人造珍珠领带。据称，这款领带只生产 200 条，由 200 名年轻女工花两周时间完成。为让礼品更显珍贵，林慕菲许诺今后不再制作这样的领带，而在每条领带的包装盒里，林慕菲还放进了两封英文信。其中一封写道：“我们是一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工厂的农村姑娘，我们深信如果 2000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能由北京承办，将最大限度地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将对开放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

作为海外华人巨大热情的代言人，林慕菲获得的回报超过了荣誉范畴。他的两个儿子从事的商务活动都和北京奥运密不可分，他家族名下的企业也为奥运会提供后勤服务。

海外华人华侨，大多和林慕菲一样，有着特殊的心理依托，他们比中国国内的民众更需要中国的强大。留学生李洵的爸爸这样表述儿子的爱国情怀：“他说他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法国人给他竖大拇指，说中国好。”

《中国青年报》一项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调查显示，65%的人表示，自己最关注“中国人的风采，世界对中国的评价”。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中国人极端重视自己的外部形象，也极其忌惮负面评价，当然，这也使他们形成了足以自豪的“热情好客”的品德。比如一个中国家庭要招待贵宾，可能会拿出自己舍不得品尝的压箱底的陈年好酒，会为了一桌丰盛菜肴不惜此后几个月勒紧腰带，而客人面对这样的盛情，一般也是极尽客套地感激。2008 年，外国的贵宾要来了，中国家庭搬出了陈年老酒，重新装饰了客厅，甚至提前一两年就用牛奶浇灌菜地了，可是，等来的外国客人的讥讽甚至抵制。

循着这样的逻辑，愤怒并不奇怪：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会……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那些以亲身体验的方式观察中国的西方人，比如英国哲学、社会学家罗素及之前的一些传教士，都提到中国人对“面子”的极端重视。不过，让普通西方人理

解“面子”有多重要，以及它何以那么重要，确实是困难的事情。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H.Smith）有一部描述中国人国民性的名著《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第一章就是“面子”，足见其重要性，但这也是全书最短的一章，似乎史密斯先生很难把“面子”问题向西方同胞解释清楚。这一章的1400多字，倒有许多令中国人震撼的段落——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

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缺点被人指出，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都要失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

举办奥运会，被中国人看作历史最有“面子”的事，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似乎对史密斯的精辟分析一无所知，那么对立自然不可避免了。国际奥委会派驻北京的代表李红说，中国需要一个温和的环境，在试图说服和改变它的时候，必须顾及它的“面子”。

2008年春天，另一个与“面子”有关、让中国人诧异和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是：大国崛起并没有换回尊重，中国依旧成为西方“欺侮”的对象。

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屈辱感占据相当比重，这在多数人心中根植了一种过分敏感的关于受迫害的臆想。“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如是说，“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

《中国为什么愤怒》，这是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春季的一期主题，封面是龙的面孔，脸色涨红，怒目圆睁。是的，中国龙愤怒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西方的“高高在上”心存不满，但愤怒的火焰主要来自写字楼和大学宿舍里的青年人，《经济学人》那一期专题报道的真正主角。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标签包括：80后，白领，愤青（愤怒青年）。在此之前，时代赋予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相对多元的文化，宽裕的物质生活，消费主义。

没有哪位学者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这一代中国青年有着如此激烈的、不逊于前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穿上爱国T恤，他们在MSN上挂红心，他们抵制法货，抵制CNN（事实上他们基本没可能收看到CNN的电视节目），他们显得怒不可遏。身为著名电视主持人的白岩松试图劝慰两句，他说“抵制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声音立刻被网络上的痛骂淹没。

随着抵制法货的喧嚣，角落里也出现一种冷冷的语调：我不抵制法货，我只抵制蠢货。

虽然还有人冷眼旁观，也有人独立思考，但愤怒中国的一个吊诡现象是：在一个信息开放程度大大增加的时代，人们的头脑依旧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被操控。

烈焰在“3·14”事件后已被燃起，不和谐的火炬境外传递则火上浇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提醒人民，时刻准备抗击外辱。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李涇当时还在西安读高中，“当时我撕了一张挂历纸，写上‘打倒美帝国主义’就上街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是欺负人。”

近20年来，中国人对打开的外部世界感情复杂。不同文明让人觉得新奇，而时有发生摩擦又令人恼火。除了美国和欧洲，民族主义的炮火还曾瞄准过日本、韩国、印尼等亚洲

国家。

李涇高中毕业以后去了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他说6年的留学生活使自己现在更理智了，知道“很多事情不是光靠情绪就能解决的”。不过，多数中国人可不想克制情绪，他们需要有一个发泄渠道。2008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钢锥，前所未有地坚硬和锋利。

西方媒体成为钢锥的首选目标。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4月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华外国媒体因西藏新闻报道受到威胁和困扰。文章称，西方驻华记者最近收到许多骚扰电话、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其中一些内容为死亡威胁。这些内容可能来自普通中国民众，他们对西方媒体就西藏抗议事件进行的偏见性报道有所不满。这种骚扰大约开始于两周前，对象主要为国外电视节目广播者，其中尤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为重。近来，美联社、《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等一些媒体记者的手机或其他联系方式被包括一些军事聊天网站在内的若干网站曝光后，该运动范围随即扩大。

美联社一名记者接到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中国人民不欢迎你们这些美国走狗。你们的报道歪曲事实，必遭天谴。”一条手机短信内容为：“某一天我要杀了你。”

钢锥也戳向一些国际文艺名人。先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接着是莎朗·斯通。

另一些明星的遭遇，也与钢锥有关。加拿大流行歌星席琳·迪翁（Celine Dion）曾是1996年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梦想的力量》的演唱者，在中国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她原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一场演唱会，在门票已售出几千张的情况下，文化主管部门突然取消了演出安排，理由是主办方艾玛娱乐未等审批通过就出售门票。外界猜测，是艾玛娱乐和比约克连累了席琳·迪翁——3月2日晚上，冰岛女歌星比约克（2004年奥运会开幕式歌曲《海洋母亲》的谱曲和演唱者）在上海举行个唱，唱完一句“高举你们的旗帜，宣布独立吧”，比约克突然高喊“Tibet、Tibet（西藏、西藏）”，引起中国方面震怒，而这场演出的主办方，也是艾玛娱乐。

抵制法国货的浪潮最猛烈的时刻，《南风窗》杂志撰文提醒：“如果我们只想享受身为大国的好处而似乎不愿承担随之而来的误解和指责，那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国。在赢得心智的国家传播战中，单纯的愤怒是无济于事的。”

雅典市长卡克拉马尼斯说：“我不认为批评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没有一个奥运举办城市能够避免负面的报道。”

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话，也可资借鉴，他在《留侯论》里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些理性的声音无法关闭发泄者的阀门。在中国成为合格的大国之前，你得允许它走过一个“拔剑而起”的发展阶段。

无论如何，中国的愤怒确实触动了西方。

中西方关系最紧张的阶段，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接到一封署名“中国李先生”的批评信，信的末尾，是一个挑战的姿态——他想看看BBC有没有勇气一字不删地发表这封信。

在题为《西方媒体应当如何面对改革中的中国》的信中，作者“中国李先生”说：“西方媒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失去中国！你们正在失去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和信任，而将他们推向民族主义立场。”

“中国李先生”1990年在大陆完成大学学业，经历过“六四”洗礼，不久留学英国，曾对西方民主社会价值观深为推崇。

BBC竟接受了挑战，将这封信原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支持“中国李先生”的有之，反对的也有之，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的《中国时报》评论说，这只是西方媒体自身的检讨与修正。那些张开大旗支持张丹红、批判“西方价值”的大陆媒体，“可能连反思的胸襟都还不具备”。

西方某些媒体的反思延续到了夏天。8月23日，北京奥运会闭幕的前一天，英国《泰晤士报》刊出评论员马丁·佛莱彻（Martin Fletcher）的文章《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文中也检讨了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方向，认为他们一味关注中国的污染、人权等问题，并没有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特征，也没有看到中国城市及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积极改变。

2008年年底，萨科齐重新回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炮火下。12月6日，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的法国总统终于还是在波兰会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显示出生气的样子，临时取消了由150名政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的访华行程，民众也跟着不高兴了，据统计，到了12月7日，联署抵制法国货的中国网民接近120万。不久，法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也遭到黑客的攻击。

美国中文网12月1日报道称，有政府背景的中华网（China.com）这个星期一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呼吁中国消费者再度对法国货说不。帖子列举抵制的法国品牌大约有50个，包括汽车、服装、酒和护肤品。这个帖子这几天引起了网民极大关注，一个小时内有3000多人回帖表示响应。到星期四，支援者突破10万人，这个数字星期五继续上升。

而路透社的报道称，一名叫闫忠杰（音）的网民发帖说：“我用真实姓名向法国人发誓：我将终身抵制法货。我永远不会再用法国品牌或任何法国产的商品。”

人们停留于表面的愤怒，声援自己的政府，质疑着萨科齐的人格乃至智商，并不去理会其中有没有政治博弈的表演成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都曾与达赖喇嘛会面，中国政府的态度远没有对萨科齐那么激烈。

不过，与春天的愤怒不同，到了年底，政府把自己和媒体的愤怒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管部门要求各大网站不要把这则新闻放在头条，删除针对萨科齐、使馆及法国商品、商业企业的实质性抗议的倡议，不允许攻击达赖个人。

两面都太锋利

北京中关村家乐福是一家地下超市，足有足球场大的地上部分，建成了花园式的休闲广场。5月1日，“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家乐福超市的地下部分没有节日的蜂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热闹。超市显眼处，以往张贴打折促销海报的地方，贴出的是“奥运加油”的标语。员工换了新的短袖工装，李宁牌的，胸口有小的的心形图案，还有“中国必胜”一类的祝福。

这样一个节日，热闹不在地下，地面以上却比平日热闹太多。在休闲广场，几百个人长时间地逗留或缓步游走，大体上，他们可以分为四类：拿对讲机的警察，拿小国旗的年轻人，端着采访设备的记者，等着看热闹的路人。

一位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的女青年，在中关村家乐福门前站着，在翻阅一本满是数学公式的书。被旁人问及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地方看书，她愣住了：“什么敏感？怎么了？”

“网上不是倡议今天到家乐福抗议嘛，没见广场上这么多警察？”

女青年怔怔地“哦”了一声，显然，她连抗议这回事都不甚了了，“我说的嘛，刚才还在纳闷儿，警察怎么跑到这里来开会。”

“开会”的规模还真不小，广场上仅穿警服的人就有60多人，还有二三十人，手上也拿着对讲机。他们分散在广场各处，明显不是一个开会的样子，相反，他们要阻止那些手拿小国旗的人聚到一起“开会”。“不要三个人以上扎堆儿”，“不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警察凑到那些人近前小声地提醒着，语气还算平和。

15点52分，两个女郎扶着滚梯来到地面，不免惊呼起来，“哎呀，下雨啦！”引得旁人

窃笑。

地面湿漉漉的，长椅湿漉漉的，花草湿漉漉的，似乎刚经历了一场很强很短促的太阳雨。但确实没有下雨。

两位穿蓝制服、戴蓝帽、蓄短须的中年园丁，拉着长长的橡皮水管浇灌花圃。其实，说是在“浇灌”长椅和花圃的大理石外沿更准确些。拿着小国旗的人们站得累了，会坐在上面休息一下。园丁的“高压水枪”扫过来，一半的水要溅向花草以外，逼得人们起身避让。

那是一个闷热如蒸笼的下午，长椅和大理石上的水很快干了，人们又准备坐上去，蓄短须的园丁连忙过来浇水。“领导让我浇水。”园丁抱歉地解释了一句。

16点多的时候，每个花圃里已注满了水，像一片一片的稻田。

整个下午，没有什么冲突发生。更早些时候，警方带走了几个 T 恤上印着谴责藏独和西方媒体口号的年轻人，并让他们脱掉了 T 恤。

一位 20 出头的年轻人坐在停车场出口的水泥地上，面带倦容，这位谭姓青年说，自己赶到这里，只是“来表达对国家的感情”。

与他坐在一起表达感情的，是一位穿着时尚的女孩。关于警察的干预，她愿意这样理解：“政府与我们想的不同，但肯定是有道理的。”

发生在中关村家乐福的一幕，是当时中国政治气候的缩影。主事者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很锋利，于是取出剑鞘，收敛锋芒。而在此之前，一些针对法国企业的抗议活动有过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昆明，南昌，哈尔滨等城市，都出现了冲击家乐福超市的情况，然后警方出来控制局势。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中国至少五座城市出现了多至数百人的小规模抗议活动，警方迅速驱散或拘留了参与者。

到了“五·一”前夕，警方严密监控任何抗议活动的萌芽。奥运倒计时 100 天的时候，百度和 google 已经搜不到“家乐福”了。

紧盯住民族主义的，不止是政府，老板们也试图迎合民族情绪，以实现商业价值。

北京奥运会前后，许多所谓的民族企业推出新的广告文案，它往往用双关语在企业形象与国家自豪感间搭建某种联系。比如蒙牛乳业推出“蒙牛，中国牛”；而它的竞争对手伊利则推出“有我中国强”；老品牌海鸥手表的广告语是“我有一颗中国心”……

连很多国际大公司的中国推广策略，也开始迎合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了。各大城市里，到处能看到麦当劳的广告语“我就喜欢中国赢”；到处都能看到阿迪达斯的广告画面：灰暗、渺小的民众汇成海洋，托举起光鲜、显赫的奥运明星。它想迎合奥运明星辉煌下的民族自豪感，不料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买它的账。许多人言辞激烈地指出，这是在诋毁中国人的形象；也有人觉得，阿迪达斯的广告反讽了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

在利用民族情绪的策略下，阿迪达斯稍有不慎，便对“两面都很锋利”有了切肤之痛。

奥运到来前，愤怒的中国青年终于把星巴克咖啡赶出了北京故宫，成全了一家不知名的本土咖啡店。咖啡这种洋玩意儿还是要喝的，只是洋标签太刺目而已。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微妙心态。

在这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某些危机中的人或机构甚至将其视作救命稻草。

宗庆后，中国最知名食品与饮料企业的创办者，闹出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并购纠纷，他痛心疾首地呼吁，要保护民族企业，避免公司被外资低价收购。宗庆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他的号召响应者众，不过也有知情人爆料指出，宗庆后拥有多家海外公司，他所表白的对民族工业的赤诚值得怀疑。

另一家本土饮料企业汇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进行着并购谈判，不料国内果汁企业奋起反对，高举的旗帜也是保护民族品牌，汇源陷入舆论的声讨，80%以上的网民反对这一收购。

9 月份的“毒奶粉”风波中，蒙牛这头“中国牛”也上了黑名单，据称要因此蒙受几十

亿元的损失。董事长牛根生在“万言书”中大声疾呼：“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他请大家施以援手，帮蒙牛度过难关。听起来，人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保护一家丢失了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因为它事关民族大义。

就像白天与黑夜

2008年9月下旬，一项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调查发布结果，它是由中国的蓝海国际传播促进会委托美国专业调查机构PRI完成的。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新加坡被22%的受访者当作最熟悉的中国城市；42%的人想不到任何中国牌子，而三星（33%）、丰田（25%）、日产（24%）甚至Nike（16%）都被受访者误认为是中国品牌。三星、丰田被认为是中国名牌；59%受访者认为，最流行的中国菜是——炒饭。

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普通美国人素来不大关心别的国家——不知这是否也算其大国心态的一部分——即使关心一下，他们一般也只是摸一摸大象的一条大腿。

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法国大报《西南报》的大牌记者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到中国采访，在保利大厦一层，即将结束在华20多天采访的他端着咖啡，轻轻摇头，他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就像白天和黑夜”。而让他无法释怀的一个生活细节，中国人也一定会诧异地想，这算什么啊——在宾馆里，克里斯蒂安把行李箱放在空闲的那张床上，服务生礼貌地把一张便笺放到床上：先生，请不要把行李放到床上。克里斯蒂安非常不解，他觉得客房已是自己的私人空间，宾馆无权干涉他怎么放置行李。

比起生活细节，要穿越意识形态的那道墙壁，理解中国的政治思维、官场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更是难得让人绝望。

在北京友谊商店旁的星巴克咖啡店，米卢拥抱了他执教国家队的得力助手沈祥福，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聊起难忘的往事——如何与中国的体育官员们打交道，如何尽力说服他们接受正确的东西。他出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又一生云游世界，具有超强的适应和沟通能力，但看得出，他对与足协官方的一些纠葛仍耿耿于怀。

“与中国人沟通容易吗？”一个问题抛给米卢。

“你指的是哪类中国人？”

“比如足协的官员。”

“不，他们不是中国人。”

艰难完成伦敦站的火炬传递后，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感慨道：“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厚重的墙的两边，人们的心情同样忐忑。

佳杰思自幼生活在前西德，提到中国，他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在北京，英国《卫报》驻华记者华衷去首都机场接母亲，母亲见到儿子竟紧张地问：“旁边不会有警察监视吧？”

在西安，一对父母也在为自己远在西方的儿子李涇担心。父母分别是普通的狱警和教师，他们并不赞成李涇成为风云人物，过多地抛头露面，觉得他身材比较胖，容易被认出来，在法国会有危险。在准备巴黎那场演讲的时候，李涇自己也承认，“要公开说伤害一些人利益的话，心情挺复杂的”。

很显然，世界不可能透过“Made In China”的玩具或衬衫就了解中国，尽管这些物品源源不断地被巨轮运来，每年增速达20%以上。

全球化时代来了，世界果真是平的？见鬼去吧。中国的家庭和仓库里堆满了西方品牌的产品，西方同样，乃至尤甚。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东西方之间巨大鸿沟的填充物。相反，接触的增加、利益的摩擦，让差异问题越发凸现出来。

李红在美国留学，又嫁到瑞士生活，2003年，她成为国际奥委会驻北京奥组委首席代表，进行中西方沟通成了她的工作。对于两种文化的交流，李红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

西方人的认知体系里，首先假定人是自私的，是逐利的。那么OK，它所设计的社会制度，承认并维护人的隐私，人的财产，人的利益；而在儒家思想里，则假定人是有道德的，是“修身”的，是“不言利”的。这并不是以真实的人性为出发点，所以，东方文明让人的生存更复杂，更暧昧。

基于这种文化的差异，在李红看来，中国与西方的了解成本，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一个中国人，初步融合到西方的文化中，三年足够，要精通其语言，再加上两年也就够了。而一个外国人要领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理解他们的人际关系，15年都未必够用。”

5年或15年，也仅仅是个体的融合时间，对于两种文化宏观的理解和沟通，李红给不出时间表，“太难了，几乎没有可能。”

李红的判断在美国青年Eric Abrahamsen身上得到验证。Eric生活在北京，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饱含乡土气息的中文名：锁柱子。他是一个语言天才，在北京申奥成功的夏天来到中国，四年之后，已经可以熟练使用这个国家的文字，他为英语国家的出版社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在网上，“锁柱子”甚至做过一个中文读书论坛的版主，他发的帖子，没有谁看得出来是一个“老外”写的。

在妻子冬晓眼里，锁柱子的中文根本不合格。“他给中国的一些作家写信，谈合作，没有任何的客套，说话也不委婉，人家一定会觉得很难接受。”每次见锁柱子坐在电脑前，吃力地冥想着怎么显得客套一点，冬晓就会失去耐心，“我对他说：去，一边去，我帮你写算了。”

Eric需要了解的东方文化，当然远不止如何写信。他去见冬晓的父母，或者接他们到北京居住，在家庭生活里感受着中美差异的巨大。他改口称对方的爸妈为爸妈，然后发觉，爸妈总是要关心女儿和女婿早餐吃些什么，衣服穿得是否能防寒。Eric的观念里，对一个成年人强调这些事情，简直是极度的不尊重。在美国，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心应该是精神交流，而不是生活琐事。

要体会中国的国情和人情，需要漫长的磨合，这件事情上，Eric超强的语言天赋派不上什么用场。

CNN北京站的负责人吉米，在华30多年，依旧不敢说多么了解这个国家。总会有一些事情冒出来，推翻他之前在某一方面的判断。

吉米、佳杰思(Geiges)等驻华记者，青年时代都曾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由此与中国结缘。多年以后，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难以把握。

在吉米以及许多深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难以概括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语概括，那只能是“复杂”。

当你无法理解的一个庞然大物越发强壮起来，忧虑甚至恐惧其实是本能的反应。普鲁斯特笔下的公爵夫人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现在，这不安在加剧。

国际形象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的报告显示：只有42%的美国人对中国抱好感，英国为49%，西班牙为43%，德国为34%，意大利为27%，而且那些数字都快速下降。非洲的尼日利亚比例比较高，有75%的人对中国抱好感。65%的意大利人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坏事，法国的数字为64%，德国的为55%。

苏珊·布朗奈尔(Susan Brownell)是美国人类学的教授，对中国问题亦有深入研究。

在她看来，中国与西方之间虽然差异巨大，但也必须积极交流，别无选择。

1980年代中期，苏珊成为北京大学的留学生。那时的中国还相当自闭，即使在大学里，中国学生也不允许擅自接触外国人士，留学生居住的勺园成为一座孤岛。苏珊很苦恼：接触不到中国人，也没机会练习汉语，这算什么留学？

出人意料的是，在北京大学的运动队里，留学生可以和本国运动员一起训练。苏珊马上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她曾是美国优秀的七项全能选手，几乎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因为体育，苏珊与中国学生沟通的禁忌被打破，她也欣喜地发现，中国学生也有丰富的内心，也像她一样渴望着交流。

请讲“世界语”

作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客座教授，北京奥组委的顾问，苏珊每年都要到中国好几次，她在这个国家找到了适合发挥优势的位置，不会为沟通难题抱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墙虽然厚重，也许确有穿墙之术。

作家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自从1960年代看了一些杂书，他掌握了一些常识，就放之四海了。即便去了美国，去了欧洲，也没觉得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那里的人按常识思考和生活。

回到常识，这个词语在2008年尤其是年底被《南方周末》等媒体反复提起，他们认为，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部分地拉回到了常识中。

按阿城的意思，人要与世界融合，就得依照常识思考和生活，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此，“中国通”吉米有着相似的观点——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那么必须接受人们共同的规则，要提醒自己也提醒世界：中国不是例外。

在那些因拉萨事件和火炬侵扰而愤怒的日子里，中国更多的时候握有道义，遗憾的是，它经常自说自话，操持着一套容易招致误解和反感的话语体系。

6月21日，奥运火炬在西藏首府拉萨传递，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首先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词句——“我们一定能粉碎达赖集团分裂的图谋，有能力维护西藏的稳定”，“西藏的天永远变不了，五星红旗一定会在西藏天空飘扬。”

张庆黎利用奥运场合发表政治性谈话，受到国际舆论关注。国际奥委会通讯联络部主任戴维斯女士说，国际奥委会已要求北京奥组委提供张庆黎当天的讲话，“如果媒体引述的说法无误，我们将感到无比的遗憾。”

《体育画报》中文版特派英国的记者姜轶注意到，英国舆论对于中方官员、发言人的某些表达方式显然难以接受，甚至深为反感，比如谈到达赖时动辄出现“阴谋”、“指使”、“披着羊皮的狼”等词汇，“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近似于个人攻击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

而达赖方面的发言人通常都是西方人，他们熟悉西方人的思维和接受方式，更容易博得好感。假使把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展开的活动而视为一场超级政治公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目前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4月19日，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法国华人举行了一场支持北京奥运的集会，这也是当地华人集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李涇被安排第四个登台演讲。这位戴着眼镜、体重达120公斤的留学生声音厚重，语气激昂，20分钟的演讲，让他成了金晶之后的又一位“民族英雄”。

在这个四月，到处可以看到慷慨陈辞的华人，李涇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赢得了华人的欢呼，法国人也在认真倾听他的声音。李涇在演讲中使用了还算流利的法语，而本质上，他使用的是一种“世界语”，从常识出发，从人性出发，因而消弭了文化的隔膜。

关于自己的沟通理念，李涇与《国际先驱导报》有这样一段对话——

《国际先驱导报》：你的演讲很注重措辞，在你看来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和西方沟通？

李涇：中国要有亲和力，和别人沟通的方式也要改变。我的演讲为什么法国人和中国人都认可，是因为我没有进攻性，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把真诚带给他们。

《国际先驱导报》：怎样看待国内抵制家乐福的声音？

李涇：人家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嗓门大，而是你实力强。我们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他们不说我们也过来了，何必他们说了我们就闹？

不妨摘取李涇演讲中的几个段落——

首先受害者是法国人民，他们是多么的具有怜悯心和博爱，他们相信媒体，可不幸的是，他们被操纵和欺骗了。

我们，海外的中国学生，我们很心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并不怨恨法国人。

我们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经验与信息交换的桥梁，我们也是这场文化、思想，尤其是政治冲突最先的受害者。

在抵制奥运，抵制中国，所谓自由西藏的叫喊声中，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审视和不信任正在增长。中国政府的努力还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说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和说它是世界上最差的同样可笑。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 20 岁到 30 岁的年轻人，从我们年幼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自由度不断开放的环境中。

来中国吧！来看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一个很多西方媒体不会展现给你们的中国……很多法国人似乎对中国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直接和我们沟通，通过我们，热爱并希望巩固中法友谊的桥梁，来进一步了解中国。

文化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当你们在中国饭店使用筷子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向你们充分地展开它的怀抱。

请让我们好好沟通！……我们向你们诉说的是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我们同时也会传达法国人民对中国善意的关注。请相信我，这座桥，将会前所未有的坚固，特别是在这种极度令人遗憾的现状下。

李涇成了中国人盛赞的一个英雄，看起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分贝更高，而是觉得他让”老外“们可以认真倾听。事实上，李涇背后的国家，也在冲突中思索着更好的沟通技巧。

三四月份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关系交恶后，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已求助国际知名公关机构，以求化解自己的形象危机。这一说法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其实，早在 2001 年北京再次申奥之际，政府已汲取教训，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而且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努力平复急促的呼吸，让自己显得更有气度。

到了 2008 年 7 月，奥运的筹备到了最后阶段，东道主已经要忙于擦拭桌椅，摆放杯盘了，他也开始向外界展现更豁达的主人姿态。7 月 9 日，中国方面与境外转播商达成协议，凡拥有奥运转播权的境外电视媒体，允许在包括天安门在内的区域进行现场报道和直播；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表示，中国不担心负面报道，将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国际舆论；8 月 1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传递主人的热诚与自信，邀请 25 家境外媒体进行联合采访。

不管这些举措来自国际知名公关公司的策划案，还是中国领导人的自主决断，都彰显了中国在阵痛和茫然之后更理性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喻国明也对这种变化给予积极评价：“在接近奥运会开幕的后期，对外部的批评报道，我们表现了不同于拉萨事件和火炬接力中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是克制的。一个大国应该有包容的心态。把自己置于国际舆论的对立面，即使从宣传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不好的。”

他还谈到如何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问题：“在跟国际社会的交往当中，至少在 5 年到 10 年的时间里要多讲普世价值，尽最大限度不要讲差异，不要突出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共同点，才能互相沟通，不能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宣泄不会带来彼此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

2008 年春天，一个风声鹤唳的时节，似乎满世界都是批评中国的政客和敌对势力，而这一年的 8 月，奥运会开闭幕式邀请到了 80 多名国家政要，包括当初那些激烈的批评者。事实上，批评与出席，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证了一个事实——中国的举足轻重。

这个春天，是一种疼痛的记忆。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认知中国，竟是在不安、敌意乃至冲突中开始的，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开头，但也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未必就意味着一个糟糕的结局。

5月24日，“鸟巢”测试赛——“好运北京”中国田径公开赛进行到第三天，刘翔在决赛中出场，像国王一般接受欢呼。人们在拍了“鸟巢”和“飞人”后很满足地离开，尽管还有多项比赛还未进行，观众已走了大半。

五月·八级强震



绵阳体育中心里茫然的难民 关军 摄

2008年5月1日，第118个国际劳动节，“鸟巢”工地上，民工们依旧忙碌着。他们没觉得劳动节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倒是从这一天起，劳动时间从每天9小时加到10小时，工钱也相应地加了5元。虽然没有劳动法规定的节假日加班的工资补偿，这5元还是让民工们很知足。

让人高兴的事情还不止多出5元。中午11点30分，送饭的魏师傅带着一个装菜的大桶和一个装馒头的竹筐来了。由于是劳动节，伙食有了改善，馒头不变，平时的蛋花汤换成了炖豆腐。“今天过节，饭菜还不错。”在“鸟巢”搞绿化的农民工常学亮大口嚼着馒头说。工人们放下手里的活计，手都没顾上洗便围了上去，每人先拿两个馒头，然后用自备的饭盒盛满豆腐，四散开来，在树下、路边或者砖垛旁吃午饭。

据《新京报》报道，这天，“鸟巢”周围挂满了条幅，“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奥运建设者的关怀”、“鸟巢建设者大干实干迎奥运”等标语迎风飘动。

据统计，四年多时间里投入“鸟巢”建设的农民工累计达到10万人。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鸟巢施工中的实际伤亡人数高于对外公布的数字，这在施工人群中并非秘密），把瑞士与中国设计师的梦想付诸现实，据工程师说，鸟巢钢架的每一个焊点，都刻着工人的名字。但工人们不在乎这个，工程结束，他们只希望不拖欠工钱，然后跟着包工头赶往别的工地。“奥运民工”的身份会获得一些意外的好处——他们比其他地方的民工更容易按时、足额地拿到工钱。

进入5月，“鸟巢”只剩下两道工序：外部绿化，内部配合开幕式做一些改动。“祥云”这时已回到国内，每到一站都会让传递城市因疯狂而陷入瘫痪。在那位“打酱油”的市民所在的广州，5月7日这一天出来“打酱油”的人真是多，达到了上百万，他们甚至站满了公交车的顶棚。家住广州大道边上的王轶庶站在阳台上往下一看，楼下像一股“赤潮”在缓缓前行，他很想做一个夸张的动作凑个热闹，猛一抬头吓了一跳——每栋临街的住宅楼顶上都肃立着一个警察。

5月12日下午，地震波在中国大半国土下扩散。那一刻，奥运火炬已被再次点燃。在

厦门会展中心，2008 只和平鸽刚被放飞到空中，激动的呐喊打破了这座秀美城市的宁静，人们自然也失去了对大地细微震荡的感知能力。

同一时刻，“牛博网”创办者、老罗英语培训学校校长罗永浩正坐在新中关大厦一层的咖啡馆里与朋友聊天，位置紧靠着落地玻璃窗，他的公司办公室就在楼上。坐在宽大的深色沙发里，罗永浩并未觉察出大地有什么异常，异常来自窗外，他看到大厦外的广场上站满了人，每个人都神情惊慌，自己公司的员工也都跑出来了。他们怎么了？

此刻，在成都郊县双流，20 岁的尹春龙正在几根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的家里，家什咣当咣当地响了一阵，像是火车开过。在意识到地震之后，他和父母并未过度惊慌——他们的简易棚户即使倒了，也不至于出人命。

地震来袭的时候，北川中学高一学生梁欢正在上物理课。一周前刚和同学们开了 24 周岁生日 Party 的曾老师站在台上，讲解着动能，教室里的桌椅突然剧烈晃动起来。和许多同学一样，梁欢被甩离座椅，跌到了地上，原本四平八稳的课桌，也被什么力量掀翻。几十秒以后，梁欢感觉她所在的四楼在整个往下掉，好像一下就落到了一楼，四周一下子就完全黑了。到处是求救声和相互间的呼唤，梁欢听到高二的一些同学在喊，不要怕，那些高二学生是在三楼上课的，这一刻，梁欢诧异地发现声音像是从隔壁传来。

在汶川县映秀镇，映秀湾发电厂发电部副主任马元江正在 8 层办公楼的二楼开会，他感受到的震荡比前面几例强烈，时间上也稍早，恰好是 14 点 28 分。

整整两周以前，成都几家报纸同时刊出了一个整版的楼盘广告，“八级强震”四个字以最具冲击力的方式出现，力图吸引消费者的注目。这句广告语的策划人据说是成都铸信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曾永林，事后，他的神奇“预言”丰富了人们对灭顶之灾的猜想和附会。

他们来了

5 月 13 日中午，经与公司其他人商量，罗永浩做出一个决定：前往灾区救援。他们还要借助“牛博网”募集善款——不通过任何慈善机构，而是亲自用到第一线的赈灾。前一天晚上浏览地震图片时，罗永浩意识到灾难的惨烈，那些压在石板下的孩子的尸体，让他难以忍住泪水。

详细的募捐方案当天就出台了，搞这个东西他们轻车熟路——2008 年春节前，“牛博网”曾发起为“黑砖窑奴工家庭派送红包”的慈善活动，用于帮助那些常年寻亲而负债累累的黑砖窑工家长。律师帮他们起草了一个比较周全的救助方案，十几天时间里，募捐 16 万元，最后每个家庭得到大约 8000 元的资助。

有此基础，地震募捐方案只须稍加修改。它获得了数以千计的网民的信任，地震募捐总额达到 230 万元。英国《金融时报》称，“对于很多渴望捐款帮助受灾者却又想避开政府渠道的中国年轻人而言，牛博网成了他们的首选慈善机构”。因为数额巨大，几乎是预料之中地，它在后来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5 月 13 日一早，尹春龙带上家里仅有的 4000 元现金，自己租了一辆车，从双流赶到都江堰。路上的人非常多，赶去救援的与逃难出来的，交错而过。后来尹春龙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份，被称为志愿者。

扒废墟，抬伤员，尹春龙在都江堰忙了一阵，对所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这不是他要做的“大事”。

尹春龙小时候曾溺水获救，这让他乐于向困顿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热情的年轻人也一直怀疑命运：在这个社会，他除了卖苦力似乎没别的希望，而辛苦了多年，生活却没发生太大改变。生于 1988 年的他说：“我讨厌这个时代，我更喜欢毛泽东的时代。乱世出英雄，在战场上，我敢拼命，肯定能立大功。”

下午，听说映秀那边比都江堰严重多了，路也断了，没有人去救援，尹春龙只身前往映

秀。这个时候，梁欢已经被救起，马元江在漆黑的废墟下劝慰绝望呼喊的幸存者保存体力。

5月15日晚上，上海飞往绵阳的春秋航空9C8809航班只承运了100多人，前排的许多座位都空着。绵阳机场的客运刚刚恢复，没有人确切知道绵阳及周边县乡的灾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客舱里的气氛十分压抑。

分散在机舱不同位置的10个人，却很快熟络起来，形成了一个“512小组”。来自上海某IT公司的王旭是发起者之一，他通过乘客的神情猜测谁可能是志愿者，于是在候机厅就结识了3个同道中人，在飞机上又与其他6个单独前往灾区的志愿者结识，其中包括来自台湾、做过特种兵的姜同一。他们每个人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去灾区的哪里，去做些什么。

下飞机的时候，10名三两小时前还彼此陌生的志愿者，开始了统一行动。

纷杂的力量

灾害最惨烈的北川，几乎是一座死城，路边堆放着许多还来不及处理的尸体，尽管被浅绿色的塑料包裹着，保留着最后一点生命的尊严，但却包裹不住强烈的死亡的气味。而在绵阳南河体育场这个容纳万余灾民的避难所，味道也很难闻，却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的气息。一位少女在垃圾桶前梳理着自己的长发，让人确信生活没有就此停滞。

在街头露宿一夜之后，王旭的“512”小组来到南河体育场，并获准在看台下的一间屋子里临时办公。屋子以前显然是用于跆拳道班授课的，墙上的“道”字一人多高，白底黑字。

让我们截取某一个时间节点，看看“512”这群人在灾区的工作状态。5月17日下午两点半，王旭在联系一家假肢工厂，此前他刚刚去医院看望了几个被截肢的儿童；一个志愿者忙着更新网络，并接听来自各地的热线电话；两个志愿者赶往情况日渐危急的北川，看那边有什么需要；其他志愿者在跑道边开辟了一片儿童活动区域，为孩子们提供图书、玩具和体育用品，它们如同投入到水杯中的泡腾片，瞬间激活了南河体育场沉闷已久的气氛。

罗永浩的赈灾团队很快聚集了很多人，包括韩寒这样的名人。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亲自采购物资，了解偏远地区的灾情，尽可能将救灾物品送到更需要它的地方。5月19日这天，他们用善款购置了7卡车的物质，包括两车篷布，其它五车装满大米、食用油、卫生巾及蚊香。罗永浩的另一个繁重任务，是把每天开销的明细及时发布到网站上，“保证每一笔捐款都有来源，有去处”。

在中国，政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职能，NGO组织空间狭窄，缺乏制度保障，而政府部门亦缺乏利用NGO及更松散的民间力量的经验。而民办慈善更是一个敏感地带，上路的时候，罗永浩已做了最坏的预期——他们的募捐被官方认定为非法集资，组织者因之承担法律责任。

尹春龙则在孤军奋战，很少有志愿者像他这样单独行动。“（通往映秀的）路上到处是塌方，还有石头在往下滚。我走得好快，一路上超过了武警部队，超过了‘铁军’。他们带着装备，我什么都没有。”

最初两天见到的救援场面，让尹春龙很不纳闷儿。他总觉得救援队伍总体上的紧张、投入程度还不如他这个种香姑的农民，这也就不难理解，温家宝总理为什么会以嘶哑的声音大喊：“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尹春龙觉得可惜，在48小时黄金时间里，投入救援的队伍还不够多。这个年轻人当然还无法理解，瞬间调集军队绝非易事，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力量要执行另一项重要的救援任务——地震选择了这个国家一块极其敏感的地带，这里有中国最为密集的水库群、中国最重要的核技术科研基地、中国西部最庞大的化工企业群，一旦发生大的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距震中映秀直线距离约108公里的绵阳，以及距震中约236公里的广元市青川县，是汶川地震的断层尾段重灾区。外电和国内公开资料均显示，绵阳“九院”、广元821工厂为基点的川北地带是中国最重要的核武库基地，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军工资源。

地震后，中国很自然地谢绝外国救援队进入该区域，并迅速派出空降师某团前往。5月13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宣布启动核与辐射应急预案，并派出由21人组成的环境专家组。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5月16日，军方在绵竹县清平乡成功营救出15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和专家。另有公开资料显示，绵阳地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已达27人。

大地震中的川北核设施是否安全，令各方瞩目。5月18日，新华社报道称核设施均处于安全可控状态，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马健也表示，四川灾区的核设施已经被军队和武警部队严格保护，没有任何问题。

大地震之后，四川境内个别化工厂发生毒害物质泄漏，一些水库的大坝也乍现裂痕，但大多有惊无险。山体滑坡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是一个例外。

当拯救幸存者的艰巨任务告一段落，唐家山“悬湖”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同一时期，关于地震预报、建筑质量等方面的反思，以及“豆腐渣学校”遇难学生家长问责，已很少能够见诸媒体，事实上，这些内容都受到新闻管理部门的严格控制。

6月11日16时起，唐家山堰塞湖的黄色警报终于解除，从5月17日开始，它已经持续鸣响达25天。网络上不免出现这样的猜测——堰塞湖的危险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会不会是有关方面故意放大了对险情的描述，让人们注意力不至于转移到其他“敏感”话题？

当然，这仅仅是个别人的猜测，他们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它至少代表了舆论对于某些“敏感”新闻冷处理的不满。

黑色三分钟

尹春龙有一双与他1.60米的身高很不相称的、蒲扇般的大手，肤色暗红，手指粗壮。5月16日，这双手攥着一把短镐，出现在映秀湾水电厂一处高高的废墟上。听人说，这里原来是电厂的一座八层办公楼，刚刚探测出，里面还有生命迹象。来自青岛、上海等地的消防队员，本来已经放弃此地了，如今又匆忙赶回来，希望与幸存者一起创造奇迹。

尹春龙同样希望成为创造奇迹的那个人。

废墟下还有两个幸存者，电厂职工虞锦华和马元江，大楼垮塌时，他们分别在三楼和二楼的楼梯。层层叠叠的楼板、梁柱堆在一起，使救援陷入困境。

差不多有三条救生通道先后被开掘，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侧翼的。在它们接近虞锦华的时候，却被迫停下来，消防官兵的意见是，情况复杂，过于危险，还要再想办法。

这时，尹春龙钻进其中的一条通道，挥动短镐，开始了孤胆英雄式的人工挖掘。

他要始终匍匐着，一下一下地刨开水泥与砖石，砸断钢筋，不时有余震袭来，堆压在一起的楼板咯吱咯吱地响，一些缝隙松动，偶有碎砖石掉下来。

5月19日14点28分，在城市里，当警笛拉响，路上的车辆全都停下来，法新社称，中国进入三分钟停顿。尹春龙也暂停挖掘，站在废墟上，与所有人一起默哀。

5月19日下午，南河体育中心，球类和棋类都安静地放置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孩子们由王旭等志愿者带到球场上，和大人们一起站到烈日下，聆听警笛鸣响。

在那举国哀鸣的三分钟里，那些刚才还因运动而绽放的笑脸，都挂着比成年人更沉痛的哀伤。他们嘴角抽动，双眼红润，重新陷入噩梦般的记忆。

防空警报的鸣响让罗永浩吓了一跳，当时他正在成都的驻地整理账目，“我还以为又要地震了。”全国默哀这回事他大略知道，却并没具体了解，他不喜欢形式主义的东西，但也承认这个国家第一次为普通人降半旗致哀是值得赞许的进步。

四川大地震灾害之惨烈，甚至也让遥远的异邦破例致哀。中国外交部提前获得的消息称，秘鲁政府将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者。这是秘鲁第一次为外国遇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这一消息被及时上传，随后，中国政府也宣布了举国哀悼的决定。

很可能，它与秘鲁的动议完全是一个巧合，因为在秘鲁政府的决议出台前，中国的平媒、网络上已出现为地震遇难者降半旗默哀的建议。

各界的评论赋予那三分钟无限的寓意和畅想——这个国家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徐徐下降，生命的尊严得以彰显。

偶有失落



尹春龙在他的香菇大棚里，现在是淡季 关军 摄

默哀三分钟之后，尹春龙继续在自己判断的线路上进行着孤胆英雄式的挖掘。尹春龙没戴头盔，也没戴口罩，在外面的人看来，简直是在玩命。他匍匐着，手用不上力气，只能一点一点地敲击。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在废墟里救人，就像摘香菇。

15岁起，尹春龙就离开家乡，到成都郊区为一个香菇种植户打工，每月工钱是240块。到了17岁，他自己租了四亩地种香菇，开始了其津津乐道的“做生意”的奋斗史。

某些时候，他会为自己的身世哀叹：“我是从粪堆里长大的，从小就受苦，那种苦，你们根本想不到。”

在映秀湾电厂的废墟里，“摘香菇”的工作累计超过了30小时，马元江恍惚中意识到，有一个不要命的小伙子正在接近自己，这坚定了他求生的信念。

到了晚上10点，尹春龙已经可以够到马元江，为其清理胸部、腿部的碎瓷砖了，他把好消息传递出去：自己的方案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记者看到，消防官兵喊出尹春龙，让他休息一会儿。“我哪儿有心思休息，我想亲自救出马元江。”事后，尹春龙如此描述当时的心情。

救援工作胜利在望，尹春龙不情愿地歇了歇，就要求再进到洞里，相关人员没有同意，让他继续休息。

20日0点50分，马元江被抬出，闪光灯拥上去一阵闪耀，现场爆发持续十几秒的欢呼。

奇迹，真是奇迹，人们赞叹着，记者把英雄般的消防官兵团团围住。

马元江被埋 178 小时 22 分钟，而且在前 173 小时，他无法得到一丁点的营养和水分，在整个四川大地震中，这成为一个再也无人突破的极限。

这时，有人把尹春龙推到几位记者面前说：“他也做了很大贡献。”而一位医生也忍不住对记者徐一龙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有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过来，并把卫星电话递给尹春龙，让他给家里通个话。他激动地抓着电话大喊：“我是龙龙，我救了两个人，你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尹春龙觉得，全中国的人都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认识他了，他对身边的志愿者刘润全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尹春龙一心要把香菇产业做大。本来以为这次出了名，会有些机会。他曾为自己预设了成功年龄：30 岁，从灾区救人回来后，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不需要（等到 30 岁）了。”

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尹春龙可能做出的最大投入，但后来的事情表明，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5 月 19 日，罗永浩在博客中表示，募捐的建行账号被建行四川分行单向冻结，款项只能进不能出。经交涉得知，建行四川分行对这个“资金流量异常”的账号产生怀疑，就在“非常时期”违反程序予以冻结。到 5 月 21 日，在媒体施压之下，账号解冻。

在参与灾区救助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王旭的感触是，政府的力量与民间的热情无法有效协调，资源配置难免混乱，而多数志愿者也会因此陷入茫然。

有限度的欣慰

王旭说，坐在来灾区的飞机上，他哭了，平时以为人群之间很冷漠，地震救援改变了他的看法。

大地震之后人们很容易生发感触——很多东西都被颠覆、翻转了。在灾区，你看到的那些黄色脸孔熟悉又陌生，它们布满了焦虑、疲惫甚或茫然，但也比平素多了几分真诚。友善的相视一笑，竟也出现在陌生人之间，强震震落了人们日常的面具。

川西北的公路上，挂着“抗震救灾”条幅的车辆一度排起了长龙，拥堵得如同高峰时的北京闹市。人们来自全国各地，热情汹涌，神情急切，其情其景，即使是路边的一块石头，也会为之动容。

“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南方周末》的评论。

舆论一片惊呼：看，公民意识在觉醒，2008 年堪称中国的志愿者元年。连美国《时代》周刊也在地震报道中赞叹：“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南风窗》的年终评述认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爆发后，志愿者千里驰援，当地藏族群众夹道为军人、志愿者递水送饭，“当天灾取代人力，成为人类基本生存权的伤害者，人类社会内部反而能够出现积极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行为，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共识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呈现了”。

几个月以后，坐在地震发生那一刻所处的咖啡馆临窗位置上怀想往事时，罗永浩说他略感惊喜地看到地震呈现了中国人人性的另一面，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那一切并不会由此成为常态。

即使是在地震刚刚发生后，罗永浩感受到的也不完全是光辉的善与爱，而是真实的、复杂的人性。当一车饥渴的战士运抵某偏远受灾村，而补给还没有跟上，许多村民却举着矿泉水——救济物质已出现过剩——拥到军车前叫卖，10 元一瓶。而几天前，物质极度匮乏的

时候，村民间也不乏8个人分吃一小包方便面的故事。

当罗永浩的团队一次次把救灾物质分发到偏远的村镇，他们原本对当地干部带有“习惯性的不信任”，而当地干部的勤勉、务实的工作很快打消了志愿者的顾虑。不过几个月以后，当罗永浩再次赶到曾去过的村子，干部们的做派已与地震时大不相同，他们拿着印刷精美的招商手册，打着官腔，为一些援建项目标出可观的价码。

公众曾高度关注着地震孤儿群体，认养方案还没出台，整个社会的热情已经达到沸点了，人们担心抢不到机会，甚至有一些公众人物说，自己认养十个八个地震孤儿都没问题，其情其景，让人觉得每个孤儿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人来认养。8月22日，四川省民政厅对外宣布，88名地震孤儿符合社会收养条件。

消息一出，民政厅门口一度排起长队，申请认养者大多三四十岁，家境富裕，无生育能力，他们普遍希望得到一个年龄三四岁、脑瓜聪明、样子乖巧的孩子。

截止9月5日，共有约8万人次向民政厅提出收养意愿，却没有成功一对——人们无法接受不能挑选孤儿的规则。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如果我们把孤儿的信息公布出去，让8万人挑三拣四，拣完又不要，谁受得了？”最终，公开报道中仅有两例地震孤儿被成功收养，而那些残疾孤儿，更是无人问津，其中60多名残疾孤儿家属因为心寒，甚至临时取消了送养意愿。

罗永浩说，看到一些还在灾区做救助工作的人抱怨后方的人们越来越冷漠了，他起初也很有同感，“但想了想又心平气和了……指望非灾区的人们对受灾者长期保持感同身受的状态是不现实的，毕竟我们从基因上就是被设计成会忘却的。”

罗永浩在灾区遇到很多这样的志愿者，他们心灵受到震荡，或是火线归依了宗教，或是毅然决定留下做义工。“无论他们选择什么道路，但愿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罗永浩说，他尊重良知被唤醒的故事，但一个社会的善举，最终仰仗的应该是制度建设。

和罗永浩一样从事英语培训的李丰，决定把他婚礼时收到的礼金六万元全部捐作牛博的赈灾款，他说自己捐款的唯一私心，就是希望将要出生的孩子因此得到更多的祝福。每个人的善举背后，都有着或简单或复杂的动机，亿万双志愿伸出的慈善之手，到底代表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很难有人说得清楚，罗永浩甚至连自己赈灾的动机都难以准确概括。

地震之后，人心与世象如同失去压力的海绵，缓慢向常态复归。所谓公民意识，志愿者精神，不过是由深度睡眠状态猛然被激起，不久又重新沉寂下去——乐观估计，至多是变成了浅表睡眠。一个新阶层在萌动，它需要时日强健自身，尤其需要一片适宜的土壤和空气。

5月底，尹春龙突然决定再次前往灾区，找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做。

6月11日，尹春龙混进了执行特殊任务的民兵队伍，在雨夜里翻越一个个“V”型甚至“U”型的山谷，把5名失事飞机机组成员的遗体运抵映秀镇。军区的首长评价说，尹春龙承担了其中最危险最繁重的任务。

在那之后，尹春龙又回到那个与窝棚没什么区别的家。

电视里，一场接一场的抗震救灾英模报告会，他没有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当然也不会看到自己。他想不通，到底要做出什么事，才配做英雄，才会得到英雄的待遇？

7月8日下午，马元江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他刚在电视上看到消息，尹春龙被团中央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接电话前，尹春龙正在大棚里栽种香菇。

尹春龙去北京领了奖，第一次坐了飞机，他并没有为此高兴几天，他知道英雄梦的结局了：无论什么荣誉，自己恐怕还是要继续种香菇。

在北京，罗永浩继续维持着网站和培训学校的运行，依旧是偶尔到楼下那间咖啡馆坐坐，地震灾区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不过也仅此而已，他不认为个人或社会因之而巨变。

但是，总有某些变化，给人留有希望，比如志愿者的觉醒，比如人道的彰显，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破例——

按照惯例，八级以上的地震要无条件地接受国际救援，地震数天后，中国方面把震级由 7.8 修订为 8，破天荒地多支国际救援队放行，表明中国愿意展示更开放、人道的国际形象；

5 月 12 日当晚，国内新闻媒体大多接到通知，要求不得派四川以外的记者前往灾区报道，不过当万千记者从各地奔向灾区，主管部门也并未予以追究。

当樊篱因某些特例而被突破，必然为它的松动乃至拆除提供可能。

根据 2008 年 9 月的统计数据，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和失踪者超过 87000 人，经济损失 8451 亿元。

人道灾难面前，西方也搁置了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远不像卡弗蒂妄言的那样不堪，而且“人们一下子意识到，在中国这个国家里，还生活着 13 亿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美国《体育画报》语）。

八级强震，让人们修正着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和情绪，包括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在震灾最惨烈的北川县，进入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块北京奥运倒计时的大牌子曾与火炬的步点遥相呼应。它还无法像天安门广场的倒计时牌那么先进，电子计时，分分秒秒显示着奥运的临近。北川县的这一块，每天都要人工更新。从 5 月 13 日开始，没有人来为它进行更新，它矗立在山体滑坡后的碎石堆后面，每天成千上万的救援人员匆忙而过，也鲜有人注意到时间在此凝固。“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 88 天”，那是 5 月 12 日的记录，很多天都没有变过。

中篇 “无与伦比”

6 月 28 日，“鸟巢”举行庆祝仪式，这座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和标志性建筑宣告正式落成。

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出新闻的周末，人们原本以为上午的落成仪式已是当日中国最重要的消

息，不过下午发生在贵州瓮安县的数万民众参与的冲击政府事件显然更为震撼。

六月·全民运动

“鸟巢”工地上有一间四五平方米的铁皮房子，那是47岁的老张经营的小卖部。铁皮房的角落里堆着四五个暖水瓶，是给工人们泡面用的。卖得最快的就是方便面和水，其次是2到5块的烟。

小狗黑黑欢快地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工人们说，黑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从不会跑到“鸟巢”工地外面去。

到了2008年6月，奥运工程基本告竣，民工们不再被这座日益整洁的城市所需要，北京市开始集中清理整顿地下室等廉价出租场所，这被一些评论者理解为变相驱逐农民工及城市贫民，以便美化奥运期间的市民形象。事实上，农民工根本不需要变相驱逐，当北京开始限制建筑、装修、重污染企业，失去饭碗的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离开。除了本书人物列传中提到的四位幸运儿，奥运会与普通的奥运工程建设者不再有什么关系。去“鸟巢”工地上看看，铁皮房已被拆除，建筑工人四散而去，没有谁知道老张和黑黑流落到哪里。

烈焰灼人

每个星期天，家住北京花家地北里的王淑琴都起得很早，她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团结湖附近上英语课。这位接近70岁的老人说，自己要在奥运期间向外国人展示北京市民的风采。在北京，像王淑琴这样为了奥运学习英语的老年人非常多，尽管他们学得很吃力，却相信这是在为北京奥运做贡献。

这些学英语的老人，只是中国人对北京奥运的巨大热情的一个缩影。

北京奥组委下面设置了一个捐赠办公室，2007年，他们做出一个明智的表态：不接受来自民间的“献礼”。幸好不接受，否则真不知道他们要准备多大的仓库。筹备奥运会的几年里，有数不清的公民制作出各种“惊人”的物品，其特征要么是耗费巨大的精力，要么是具有宏大的规模——这是他们很容易想到的表达对奥运赤诚之心的方式——有人购买了2008米长的白布，准备在全国各地征集10万个签名；有人将全部积蓄（70万元）用来制作“中华龙点火器”；有人手工制作了5.6米长的巨龙状的面塑，象征56个民族迎奥运；有人制作了一双2008毫米长的巨大的布鞋，用去棉布1000多米；有人花费200多万元，把《孙子兵法》刻在2008枚印章上，其家庭因此负债累累……

吕清水，北京一家健身俱乐部的经营者，北京奥运倒计时100天的时候，他决定徒步绕五环路一圈，然后再走到“鸟巢”。他走了20多小时，到“鸟巢”的时刻是晚7点，他很满意，比8点零8分提前了一小时。2001年7月13日晚，他也拥有足以自豪的提前量——萨马兰奇22点零9分才宣布北京胜出，他20点就开始设计北京奥运的会徽。吕清水说：“我是第一个奥运会徽投稿人。”

喜欢剃光头的曹大佛，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第一代个体户，2001年申奥成功，他形容自己的热情“像一枚二踢脚一样”腾然而起，他开始组建“中国奥运民间宣传团”，到世界各地宣传，让那里的人知道中国人对奥运有多么热情。他说自己完全自费地走了整整100个国家，有时有同伴，有时是独自一人。他还去了南极，而且赤膊15分钟，终于让又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属于中国人。

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媒体上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报道：一些个人或团队，通过骑车甚至步行，在中国跋涉几千公里，目的是“号召沿途群众支持北京奥运”。他们都是国产版的

曹大佛。

奥运期间，狂热的人们纷纷汇聚北京。在“鸟巢”附近的过街天桥和景观大道，和警察于滨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人——有人宣称从昆明骑三轮车赶到北京，还上过 CCTV 的节目；有人说自己为宣传奥运奔波六万五千里；有人试图通过警察帮忙找到张艺谋，献上自己创作的组歌；也有人拿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在这个区域里演讲，抱怨怀才不遇。

那些长途跋涉的奥运支持者，都有一副以激发国人奥运热情为己任的姿态，事实上，普通中国民众每每把个人荣辱系于国事，他们的奥运激情完全不需要激励，官方甚至担心：公众的过度热情会否洪水一样泛滥，无法收拾。

2007 年 10 月 30 日，北京奥运官方售票网站开始第二阶段的门票预订，因为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预订后一个小时的网络访问量就达 800 多万，网站很快陷入瘫痪。

歌华特玛捷票务有限公司是北京奥运会票务服务独家供应商，曾经有专家承诺，门票销售系统平台的负荷量绝对没问题，按他们的意思，如果说雅典奥运会的票务网络可以通过一只老鼠，那么北京的网络足以通过一头大象，但领导和专家们显然都低估了中国人的狂热，这次冲向网络的，其实是一头蓝鲸。

预订系统瘫痪的时候，奥组委的一位重要官员正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其他官员觉得自己无权处置这样的危机，于是立即驱车赶到首都国际机场，通过民航的通信系统向飞机上的领导请示，得到了“立即终止预售”的指令。事后，北京奥组委撤换了票务中心的负责人，也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公开道歉。

7 月 25 日上午，假如你仅仅是一个“出来打酱油的”，从北京地铁 10 号线北土城站来到地面，一定会觉得自己坐错了车，怎么跑到火车站广场上来来了？

你没有走错，这里是北土城路，连着奥体中心的南侧广场，路上、广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按新华社的数据，至少有三万人），场面确实很像北京的火车站。人群躁动不安，眼睛看不到的人海的深处，偶尔还爆发阵阵海啸般的吼声。陆续有人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来，神情里夹杂着极度的亢奋与疲惫，他们大多手里攥着红艳艳的票，肩上扛着一大卷凉席。

差不多 10 点的时候，头发花白、面色粉红的道格拉斯与他的华裔妻子孙爱珍手拉着手，挤出人群，除了疲惫而兴奋，还显得有些惊魂未定。他们买到了刘翔决赛的门票（他们当然无法预见到刘翔退赛），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信用卡、护照连同钱包一同被偷了。

不过，能够安全地出来，此刻对他们而言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7 月 25 日，北京奥运门票销售的第四阶段启动，各比赛场馆现场售票，最后的扑票机会。从 24 日白天开始，几个主要场馆门前就排起了长龙。人数最多的奥体中心售票处当晚就已有超过一万人排队，队列被迫在有限的空间里拐来拐去，扭成若干 S 型。

恰好是门票销售前那两天，北京持续高温、闷热，似乎要考验和凸显一下人们对奥运门票的狂热。比起晚上的蚊虫叮咬和困倦，人们普遍认为白天的暴晒与酷热更难忍受。可是又不敢喝水，几个临时公厕前，始终排着长队。偶尔有人中暑倒地，被救护车呼啸着送走。

25 日凌晨 1 点多，蜿蜒的长龙已近乎一条“卧龙”，疲惫的人们席地而睡，难以入眠的人们或游戏，或闲聊，还有一些人茫然地仰卧在地上，等着几个小时后的黎明。

“他的表现比较可疑，建议警察先把他干掉。”听着像出了什么大事，其实是十多个年轻人围在一起，在玩“杀人游戏”，里面还有一个深眼窝的外国人。

更多的娱乐方式，是传统的打扑克，中国人熟悉的“斗地主”、“锄大地”。

昏黄的灯光无力地漫射下来，很有一种特殊的广场文化的味道。

2008 年，中国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从年初的广州火车站，到大地震之后的绵阳九洲体育馆，都能见到类似的人海。只不过，这一次，人们是被激情趋使，而非被动地聚集。

排在第一位的徐永恒说自己是提前四天来的，他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直至下半夜仍被

记者们团团围住。其实提前四天也不算什么壮举，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第一个排队的人提前五天就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口。

差不多凌晨四点的时候，位于长龙后部的一些人躁动起来，可能是长期焦虑下的歇斯底里，可能是想占据前面的位置以便买到门票，他们冲向旁边的队列，辛苦维持的秩序瞬间崩溃。“（卷入混乱的）大概有几千人吧，非常可怕。”孙爱珍说她看到一些人被拥倒，被踩踏，人群中混杂着惊惧的呼喊和愤怒的指责。这个国家的“加塞儿”现象司空见惯，如此规模却极其罕见。

这场面让孙爱珍有些绝望，她几次劝丈夫道格拉斯放弃，63岁的美国老头却不甘心——他们是专程从美国赶来看奥运的——一直在人流的挤撞下坚持着。

倒是些年轻人首先选择了退出。大学毕业不久的付欣淼说，他本来和几个同学一起来的，因为身心疲惫，又担心局面失控，其他同学在凌晨撤离。

有限的安保人员在极力维持秩序。谢天谢地，场面总算得以控制，但原有的秩序已被打破，排在道格拉斯夫妇旁边的男青年韩珂说，队列里挤进许多新面孔，“细S”变成了“粗S”。

早上，随着售票时间的临近，偶有小的混乱发生，警方被迫封锁现场，暂时不允许购票者和记者继续进入。南出口处，上百名警察与同样多的各国记者，在一条长长的警戒绳两边相向而立，就像美式橄榄球开球前的阵势。

与北京奥运的第二、第三阶段网络售票一样，现场售票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狂热地向往着参与到奥运之中。学生、外地在京务工者是其中的主力。

仅仅半天时间，“鸟巢”、“水立方”等场馆的门票均告售罄，“有什么票就买什么票吧。”人群中，不断听到类似的急切的声音。这样的奥运狂热者还真不在少数，他们只为奥运门票而来，只为奥运体验而来。

道格拉斯夫妇意犹未尽，他们本来还想再次排队，继续购票，可惜已经无票可买。

奥运快到了，空气比较紧绷，很少有媒体描述25日凌晨的那场骚乱。事后回想起来，失控的人群假如再多出一些人，或者再疯狂一点点，或许将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骚乱在临界点前被摀住了，北京奥运真是好运气。

你是否想知道，那些历尽磨难买到奥运门票的人们，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他们翘首以盼的看台上？

在网站工作的金戈是一位超级体育迷，他通过网络等渠道买到了很多场次的奥运门票。第一次从比赛现场出来后，他和朋友打电话大声地抱怨着——看台上大量存在的缺乏观赛礼仪的举动，使得他心情大坏，尽管那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在他的周围，坐着很多仅仅把奥运赛场当作旅游景点的观众，比赛开始了，他们还在变换着各种背景拍照留念，就差在椅背上刻写“奥运观众XXX到此一游”了。在金戈看来，对比赛缺乏了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对比赛者、周围观众基本的尊重总要顾及吧。

金戈自己觉得痛苦，难道那些无心观赛的奥运痴迷者就不痛苦？许多观众一通狂拍之后，未及比赛结束就匆匆退场，可见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女球迷张敏感觉周围的许多观众对足球兴趣不高，连看两场90分钟的女足比赛对他们而言颇为痛苦。而一些穿着志愿者服装的年轻人不仅要做好服务，还得不断鼓动周围观众：“现在尼日利亚落后了，我们为她们加油，好不好？”然后他们带头高喊“尼日利亚，加油！”“奥运，加油！”——当然，使用的是汉语。

足球场上怎么奔放都无所谓，某些场合就不适宜热情过度。在射击场上，就有外国选手不解地问，观众为什么给本国运动员那么大的压力，发出不合时宜的助威声？要知道，这个项目需要的不是这个。

CCTV在报道柔道比赛的时候拍摄了一个花絮：两个年轻的女观众一直举着相机对准电

子显示屏，非常执著。原来她们知道柔道比赛有一种得分方式叫“一本”，于是一定要拍到屏幕上显示“一本”的镜头。最终，这两位有心人如愿以偿，而且拍到的还是中国选手获得的“一本”。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政府部门的民意调查显示，北京人对奥运的支持率是94.9%，国际奥委会惊讶于这个数字，又委托专业公司调查，得出的数字竟高达99%。真是万众一心，群情激昂，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民众还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集体狂热。

火炬传递最能体现北京奥运在整个中国掀起的痴狂。在广州、深圳等地，超过百万的市民上街迎接火炬，造成交通大瘫痪。在湖北武汉，曾发生比较严重的踩踏事故，内部资料显示有两个平民丧生，传递也被迫终止。

这成为火炬传递的一个转折点。从武汉站以后，基本不允许群众自发地在传递线路上助威，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是经挑选的支持者（详情见于本书关于传递城市本溪的报道），直到最终传到北京，限制才适度放宽。

境内火炬传递开始后，涌现出一大批追着“祥云”全国各地跑的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表达对国家、对奥运的支持。其中的许多人，沿路兜售国旗、奥运纪念品，以贴补开销。有报道说，最多的时候，这种追火炬的人多达千人以上，而且许多人收入颇丰，刨去路费竟能有所盈余。

武汉站之后，追火炬的人生意清淡了许多。

当然，并不是去为火炬加油的人才买国旗，2008年的夏天，北京差不多一半的机动车上都插着小国旗，连郊区违规运营的三轮摩托都插上小国旗，似乎它成了一件辟邪之物。满大街望去，小红旗招展，仿佛到处都是代表中国搭载贵客的礼宾车。

北京天意市场一家批发国旗的小铺面的店员说，国旗非常好卖，在6月份，仅他们的铺面就卖出上万面，“有一次我去送货，路上还卖了十来面。”

类似的批发市场和个体贩卖者，国旗进货渠道大多是小作坊，因为正规厂家的产品价格要高出至少三五倍。而北京市面的小作坊国旗，基本都出自同一个小村落——河北藁城市梅花镇屯头村。

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被爱国之情推高的国旗购销热潮，有些无视《国旗法》的存在。国旗按规定需要授权生产，对产品亦有严格要求。产自小作坊的国旗，错谬多多，比如旗面长宽比例不符合3:2的要求，比如五角星的位置偏差较大，比如颜色与标准国旗色相去较远。在浩荡的街头“礼宾车队”中，许多车辆上的国旗已残破不堪。

除了小作坊，正规渠道的国旗生意也非常火爆，据同里国旗厂厂长黄丹曙称，4月上旬开始，国旗厂收到的订单明显增多。“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0倍。”

让我们暂时把日历向前翻动几十页，看看中国的新郎新娘献给奥运的爱情。

2008年8月8日，农历是7月8日，一个数字上非常吉利的日子，新人们喜欢。北京奥运也早早把它的喜事定在了这一天。

海淀区婚姻登记处是北京各城区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一个，8月8日的阵势，就像是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在这里举办公开的婚礼——门口拦起了警戒线，警察和保安守护着入口，三个楼层都站满了工作人员。

前台大屏幕上滚动着几行红字：百年奥运，百年梦想，百年好合。

自由职业者孟凡华与女友阎胜玉早就商量好，要选择北京奥运的开幕当天结婚，他们知道那天会人气很旺，想多沾一点喜气。原本想很低调地赶到海淀区婚姻登记处办手续，不料他们却被CCTV“一起看奥运”栏目的记者瞄上了，一直跟拍办理手续的全过程，到了二楼

登记大厅，又赶上民政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视察，随从的官员以不容推辞的口吻对这对新人说：“让部长给你们证婚吧。”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读经济学硕士的刘先生和王女士，接近中午时才来到海淀区婚姻登记处。刘先生前一段在美国进修，他曾有三四次尝试进行网上预约，都因为人太多，网站“塞车”严重。无奈，他们只能当天来这里碰运气。

为了缓解登记高峰，海淀区婚姻登记处从8日午夜就开始了接待工作，平日他们开放大约10个登记窗口，这一天临时增加到60个。一层走廊的尽头，两个年轻人为什么事情争执着，听起来像是离婚前的财产纠纷还没解决。他们身旁，离婚登记处的大门敞开着。

据报道，四川达城市通川区、上海市长宁区等地有关部门决定，8月8日不办理离婚手续，理由是“给结婚登记让路”。还好，在北京，离婚申请者与结婚申请者尚可以享有相同的权利。

8月8日，光临离婚登记处的只有寥寥几对，而通过各种预约方式在海淀区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的新人有3200多对——这还没算上许多像刘先生一样临时赶来的。在整个北京市，有15500多对新人在这一天领取结婚证书，历史记录被轻松改写，以往的最高峰出现在2006年12月18日，共有4452对新人登记结婚。

在整个中国，共有314224对新人与奥运同喜，这还是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

扎堆儿结婚，似乎还不足以表达中国人对奥运会开幕日的特殊感情，还有很多准妈妈选择在这一天进行剖腹产，生一个“奥运宝宝”。8月8日凌晨，一位陕西妇女剖腹产成功，她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奥运宝宝”一生就是一对，更了不起的是，她的预产期原本是在9月20日左右，竟急不可耐地提前了40多天。

北京什刹海大金丝胡同12号的金丝居，一处北京很有名的四合院。金丝居有房9间半，鱼缸里游弋着金鱼，鸟笼里养着金丝雀，白天，葡萄枝叶和石榴树的影子投到青砖地面上，时光随着树影很惬意地缓慢流动。

在客厅一角的柜子上，写有“奥运人家”的瓷盘与关公的彩塑并排而立。金丝居是北京市旅游部门选出的598户“奥运人家”中的一家，也是其中的招牌。

2002年，北京什刹海兴起胡同游，旅游公司觉得金丝居是非常经典的四合院，就说服主人进行旅游开发。除了接待白天的参观，金丝居也不拒绝希望留下住宿的境外游客，它像一个家庭旅馆，适合体验比较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四合院生活。

四合院的男女主人荆继昌和王志喜，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展现给游人和房客。他们的客房收费不高，主人打理“奥运人家”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在靠近“鸟巢”的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也选出了一批负责接待境外客人的“奥运人家”，60多岁的周洪涛就是其中一家的主人。他曾长期在原外经贸部的驻外机构工作，足迹遍及非洲和南北美，外事经验丰富，这成为顺利入选的重要原因。周洪涛家里准备了20多套西式餐具，他和妻子向境外来客展示中国人的生活与好客之情。

假如中国的问题奶粉事件在北京奥运之前爆发，一个可能的的好处是，那些河北乡间的奶农们不至于直接把牛奶倒在马路上，可以把它当作有机肥料，供应给奥运特供蔬果的培育基地——奥运特供蔬果均施以有机肥料，比如媒体报道的蔬菜种植心得：把经过浸泡的黄豆被当作有机肥料沤在菜地里，浇灌菜地的清水换成了发酵的豆浆，还有用奶粉、白糖、醋等按比例调配的、用于提高蔬菜口感、甜度的营养液。

乳制品供应同样含糊不得。假如是一头特供奥运的奶牛，或许还有机会品尝到自己的奶汁浇灌的牧草。

中国人素有好客的家风，何况是举办奥运会。至于如何体现浩荡的热情，餐桌是人们尤

其重视的载体。除了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后者在富裕之后的中国反倒难度更大一些。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奥运会肉食品供应商千喜鹤集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公司将向奥运会供应生猪视为“政治任务”，正“不计成本”地在秘密地点以有机方式饲养生猪，确保运动员们不会因为吃他们供应的猪肉而无法通过兴奋剂检测。他们的“奥运特供猪仔”不仅喂以有机农作物，采用天然中草药免疫，而且每天还必须在室外“锻炼”至少两小时。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了关于食品安全双重标准的大讨论。千喜鹤集团的“奥运猪”引起了一些民众的不满，一位博客名为“十年砍柴”的人写道：“宁做奥运猪，莫为井下人！”他所说的“井下人”，显然是指历年来死于各种矿难事故的矿工。

2007年11月初，面对社会上关于“奥运猪”越来越激烈的讨论，北京奥组委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从没有要求任何企业建立专供奥运的秘密养殖基地，并对有关喂养生猪中草药和进行特别锻炼的说法予以批评。北京奥组委表示：“奥组委有关部门已对有关企业的行为予以了警告。”

千喜鹤集团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而否认存在所谓的“奥运特供猪”，并拒绝就供应奥运会的生猪饲养方式或地点提供细节。他们对外国记者表示：“我们没必要告诉你们，你们没必要问这个问题，你们也不应该报道此事，中国是个讲政治的国家。”

中国特色的付出

在中国乒乓球队的训练馆里，墙上刷着很醒目的“你死我活”；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馆里，标语换成了“上级逼，下级逼，互相逼，自我逼。不吃苦中苦，难有大突破。不经逼中逼，难上冠军台”。

经过“你死我活”式的选拔与训练的乒乓球运动员，8月出现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他们霸气十足地囊括了全部四枚金牌以及男女单打的全部奖牌，通往领奖台的荣耀之路上，乒乓明星们并不认识在前面引领的奥运志愿者陈娜娜，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志愿者与自己一样曾为奥运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

7月底，在昌平职业培训学校的礼堂，奥运礼仪志愿者完成了她们的最后一次集中训练。380多名美丽端庄的少女在完成了800米晨跑和上午的课堂培训之后，开始了下午的形体、队列和舞蹈训练。

礼堂的形状看上去比“水立方”更为宽大和扁平，这导致散热性极差，室内又没有空调。7月下旬恰好是北京的“桑拿天”，近400人闷在这么一个空间里，即使安静地坐在地上，也要汗流浹背。而少女们还要不停地踢腿、转体、跳跃，你甚至看得清汗珠在她们手臂甩开的瞬间飞散出去。少女们挑战生理极限的同时，还得按要求保持恰到好处的笑容。

只有两部电风扇——那种乌黑的、粗笨的强力工业落地扇——吃力地送出一些流动的空气，可惜在偌大的礼堂里显得杯水车薪。也许是因为过于陈旧，落地扇运转起来吱吱呀呀，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跌倒。

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来自北京某航服学校的陈娜娜依旧身材笔挺，面带笑容，这位乒乓场馆引领小组的组长用手不停地扇着，还要鼓励一下身边的姐妹。

有人把奥运礼仪志愿者的培训描绘为魔鬼训练，看来并不算夸张。志愿者郝婧钰说，在站姿训练中，必须穿着5厘米高的高跟鞋，头上顶一本书，两腿膝盖间夹着一张普通的白纸，在至少一小时之内，不允许有脱落。在托盘训练中，为了稳如泰山，要在盘子上立一根香烟，让它一直岿然不动。

按指导老师李柠的说法，奥运颁奖现场是要求零差错的。在闷热的礼堂里，志愿者冯思璐告诉记者：“我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在领奖台前晕倒。”

晚上的录像观摩课，陈娜娜看了雅典奥运会礼仪小姐的表现，那些异国姑娘参差多态，

很热情，也很松弛。“没法做比较。”陈娜娜以一种训练有素的语气对记者说，“彼此的标准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国情。”

指导老师也强调过中国礼仪小姐的特殊之处：“我们走路的样子既不同于猫步，也不是小碎步，两只脚在走路时微微向外分开，一路走下来，脚印就像一串叶子。有些动作只有我们中国女孩做出来才迷人。”为了“迷人”，女孩们必须在礼堂里蒸那漫长的“桑拿”。

奥运会期间的北京大学体育馆，先后四次，陈娜娜袅袅走来，脸上保持着千锤百炼的、得体的笑容，引领乒乓球明星们走向颁奖台。后面的三次，标准得如同播放第一次的录像，对于陈娜娜而言，这不过是在完成一次程序。9月的北京残奥会上，她依旧是乒乓球项目的颁奖引导员，同样的程序重复了24次。

奥运会需要的远不止颁奖礼上的礼仪志愿者，开闭幕式的引导员，各种礼宾场合的礼仪小姐，也都进行着专门、系统、高强度的训练。

在CCTV记录片《奥运档案》中，一位接受军事化训练的开幕式引导员岗位的竞争者背对着镜头，抽泣着用东北口音给自己的亲友偷偷打电话（她们的手机集训期间全部被收走，不允许与外界联系）：“受不了了，累死了，”她的倾诉因哽咽而断断续续，“还得淘汰，淘汰一大批。”

在此之前，这位20出头的女孩刚结束了艰苦的训练，包括3000米跑步，穿很高的高跟鞋站两个小时军姿，她们还要练习长时间头顶一个矿泉水瓶子，一位哈尔滨女孩哭着说，训练结束，人都僵在那里，不会活动了。

接近一个小时的记录片中，至少十分钟的镜头里有女孩在哭泣。参与各种奥运礼仪志愿者培训、选拔的，大多从小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下，而现在，严苛、残酷的训练和管教让她们不断挑战新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培训程序像一条生产线，完成着对一批批美女产品的塑造，链条上的每个人都顾不上追问自己：这么“折腾”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北京奥运会的竞技之外，辛苦付出的还不止陈娜娜这样的志愿者，甚至在奥运看台上的许多观众，也训练有素。

7月下旬的一个周二下午，在丰台区的一家街道办事处，40多名志愿者在演练赛场助威口号和动作。这些人平均年龄约45岁，多为社区居民中的党员，他们是“北京职工文明拉拉队”的一支，据报道，整个拉拉队有20万人。

训练的条件还不错，是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有空调。

落座后，队员们各自从黄色环保袋里取出道具——黄丝巾和塑料充气棒（或暂时以空的矿泉水瓶代替），开始跟着讲台上的指导老师做动作。

指导老师是40多岁的中年男子，穿着休闲的白T恤，做派却像一个交通警察，他手里不断变换着黄的、绿的、四色的小旗，摆出不同的姿势，群众就随之喊出不同的口号，比如“更高更高，更快更快，更强更强”，“加油奥运，加油中国，嘿嘿嘿嘿嘿嘿”，“运动员——加油，中国——必胜”。黄丝巾或充气棒挥舞起来，击打出配合口号的节奏。

拉拉队的成员介绍说，训练从一年前开始，最初是一段很辛苦的入门训练，后来改为每周一个下午，强化记忆，强调纪律。

训练中，拉拉队竭尽所能地提高嗓门儿，这也是工作需要——万一奥运赛场出现不和谐音，需要拉拉队的声音将其覆盖。

下课前，每个队员发一份《安保志愿书》，要本人及家属签字，负责人告诉大家，发现哪位队员“历史不清楚”或参加过非法组织，要及时报告，去现场观赛其实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一旦出了问题，要“倒查责任”。最后，指导老师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奥运期间最长的观赛时段，可能会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5点，原则上不能喝水。这么长？有人轻轻地吐了一下舌头。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召开的日子里，拉拉队成员一次次奔赴赛场，他们并不只是去填补

看台座位的，他们要充分展示东道主的热情。不过，这种看台上的热情好像也与比赛进程没什么关系，哪个队支持者少，或者哪一方场面被动，拉拉队就慷慨地施予声援。

在北京，一家不知名的社会艺术团体也在辛劳付出，它有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舞和谐，它还有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特殊使命——培养奥运会看台互动指挥员。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上，“鸟巢”看台都会安排 500 名互动指挥员，他们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

培训结束时的考核环节是这样的：一个指挥员需要走到 500 人前面，通过动作和语言，在 90 秒之内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在开闭幕式的实际场合，难度更大，每个互动指挥员要“指挥” 2000 观众。中国人生性内敛，激活一大群陌生人不是容易的事情。

出于培养心理承受力的需要，考核现场的气氛制造得有点残酷——表现好的指挥员获得掌声，表现不好的获得嘘声。

此前，一个渐渐公开化的秘密是，在每年的 CCTV 春节联欢晚会上，观众席都安排若干“领掌员”，负责制造欢娱场面。对于奥运会这么重大的节庆，“鸟巢”看台上安排 500 个类似的职位，不会有几个中国人感到意外。

7 月 28 日，重庆民族艺术学校收到传真确认，将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学校上下响起一片欢呼。

五位老师和 23 名 13 岁到 18 岁的学生，承担的角色是《中华礼乐》600 名贵妇中的 28 个，她们也是开幕式差不多 3 万演职员中的 28 人。这是荣誉之旅，志愿之旅，没有一分钱的报酬。接到传真 5 天以后，她们坐火车到达北京，未及安置，直接背着行李被拉到排练现场。

几天的排练下来，老师们最不满的是伙食。10 个孩子一桌，只有四菜一汤，菜大致就是黄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西红柿的轮回。经过很多参演者的抗议，组委会把伙食加到五菜一汤，还是很难吃饱，她们只能到驻地附近的小吃摊去加餐。为了能在北京奥运会上表演，生活的清苦和排练的艰辛都是必须忍受的。

在学生之外，军人承担了更多的演出任务。漫长的排练过程中，一个麻烦凸显出来——很多参演战士面临退伍（多数集体表演项目准备期很长，比如 2008 人击缶的节目准备了三年多，而普通战士的服役期一般只有两年）。于是，组织者把参演战士集中到专门成立的“礼宾大队”，退伍暂缓，全力保障节目排练。

没有知道北京奥运会花了多少钱，也同样算不清省了多少钱。关于文艺演出的花销，总导演张艺谋给出的答案是——他的团队贯彻节俭办奥运的精神，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四场盛大演出，花费还不如多哈亚运会的一场开幕式。

多哈亚运会上，卡塔尔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他们开幕式花了约 2 亿美元，人力成本奇高，整个策划花几千万委托给了澳大利亚的团队。而且，连“志愿者”也待遇优厚。

而北京办了四场盛大、奢华的演出，花费却没有打破多哈人的“世界纪录”，这向外界传递的信号是：中国的物价真低啊，劳动力真便宜啊。何止是低廉，我们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制度优越，很多事情是免费做的。

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演出主体，接近 3 万人，除了军人就是学生。他们都是演出“志愿者”，提供简单的食宿就 OK 了。

2008 人的太极拳表演，是少林寺附近的塔沟武校承担的，学校需要自己花钱包车把学生们运到北京，然后开始义务的训练。“能参加奥运演出，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在漫长的筹备期里，塔沟武校要这么激励学生，也要这么说服自己。

为开幕式演出提供设备支持的一个供应商透露，他们提供了 2008 件道具，最后取消了，费用也需要自己承担，很是无奈。

志愿者是奥林匹克的最大财富，那么北京奥运会无疑拥有最多的志愿者，创造了最大的

“财富”，也节省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开销。

奥运开始后，几十万街道治安志愿者的辛苦加倍。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团结湖地铁站附近扇着扇子，无聊地找着话题，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夜班远未结束。老人们说现在要“加班”，执勤到半夜12点。另一位老人则说，他们都是街道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他们没有报酬，只是能得到一套服装、帽子、遮阳伞。

各级政府部门也乐于为奥运付出。为了保证奥运大厦视觉上的美观，海淀区在其周围的屋顶上种植了草皮，区财政为美化工程投入1000多万，属于义务奉献。邮政部门也主动提出要为奥组委提供特色服务，将他们的邮政编码改为102008，后来没有实行。

必须做出的牺牲

离奥运开幕尚有些时日，宣武区陶然亭街道早早打出了标语：“减少出门，为外国友人让出大道。”

还好，这仅仅是一句倡议，居民不必真的被限定出门的次数。不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这种倡议更有效力的限制随着奥运的迫近越来越多，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开始进入非常时期。

北京的空气质量，是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对北京奥运会的最大担忧，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说：北京的空气像一碗浑浊的蛋花汤。为了让北京的空气至少像一碗清爽的蛋花汤，整个北京甚至整个华北都付诸行动。再现蓝天，其实也是非常时期的最重要使命。

一些车主收到了汽修厂的短信：“接上级通知，7-20到9-20全市汽修厂暂停喷漆业务，请车主早做准备。”

一些居民小区里贴出了收废回收暂时歇业的告示，第一行就是“因奥运会召开”。

一位网民写下了这样一个帖子——

中午吃饭，有搞化工的人，听到他们谈论，奥运期间，北方很多化工、医药工厂都要停产。

我说：“那是好消息呀，你们南方不受影响，赶紧加大生产，抢占市场。”

人家说：“好个屁呀，我们原料是山东的，没有原料，生个屁产！”

“那赶紧囤积原料啊，还有一个半月，备战备荒还来得及。”

“咳，就你聪明？政府已经规定，7月1日到10月18日，全国范围内危险品都不准运输，高速也不能上，长江也不能进，我们原料是剧毒物品，已经运不出来了，你就等着停产吧。”

我不禁丧尽天良地哈哈大笑：“那还不如规定全部停产算了。一样的停产，人家北方停得多自豪啊：咱不贪那两个钱，咱支持奥运！倍儿有面子！你们呢？停产也白停产，损失也白损失——国家也没要求您支持奥运啊！纯粹打水漂，无名英雄！哈哈！”

笑完了，回去上网一查，果然查出禁令无数，大禁如梳，中禁如篦，小禁如剃，凡是不朝气蓬勃不和谐不向上的行业，几乎全都着了道。而且在经济高度分工、高度依赖的今天，禁令都是子母弹，拉响一个，炸倒一片，一个工厂停产，十家企业遭殃，三百六十行，行行受影响。

6月底是一道铁闸，挡住了许多机械的运转，车轮的滚动。奥运近了，北京市的重污染施工企业被要求停工，重污染生产企业在确保达标排放的基础上，继续减排30%。首钢集团的涉钢系统率先减产、停产，奥运场馆周边建材企业歇业。

专家说，北京有着簸箕式的地形特征，要达到治理空气污染的良好效果，必须与周边省市联动。奥运会事关国家利益，周边联动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四省市污染严重的冶金、建材等企业也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其中天津、河北等地的燃煤锅炉要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并使用低硫煤。

本书随后将重点提到的辽宁省工业城市本溪，也因北京奥运会出台了水泥、冶炼等行业的停产减产措施，为的是保证60多公里外的沈阳的几场奥运足球赛能在更干净的天空下进行。

经济观察报网站提供了一份7月20日起北京及周边减产或停产企业（或行业）的不完全名单：

北京：

首都钢铁集团；

北京所有的水泥厂和200多家采石场、石灰厂关闭；

北京东方化工厂；

北京燕山石化集团，四个火力发电厂和19个重度污染工厂将减产以减少30%的污染物排放。

河北：

已提前关闭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工厂。截至6月7日，以下日常产能已被关闭——

焦炭：35万吨；

铁：711万吨；

钢：558万吨；

水泥：967万吨；

小型发电厂：74.5万千瓦每小时；

保定太行水泥公司自 7 月 25 日起停产；

6 月底，重要的钢铁生产区邯郸已经关闭了峰峰矿区 116 万吨焦炭产能。

内蒙古：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周围的 80 多个煤炭存储和销售中心已经关闭，还有 100 多家被要求整改；火力发电厂必须使用低硫黄的煤炭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如果空气质量不能达到标准，主要的污染者也会被要求关闭。

天津：

两个钢厂、一个化肥公司、一个水泥加工厂和一个冶炼厂 7 月 25 日到 9 月 20 日将被关闭；两家水泥公司和一个化工厂将减产。

山西：

小的煤炭厂已经被勒令关闭；

由于矿难频繁发生，6 月中旬开始，许多小的煤矿相继被关闭。

一位石家庄市民在网上留言：“治理污染企业喊了 20 年，还是奥运会有威力……燕赵儿女万分感谢奥运会，千万别闭幕。”她所在的石家庄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北京举办奥运会，使得她家附近的高污染企业都无法开工，火电站被强制安装了净化装置，街道也开始天天有人清洗。

非常时期，给某些人带来意外欣喜，另一些企业和个人却要面对不同程度的牺牲，个别人甚至会觉得牺牲超过自己的承受力。河北武宁县的一名工人因工厂为奥运停产而失去工作，生活难以为继，竟走上了绝路。

大量工厂停产、限产，很多产业临时叫停，大型货车进入市区受到严格限制，绝大多数公司货源不畅，出现大批无事可做的人。“避运”的说法应运而生，一些旅行社瞄准了商机，推出“避运套餐”，有人趁机休了长假，离开北京出外旅游，真正响应了“为外国友人让出大路”的号召。

除了净化空气，另有一些重大使命需要人们做出牺牲。

据隶属于新华社的《半月谈》报道，以河北省赤城县为代表的北京周边地区，近年来一直为首都贡献着宝贵的资源，“北京市民每饮用 3 杯水，就有 1 杯来自赤城”。随着奥运会的临近，需要它们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断加码。报道称，为保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量 and 水质，从 2007 年起，赤城以及承德市滦平、丰宁三县不再种植水稻，改种耐旱作物，每亩地可因此得到 450 元补助。这项被称为“退稻还旱”的工程，涉及河北省 10 万亩高产水稻田。在沽源县，实施了“退菜种草”工程，全县已退菜种草 5000 亩，计划 3 年内共退菜种

草 2 万亩，届时每年可为下游节水 1500 万立方米，对缓解北京人水矛盾大有裨益。但对当地村民来说，这意味着每亩菜地要最低损失 1000 元。

6 月开始，北京方面实行更为严格的签证政策，大量居留中国的外籍人士被迫离境，而作为旅游者进入中国也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本国居民，奥运期间的流动也将受到限制。如果人们没有买到门票，又要表达对奥运的巨大热情，那就坐在电视机前独自欢呼吧。

2006 年初，北京市“2008 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宣布，从当年 4 月起，对北京市“违反规划”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及各类广告牌和牌匾标识，进行强制拆除。类似行动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在上演。

在历时两年多的行动中，北京市共拆除近 10 万块广告牌匾，其中不少广告原本拥有合法审批手续。城管的强制拆除行为被指不仅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同时程序上也严重违法，由此引发多起行政诉讼。

广告业者受到的限制还不止于此。据北京奥组委和中国广告协会称，除了北京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其他广告中含有“2008”、“北京”、“火炬”字样的，均是一种侵权行为。

为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北京市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有奥运赛事的城市，还出台了很多相关的公共管理措施，涉及面非常广泛，如交通管制、错峰上班、全面安检、城市人口排查、某些手术暂缓、民航禁液、邮政禁寄……

接到“稍息”口令的还远不止这些行业。奥运期间，北京的人才市场暂停全部招聘会，五道口服装市场暂时歇业；一个叫格林小镇的社区原本到了换届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时候，却接到主管政府部门的“意见”：为了平安奥运，希望本届业主委员会继续工作，换届选举等奥运会结束以后再说。

贵为首都，配合政治任务本来是家常便饭，比如“两会”召开带来的十几天不方便的日子，每年都要有；比如“中非论坛”一类的重要活动，不知何时何地，道路就管制了，交通就限行。不过，像奥运会这么繁重的、冗长的、高度紧张的政治任务，即使是“老北京”，也无法从记忆里找到先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媒体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奥运固然重要，需要保证安全、秩序和适当环境，全国尤其北京有必要出台一些公共管理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因此而进入某种非常时期乃至紧急状态，相关措施仍然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张千帆表示，奥运会显然是重要的公共利益，但老百姓的生活便利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公共利益。从公共管理的目标来衡量，只有真正必要的措施才是合理与合法的，要防止行政措施不必要地限制自由和增加成本，尤其不能让公民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为这些限制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2008 年 7 月 16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排首次燃礼花，大半个北京都看得到“鸟巢”

上空的绚烂；7 月 30 日，开幕式在“鸟巢”进行了第一次封闭式的带妆彩排。

七月·请让开，奥运来了



奥运配套公园内的“钉子户” 关军 摄

2001年2月，北京许多主干道上，用于美化的草坪和落叶灌木居然前所未有地在一夜之间绿了起来，奥申委副主席、宣传部长蒋效愚特意解释说，春节前，北京市在部分草坪上使用了草坪增色剂，为的是增添假日色彩，与申办奥运没关系。或许是巧合吧，正是在那个时候，评估团造访北京。

2008年，奥运会在植被最繁茂的盛夏举行，北京主干道的灌木无须涂抹颜料，尽可以欢畅呼吸。不过颜料供应商并不会失去生意——城市里处处需要粉刷一新。

7月的北京，温度已经很高了。经过整整7年的筹备，伟大首都也显露出奥运新气象。主干道旁居民楼的“平改坡”全部告竣，充满欧陆风情；主干道旁的店面粉刷一新，标牌统一更换；主干道旁的不雅观建筑统一由奥运宣传板遮挡……

这个月，北京城区的雨水多过普通年份。假如有云团飘过北京上空，它的命运多半是被火箭击中，一旦奥运开始，这些火箭会搬到远郊区县，在那里拦截云团。有人诙谐地把此举称为“双规”老天爷——“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让雨在奥运开幕前落下，或者让雨在北京之外、至少是“鸟巢”之外落下。

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晚上，空气湿得可以拧出水来，但雨水被成功地阻断在城区以外，火箭的轰鸣，淹没在焰火燃放的喧嚣中。

为了“平安奥运”

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28岁的北京籍男子杨佳突然持刀出现在闸北区公安局的一座综合办公楼内，据警方说，杨佳为了报复连续捅伤10余名警察，其中6人抢救无效死亡。

7月21日，昆明连续发生两起公交车爆炸案。

这些突发事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北京奥运会，但还是让本已严峻的奥运安保形势雪上加霜，用于安保的投入不断追加。在此之前的春天，一些被制止的恐怖袭击被证实是针对北京奥运的——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航客机上，图谋撞击北京奥运场馆、制造又一个“911”事件的计划最终败露；在一辆山西开往北京的汽车底部检查出了爆炸装置，据称目标也是奥

运场馆。

7月份的北京奥运会时工作动员大会，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平安奥运是北京奥运成功的最大标志。

7月23日上午，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前停了7辆警车，以及5辆没有牌照的车，每隔几分钟，还有巡逻的警车由南向北开过。这天是星期三，每周固定的信访接待日。

市政府正对的正义路有一个街心花园，每条长椅周围都三五成群地聚集着上访的人。有人商议既然国内告状无门，能不能告到国际法庭去；有人在哀叹“谁让你生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讨论奥运会之后对上访的限制会不会松动。

一个着装警察试图说服一群老人离开，他想尽可能表现得有亲和力：“我就（是）一机器，脱下这身衣服，没准儿是一坏人呢。”

一个老人立刻接话：“别，脱下这衣服，没准儿您是好人呢。”

街心花园里，一尊雕塑静默无语，那是少女托腮冥思的造型。

奥运前的“上访村”，截访的车子陡增；周围的旅馆拒绝带上访资料的人入住。

居民委员会是国家机器的神经末梢，他们负责在细微处防微杜渐。许多住宅小区都贴出居委会的告示，要求重点监控几类居民，其中甚至包括近期闹家庭矛盾的。

为美国奥运代表团建立训练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高于美方训练区的环绕一周区域，要签订“制高点责任书”，专人紧盯制高点动静。各楼管理员逐个宿舍分发安全须知，要求“在美国奥运代表团进驻期间，面向美方训练区域各学生宿舍窗户、楼道窗户、卫生间、洗漱间窗户早7：00-晚7：00禁止开启”。

网络上一个叫“新疆人在北京”的QQ聊天群，有人在抱怨，回龙观地区的好多房东为避免麻烦，都不肯出租房子给户籍新疆的人。

北京娱乐场所空前清查，带有色情意味的消费生意清淡，娱乐场所服务生个人信息必须登记在册，由派出所备案，有前科的、脾气暴躁、容易滋事的人等，要求暂时离职或辞职。

“鸟巢”附近，人行道边的绿化带里，火箭发生装置若隐若现。它并不准备回避路人的顾盼和拍摄，相反，就是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存在。

在北京市西苑地区的某足球场，20个武警战士在每天重复着高强度的训练。每次训练前，他们都要高声朗读奥运安保细则，其中包括“为了奥运安全，我愿做出牺牲”的语句。训练的一个重要科目，是应付异常突发情况，其中的一幕模拟演习，有人举起白纸，上写“支持奥运，反对法国”，其他人马上冲上去加以制止。

一家外国媒体借游客之口抱怨说：北京准备了7年，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惜就是缺少街头艺人、流浪汉。在他们看来，北京的安保气氛太浓重，如临大敌，事实上，北京方面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调试紧张与轻松间的分寸，就如同他们费心地控制着装警卫与便装警卫的比例。

香港某报曾刊发了一条不实消息，说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都接到北京警方通知，内容包含对外国人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外交部很快出面回击了谣传。奥运前夕三里屯酒吧确实冷清了许多，不过很可能另有原因。定居北京的美国人Eric（就是那个语言天才锁柱子）说，奥运前夕，他认识的差不多一半老外都被迫离开了北京。

七月底的周五晚上，三里屯一家名叫“26”的酒吧里，三个歌手和一个印度舞者轮番出场，四位侍者守在吧台昏黄的灯光下，陪伴着和他们数量差不多的客人。以往30一支的啤酒，降到了20元，看不到有人豪饮。女歌手尽力想调动自己的情绪，从而调动客人的情绪，看起来没什么效果。

奥运来了，会给酒吧生意带来影响吗？吧台里的光头男子没好气地说，能不受影响么？听起来不像是积极的影响。

那家装修气派的大型酒吧“床”的门前，整晚有警察值守。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警方也协同宣传部门加强了控制。两份流传到网上的官方文件，证实了对网络“舆论阵地”的控制和争夺。其中一份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称从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帖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钱，“五毛党”一词由此而来；而编号2008-0173(2)/CG(P)20080112的《沈阳市政府采购中心谈判采购公告》显示，受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委托，沈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就“奥运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集成软件”项目以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组织采购。

“五毛党”成为2008年的网络异类，在反击西方“反华”媒体、政要及藏独势力的声浪中，他们为引导舆论、“驳斥”或覆盖不利于官方利益的声音而不遗余力。“五毛党”也代表宣传部门的新思维，官方一向强调的“堵”与“疏”的结合，终于在后者上面有所作为。

平安奥运，不允许有被遗忘的角落，《北京青年报》记者刘砥砺的一段报道，足以让人感受到北京已武装到了牙齿，即使偏远区县也不例外。

靳各寨村是位于京郊密云县东部的一个几百户人家聚居的行政村，它距离北四环外的奥运中心区90多公里，距离最近的奥运场馆顺义水上公园40公里，村里几十年里间没有外国人光顾。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村民们宁静、慵懒的生活被打破，根据北京市“平安奥运行动”指挥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村里开始招募奥运治安志愿者了。

和城里的景象相似，村里的治安志愿者大多是50至70岁的中共党员，他们也穿上印有燕京啤酒标志的白T恤，戴上红袖标，一次又一次地被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县里、镇里的干部陆续进驻（仅镇政府派来“包村”的干部就有8名），让人感觉到局面的紧张。村主任李玉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像这么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还是头一回。”

靳各寨村按照地势走向被划分成8个片，每15户形成一个网格，每个网格，责任到人。其中，对于一些曾经参与过邪教组织、多年越级上访、以及刑释解教人员，村里特别安排治安志愿者加强关注，如发现有异常动向或离家外出的情况，都要向上级单位进行汇报。

一位河南塔沟武术学校的教练带着学员在“鸟巢”实地排练太极拳节目，不断收到一个暗恋他的女子的短信，对排练情况评头品足。开幕式节目当时属机密，而且每天进入“鸟巢”需要过四道关卡，连鸟都很难飞进来啊，教练开始还以为对方是在蒙自己，但是难以解释她怎么会把排练内容说得那么准确。直到有一天，教练看到了孤零零站在看台上的那位23岁的老乡。

为了每天关注自己心仪的人，河南姑娘一次又一次蒙混过“鸟巢”的四道严密关卡。安保部门得知此事后，不免感觉后怕——幸亏她不是恐怖分子。奥运安保甲胃层层，终究也有阿喀琉斯之踵。

不存在的示威区？

7月23日，奥组委在“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奥运期间将在日坛公园、紫竹院公园和世界公园开辟游行示威专区，供中国公民与境外人士进行抗议活动。只是有个前提，需要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准。奥运将让这个国度更尊重公民的权利，许多媒体当时就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称，我们可以从“奥运游行示威公园”开始，慢慢对公民进行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的训练，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实践和意见表达能力。

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北京奥组委顾问、美国人类学教授苏珊·布朗内尔推动了这一专区的设立，而苏珊本人的解释是，自己确实与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提出

过类似建议，但她并不认为那会是促成这一动议出台的决定性因素，她甚至不敢肯定自己的建议是否到达北京奥组委的决策层，“或许只是巧合吧。”她谨慎地说，“决策应该是中方自己做出的。”

不过，苏珊并不否认自己从欣喜到疑惑的情绪起落，她不理解这个好的动议为什么最终没有真正落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了对示威区没有得到利用的遗憾。

8月中旬，位于北京白石桥地区的首都体育馆热闹异常，奥运排球比赛正此进行，而一路之隔的紫竹院公园，游人们悠闲地跳舞、划船、散步、唱京戏，雨水浸润过的草地散发着清香。

据说，这么一个清幽的地方，奥运期间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开辟一小块区域接纳合法抗议者。现在，听不到抗议，只有悦耳的鸟鸣。

公园里最怡人的风景自然是来自竹林，眼光所及，到处是茂林修竹，假使有人要在景致这么优美的地方表达不满，他也一定会呼吸舒缓，心态平和，有话好好说。如此看来，有关方面的选择还真是用心良苦。

竹韵餐厅前面，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若不是事先询问警方，你实在看不出这就是紫竹院公园里的游行示威区。公园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表示不清楚存在这个区域。

空地周围竹林环绕，完全看不到游行示威方面的标识，连警察都没有。整个紫竹院公园里也难以找到关于游行示威区的指示牌。

一些记者也发回了日坛公园、世界公园的现场报道，他们看到的情景与紫竹苑公园的没什么不同。在位于北京使馆区的日坛公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记录下发生在8月9日上午10点30分的一段小插曲。

穿着平常的白短袖和米黄长裤、最近才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张亮（音）从日坛南门进入，径直走向两百米开外的“祭天壁画”景观。他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他前几天花200块钱专门定做的横幅。张亮看准壁画前一对一左一右相隔20米的灯柱，开始动手绑横幅。旁边路过一两个游客，看他个头不高，干活有些吃力，随即上前帮忙。

横幅展开，红底黄字的标语挺长，一口气还读不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以及生产力广度，缩小贫富差距，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国力强大和全民富裕的新社区。”张亮擦擦额头上的汗，稍稍退后看横幅有没有挂齐。“希望它（横幅）能够挂久一点，一次搞不好就多来几次。”张亮说。

一会儿，从壁画右侧小路的树荫下走出两个灰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查问张亮的来意，同时，另外几名保安走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几名警察带走了张亮。

北京市局示威游行审批处民警表示：“一个人要申请示威游行，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朝阳分局的专门负责人也解释说，“必须得本市的（户口）或是在北京呆上六个月以上的（外地

人员)才能在北京申请。”

7月23日以后,假如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在三个公园内的专区里游行示威,会有怎样的遭遇?不妨看看北京某都市类报纸的一位年轻记者的讲述——

我按奥组委公布的程序去试了。去负责接待中国人申请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从上午9点多呆到中午12点,没有人去申请。然后我就自己试了试。在接待大厅,有一个牌子写着“游行申请”,我过去问怎么申请,女警察表情愕然,让我给治安总队的法治科打电话咨询,然后再办理。

第一次是用手机打的,对方先问我是哪里人,我是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我说了我想在日坛公园示威,他说让我去朝阳分局申请。

我把奥组委在前一天发布的程序读给他听,他说他们没接到任何关于接待示威申请者的通知,申请者要按法规到示威地点所在地的分局办理。

我再次提醒他,是奥组委安保部长说国内申请者到治安总队办理,他不耐烦地答复“那你找奥组委咨询去”。

我开始以为对方听说我是学生,是在搪塞我。后来让实习生用座机再给治安总队打电话,说是保护小动物协会要申请示威,得到的答复相同,到所在地分局申请。我又给朝阳分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好像从来没接待过“示威申请”这样的业务,说业务流程不清楚,让我过一段时间再打给他。

后来我找到了世界公园的工作人员,对方说他们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示威活动通知。

紫竹院公园负责宣传的人没正面回答我,说要当面采访再谈。后来我又给朝阳区委宣传部写采访申请,想接触日坛公园……等我准备再给朝阳分局打电话咨询程序时,(报社)领导说这个题目不能作了。

整个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获得在三个公园抗议的批复。倒是有一些零星的报道指出,个别前往申请游行示威的中国公民,随后受到了人身限制。另有一些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有人选择了不合规的方式表达意见。

准备了好多天

奥运不仅是北京的，也是全中国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去一座名叫本溪的距北京近千公里的东北城市去看看。

本溪是辽宁东部山区的中等城市，一座日渐没落的老工业基地，煤已采光了，铁矿也快见底了，大量失业的产业工人经历着艰难的转型。这城市知名度不高，而且没诞生过什么革命家，也没产生过耀眼的运动明星（冬奥会银牌得主李妮娜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了）。

2007年4月26日晚，时年39岁的姚革看电视里播放的新闻，北京奥运火炬揭开面纱，传递路线也同时发布。播音员宣读境内113个传递城市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姚革颇为意外地听到一个名字：本溪。

本溪是他的故乡，但他从没想过它会成为火炬传递城市。与姚革一样，本溪市的100多万市民大多也经历了惊异-怀疑-兴奋的过程。

按既定线路，火炬将在一日之内连续传递本溪、辽阳、鞍山三市。三座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里，利于火炬团队连续作战，不过市民们还是不免猜测：本溪和辽阳的入选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无论如何，争取得到火炬传递机会可以被看做本溪从未有过的荣耀一刻。而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想法是，借助火炬传递为本溪做一次“免费的形象广告”。

亢奋之后，艰苦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对于这座人力、财力有限的城市而言，“举全市之力迎接火炬”的说法并不夸张。尤其是随着火炬传递的安保压力越来越大，本溪市的安保之弦也越拉越紧，仿佛要经过这座城市的不是名为“祥云”的火炬，而是敌对国的装甲运兵车。

火炬传递线路几经斟酌，最终放弃了穿越繁华地带、展示城市新貌的初衷，改为滨河路的一段，起点体育馆，终点殡仪馆，一侧是太子河，一侧是几座小山丘，这里不仅人少，连路边的建筑都少，容易“控制”。

火炬传递起点旁的鹏程园社区（它是线路上仅有的两个社区之一）有近百住户临街，他们的门最初被敲响，是因为政府要借用他们的阳台，贴上中国国旗与奥运五环并列的招贴画。几十幅整齐排列的图案，为的是展示本溪人“对奥运圣火的热情”。

敲门声不是只响这一次，而是时常响起。警察、街道干部经常要来做工作，确定房间的固定住户，登记备案，而且被告知火炬传递时的既不许家中无人，又不许开窗，不许在窗前观望、走动。作为精神补偿，某些住户会收到一个西瓜。

不仅如此，在6月下旬、7月初的两次演习和正式传递的时候，每个沿线住户家都会安排一名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入户值守，以防意外事件。

入户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值守人员敲一家沿线住户的房门，敲了几次都没人答应，最终他们动用某种技术手段开了门，见到的竟是屋内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们凭什么闯进我家？”值守人员也很生气：你凭什么不配合政府的工作，还故意不开门，难道心里有鬼？把他带走，接受审查。结果，那位拒绝合作的住户被关了几天。

另一强硬的住户运气好一些，他们大声斥责擅入民宅于法无据，值守人员自觉理亏，无奈地离开了。

一位女警察早晨4点就到了——因为到的实在太早，她负责“照看”的老夫妻有抵触情绪，拒绝开门。女警察就在门口站着，难得地目睹了夏日清晨天光渐亮的全过程。后来，老夫妻有些过意不去，给女警察搬出一只小板凳。

火炬手张学锋熟识的一位警察，任务是值守路边建筑物的屋顶，“他在上面站了一晚上，真不容易。”

这座城市的神经好像从未紧张到如此程度，一位姓王的警察说：“我们都快被逼疯了。”

其他工作人员同样要作出牺牲。一位记者这些天患了严重的痛风，脚都不敢穿鞋，走路要一点一点蹭，但是很抱歉，演习的时候还是要去，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既然报完名了，

就无法更换了。

15岁的婷婷6月底刚参加完中考，有点儿重回人间的意思，她突然想起这城市要经历一个大事件，“太好了，我可以去看火炬传递了。”欣喜之情只持续了一秒钟，父亲告诉她，普通市民不允许去现场。像其他普通市民一样，小姑娘觉得自己的热情被晃点了。

围观群众确实不是随便当的，他们都来自全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位观众都经过政审，进行备案，配发专门的证件。

法院的多数员工都要担任观众，7月3日那最后一次演习，“除了火炬是假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的运气比警察稍好，到岗时间是早晨5点半，他们不能带打火机，不能带饮用水，要带上的是一张笑脸，以便营造夹道欢迎的生动的气氛，一直到上午10点。

法院的观众们服装不算单调，只是牌子无一例外都是NIKE——单位事先发了NIKE专卖店的代金券，人们可自行选购。遮阳帽倒是统一款式的，adidas品牌。有年轻人仔细鉴别了一下，认定专卖店的NIKE是真品，而adidas却是假货。

演习那天早晨6点，董先生开车接近了本钢宾馆附近的家，遇到警察的拦截和盘问，董先生解释说回家吃饭，警察开导了他：“到哪吃早饭不一样啊。”董先生只好驱车转悠了几公里，在一个路边小铺解决了早餐问题。

为了迎接火炬，全市所有的网吧、按摩、洗浴、娱乐场所都接到通知，只能经营到晚上11点半之前。这些基本靠夜晚做生意的店家门前，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变卖、转让的广告。

在本溪做小生意的热合买提等维吾尔族人汉语很差，这让警方感到为难，经协调，专门从乌鲁木齐调来几名维族警察。热合买提这样描绘为同民族警察的初次会面：“警察来了，问我们来干什么，有没有做坏事。我告诉他，我都知道，全市50多个维族朋友，都是好人，没人做坏事，我们就烤羊肉串。真的。”

因为北京要办奥运会，本溪的这个夏天禁止露天烧烤，热合买提和他的50多个伙伴只能在同族警察的陪伴下，面对一大段太过悠闲的时光。

7月9日，快到午饭时间了，李冬仍像蜘蛛一样吊在前进路的一幢高层建筑上，洗刷着外墙，“晒得快要虚脱了。”他抱怨着，却只能继续忙碌，这项工作必须在傍晚结束，以跟上全市清洁建筑的扫尾进度。按照政府部署，主要道路两侧的建筑全都粉饰一新，连楼缝间看得到的小块墙体也不能遗漏，假如你只是在主干道上逡巡，会以为这座老工业城市只是刚刚出生。

除了巨大热情，本溪为火炬传递投入了多少？财政局官员透露的数字是，5600万。当然，这仅仅是市财政的看得见的投入。7月18日的传递还有几天就要到了，安保费用还在追加，一张硬弓被拉满到随时会绷断的地步。

7月14日上午9点半，在姚革经营的复印社门前，几名城管干部要求复印社把贴在玻璃上的不干胶广告撕掉，因为奥运火种要经过这里。“火炬都不传本溪了，你不知道？”姚革反问。“你可不能造谣啊。”对方严肃地说。姚革说明了自己的火炬手身份。几位城管人员进到屋里小声问：“真的不传了？”“可不咋的。”姚革很肯定地说。城管干部思虑再三，还是要求姚革把广告“先撕掉再说”。

7月14日上午10点半，本溪体育馆门前，几名工人正在拆卸刚刚搭起的舞台，他们先于普通市民得知，火炬可能不来了。

来自省里的消息在一天前已开始内部传达：取消火炬在本溪和辽阳的传递，集中力量保证鞍山的安全传递。事实上，此前有多个做好一切准备的城市也取消了传递，本溪和辽阳不应觉得太过沮丧。

奥运火炬不来了，小道消息漫散开来，多数市民都显得将信将疑。

火炬手张学锋较早得到消息，他是本溪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按计划，他的学校将选派750名学生去为火炬传递做观众。“怎么和这些满怀热情的孩子解释，让我挺为难。”

7月18日的传递开始了。通过三星公司选拔的姚革本来就被安排在鞍山，而张学锋这样的本溪站火炬手也被派到了此地，人数大增，每个人的传递距离被进一步压缩，一般只有20多米，在电视镜头里稍纵即逝。出于安全考虑，火炬手不许带任何东西，特制服装上也没有口袋，假如姚革在陌生城市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得翻出袜子里的小纸条，组织者在上面标有联系方式。当然，他需要想办法借到电话。

电视里播放着鞍山站的传递画面，本溪人以此方式确认，火炬真的不来了。

司机张川用结婚打着比方，“聘礼也下定了，是吧，七大姑八大姨也都通知到了，酒席也交完钱了，老丈人都磕了头了，完事新娘子跟人跑了，这叫咋回事，这不白忙活了吗。”这时，有辆车从他右侧违章超车，晃了他一下，张川摇开车窗大叫：“抢！抢什么抢！”

火炬缘慳一面，政府沉默以对，没有对传递临时取消做任何解释，据说是怕伤害市民的感情。不过，绝大多数市民看起来既失落又释然，其中包括警察和观众们。

“终于不用折腾了。”人们长长松了一口气。自2007年4月26日以来，这座城市的人们再一次因为火炬的事情而欣慰。

权利的让渡

在北京，机动车从7月20日开始按单双号行驶。有关部门还有言在先：如遇特殊情况，可能还要进一步限行，到时候，某某号段、某某号段以及某某号段的的车，都不能上路，听起来甚是复杂。一位网民在他 Blogbus 的博客里调侃说：“（真要这样，）开车出行如同中彩票。”

驾车出行变得不那么方便了，在一些远郊居民小区的内部网上，单号车主寻找着工作地点相近的双号车主，以便拼凑成一个临时的上班组合。有人打出一个触目的标题：为了奥运，拼了。

在7月，你要从外省经公路到北京，车要有通行证，人要带身份证，还必须忍耐检查口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几小时的排队；你要进行网银转账，可能会被银行告知被银行业务暂时中止，“为落实奥运期间加强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于此次调整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奥运做出太多妥协，至少他们保留了抱怨的权利。

一个笑话流传开来——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宣布，鉴于北京的卓越表现，下届奥运会仍由他们承办（另一版本是永久交给中国），结果现场中国人全部晕倒……

到了10月，国际奥委会驻京代表李红有点异样的感觉：好象中国人马上就把奥运的一切都忘了，不提了。有朋友帮她分析说，除了人们要焦虑的事情太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漫长的奥运筹备让中国人太疲惫了。

《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了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奥运前夕，许多中国人（尤其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奥运会赶紧来吧。接下来的一句，表明他们并非心怀期待——然后好赶快结束。加州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也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他说人们简直有一种对奥运会兴趣骤减的感觉，就好像奥运会已经开过了。”

当然，随着奥运会真正开始，多数人很快忘却了烦忧，重新被裹挟进八月北京的酣畅与恢弘之中。

在北京奥运会临近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像以往那样，看到一份关于主办国的奥运民意支持率调查。

2008年5月，本书作者借助网络，进行了一次一定范围内的奥运支持率调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调查只能很低调地、在尽可能保护被调查人信息的情况下完成。发起

者强调，这不是一次网络调查，只是借助网民力量来完成（参与协助调查的各地网民，其本人的意见不被采纳）。调查还尽可能地对被调查者的年龄、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比例划分做出要求，不过近半数的调查回复仍不能完全符合调查的各项条件。最终，在统计调查结果时做了适当的妥协，保留了大体符合要求的应答，有大约 10% 的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应答未予采纳。

如上所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不是一次非常符合规范的社会调查，但它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民众对北京奥运会的基本态度。

问题的设置极其简单，即“您对 2008 北京奥运会的基本态度”，有四个选项：支持；不支持；不关心；说不好。被调查者也可简单说明理由，但不作为硬性指标。调查结果不会在奥运前后的“特殊时期”公布，而是在本书里第一次披露。

最终被本书作者采纳的有效问卷共 225 份，比例分配如下——

支持 115 约 51.1%

不支持 36 16%

不关心 43 约 19.1%

说不好 31 约 13.8%

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的征集时间，恰是公众权益为奥运做出让渡（它是全国范围的，不只限于北京等承办城市）最集中的时期，也是国外媒体所称的中国民众“疲劳奥运”的节点上，因此所采集的数据，可能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北京奥运情感最复杂的一个状况。在任何主办国，奥运支持率都不是一个固态的数字，它都会随不同阶段而起伏、变动。而中国民众总体上对奥运会的支持率，肯定是史上位居前列的。

某些被调查者的选择理由颇值得玩味。差不多 10 位选择“支持”的理由极其简单——因

为我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成都的大学生的理由是“我是共产党员呢”。

一位在黑龙江任教的 50 岁女教师表示，其支持的理由是“不支持也没用”。

一些不支持者的理由比较接近，就是筹备奥运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或“劳民伤财”。还有一位刚刚注销了自己公司的 32 岁宁波男子表示“对我没好处的都不支持”。

福建厦门的一位 23 岁的女大学生选择了“说不好”，她说自己“不支持不抵制，静观其变，挺关心这么件事情结束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位署名为“jjaximoduo”的被调查者认为，“北京奥运再次将中国人在 10 年“文革”中培养起来的假大空的习惯激发出来。全中国人都再次陷入一种虚伪的、无聊的、做作的集体狂热中，这样的氛围再次验证了什么叫集体无意识”。

武汉市一位 54 岁的女教师的态度，代表了许多人都曾有过的复杂情感——

申奥时反对，申奥成功时喜悦；备战奥运反对，火炬到武汉市时被感染也是喜悦。结论：说不好。

一位网名“杜杜”的大学女教师是协助调查的网民，她的应答属于无效问卷，但本书还是愿意摘录她的态度——

我的回答是 D，说不好。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对于奥运，几乎在下意识里都把它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看，把办好奥运当成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办过奥运，他们都强大吗？真正强大的国家不需证明，心里多少不太健全的民族才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第几大。

第二，奥运对于一个国家，会带来很多不利因素，政府对此提得太少甚至根本不提……国内经济这两年的问题多多，环境治理迫在眉睫，在我们面临如此多问题的时候，花大把银子办场奥运来脸上贴金，不值。

第三，奥运带来很大安全压力。国际恐怖主义一直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事端，尽管我国和大部分恐怖主义直接利益关系不大，但也不排除因为奥运树大招风，再加上众多世界头脑们聚焦奥运，使恐怖主义挪到中国生事端，让中国成为受害者。

第四，有那么多人还是喜欢让外国仰起脸来看他的国家，哪怕自己受点气，回家揭不开锅都无所谓，对着大群这样善良得让人生气的百姓，我也只能说，希望奥运开得平平安安就好。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曾研究过北京奥运会“形象工程”的戴杰（Jacques deLisle）说，中国最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政府的放权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宽松，但要让世人接受中国的这一新形象，政府又必须重拾改革前的老办法。

1978 年以后，初步的市场化唤醒了个体意识，国家意志驱动一切的社会形态正逐渐瓦解或弱化。奥运会之于中国实在魔力惊人，以它的名义，高度的组织性和个人牺牲精神重新成为必须，表面看上去，中国简直是暂时性地退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那个社会主义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喻国明指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确实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此高效的奥运会与老百姓权益的让渡有关。老百姓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但我们不能对这种合作态度滥用。权力集中有其优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迅速集中资源。但这不能成为一种日常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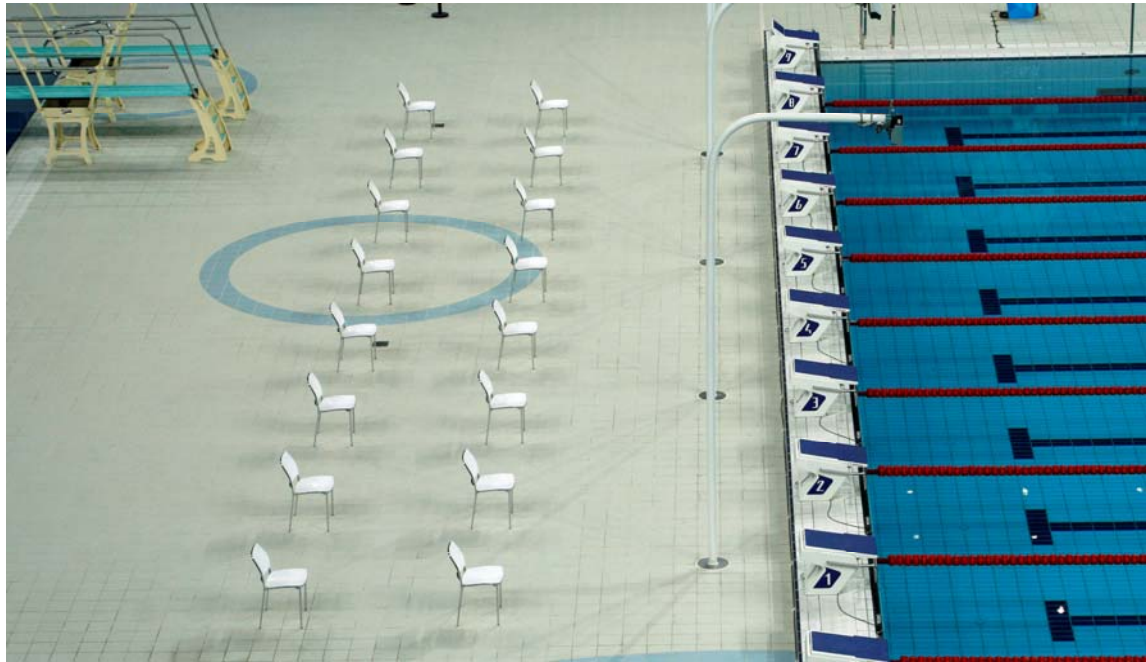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执政者确实有过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随着残奥会在 9 月 17 日结束，北京一些媒体刊发了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信中感谢北京市民为奥运“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甘于奉献”。

8 月上旬，奥运火炬回到北京，慢慢向“鸟巢”靠近。火炬在北京各区县的传递线路原打

算设计成一个汉字“和”，后为了减轻交通、安保等方面的压力，修改为更务实的方案。

8月8日至8月24日，中国历史上梦幻般的17天以“鸟巢”为孔雀开屏的中心舞台。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田径比赛和男子足球决赛都在此上演。

八月·高潮体验



诞生了20项新世界纪录的“水立方” 关军 摄

8月的北京以一个高度开放的姿态展开画轴。8月1日，北京出现了色彩好得出奇的天空和云彩，简直有点像高原之城拉萨的感觉。胡锦涛在北京接受25家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在CNN记者吉米的记忆中，这是胡锦涛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第一次在国内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同一天，吉米前往位于昌平的北京军区第六装甲师营地，这支代表中国陆军先进程度的精锐之师，首次掀起甲冑，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展示。当天，共有68家中外媒体应邀到访。

当然，政府实行的是“内紧外松”的政策，对待媒体也是一样。《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接到通知，不许副刊和娱乐版涉及奥运内容，版面上要注意避免“复仇、杀手、凶狠”等字眼。紧箍咒自然不是仅戴在这家报纸的头顶，据外电报道，宣传部门曾向境内媒体传达了“奥运21条”，细致规定了奥运报道的戒律清规，国内媒体人后来澄清，外电所言有误，实际是“奥运25条”。

体育暂时归位

内部的紧张看起来并非没有理由，形势确显严峻。8月4日，新疆喀什边防支队出早操时遭遇袭击，两个维族人驾车冲入队列，并引燃车上的爆炸物，造成16死16伤。北京的神经随之进一步绷紧，当天中午，仅奥体中心东门的路口就站着至少8名武警，每条斑马线两端都有，此外还有数目多于武警的警察和保安，也布置在路口。

在奥运核心区，警力也不少，只是他们更多地穿上了“马甲”，处于半“潜水”状态。一家外国电视媒体的摄像机对准了一队穿蓝色志愿者服装的男子，他们皮肤黝黑，表情坚毅，踢着整齐的正步。

8月8日，开幕当天，北京曾出动四架飞机，发射1104枚火箭，与云团在空中激战，完成了人工消雨——这也属奥运历史之首次。当日，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双方发生激战。奥林匹克休战协议，在如此巧合的时刻遭到践踏。

北京城倒是一派祥和气氛。虽有一些小规模麻烦不可避免地发生，国内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境外媒体也没有狂轰滥炸。8月4日，有20多位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表达对强制拆迁的不满；8月6日清晨，两名外国人爬上“鸟巢”附近的路灯杆，挂起藏独横幅；奥运开幕后第一天，美国男排教练的岳父母及一名中国导游在北京鼓楼遭浙江男子唐永明持刀袭击，造成一死二伤，唐永明跳楼自尽。

CNN调集了大约20人的力量在北京报道奥运会。对于上述事件，他们并没有进行现场报道，按北京记者站负责人吉米的说法，高水平的比赛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这时候奥运本身才是最重大的新闻。这也是其他西方媒体普遍的价值判断，是的，作为商业媒体，他们对新闻的取舍是由受众的趣味决定，电视人主要服务于那只遥控器，而非政治主张或国家意志。

美联社记者安娜透露，她曾很想采访一个美国人，他曾在北京的宾馆房间墙壁上涂鸦支持藏独的口号，警方要求其限期离境，这个美国人却躲在北京某处公园里，过起了穴居生活，并寻找机会表达对藏独的支持。“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为了抗议而抗议，作秀的成分大，就放弃了。”安娜说。在北京，可见西方记者并非一直戴着“有色眼镜”。

“鸟巢”里，博尔特未到终点竟敢回头望月；“水立方”里，菲尔普斯的神奇令体育评论员韩乔生戏言将其留在中国解剖；美国总统由几百壮士护卫，前去五棵松观赏中美篮球对决。人们兴致盎然地谈论一个个难忘瞬间，至少在那17天里，体育和奥运暂时回到了它们应该在的位置。

8月8日开幕式的看台上，坐着一位很普通的观众，她平静地俯视着为奥运而激情万丈的人们，包括高擎国旗的现役明星姚明，包括吊在威亚上的退役20年的李宁。她有着不寻常的过去，她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传奇的跳水女皇，现在，她认为自己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此刻的北京汇聚了几乎所有的体育明星，无论现役的还是退役的，都以奥运的名义奔忙着，伏明霞很享受只做一个看客。与香港金融业名流的婚姻，使得她最终选择了淡泊名利，也远离过去的自己，她甚至拒绝了担任中央电视台跳水比赛解说惟一嘉宾的邀请，“说话不是我的强项，而且我已经不是运动员了，还是做一个观众吧。”

除了观看开幕式，伏明霞还前往“水立方”，观看同门师妹郭晶晶和上海姑娘吴敏霞的配对表演。见证了郭晶晶的卫冕后，伏明霞于11日回到香港浅水湾的世外桃源。

不仅是伏明霞，连一些奥运赛场上的中国选手，也更懂得享受奥运，不再是锦标主义的服帖的奴仆。17岁的龙清泉一直笑容灿烂地推举沉重的杠铃，并提前确立了自己的夺冠优势，教练示意他返场向观众示意，他拒绝了，因为“对手还没结束比赛”；有新华社记者问90后跳水选手王鑫和陈若琳：压力那么大，你们那么年轻，怎么克服紧张的？两个姑娘竟反问：干嘛要紧张呢？

中国的公众仍在体育之上附加了太多的价值与意义，梦想与寄托，不过比之以往，令人欣慰的转变已悄然发生。

刘翔因为退赛成为千夫所指的“懦夫”，不过他比朱建华、李宁这些前辈奥运失意者幸运太多了，他收到的邮件里也有侮辱，好在没有附带绳子或刀片。

郎平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心存感激。当初接到美国排协邀请的时候，她渴望这份便于照顾女儿的工作机会，却不得不思虑再三，她担心自己在中国被当作“汉奸”。上帝在2008

年8月加大了考验人们承受力的砝码，北京女子郎平不仅要自己家门口执教美国队，而且还与中国女排有一场关键战役，而且还战而胜之。除了聂卫平为代表的少数派，多数中国人非但没有责骂郎平，还把掌声送给她。

中国的第一代奥运冠军栾菊杰，在她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奥运的剑道。超高龄选手，纯粹的参与精神，栾菊杰虽然是代表加拿大出战，但毫无疑问，她弥足珍贵地为中国的奥运史填补了几块空白。姚明的国内经纪公司还与栾菊杰签约，表示看好她的市场价值。

美国人埃蒙斯第二次被命运捉弄，第二次眼看奥运金牌在最后一刻飞走（更戏剧性的是都飞到了中国人手里），他并没有显得多么沮丧。这个达观的美国人栾菊杰一样，都代表了奥林匹克所倡导的体育精神，也镜照着观赛者对奥运的不同理解。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栾菊杰和埃蒙斯很容易被解读为悲情人物——你看栾菊杰这种在海外求生的华人多不容易啊，50岁了还要打打杀杀；埃蒙斯，一个笑话，一个命运的弃儿，一个可怜虫，专为成全中国射击队的金牌梦想而存在。当然，他们也不缺少赞美和崇敬。

一届奥运会的举办，还不足以让体育精神的光辉照临整个中国。



前奥运明星伏明霞在香港为红旗签名祝福奥运 关军 摄

一支“强心剂”打下去

8月8日，北京市民放假一天。

这天下午3点多，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两股人潮形成强烈的对流，以至宽敞的站台有些不堪负荷。大批手持开幕式门票的人提前5个小时就赶来了，而一大批没有门票的观光客胳膊上也绑着“中国必胜”的布条，他们刚完成对奥运气氛的体验（所谓感受，其实只能在至少500米之外看一眼“鸟巢”、“水立方”，或者在亢奋的人流中挤出一身热汗），浩浩荡荡赶回住处等着看电视。

8月8日当晚，什刹海“奥运人家”金丝居的餐桌前围坐这样着一些人：荆继昌、王志喜夫妇，金丝居主人；杨先生及夫人，旅居美国的台湾人；曾女士和颜小姐，在沪推广台湾药膳文化的台商；本书作者，住在这里体验“奥运人家”的记者。

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境外游客预订奥运房间。有一群法国客人，金丝居的常客，他

们想在奥运期间把全部四间客房包下来，整整一个月。“这样对我们来说当然最省心喽，但我没答应。我要先把客房留给来北京看奥运的海外华人。”王志喜女士 25 岁的儿子在加拿大工作，她说自己最能理解海外华人多么渴望感受奥运，多么渴望中国强大。

8 月 8 日，金丝居主人决定搞一桌丰盛的晚宴招待客人，并一起观看奥运会开幕式转播。荆先生擅长烧鱼，这一天献上的手艺是自己最拿手的油浸鱼，女主人的厨艺更是了得，金丝居的四合院清韵有多地道，她的北京精品私家菜就有多地道。

“如果不是非常熟的客人，我是不会给他们品尝私家菜的，何况最近接受采访都要累死了，哪有心思烧菜。”进入 8 月的这几天，金丝居主人真的比奥运会新闻中心的发言人还忙，他们平均每天要接待 20 多家媒体，晚上八九点钟还有记者在按门铃。

家宴这天晚上，主人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请求，但还是有一些记者不请自到。夹着鸡块的筷子伸到嘴边的时候，采访者的话筒也伸到了嘴边，只好先来回答“作为台湾人，对北京奥运有什么期待”。

开幕式在即，孔雀即将开屏，很有江南大家闺秀遗风的王女士适时地举起半杯啤酒，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今天是百年一遇的日子，中国强大的梦想，也是我们华人的梦想。身为华人，我们都很骄傲。来吧，干杯！”

闪光灯噼噼啪啪地在四下闪亮，现场气氛显得热烈有余，温馨不足。

对开幕式演出进行“文艺评论”是令人愉悦的事情，不仅大家都讲汉语，而且对于张艺谋那些文化符号的解读，也没有多少差异。“和”字反复出现的时候，曾女士心领神会，她说很高兴儒家思想被大陆强调。

击缶，太极，开幕式照例是团体操，照例是人海战术，照例是完成电脑程序般的整齐划一，曾女士不禁赞叹：“你们的国家真强大，没有谁能搞出这么大的场面。”她以“你们的国家”来指代大陆，表明类似家宴的温情终究不能掩饰政治隔膜。

浩荡的中国代表团进场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很有文采的词：与有荣焉。

中华台北代表团亮相，几个台湾人迎来了当晚最期盼的时刻，起立拍手，看台上的连战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颜小姐大声喊：“快看，连爷爷！”之后，他们也期待大陆选手的出现，看到镜头里的温家宝总理，颜小姐以同样的口吻喊着：“这不是温爷爷么。”

8 月 9 日零时 10 分，奥运主火炬刚刚点燃，后海的焰火燃放点开始点亮绚烂夜空。银锭桥头，许多年轻人是在后海的酒吧一起观看开幕式的。当礼花升空，银锭桥站满了人，那些年轻人激动不已，有的甚至爬上了房顶观看。

礼花不断升起，狂热不断升温。人群中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加油”，于是人群中差不多一半的人随之应和着“中国加油”，很配合礼花升空的气势。

也有许多人没那么激动，只是把一切当作热闹来看。燃放结束，胡同深处仍弥漫着火药的味道，一些老人坐在门口扇着蒲扇，带着心痛的口吻说，这得花多少钱啊。

有人亢奋，有人平静，有人心疼，一支“强心剂”打下去，人们的反应不尽相同。你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进步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不可能像开幕式上的团体操那样整齐划一。

第 28 个“大脚印儿”是在那和利头顶绽放的，但他没时间出去看热闹，甚至开幕式的直播都没看几眼。这个最著名的北京奥运拆迁户现在负责着部分奥运服务车辆的调配，此刻正忙得不亦乐乎。

8 月 9 日，那和利想办法抽出时间，专程跑到了昌平，他来了却一件心愿——带来北京奥运的火炬，站在父亲的坟前“和老头儿叨咕叨咕”。洼里乡拆迁之后，那和利把祖坟迁到了昌平。2004 年，那忠突发心脏病不治，再难实现传递北京奥运火炬、观看真正“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的愿望。

8 月 9 日清晨的什刹海，与往日没什么区别。银锭桥边，一个老人在亮嗓子，声音高远

而怪异，站到后海对岸也清晰可闻。有人在哼着小曲，有人在光着膀子钓鱼，有人在岸边做起俯卧撑。每个夜晚，音乐的脉动在胡同深处都听得见，这里是泡在酒吧里的北京；每个清晨，晨练的脚步踏在青砖上，这里是停留在传统生活的北京。一个身材高挑、打扮摩登的女郎走过垂钓的人们，这个面带疲倦、似乎还不曾入睡的女子，在两个北京之间进行着某种连缀。

君临天下以后

8月18日中午，中国奥委会驻主新闻中心的办公室里，大屏幕正播放孙海平教练在“鸟巢”新闻发布厅痛哭失声的画面，房间里伴随着工作人员的叹息。这间办公室拿出一面墙来张贴中国代表团金牌得主的照片，上面金光闪闪，晃得人眼晕。当时的金牌数已经逼近40了，墙上的位置不多了。

墙上是一张张幸福的面容，尽管其中某位冠军刚得知失去母亲，另一位冠军惦记着失踪多年的父亲，但他们必须在此刻微笑。电视上的孙海平神情悲苦，其实与冠军墙上的笑容在说同一个事情——这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赢得意味着一切，输掉则……

上世纪末叶，某国在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的时候，借主办者身份不光彩地争夺金牌，曾广受诟病。在筹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提出要力戒对金牌的非正当性攫取。北京奥运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利用东道主身份获益的例证（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中国代表团之所以能像联合收割机一样狂揽金牌，主要的原因不是东道主身份，而是我们确实投入太大了，大过别人，也远远大过自己的以往。

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流体力学的重点实验室，叫做湍流与复杂系统实验室。实验室的主任余振苏博士，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

2005年底，这个实验室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成立中国激流回旋国家队2008北京奥运会科技攻关项目组，为这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提供科技保障。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被认为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要在湍急河道中准确跨越22个宽度为90至120厘米的门框，进行竞速。最理想的状态，是把选手们都培养成复合型的科学家，他们需要掌握流体力学、生物医学、认知心理学……

余振苏可不是挂一个顾问的头衔，他和他的学生们真的到国家队待了几个月，有的学生还直接担任了科研教练。为了支持奥运，实验室的某些研究放缓了进程，两个学生为了投身该项目只能延期毕业。

事实上，余振苏和他的学生，不过是激流回旋科学训练计划的外围团队，而且仅仅是外围团队的一部分。为了更快地提高水平，激流回旋队还向中国杂技团和清华大学的相关机构取经。

现在，让我们从外围进入这支队伍的核心。它由5名获得奥与参赛资格的选手和20多人的教练、科研、保障人员组成。20多人中，博士4人，硕士9人，有研究训练学的，有研究生物力学的，有研究运动心理学的。听上去实在不像在介绍一支少人问津的冷门项目的人员构成，倒像是在介绍北京体育大学某个优秀的科研机构。

奥运会前，队里有三位德国专家在协助工作，其中包括该项目第一枚奥运女子皮艇金牌获得者，有运动学的博士。

副领队郑黎明说，在这个奥运备战周期里，运动员出国比赛、教练员出国进修的机会大大多于以往。他自己就曾先后被派到欧洲和美国“取经”。

其他运动队的投入力度，同样是空前而绝后的。不惜代价的投入帮助中国狂揽51金，如愿以偿地在竞技体育王国君临天下。

因为北京奥运的无比重要，中国体育军团从未出现如此之多的外籍教练、助理（据CCTV的统计共有38人）。体育创造了不同文明充分交流的机遇。而北京奥运会之后，只有一支国

家级运动队继续聘用外籍主教练。

闭幕式上，多数代表团的队列排序“毫无章法”，而中国代表团还是老规矩——金牌获得者站在队列前面，以往的奥运凯旋之旅，他们还享受乘坐飞机头等舱的特殊待遇。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金牌获得者还集体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接下来，金牌机器的生产成果得到更丰厚的奖掖，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的庆功会排满了体育劳模们的日程表，奥运冠军的名字甚至被家乡用来为新修的公路命名；地震受灾省份四川慷慨拿出数百万元，奖励本省取得奥运佳绩的体操选手。

喧闹中，《财经》主编胡舒立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举国体制”淡出正其时。她提出中国要大幅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

利用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把体育重心转向全民健身，近邻日本早在1960年代就做出了表率。

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奥运会后的第二年（1965），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趁着这股热潮，日本体育开始转身，从1965年开始，政府的预算更多地投向了国民体育。

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和成功举办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日本1997和2015体育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由196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68%。其中，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占全国总人口40.8%，这个比率远远高于中国。《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

奥运会结束后，舆论旧事重提，开始聚焦举国体制的利弊乃至存废。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访谈，一问一答，都显得字正腔圆，逻辑之严谨，如同学术论文，看得出是一篇有备而为之的书面问答。

在此之前，一种被广泛传播的说法是，高层确实有意在北京奥运之后推动体育体制的变革。《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在此时刊发这样的访谈，难免被看作对上述传闻的否定性回应。

那篇访谈中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举国体制具有巨大优势，这其实等于正确的废话。举国体制之利，不仅中国的体育官员清楚，任何国家的体育官员也都清楚。不过，它却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当然之选，无非是它的弊端太突出，它的价值观值得怀疑。

刘鹏的谈话内容，此前也偶有表露。作为既得利益者，体育主管部门很难放弃“成功”模式，主动尝试另一条道路。但是，中国体育的体制之变，不应该因某个部门的利益和意愿而废止。举国体育体制传承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衣钵，与市场准则明显背离。

举国体育体制的存在，造成了对社会公平性的多重破坏。其一，它花费巨额税费，却无法让纳税人享受切实的利益，相反民众的体质却呈下滑趋势；它把优势资金、资源倾注于少数尖子选手，却损害着作为基座的多数运动员的权益；它成为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特例，垄断体育市场资源，并与市场规则时有冲突。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凭借举国体制勇夺51金，看看周围的民众，激动程度却远远不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16金。社会在进步，体育的社会功能更需相应转变，它没有理由原地踏步。

令人遗憾的是，在跨越2008年的冬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大院里，热汗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升腾起来，新的伦敦奥运会备战周期启动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举国体育体制会迎来转轨的契机。

现在可以说了

奥运会开始后，位于林萃路的奥运开闭幕式指挥中心，依旧忙乱得如同前敌指挥部。午夜12点，夜阑人静，正是艺术家们灵感的电火花噼啪作响的好时候。与之呼应的一个场景

是，窗外在进行闭幕式焰火燃烧的试验，夜色被渲染得有几分离。总导演张艺谋坐在大厅里，他要选择一首适合抒发告别之情的曲目，用于闭幕式火炬熄灭那一刻。音乐总监卞留念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随着音乐很沉醉地打着节拍，半长的头发轻舞飞扬。一旁的肖阳，忠实地做着他的影像记录工作。

那音乐蜿蜒流淌，蓦然间触碰到肖阳情感中最敏感的部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忍住了将要流出的泪水。他仿佛真的看到奥运主火炬缓缓熄灭的画面，一切都结束了，随之突然终止的，是自己这6年无比辛劳又激荡人心的投入。

“每个人参与奥运，自然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性，这很正常。但除此之外，我看到，人们在工作中也确实投入了深情。”肖阳说，奥运之后，他有差不多半年时间陷于失重状态，什么都不想干。

奥运会结束后的一天，张艺谋独自一个人跑回林萃路的指挥中心，诺大的工作间里空无一人，没有争吵，没有音乐，也没有焰火，他陷入了巨大的失落与感伤。

这失落和感伤从开幕式结束的一刻就开始了，毕竟，闭幕式的压力比它小许多。开始频繁接受采访。

在长达三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准备过程中，张艺谋最头疼的就是开会：“一点也不夸张，我差不多开了几千个会。”张艺谋用“撕心裂肺”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你弄了好半天，突然这个方案不要了，又变成那个了，真的很痛苦。”他每天有看不完的资料、审批不完的报告。然而，当挂满草图的设计室突然安静下来时，张艺谋心里也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他坦言，自己有一点失落。“奥运会不是慢慢散去，它是‘哗’一下就过去了。工作好长时间了，最后一解散、一停机，‘哗’第二天飞机票一买，‘哗’这楼的人就走光了。我感觉到有一种失落。

在主题曲演唱者的人选上，张艺谋还曾经和音乐总监陈其钢闹翻过，“我们一直的策划就是让两个最普通的志愿者唱主题歌《我和你》，就是两个最普通的大学生，要最原原本本的声音表达。但是离开开幕式还有两周的时候，领导说这样担心高潮起不来，还是找两个大腕来唱吧。”后来张艺谋给陈其钢打电话把这个改变说了，“陈其钢当时就在电话那头翻脸了，这个想法咱们排练这么多年了，临阵换人成什么话，还大骂我立场不坚定！”当时陈其钢正在餐厅用餐，他激动地攥着手机与张艺谋大吵起来。

艺术家与政治家，艺术规律与行政规则，在舞台背后对峙着，也妥协着。张艺谋的感觉，搞这么一次奥运项目，等于拍10部电影。事实上，这份工作耗费的精力与拍电影并不相同。比如要为某一分项招一个导演，拍电影的时候，总导演听从自己的艺术感觉就可以了，而筹备开闭幕式，大事小情都要打报告，都要审批。

原本有8分钟的兵马俑的表演，被取消了。张艺谋也不是说了算。他曾在专题片《解密开幕式》中含蓄地吐一下苦水：下面的人动辄就要撻挑子，就说“这活儿没法干了”，而他的位置却不允许他这么发泄不满。也是在那部专题片里，张艺谋对上级表达了意味深长的恭维：开幕式最终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必须感谢领导，因为他们“非常开明”。

对于外界评价开幕式无非是“人海战术”、“大型团体操”，张艺谋反驳道：“凡是大型活动的高潮，不是因为万人齐呼的阵势搞起来的？那样才能让现场热血沸腾啊。”“你以为西方人不想找那么多人吗？他们也想找三千个一样身高胖瘦的演员，一样想搞‘人海战术’，可是他们找不到这么多人，也花不起这些钱啊！”

在奥运场馆中心区，人们在地面以上观看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演出和比赛，在他们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迷宫暗藏，每天也是人如川流，熙熙攘攘。在深邃的地下，下沉式的环形通道连接着中心区的各个场馆，通道之宽大容得下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通道的重要功能是调配安保力量并应付突发事件，与此功能配置的地下屯兵室里，一支精锐之师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其中的100人配备了136件枪械和其他反恐装备；在“鸟巢”的下面，另有一座地下宫殿，

它分为好几层，机关暗藏，开幕式上的巨大“地球”，就隐蔽在这里，伺机升起。奥运会结束后，地下“宫殿”依旧没有对外开放，而部分地下空间将变身为地下商业设施，开门迎客。

就如同那些曾深藏地下的秘密一样，北京奥运会保密档案里的故事，一部分揭开了面纱，另一部分依然保持缄默。

奥运一结束（甚至开幕式一结束），不仅张艺谋，各种“知情人士”都倾诉欲旺盛，“解密奥运”的新闻纷杂而出。

有参与节目策划的知情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最初提出开幕式击缶的时候，就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说“否”“缶”同音，不能奥运会刚开幕就给“否”了吧。后来找了一大圈，没找到合适的打击乐器，大家在击缶上达成了妥协，不再计较谐音问题。

文化学者朱大可的一番言论，以近乎吹毛求疵的方式对“缶”提出另一个质疑。他认为“击缶而歌”犯了很严重的礼制错误——缶本来应该是在丧礼上使用的乐器，至今湖北还保留着这样的丧乐队，庄子丧妻“击缶而歌”也正是这个乐器。

战士们的鼓锤重重落到鼓面上，然后观众的耳膜感受到了雄浑之音的震颤，假如不是有人解密，人们怎能知道二者之间并无联系？由于对实际的击缶音效不满，导演组最终决定，还是在开幕式上播放电子合成器制作的更理想的声音。

开放在北京夜空的29个“大脚印儿”，完美地呈现在电视画面中，节目组人员透露，其中“鸟巢”上空的最最后一个是真的，其他28个，是通过电脑特技制作的，为的是保证最佳的视觉效果。考虑到北京的空气质量，电脑特技中还加入了逼真的“雾蔼”。

56个民族的表演，被指并非真正来自各少数民族；为了整齐划一的发式，一些奥运礼仪小姐还需要戴上假发。

个别外国媒体在比赛期间质疑中国体操选手的年龄问题，这让中国公众稍稍愠怒了一下，不是因为假年龄，而是觉得外国人吃到了酸葡萄，无是生非。在中国，人们对于造假的宽容度一向更大一些，何况是为了展示中国形象而造假。

8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教师王丽萍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得知她的学生杨沛宜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排牙印。

十几天前，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歌唱祖国》引起轰动，也让杨沛宜及其父母深陷烦恼。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一个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上那首令许多人感动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天籁般的声音来自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录音以后，觉得林妙可的声音不是特别合适，从声音的高度，宽度各方面都不是非常合适，最后我们从声音上决定用杨沛宜。出现的小孩叫林妙可，声音是杨沛宜的声音……这可以说是最后一分钟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历了若干次审查，都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听过一次林妙可的录音，在现场放的，联排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必须要改变，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觉得有责任面对中国的听众、观众，作这样一个解释，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理解，这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国家文化，国家音乐文化的形象，尤其是国旗入场，这是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无论对林妙可，还是对杨沛宜来讲，我想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完美的声音，加上一个我们认为完美的形象和表现，这样结合在一起。”

但事实上，林妙可和杨沛宜都难以平静接受这个结果。为了躲避成人世界的复杂和喧嚣，她们的父母张开羽翼，极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林妙可的父亲、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林晖，还得到宣传部门的指示，不得再接受记者采访。

杨沛宜的家人把她带到远离舆论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知道，她是因为“形象问题”而只能贡献声音，而且所谓形象缺憾的关键，是这个处于换牙期的女孩牙齿不那么整齐，还有一点缺口。

8月18日晚上，杨沛宜在一个娱乐节目里看见了曾朝夕相处的林妙可和表演飞天的两个小朋友，她很开心，但是直到节目最后，无论主持人还是那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在片子中提到她。广告结束，下一个节目开始，杨沛宜愣愣地看了一会儿，默默地回到卧室。

9月1日，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杨沛宜在全校2000多名师生面前再次演唱了《歌唱祖国》，是她亲自登台。

9月23日，杨沛宜告诉王丽萍老师，自己刚掉了一颗。

“牙呢？”

“牙我要带回家里。”

“对！你的牙最有纪念意义，你唱歌的时候，好多照片里都有这颗牙。”

“我知道，我会好好保护，我还有这几个牙没有换，已经活动了。”

“等你的牙都换完了，脸蛋长开了，脸盘再大一点，牙齿就不挤在一起了，排列也就整齐了。”

“我知道了。”

地球上最恢弘的造梦工程

8月8日晚上，重庆民族艺术学校的28位“唐朝贵妇”，全都如愿出现在《中华礼乐》的演出中。26岁的女教师张洁后来有点心疼——化妆师给她粘鬓角时粘得太紧，在她脸上留下了小小的疤痕。

那种紧张的气氛下，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在开幕式演出前，2000多个击缶的战士就趴下了，其他20000多演员也都隐藏起来，像邱少云在韩战中参加的隐蔽行动。最先表演的击缶的战士们趴了40分钟，后来，耳麦里传来张艺谋的声音：领导来看大家演出，这是大家的光荣，坚持住。

与演员们一样，所有被奥运裹挟和影响的中国人，也都坚持着，坚持到了一个超忽想象的结局——几乎整个世界都被中国的盛大演出震撼了。

前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春昕的一个朋友，从中国移居美国多年。徐春昕问她北京奥运期间若能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的电视节目，最想看到什么。朋友说自己很久不说中文，也不想看什么。但是她知道，很多美国人想看中国的奥运，她愿意问问她认识的那些普通美国人，于是她用私人邮箱群发了一封调查信。下面，我们和盘托出她接到的回复——

1. Ken Kumaki , 20岁

人们会怎样庆祝奥运会的到来？我想看到那里的气氛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还想看排球比赛。

2. Luke Nagata , 20岁

从运动角度说，我想看相扑、马拉松、高尔夫。别的方面我想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样子，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对他们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人民的生活水平进步了吗？怎么进步的呢？有多少外国企业现在进入中国市场了？他们都做什么行业？中国的

日用品价格增长了多少？奥运会以后，商品还要继续涨价吗？奥运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中国的进口商品总量有提高吗？出口呢？他们说中国现在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要办奥运会的缘故，可是我想看到对中国普通人的采访，想知道他们的客观的看法。

3. Dennis Jackson , 30 岁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在电视节目里看过一点。我喜欢了解其他文化的历史传统，因为这可以帮助我在国际贸易领域有所发展，了解其他国家的风俗可以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长城特别宏伟，我还想看到更多这样的东西。

4. Andy Weinberger , 40 岁

当中国正在崛起为国际领袖，在国际事务中也起着带头作用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普通的中国人对此怎么想。不过我不能肯定中国的普通人对这个话题是不是关心，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思考这个问题。只要是普通人的想法，我都想知道。

5. Mike Ahern , 20 岁

我想了解一些中国体育运动的历史。

6. Kaz Saito , 40 岁

我对以下题目感兴趣——

中国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的比较；

老一辈是怎样把传统文化传给年轻一代的？

中国的国家队是怎样选拔和培训年轻运动员的？

中国人怎么看体育比赛？

想了解中国的食品、服装、运动、学校等等；

想知道中国最美的地方什么样；

想知道 2008 年奥运会时住在普通人家里会怎么样。比如，一个不懂中文的客人能生活

吗？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想在中国旅行会怎样，能住在中国人家里和他们一起看奥运会吗？

7. Keiko Shoji , 30 岁

我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受到了奥运会的哪些影响，比如有的人本来没工作，因为奥运会得到了工作机会，奥运以后会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为了奥运搬迁了，能告诉我们一个街边的小店的故事吗？中国其他城市的人对北京的奥运会怎么想呢？比如上海人会不会嫉妒北京，觉得自己的城市更好？我还想知道北京有多少人不喜欢奥运会。

8. Taka Nishimura , 20 岁

我去过北京，我绝对想在电视上再看到这个城市的样子。我还希望看到好吃的、好玩的东西。

9. Michael Iwanski , 20 岁

我特别想看到北京人生活的样子，比如他们吃饭，喝水，睡觉。从低阶层的人到高阶层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中国是怎样集中各种资源办奥运会的。当然了，我也想看体育比赛，想看到中国本国选手的比赛，我记得应该有跳水和篮球。

也许中国会继续为 NBA 提供运动员？也许在篮球比赛中，中国队会赢美国队呢。还有中国的环保建筑，他们除了盖楼，对环境保护做了什么？我有个朋友是建筑师，她说中国做了不少工作。

10. Ray Nakada , 30 岁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没什么了解，对此我很气愤。中国比他们想象的要文明和深刻得多！我想看到中国在最近 10 年，特别是取得奥运主办权以后的变化。

11. Toshihiko Sahashi , 30 岁

我想看这些：

一，北京的美丽风光，名胜古迹，比如我知道故宫是什么样子，但别的就不知道了。

二，4000 年的历史（是 4000 年吗？）

四，现代化程度到什么样子了？

五，美丽的女人！有漂亮的运动员么？

12. Mike Holland , 50 岁

想了解中国修建奥运场馆的时候，使用的工人，建筑材料和花费的时间。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典型的一天。

中国人是怎么看美国和美国人的？

中国人业余时间干什么？有什么爱好？

中国人看什么电视节目？

中国的污染真的像媒体说的那么严重吗？

中国变得越来越西化了，中国的政治政策是怎么变化的？

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旅行的话，到底有多困难？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普通人对我们友善吗？

13. Susan Holzwanger , 40 岁

我非常想知道中国经济发展这方面的故事。我还想了解中国的历史。

14. M. Shinozaki , 50 岁

我最感兴趣的是长城。想从起点到终点地了解它。再就是中国的交通系统。

15. Toni Blair , 50 岁

我哥哥非常想看奥运会的实况报道。我想知道的是中国菜是怎么做的，还想知道这些菜背后的历史故事。我想学几个中国菜，到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做给我家人吃。

16. Lindy Sousa , 40 岁

我特别喜欢体育运动，而且一直在看 DISCOVERY 频道里关于北京奥运场馆的跟踪报道。我敢保证它们肯定会特别漂亮。我还经常上网，最想看到杭州的灵隐寺，上海的玉佛寺，庐山植物园，我喜欢白暨豚和罕见的红色熊猫，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我还特别希望看到中国的艺术和所有美丽的东西。

17. Christopher Ciemian , 20 岁

我不太喜欢运动，不过我想看到赛场周围的环境，以及相关的文化。北京人受到了什么影响？他们对大量涌入的游客会怎么想呢？还有那些中国运动员的背景我也愿意了解。

18. Rosemary Arreola , 40 岁

很抱歉，我对北京差不多一无所知。所以我想知道那里有什么名胜古迹？那里的购物场所是什么样子的？

19. David Hoenig , 20 岁

我很想看到真正的北京。比如夜生活，餐厅，景点，人们在周末都做些什么。我想去中国旅游，但是我对那里的城市和文化没什么了解。芝加哥在申办 2016 年奥运会，也许我们能向北京学习点什么。

20. Vikrum Rupani , 20 岁

北京是怎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来应对奥运会的？他们还为奥运会准备了什么？

21. Tara Connor , 20 岁

自从我们学校来了几个中国学生后，我对中国就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

小学是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有多少人？一个班有多少学生？他们的教学思想是什么样的？

我未婚夫想知道一些关于宗教、权利和性别方面的教育内容。

中国运动员是怎样为奥运而训练的？从很小就练吗？女性运动员有机会平等竞争吗？

22. 其他：

当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候，北京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想看到普通北京人的典型生活，他们吃什么，每周工作多久，有什么爱好。

有没有可以喝杯啤酒，泡个小妞的地方？

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城市里，人和人挨得这么近，一定非常有意思，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一个中国家庭里有多少人？

奥运会结束后，还没有一份对这些被调查者的追踪问卷，不过美国人普遍对北京的奢华表演感到震撼，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则让他们惊讶。震惊的还不仅是没到过中国的人们，在美国，一位朋友对 CNN 驻华记者吉米说，通过马拉松比赛，他觉得北京的变化实在快得惊人——几年前，他曾去过那里。

JOSH 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进修电影研究的博士生，曾在北京居住一年，来听听他的感受——

天气不错，除了一些外国游客常去之处（如奥体公园，工体，三里屯等），城里感觉空旷，闲适，有点像假期，可能市民都躲在家里看电视。交通状况良好，不塞车；

很多小区的路边食物摊被清理了，奥运之后又回来了；

市民表现良好，热情有礼。但很多初次来北京的外国游客看到的北京也许只是片面和表面的，因为他们住昂贵旅馆，去昂贵饭馆，乘旅行车去长城……很多人也就去去后海，三里屯或南锣鼓巷；

很多外国游客都对街上志愿者的数量和热情印象深刻，好像每条街上每隔 30 米都有志愿者，有些是不会说外语的居委会的老人家，可能也有协助治安联防的意思；

新修的地铁线路很方便快捷且整洁，就是有些拥挤；

奥运会开幕式视觉上叹为观止，无人再能超越。

假如不是奥运画面的呈现，在美国，人们很少有兴趣去主动关注别的国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简单得有些幼稚。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有一家名叫 Sequoia 的咖啡馆，为了装饰，墙上挂了接近 20 幅反映中国风情的摄影作品。看看镜头里都对准了什么——头上盖着毛巾的墙根下的老妪，破败的灶台边面带污垢的幼童，村庄里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风俗……无一例外的，都是取自贫穷乡村的场景。

对于遥远的中国，这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部分，也就成了他们中国印象的主体。

北京奥运会让他们的看法翻转过来，简直觉得北京与纽约没什么区别。

假如美国人有兴趣玩一个拼图游戏，把奥运前的中国印象与奥运后的中国印象摆在一起，或许更接近真实的中国。

欧洲人的震惊与美国相似。而对中国颇为熟悉的杰弗里·豪（前英国外交大臣、英中协会名誉主席）则做出更有质地的评价：中国确有进步。

法国记者克里斯蒂安说，他感到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的团结，服从，友善。

8月8日晚上，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穿上西装、系好领带，前往“鸟巢”观看奥运会开幕式。到了现场才发现，除了贵宾席上的政要们，没有哪个观众穿得如此正式。

米卢对北京奥运的评价，几乎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了。于是他努起嘴，做出一个亲吻的动作。

根据尼尔森公司（Nielsen Co.）在闭幕式后对 16 个国家的观众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表示北京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现代，科技也更发达。开幕式的声光电，美妙的数字画轴，都让他们大感意外。

作为近邻，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一些。记者王东询问了身边的一些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民众对北京奥运的印象如何，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北京奥运并没有对改善日本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发挥太大的作用。对中国怀有好感的日本人在逐年减少，感觉不佳甚至厌恶的逐年增多，这是多年来一直持续的趋势，不可能依靠一次‘体育盛会’来扭转。”

在奥运期间，日本媒体不论是电视、纸面或网络，除了日本与外国运动员的体育报道之外，对中国的报道仍以负面居多。媒体一方面要迎合受众中弥漫的厌华情绪，另一方面又要证明自身的精英优越感，因此造就了一股非理性的热潮。

体育传媒界的户冢先生因工作缘故，在中国居住了近一个月，并且去了多座协办城市。他喜爱乒乓球，是张怡宁的粉丝，也有很多中国朋友。他把北京奥运形容成一个长达十几天的节日，形容北京宛如一座巨大的“居酒屋”，以至于回到东京后的几天有些不适应，因为“周围突然安静下来了”。他认为中国政府作为主办者，大体上是成功完成了使命，但这样的奥运也只有中国能完成，仅仅是开幕式几千人规模的表演，日本“想都不敢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加体会到了中国作为“他者”与日本的不同。

在中国有商务活动的野上先生则指出，北京奥运显示出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严峻性，未来的不安定风险在增大，接下来他考虑的是从中国撤资。当然，能源涨价等客观因素也是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考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员，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所谓“中国帮”成员，他的记忆更多停留在中日因奥运火炬而产生的不愉快——

在奥运火炬接力的初始阶段，我就担忧日本和韩国这两站的情况。如果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管制措施，那么可能爆发的暴力对抗将令巴黎、伦敦的喧扰变得形同儿戏。

事实上，即便是这两个国家真的花了不少气力，暴力冲突还是屡有发生。在日本，第一次出

现了有人流血受伤的情况；在韩国，据说也有人在打斗和互掷杂物中挂彩。这就是东北亚的现实。在这里，民族主义的对立最为激烈，仇恨、蔑视、厌恶与隔阂比和遥远的欧美更加深重。在上一次战争中，这里的血腥程度是无与伦比的。

最大的遗憾是奥运火炬在长野的传递，日本市民没有成为主角，被在日中国人的红旗占据。

在接受尼尔森调查的受访者中，约有 50% 的人对北京的实际环境印象很好。在投入了人民币 713 亿元用于治理环境后，8 月份的污染水平几乎是多年来最低的。

中国国内舆论也认为，奥运会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研究机构思纬（Synovate）在奥运会后对中国 500 名城市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有 60% 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最重要的遗产是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了中国。

几家西方主流媒体

CNN：近代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美联：奥运会的运作近乎完美。

BBC：北京举办了历史上组织最出色的奥运会之一，还上演了最令人难忘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表演。

美国《时代》周刊：在闭幕式上，一切都明白了：是的，中国邀请世界来观看北京 2008，但是这却是中国的奥运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只是看客……这真的就是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于急切推销中国形象的政府而言，奥运会差不多是唯一的可以让各国人民以平和、正常视角看中国的机会，是这个星球上最大一项形象工程的平台。

游戏规则是用来……

按照人们通常的想象，奥运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文化、体制、思维方式迥异的中国，会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阶段，而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之间，也将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磨合期。作为 CCTV 派驻北京奥组委的特派联络员，肖阳负责北京奥运筹办的影像记录，6 年时间里他见证了几乎所有重要会议、重大决策的过程。“其实并不像外界想象的，有很多冲突，国际奥委会清楚中国的体制，所以没什么担心的，他们知道，只要政府重视，一切都没有问题。”

对于奥运会的举办，国际奥委会最看重的是三件事：一，运动员和媒体的服务——它决定了奥运会的精彩程度以及对精彩的呈现；二，赞助企业的权益保障——赞助商是奥林匹克的衣食父母；三，尽可能地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搞得民怨沸反，在一个民主

国家里，政府申办奥运的意愿将很难再获得通过。

前两点，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很快就吃了宽心丸，他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权对奥运会的巨大热情。至于第三点，国际奥委会也不很担心，为奥运做出牺牲，在中国人看来好象不是不堪忍受的事情。

国际奥委会会有一个机构，叫 XX（主办城市名）奥运会协调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一个与主办城市进行协调的部门，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或许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轻松的一个协调机构，北京方面提供了极其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担心的事情。

协调委员会的最主要工作，无非是前期给自己洗一下脑，好好学习一个中文词汇——通融。事实上，他们做得非常之好。

百多年的现代奥运会，留下了详尽的典章制度，也衍生出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它们在东方遭遇了一位了不起的怀疑论者，说北京奥运会是各种奥运规则被改变最多的一届，应不为过。事实上，国际奥委会也接受了中国的特殊性，对于这些修改的冲动未加过多阻挠。

依照以往的游戏规则，赞助企业使用五环标志或奥运会标志时，如何与自己的企业 LOGO 组合，都有着固定的格式。LOGO 的组合方式，一些中国企业希望以更灵活的方式使用奥运相关标志。他们把这种意愿反映到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按照北京奥组委的初衷，要严格遵守以往的规矩，没什么可通融的。倒是赞助企业首先说服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北京方面沟通，表示可以尽可能遵照赞助企业的意愿。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奥委会的官员们渐渐认清了这一点，于是通融的事例越来越多。比如，奥运会的核心场馆区从不允许荷枪拾弹的军队进入，国际奥委会破例答应 100 名中国武装力量潜伏在龙形水系的地下 10 米处；再比如，主办城市的奥组委主席在奥运筹备关键阶段历来都是专职的，国际奥委会却并没有暗示刘淇离开北京市委书记的席位，他们知道刘的行政职务更利于奥运会的成功运行。

中国逻辑与奥林匹克规则的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不妨仅仅聚焦与商业有关的一些故事，其中足以管窥互动的频繁和普遍。

少即是多，国际奥委会的这条原则，曾被视为其品牌经营、商业运作的成功诀窍。在他们的经验里，赞助企业少而精，才更利于奥林匹克的品牌增值。北京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多少颠覆了“少即是多”的原则。由最高级的全球合作伙伴到最低端的供应商，一共 67 家（其中强生既是全球合作伙伴，又是北京 2008 合作伙伴，只算一家，不再重复计数）。

一些才大气粗的国有企业中的巨无霸，势在必得地要成为奥运赞助者。国家电网对于自己赞助北京奥运会的解释是：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多数赞助北京奥运的超大型国企都在强调这一点，听起来动辄几亿的投入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心领神会地领受了国家的一项任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其中一个例外，正在拓展国际业务的他们希望借助奥运而在营销上更新理念，丰富经验。奥运办公室主任黄涛亲身感受了 2000 年以来的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他为自己的团队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它是借奥运进行品牌营销的最成功者”。

由于竞争激烈，一些北京 2008 合作伙伴，掏出了远远高于某些 TOP 赞助商（即全球合作伙伴）的价码。出资最多的当属中国银行（他们的对手是同样渴望胜出的中国工商银行），接近 20 亿元人民币。

联想公司付出 6500 万美元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他们需要再拿出三至五倍于此的推广费用，才能实现奥运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以往奥运赞助商普遍选择的投入比例。而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赞助企业大大节省了推广费用，既然是尽“社会责任”，一些国企并不追求商业回报，比如国家电网，只想无私奉献，很少宣扬自己是北京奥运的赞助者，身为垄断行业，他们知道自己并不需要广告推广。

在北京奥运村休闲区墨绿色的遮阳伞下，嗜酒的村民们比往届要幸福许多，因为他们有

机会品鉴不同品牌的啤酒——青岛、百威和燕京。而他们的幸福，来自三家啤酒供应商非常“友好”的比赛。

奥运会的赞助，以往还须遵照“排他性”原则，即同一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企业。而当北京奥运会庞杂的赞助商名单出炉，人们惊异地发现，居然两家石化企业都中标了，而啤酒赞助商更是多达三家。

啤酒赞助商的竞争，原本在青岛和燕京两位本土拳手之间展开。就产能、市场覆盖、品牌等方面考量，青岛啤酒略胜一筹，获得了更多的“点数”。北京有关方面很不甘心，因为奥运会是在北京办，作为本地品牌的燕京如果胜出，会更有面子。无奈比赛无情，他们与燕京也做好了承受败局的心理准备。

这时，意外的转机出现了。国际奥委会——这个幕后的比赛组织者——出面与负责裁判工作的北京奥组委市场部协商：有一个叫“百威”的洋拳手，也想参与到比赛中，他与我们多年交往，关系良好，贡献巨大……

北京奥组委方面并不觉得很为难，既然讲到“通融”，事情倒好办了，干脆把冠军领奖台拓宽一些，让三位拳手并列站到上面。百威获得的身份证比较特别，叫“国际啤酒赞助商”。

为了这三位特殊拳手，奥运主办者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联合排他。

三家啤酒企业“联合排他”，比独家赞助要少支出许多银子，而三家的支出加在一起，又大大多于独家赞助的费用，显得企业、奥委会、奥组委皆大欢喜，创造了“多即是多”的新模式，至少暂时在经济账上是赚了。

目前还很难知晓，这种赞助模式的破例，是颠覆性的，还是仅为“中国特色”下的一种权宜。

中石油与中石化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奥组委方面想出一个双方都不丢面子的办法，就是把两家石化企业的业务“拆分”，然后双双中标北京 2008 合作伙伴。

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石化行业的双塔，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有他们的加油站，不过在中石油的加油站里，你却感觉不到他们为北京奥运花了大价钱。按照“拆分”的结果，中石油宣传自己业务的范围限于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说，假如他们宣传自己有多少钻井平台，或者在油田里遍插北京奥运的 LOGO，都没有问题；而中石化的范围，则在产业链下游，他们可以宣传产品与奥运的关系。

无论上游还是下游，中国人的智慧都在熠熠生辉。

同为民营企业、总部同在呼和浩特市乳业巨头蒙牛和伊利，也对奥运赞助商的光环势在必得，他们的竞逐之路，别有一番玄妙。据报道，两家企业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有官员找到蒙牛方面进行规劝，意思是担心形成恶性竞争，出价太高，得不偿失，既然同为本土企业，干脆一起退出竞争算了。蒙牛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最终发现，伊利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乳品赞助商。

隐性营销，在中国又叫“埋伏营销”，也俗称“擦边球”，它在奥运商战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隐性营销，北京奥组委顾问魏纪中笑眯眯地说：利用规则的漏洞，不算违法，对吧，律师不也是利用法律的漏洞吗。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耐克（Nike）公司在家门口大搞隐性营销，他们在奥林匹克城和奥林匹克公园旁设立耐克体验中心，还雇用很多大学生在场馆外向观众分发耐克的胸牌挂绳，便于观众携带门票，许多人以为该届奥运会的赞助商是耐克呢；到了 2008 年，最被业界津津乐道的隐性营销案例也出现在运动品牌，而且也是东道主企业。

起步于草根的耐克（Nike），一向不愿为竞逐奥运赞助商付出太大代价，他们的全球品牌总监解释说，我们是做运动产品的，所以直接赞助运动队和运动员，让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于是，北京奥运会运动装备的赞助权，主要在国际企业阿迪达斯（Adidas）与民族品牌李宁（Lining）之间展开。国货当自强，何况是在家门口，连魏纪中也承认，北京有关方

面很希望李宁公司赢得胜利。但是，就实力而言，中国第一的李宁与全球第二的阿迪达斯终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李宁公司可以接受的支出上限是 10 亿人民币，阿迪达斯的报价不仅高出李宁，还许诺了其他一些附加的支出。

李宁公司并不希望就此退出奥运竞技场。在 CCTV 奥运频道的各类节目中，播音员、主持人和出镜的记者、嘉宾要么穿着李宁牌服装，要么领口别一枚“李宁”的 LOGO，谁都知道，那绝非巧合。李宁公司利用了国际奥委会规则中的一个漏洞，大获成功。作为北京 2008 合作伙伴，阿迪达斯也吃了哑巴亏，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2008 年年初，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更名为奥运频道，CCTV 字母的下方出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 LOGO——奥运五环，它为体育频道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和商机，未曾想到麻烦也随之而来，而且不止发布会上被胡紫薇抢去风头那一件。

很快，阿迪达斯把官司打到了国际奥委会，他们认为 CCTV 既然使用了五环标志，就不能再播放非奥运赞助商的广告，也不能搞隐性广告，否则就侵害了赞助商的权益。

几经博弈，奥运频道做出了一定范围的让步：当播放广告的时候，带有奥运五环的台标暂时穿上隐身衣；奥运会比赛期间，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服装上不会出现“李宁”的 LOGO——即使真的是李宁牌服饰，也要把 LOGO 遮盖住。当然，外景记者不受此规定限制。

奥运会开幕式上，“李宁”的传奇被续写，这次不是 LOGO，而是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出现在最耀眼的位置，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没有人相信奥运主火炬手的人选诞生会有商业推手，但也没有人怀疑，“李宁”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最难以想象的隐性广告。

CCTV 的故事还没有完结，在本书“人物列传”中关于李红的章节将有所涉及。

从 1997 年开始，三星成为奥运会无线通信领域全球合作伙伴，并于 2002 年 10 月与国际奥委会续签协议，他们早已瞄准北京奥运会的商机。

2008 年 5 月，三星电子向北京奥组委捐赠了 1.5 万部手机。仅仅一个月之后，中国广电总局高调向北京奥组委赠送 1000 台“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接收终端”，即手机电视，其生产商包括联想、天宇朗通等国内品牌。显然，中国手机电视标准的制定者们已经忘记了联想只是奥运会计算机设备全球合作伙伴。

继广电总局之后，2008 年 7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国移动公司，再次向奥运志愿者、中国体育代表团等赠送了数万部具有手机电视功能的 TD-SCDMA 手机，以展示中国自行研发的 3G 成就，这次手机的生产商仍然是国内厂商。

三星人不免疑惑，到底谁才是北京奥运会的手机赞助商呢？

让我们把目光从生意场拉回到运动场。以往历届奥运会（除了在本土举行）的开幕式，体育大国澳大利亚都是第三个入场，早早接受本国拥趸的欢呼。在北京的开幕式上，澳大利亚观众则望眼欲穿，他们的代表团被安排第 203 个入场。依照不成文的惯例，入场顺序依照国家名称的当地发音，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澳大利亚占了自己名字的便宜。在“鸟巢”，运动员要按其国家中文名字的笔划排序，不过他们无须迷茫，毕竟有美丽的引导员带领他们。韩国《中央日报》的文章称，中国借助奥运会向世界推行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标准”。

假如在西方人和中国人面前摆一道相同的填空题：规则是用来（）的，前者的答案大体会是“遵守”，后者的则是“改变”。

西方国家的多数人，习惯于规则的约束，他们的努力方向是在规则框架以内把事情做好，而中国人的习惯是首先想想这规则能不能变通，是否要托托人情？他们努力让规则变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北京奥运会的组织比以往更接近完美，它并非浑然天成，而是由无数的测试、失误、调

试累积得来。早期的测试赛曾相当混乱，“好运北京”中国游泳公开赛在“水立方”举行时，男子 50 米自由泳获得金银牌的都是瑞典选手，但是颁奖仪式上两面“瑞典国旗”却迥然不同。

开幕式演出的最后一次彩排中，中国知名的青年舞蹈演员刘岩表演独舞，她是 A 角演员，离正式的华彩亮相仅一步之遥。彩排中，26 岁的她在三米多高的活动舞台上跳跃，下面推动舞台的战士出现了微小的误差，提前了大约 1 秒，刘岩一脚踩空，脊背摔到了下面的钢轨之上。截止 2008 年年底，刘岩依旧难以摆脱高位截瘫的厄运，这位曾出现在 CCTV 春节晚会舞台、平日喜欢开敞篷车的女子，连站起来都几乎不可能。开幕式还有替补演员可以顶替，但对刘岩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失误。

神经绷得过紧，也有突然断掉的可能，人是如此，设备或许也一样。8 月 24 日晚上，电视屏幕上的闭幕式轻歌曼舞，美轮美奂，现场 9 万多人的感觉就要差一些——或许是开始一段的现场音效过于滂沱、震撼，某一个电器元件突然不堪重负（就如同刘翔的那块跟骨），观众们突然就听不到完整、丰富的声音了，只能无助地看着演员们的表演。失去现场音效的闭幕式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焰火腾空而起。

北京以自己的经历表明，完美实在是无法达到的境界。

闭幕式上，罗格评价北京奥运会使用的语句是“truly exceptional games”。在新华社播发的快讯中，译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因其官方通讯社的特殊地位，“无与伦比”也被多数媒体沿用。国外媒体和中国的网络上，很快出现了对这一译法的质疑。有人指出，exceptional 有不寻常、超水平之意，但还不至于“无与伦比”。

身为主席，自然不大愿意选择极端的词汇。但历史或可证明，在许多方面，在许多年内，北京的奥运会真的“无与伦比”。

下篇 加油

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依旧在“鸟巢”举行。

9月23日，一群深圳失踪孩子家长，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选择在“鸟巢”集体“散步”。

无疑，“鸟巢”已晋升为这个国家的重要象征物。

九月·“阻燃剂”

9月下旬，从石家庄通往行唐县的沿途，差不多每个村落都飘散着牛奶的香气。行唐县是位居全国第三的奶牛大县，拥有奶牛超过13万头，由于国产奶制品陷入信任危机，以前被抢购的原奶几乎无人问津，奶农们只能将大桶的鲜奶倒在沟渠里——像极了教科书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动描绘——许多人绝望地表示，要是一个月内还没有乳业公司来收奶，他们会卖掉奶牛，“价格要是不好，就杀掉”。

三鹿集团大院内，排起蜿蜒的长龙，许多人甚至抱着成箱的奶粉，等待退货。全中国都在研究一个新普及的化学名词：三聚氰胺。

升天

北京时间9月25日晚9时10分许，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人类云游太空的名单中又增加了三个中文名字：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

让中国人更为荣耀的一刻，是翟志刚小心翼翼地离开飞船船舱，“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穿越大气层后，飞船返回舱借助降落伞和反推火箭逐步减速，最终，它像一片羽毛一般飘落在内蒙古阿木古朗草原上。当时气温17摄氏度，风速4-6级，时钟指向北京时间9月28日下午17时38分。

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中国在航天事业上每年的投入约20亿，近期则准备加大投入。每年几乎一座“鸟巢”的高投入，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让国人自豪一下，让世界惊羡一下。《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原则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满足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举措……”

无论如何，中国人能恰好在奥运周期里成功完成太空行走，让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全世界对“大国崛起”的瞩目再次升温。

当然，在“神七”升天的日子里，人们半是戏谑、半是忧虑地谈论着三位宇航员的饮食健康问题——作为“航天乳品”的三鹿奶粉是否也进入了太空？里面会有三聚氰胺吗？宇航员会因饮用它而不适吗？

三鹿奶粉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关系，最早出现在一篇新闻通稿中——

6月25日上午10点，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航天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著名乳品企业三鹿集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三鹿成为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乳饮料及乳粉”的唯一合作伙伴，全国唯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在中国乳制品行业曾经享有崇高声誉的高标准、高质量，安全、营养、美味的三鹿乳制品将为中国航天事业加油！

此次合作是将航天乳饮料惠泽全国广大消费者的壮举。

三鹿问题奶粉事发后，航天中心人士出面澄清一些事实，他非常肯定地说，所谓“航天乳品唯一生产企业”只是商业冠名行为。

9月中旬，问题奶粉事件甚嚣尘上，而残奥会仍在进行中。残奥村里弥漫着隐隐的恐慌，运动员们在冷藏柜前犹豫不决：里面的奶制品安全吗？之前饮用的牛奶里会有三聚氰胺吗？

很快，奥运赞助品牌“伊利”也出现在那份不断加长的黑名单上。

不过，就如同航天员不必为航天乳品的品质担心一样，奥运村的运动员和官员们也不必担心，因为他们喝的并非伊利牛奶，凤凰卫视记者对北京三元乳业的采访中，一位负责人透露了一则内幕消息——他们是负责特供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的，“是不可以有事的”，正是由于三元的质量好，而原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伊利）质量不达标，有关方面紧急改用北京三元牛奶来“特供”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没有采用原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

也要感谢新西兰友邦

35岁的简光洲成了广告明星，一些大城市街头的大幅公益广告里，这个戴黑边眼镜的记者面露微笑，旁边的大字是“讲真话，办实事”。他被视为揭穿三鹿奶粉黑幕的英雄，社会的良心。

简光洲和他背后的《东方早报》配得上人们的敬意，他们第一个在报道中点出“三鹿”，尽了新闻人的本分。一个至少戕害30万婴幼儿、令世界震惊的丑闻，终于被公开化。

9月11日，《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一文见报时，简光洲正乘机飞往兰州，那是最忐忑的一段航程，他不知道一直宣称奶粉没问题的“三鹿”将做何反击。在兰州机场接到同事的短信，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三鹿”终于改口，决定召回8月6日前生产的婴幼儿奶粉。

并不是《东方早报》的报道以奇迹般的速度触动了“三鹿”，而是另有一股力量推动着事件的演进，“三鹿”改口与报道见报仅是一种巧合。

早在7月中旬，中国卫生部就接到一些地方“肾结石婴儿”病例增多的报告。7月16日，甘肃省卫生厅接到来自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电话报告，称今年该院收治的婴儿患肾结石病例明显增多，近几个月已达十几例，经了解都食用过三鹿牌配方奶粉。

当日下午，甘肃省卫生厅初步调查后立即向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并同时报卫生部。卫生部也曾派专家前往调查，但“没有意识到事情有这么大”。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三鹿”的新西兰合作方恒天然公司（Fonterra）。总经理 Andrew Ferrier 说，恒天然公司在8月1日晚上得知三鹿牌婴儿配方奶粉出了问题，他们希望公开召回所有产品。但是，恒天然的建议被三鹿董事会否决——董事会一共有7名董事，拥有43%股份的恒天然只占其中3席。

董事会受挫后，恒天然公司把问题反映到了石家庄当地政府和新西兰驻华大使馆。8月14日即收到消息的使馆方面并未及时反馈给外交部门，而是试图劝说地方政府召回有问题奶粉。与地方政府的沟通结果同样令人遗憾，恒天然公司只好把相关信息直接向新西兰政府部门汇报。

9月15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在对媒体谈话时表示，9月8日，她召集多名内阁部长讨论中国三鹿奶粉质量问题，并决定由新西兰外交部给新西兰驻华大使 Brown 先生下指示，要求 Brown 先生把问题奶粉信息直接反映到中国的中央政府。同时，命令新西兰食品安全局照会其它有关国家，征求他们的意见。

国务院调查组公布的信息显示，三鹿集团2007年12月即接到患儿家属投诉。但三鹿集团相关负责人一直对外宣称从2008年3月起才接到患者投诉。

2008年6月，三鹿集团查出患儿结石祸起三聚氰胺，直到8月2日，他们才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而在8月2日到9月8日的38天当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

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做任何报告。

由于新西兰政府的广泛告知，很多国家先于中国发布了问题奶粉的消息。从9月8日，毒疮已经严重得捂不住了。暗中的调查、处理已经启动，直到3天后被推到阳光下。

人们该感谢尽职的新闻人，也该感谢新西兰友邦，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问题奶粉事件，中国政府的处理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透明和高效。

事后，简光洲坦陈：“网上说我是英雄什么的……他们看不到这后面各种力量的牵制和较量。这件事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公之于众，是个小概率事件。”

稀释

9月16日，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已查出22家奶企的产品内含有三聚氰胺。恐慌在迅速蔓延。

或许与奶业的丑闻没什么直接联系，当天，沪指跌破2000点。

“中国制造”在市场不景气之外雪上加霜，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仅9月22日这一天，三种品牌的中国奶制品在孟加拉国下架，印尼则对中国奶产品展开地毯式的清查，非洲的加纳、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停止从中国进口奶制品及以奶为原料的产品。

9月23日，意大利高调宣布，他们成为第一个对中国产品采取严厉检查的欧洲国家，次日，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总司消费者事务司司长杰奎琳·米诺表示，由于“中国从来就没达到过欧盟的要求”，欧盟并不从中国进口牛奶和奶制品，但他们考虑禁止进口相关衍生产品。英国连锁超市TESCO反应更为激烈，宣布产自中国的一切零食全部下架。

CNN得到的反馈是，美国观众非常关注奶粉事件，毕竟这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

一些国家曾出现过三聚氰胺制造的恐慌。2007年，中国大陆出口的宠物饲料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相关进口国的猫狗等宠物出现大量死亡，中国国内对这场风波普遍未做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TIME）把三聚氰胺事件列入2008“年度十大新闻”。其评论说：“三聚氰胺已经是中国食品工业的一例公开的秘密添加剂。因为中国食品出口的大覆盖率，恐慌弥漫全球。”

三聚氰胺在高温下会释放出不支持燃烧的氮气，因此它也可用作阻燃剂。中国苦心经营的国家形象，原本在奥运会之后灿烂得有些让人目眩，“阻燃剂”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扑灭了世人心中刚刚升腾起来的对中国的巨大热情。

9月实在是一个况味复杂的月份，奥运会、残奥会、“神七”升天带来的无限赞誉和荣耀，不断被各种“意外”稀释着。除了奶粉危机持续升级，股市阴线屡创新低，重大骚乱和事故也提醒世人，中国不可能仅仅生活在蜜糖里。

新华社9月7日消息，湖南决定对吉首市出现的非法集资活动实行清理整治。此前多年，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存在一些向民间高息融资的房地产、矿业和旅游业企业，集资总额至少70亿元。随着一些集资公司资金链断裂，不能按时还本付息，他们与集资户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9月3日和4日，数以千计的集资者先后两次在市内街道、火车站、公路、铁路聚集，一度造成交通堵塞和火车延误。9月25日，已连续三天在湘西州政府门前抗议的上访群众再次情绪失控，人们掀翻汽车，砸毁店铺，袭击军警，还冲击火车站，试图堵塞铁路。

一天以后（9月8日），发生了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这起重大责任事故最初被描述为单纯的自然灾害，暴雨引发泥石流，当日发布的死亡人数为26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一周以后，公布的遇难人数已达254人。此后，被确认的遇难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12月初，卫生部在其官网的公告中称，医疗专家们“无法排除”死亡人数为6人的可能性（此前公布的数字为4人）。这份报告还称，三鹿奶粉及“其他多家品牌的问题奶粉”已累计造成29万名儿童患上“尿路系统异常”。

黑名单上的人

事件的早期，石家庄市政府试图把责任推给个别“不法奶农”，后来的事实表明，良心发霉的绝不仅仅是奶农，过度竞争之下的中国乳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腐烂，与其连带的一些政府部门、媒体、相关产业同样难脱干系。

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一期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它是系列片“中国制造”的第一集。特别节目显示，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

不妨引用一段片中的解说词——

记者对奶粉辅料检测、奶粉加工、包材检验、入库检疫等环节进行了详细暗访、调查，还到其他五家奶牛场和两家加工厂，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情况，眼见为实，经过10多天的调查，央视记者仔细计算了一下，三鹿婴幼儿奶粉用国际先进的全日粮饲养技术饲养的奶牛，产出的鲜牛奶，经过冷链储运、原料检测、添加营养素、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检验等一系列环节，经过1100多项检验检测后，才最终出厂运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三鹿集团具有50多年的乳品专业生产经验，是我国率先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三鹿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全国第一；2006年6月，与全球领先的新西兰恒天然合资，拥有了世界级水准的乳品科研制造能力；2006年7月，三鹿奶粉荣获中国奶粉行业唯一标志性品牌。

后来的官方调查表明，节目制作和播出的时候，三鹿集团内部早已知道其婴幼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并致使一些婴幼儿罹患肾结石的事实。

而在三鹿陷入危机之际，其他国内知名奶企极力表白自己的品质管理多么严苛，伊利更是在广告中着重强调自己是“奥运品质”。

“问题奶粉事件”稍稍平息之后，中国最著名的两家奶企又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伊利请消费者认清自己的“放心奶”标志，蒙牛则向消费者强调自己层层严苛把关的“牛奶安全工程”，他们历数的关卡非常之多，还好，没有多达1100道。

蒙牛宣称的几道重要关卡，包括“精选全球优质牧草”，“精选全球优良奶种”，“建立自己的奶源基地”，而媒体尚未完全平息的“揭黑”报道则指出，那些“黑名单”上的奶企主要都依靠散养的奶源支撑。

艺术作品《匹诺曹》里，那个撒谎的孩子鼻子不停地生长，实在让人羞愧难当。童话只是童话，中国的企业家没必要为此担心。为了挽回欺瞒造成的巨大损失，许多人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新的欺瞒。

9月中下旬，在许多超市的收银台前，人们搬运整箱或大桶的奶制品，而且基本都是双数的——买一赠一是当时奶企抛出积压产品的主要策略。有媒体指出，在促销的奶制品中，不乏9月14日之前的产品，而且上过“黑名单”。

接下来的几个月，奶制品的销售渐渐回暖，10月中旬，伊利宣称销量已恢复到危机前

的 80%。超市的奶制品专柜前，提着购物筐的市民并不比 9 月之前少。奶总是要喝的，许多人无奈地表示。还有一个想法支撑着消费者的信心：或许这个阶段的奶制品质量反倒是最好的。

中国的消费者表现着一贯的麻木、务实或健忘，很少有人准备以“抵制”惩戒那些奶业大鳄的欺骗。

结石的灵魂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科普：从大米中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肠中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中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枣蜜中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最近我们又从奶粉中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这是问题奶粉事件之后，网络上的黑色幽默。仅最近几年里，关乎民生的食品和医药领域每年都会有触目惊心的黑幕被揭开——2003 年“海城豆奶事件”、2004 年阜阳“大头奶粉事件”、2005 年“苏丹红事件”、2006 年“瘦肉精事件”，以及 2005 年“齐二药”假药事件、2006 年“欣弗事件”、2007 年“佰易事件”、2008 年完达山“刺五加注射液事件”

中国的媒体大多不加思索地把三鹿问题奶粉引发的危机定义为“毒奶粉事件”，严格地说，“毒奶粉”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定义，科学实验表明，三聚氰胺难以被人体吸收，容易导致结石，但对于三聚氰胺的毒性，存在较大争议，目前的观点更多倾向于它是一种微毒的化工产品。

总有一些东西，比三聚氰胺本身更让人不寒而栗。后来被揭露的事实表明，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绝非个别奶农和个别企业，它是整个行业里大家心安理得接受的潜规则；而添加到食品里的毒害物质不止三聚氰胺一种，也绝非只存在于牛奶当中；至于道德的沦落，又何止发生在产品供应环节？

9 月 21 日，温家宝在北京儿童医院看望患儿时说：“在这起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

信仰早已危机，道德体系继而塌陷，灵魂结石，无以救赎。

2008 年还有一件颇为轰动的“中国制造”，那就是山寨机。最初，一种廉价的仿制手机只是在广州海印、深圳华强北一类的地方被低调贩卖，到了 2008 年，如同病毒的大规模爆发，山寨开始名正言顺，开始呼风唤雨，开始遍地开花，从电脑、服装、汽车及至文化产品，山寨无所不包，据粗略统计，山寨产业的年销售额已达 400 亿，人们把 2008 命名为山寨元年，他们看起来并不是要回归粗鄙、廉价、无保障的生活质量，而是陷入一种挑战和颠覆的快感。山寨的当红，也进一步证明着中国人创造力的匮乏。

2008 年，如果说造假还无法在阳光下进行，至少仿制和剽窃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炫耀的。

大约 2006 年的时候，中国市场上的假鸡蛋引起人们的恐慌——居然连这个都可以造假了？两年之后，真鸡蛋里被检出了三聚氰胺。选购鸡蛋的时候，先别去考虑营养价值了，中国人需要仔细权衡一下，在假蛋与三聚氰胺蛋之间，哪个的危害小一些？

在紧邻香港的深圳，为了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一些旅行社竟在 9 月份推出赴港采购奶粉一日游，消费者更相信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

当全社会普遍诚信匮乏，安全感便当然地成为稀缺之物。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感本是低层次的需求，而中国人至今还很渴求它。中国人要教自己的孩子从小增强辨别力以应付复杂社会，要迫使孩子奋发向上，以免在残酷的竞争中落伍。即使那些丛林法则的获益者，不仅压力巨大，还因缺乏制度保障而内心惶恐。每个人潜意识里都缺乏安全感，乞丐没有，富豪没有，官员也没有，中国的 B 面没有，A 面也没有。

于丹的《论语》讲得风靡全国，并没有真的让儒教回到人们心中；法国媒体曾诙谐地说：中国有 7000 多万共产党员，超过法国总人口，但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不如法国多；佛教依旧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大宗教，不过人们的宗教仪式通常是这样进行的：在佛像前点燃三柱香，然后默默求佛祖帮忙做几件实事，诸如赐予健康，保佑发财，带来功名。中国好象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正的宗教国家。

宗教信仰不能解决内心世界的全部问题，但它有可能预设一根道德底线。

如果说当代中国还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不容置疑的信仰”，就如龙应台所说的，它就是“现代化”。那个变形金刚一般的 CCTV 新大楼，恰是代表这种信仰的图腾。

这个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处于“折腾”和颠覆的时日至少有一百年，支撑中国人内心的道德、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也因此而面目全非，无可避免地，人们迷失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就是当下中国，国土辽远，却找不到精神家园。

海啸来袭

2007 年春天，当美国新世纪房贷公司破产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它只是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最初倒掉的那一个。

2008 年 3 月，当投资银行中的巨头贝尔斯登因深陷财务危机而被迫以超低价格出售给摩根大通，人们以为已经到了最坏的时刻。

这个秋天，格林斯潘的判断起初让人觉得有点危言耸听（他说美国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接踵而至的噩梦确实在勾勒美国金融业的末日图景。

美国当地时间 9 月 7 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政府注资与正式接管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联邦房贷公司，著名的“两房”变身国有企业。

接着，被媒体称为“流血的一周”的噩梦，在 2008 年 9 月中旬袭来，给予合众国不啻于“911”的沉重打击。

9 月 14 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集团以总额 500 亿美元出售给美国银行。15 日，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这个星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一夜之间，华尔街五大投行中的三家都已不复存在。

破产前夕，“雷曼兄弟”的股价较 2007 年年初最高价时下跌了 95%。

位于曼哈顿岛第七大道上的雷曼兄弟总部大楼，有着与其名望相符的气派，巨大的玻璃幕墙上，隐约可见的是全球版图。当地时间 14 日晚上，警察用隔离栏围住总部大楼的大门，不断有抱着纸箱、拖着行李的雷曼员工走出来，他们在路人的围观之下彼此拥抱，然后各奔东西。雷曼兄弟，曾被纽约大学金融教授罗伊·史密斯形容为“有 19 条命的猫”，这次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条命。消息瞬间震撼了全美国，此后几天发生在总部大楼的景象是，游人纷纷在大楼附近拍照留恋，他们知道，那块挂了 158 年的牌子即将彻底消失。

风暴远没有停息的迹象，9 月 16 日，美国最大的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AIG）被政府接管；

9 月 21 日，五大投行中幸存下来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宣布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9 月 25 日，又一项美国之最诞生——全美最大的储蓄贷款银行华盛顿互助银行宣布破产，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桩银行破产案。

花旗银行也摇摇欲坠，走到破产边缘。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美国政府从 7000 亿美元资金中再拿出 200 亿美元，拯救身处困境的花旗，同时还为其价值 3060 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提供担保。

美国政府频频出台救市计划，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揶揄说：布什同志开始走向社会主义。

很快，海啸波及全球金融业，波及美国实体经济，波及全球的实体经济，11 月，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都陷入严重的危机。

上世纪美国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华尔街流传着一个段子：五星级豪华酒店里兹·卡顿酒店对来客的第一句问候语改为：“请问，您开房间是来住宿还是跳楼？”现在，昨日重现。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的晚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杰伊·莱诺诙谐地说：“美国已发展了一种能够消灭人但却让建筑物完好无损的新式武器，这就是股市。”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界和商界领袖都站出来鼓励公众消费，希望借此挽救经济。心理学教授 Stuart Vyse 说：“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讯息：花钱是爱国行为。”身处巨大哀痛和恐慌中的人们也非常配合消费的建议，人们更多依赖于冲动型的购物和消费来释放情绪。

金融海啸爆发后，许多美国人捂紧了钱袋并开始反思：是不是该像中国人那样，过一种量入为出的、甚至清教徒式的生活？不久，类似于中国的抢购打折商品的疯狂，竟真的在美国出现了。

纽约长岛一家沃尔玛超市感恩节后的打折销售中，连夜排队等待的消费者为抢购低价的平面电视和电脑蜂拥而入，造成踩踏事故，导致一名沃尔玛员工死亡。

更多的美国人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钱，突然的窘迫让他们难以忍受。一些心理学家表示担心，消费上的压抑会导致犯罪、吸毒、酗酒等社会问题的增加。

浓重的阴影不止笼罩华尔街，也不止美利坚。

路透社报道，在生活窘迫的背景下，英国也出现了“山寨食品”：Waitrose 超市连锁里有种叫 Arenkha MSC 的产品，其成分和口感跟鱼子酱比较相像，但价格要便宜多了。包装上写着该产品“混合了熏鲱鱼、鱿鱼墨、柠檬汁及调味料等元素”。

在莫斯科，Niyama 日本料理店促销出新招：中午套餐与俄罗斯股市的交易系统指数(RTS)挂钩。

2008 年 6 月，一位名叫“郁闷昊”的网友发起“百元周”计划，即一周内全部生活开销加起来不超过 100 元，很快就在网上蹿红。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百元运动”。同时，类似“账客网”之类的记账网站流行起来，少至买瓶饮料的钱，白领们也开始晾晒到网上，接受朋友监督。

年关将至，有媒体搞了一个街头采访，问路人 2008 年的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许多人的回答是，想要钱。

9 月 29 日，以“鸟巢”、“水立方”为代表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成为长假首日接待游客最多的地方，共迎客 15 万人次，9 月 30 日全天接待 26.22 万人，10 月 1 日截止 15 时的接待数字是 19.46 万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接待游人数量远远超过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北京著名旅游景点。

十月·危局

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中国在 21 世纪初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广东省的东莞市，无疑是最具标本意义的一个车间，近年来，这座新兴城市的年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15% 以上，超过 1000 万的外来务工者，挤满了蜂巢一般的工位。2008 年，当中国制造进入寒冬，东莞同样是危局中的一个典型标本。英国《卫报》的记者 10 月就从东莞发回这样的报道——

掉下的玩偶头无神地盯着大门外；WALL-E 和芭比宠物医生的盒子散满了院子。

两周以前，玩具生产商合俊（Smart Union）还在辛勤地为美利坚与欧洲的孩子们制作着玩具；而现在，这个公司却被摘牌清算了——这让它的 7000 员工震惊不已。

“前一天我们还在正常上班，而第二天，工厂就彻底停产关门了。”魏孙影（音译）说。

此时的她正站在中国南部城市东莞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八年来，她一直在这家工厂充满烟雾的房间中为塑料零件涂漆。

“现在，我们厂里的几千人都在找工作。每天我们走得脚都疼了，却还是找不到任何活计。”

10 月中旬，工人们聚集在工厂门口，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这家企业 10 月份停产，之前有大约 6500 名员工。

仅仅几个月之前，合俊公司还是打工者的理想之选，进厂竟要缴纳高额的“介绍费”。

合俊当然不是一个凄惨的特例，2008 年，寒潮强劲，整个珠江三角洲都战栗不已。仅 2008 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区域已有 67000 家小工厂倒闭。即使挣扎着活下来的小企业，大多也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来自广州海关的统计数字是，2008 年前三个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实际出口玩具记录的企业由 4820 家减少到了 1554 家。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 6000 多家制鞋企业中，超过 1000 家倒闭或外迁。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史蒂芬·格林说：“很多工厂的订单本都是空空的。”

2008 年 10 月下旬的“广交会”，或许可以解释合俊公司为什么会突然死亡。

“广交会”的玩具展区被安排在广州琶洲会馆的 C 区，这里圣诞树灯光闪烁，风铃轻轻摇曳，但前所未有的萧条还是在人们沮丧的脸上暴露无遗。

一家参展商租下两个展位，10 月 25 日这一天，三名工作人员如此度过——一个人在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里的游戏，另一个玩游戏的工具则是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人呆呆地坐了许久，因一个电话而兴奋起来：“你快过来吧，我这正没人陪我聊天呢。”

玩具展区外面的长廊上时常坐满参展者。有的人在闲聊；有的人盯着琳琅满目的玩具发呆，有的人则歪着脑袋，半张着嘴巴睡着了。一位来自辽宁的参展商对记者说，在他印象中，2003 年“非典”期间都没有这么冷清。

《卫报》记者认为，“某种程度上，东莞成了它自己成功的受害者”。整个广东省也是一

样，它在不到 15 年里完成了西方 200 年的工业发展进程，现在，政府试图把自己的省份移至价值链的上游，却发现转身并非易事。

长江三角洲感受到的寒意，绝不逊色于珠江三角洲。2007 年，温州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还有 500 多家，一年过去后，开工的只剩下不到 80 家。

财经作家吴晓波去“长三角”考察制造业，回来以后写下“江南危矣”的题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2 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11 月底，十省份农民工返乡数据总计有 485 万名，占 2008 年 9 月底外出务工人员 5.4%，算上依旧滞留下来寻找工作的人们（比如合俊公司的那些农民工），实际的失业人群可能更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从各地调研情况看，农民工失业人数，保守估计也将超过 1000 万人，这一数字占全国 1.4 亿外出农民工的 7% 以上，形势之严峻前所未有。《财经》在深入调查之后也得出相近的结论，而且只是 2008 年年底的数目，它无疑还会继续攀升。

在严寒中无声消亡的，基本都是私营中小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时也最为脆弱，在国家经济序列中属于二等公民，很容易在气候骤变之际自生自灭。

与奥运无关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股市没有接到“配合奥运”的政治任务，相反，它相当的不配合。奥运开幕后，沪深股市持续下跌，8 月 11 日两市跌幅均超 5%。

10 月 13 日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说，美股周五收盘走低，道指以 8451 点结束了 112 年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周。道指盘中剧烈波动，振荡区间达 1000 点，盘中一度跌破 8000 点关口。

中国股市从 10 月起反复起落，幅度都在 10% 以内。证券印花税单边征收，利率下调，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每一项政府用于提振信心的举措，都被股民和机构当作短线操作的机会，他们自觉地坐在过山车上，只想借此减少一点损失。

2008 年 8 月之前，“中国加油”，“奥运加油”的声音响彻中国，波及世界，其实它应该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响起，帮人们对抗恐慌和绝望。

一直希望借奥运商机发展业务的公司法人张宁说：“奥运经济是个‘鬼’，人人都说它可能存在，却没有人真的见到。”他抱怨说，上游的资源都控制在政府部门手里，私营公司只能像厨房里的小伙计，帮着摘菜，洗碗，顺便闻一点油烟味儿。为了奥运梦，张宁把儿子丢在南京老家，自己跑到北京折腾了两年，事后一反思，他没觉得奥运会真的商机无限，蛋糕大得不得了。

2008 年年初，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日本专家田中修就曾指出，对于中日这样的国家而言，举办奥运会，重要的是提升了国民自信心，而所谓“奥运经济”，主要拉升的也只是主办城市的基础建设，其他贡献并不明显。

田中修对于中国的经济过热表示忧虑，尽管他并不觉得这与奥运直接相关。事实部分地被田中言中了，早在北京奥运会开始前，中国经济的温度计已经由热转冷，它甚至无意与预言中的“后奥运”低潮合拍。

即使没有奥运，没有金融海啸，2008 年也是中国的一个拐点。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的迹象，在年初即已显露，楼市停退，股价“跳楼”，预警信号的级别不断升高……

巴士司机的两难抉择

为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中央政府进行着不断的政策尝试，收效并不明显。当高企的房价似乎真的撞到了天花板，成交量萎缩，房价徘徊甚或下挫，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

方政府又坐不住了，纷纷奋起救市。中央政府以一种默许的姿态注视着波澜起伏，没有办法，地产业已经成了国民经济这座大厦里过于粗壮的支柱。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近两年共产党和政府反复提及的任务。连高层也不否认，现有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深层矛盾，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尖锐。在改革开放 30 年的纪念一刻，政治体制改革再度被热议，但它看上去比经济领域的突破要艰难得多。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制”，虽小有推进，却远不及外界普遍期待的力度。

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分仰仗外贸和基建投资的拉动，将使这种增长虚弱而缺乏可持续性。调整产业结构，哪怕是承受暂时的阵痛，不时出台的相关政策表明，决策层暗暗下着决心。但是，所谓的改变增长模式，更多停留在口头上，很难被实际推动。

即使在地方政府中有人愿意忍受阵痛而尝试产业升级，也需要逆风而行。2008 年 12 月 10 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表示应坚持减少广东境内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他把这个形象地比喻为“腾笼换鸟”；不过，当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批驳的文章，认为这是在“歧视中小企业”。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弊端，在经济界基本是一个无须争议的共识：GDP 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贸（自 2002 年加入 WTO 以后每年外贸增幅都超过 20%）拉动，当外需疲软或趋于饱和，成本优势随人民币升值而降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遭遇瓶颈，国内就可能面临大萧条甚至经济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分析表明，如果美国的增长率下降 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 4%，要知道，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已高达 35%。美国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而中国可能会是感冒最重的一个。

这是中国漫长海岸线上 2008 年下半年的情景：大量的 10 万吨级的货轮和五彩的集装箱停靠在港口，个别货轮以“拼船”的方式才能勉强凑齐足够出航的订单——有点像北京奥运单双号限行期间的“拼车”出行。即使有中国军舰参战的围剿索马里海盗的行动大获成功，仍无法冀望海上航路重现中国货轮往来穿梭的盛况。

一度，中国巴士在减速，尾灯上亮起“宏观调控”的标志，它试图修正自己的方向。但是，如何承受因此带来的车厢内的抱怨之声，是巴士司机棘手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外面的天气恶劣起来，抱怨加重，司机被迫加一把力气，猛踩油门。在艰难的 11 月，由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转为经济刺激方案，正是踩下的那一脚油门。它可能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失去深化改革的时机，但你也必须体谅，这确实是无奈之选。

中国的 GDP 每变动 1%，都至少涉及 120 多万人的饭碗。不要说停滞，哪怕中国巴士的加速度降到百分比的个位数，一些伴生的危机都是让司机恐慌的。必须让中国神话继续下去，别无他法，我们不妨把它称为高增长依赖。

这是一种靠不住的依赖。司机如何加油，经济衰退还是真实地降临了，政府刺激政策频出，股指、房价、就业率的阴线并未随之消失。

经济的萎靡推高了失业率，也更加考验企业主的信用，从年初开始，就不断传出企业主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携款潜逃的新闻。据政府背景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2008 年共有 6 万多起劳动仲裁案件，是前一年的两倍。

危机中的应对之策，仍有头疼医头之嫌，中央政府用以刺激经济的 4 万亿（各地政府随后跟进 18 万亿）投资，依旧集中于基本建设。而不是切实增加民众消费能力，解决内需不足。

11 月 14 日，“鸟巢”正式开始对外立面钢结构进行首次清洗。考虑到天气和安全的因素，

清洗工作没有像“水立方”一样采用“蜘蛛人”，而是由两辆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完成。

十一月·非典型奥运

11月24日，北京奥运会总结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整整三个月以前，来自伦敦的巴士载走了五环旗，现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和伦敦奥组委的大员们的手再次紧握，然后它们会把北京奥运会的句号彻底画圆。

总结会上公布了北京奥运会的财务情况：筹备奥运花费超3000亿人民币，其中场馆130亿人民币，城市建设2800亿人民币，奥组委运行20亿美元。不过在北京奥运大厦内，奥运的经济问题依旧是机密。

北京给奥林匹克带来的是什么？在这次总结会上，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它的超高标准给其他举办城市造成的巨大压力。IOC（国际奥委会）小心地措辞，说明北京是一届非典型的奥运会，以此给后来者解压。

“奥运会没有‘最好’或‘最伟大’，只有‘不同’。每届奥运会都是独特的。奥运会的好坏不是花多少钱就能决定的，还要看主办城市是否有独特和激动人心的氛围。我相信伦敦在这方面能做得很好。”11月24日的总结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盛赞北京的同时，对2012年奥运会东道主说，伦敦不需要向北京的高标准看齐。

北京奥组委顾问、美国学者苏珊·布朗内尔如此评价北京之于奥运的意义：“奥运会是纯粹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但在2008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不西方化、象征远东文化中心的国家举办，具有破天荒的历史意义。”在苏珊看来，奥林匹克运动从北京得到的最珍贵礼物，就是当它在西方世界的光环逐渐消退的时候，在东方的中国赢得了无上的荣耀与推崇，奥林匹克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被提升。

有形的遗产

我们当然更关心奥运会给北京乃至中国留下什么。容易直观看到的，除了地铁和T3航站楼，主要还是一大批奥运场馆。不过它们肯定算不得重要的遗产，不成为沉重的包袱，就已是北京创造的又一奇迹了。

当“鸟巢”还是一个模型，它并不被评委之外的人广泛看好。一个国家标志性的主体育场，竟设计成鸟窝，一个巨大的鸟窝，起初，多数中国民众难以接受。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人的图腾。奥运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鸟巢”体育场的游客数量甚至超过了故宫，跃居北京最热旅游景点。即使在平日，这里每日也是游客过万。

一座体育场成为著名旅游景点，似乎是古罗马竞技场才会有的传奇。

1988年的韩国，奥运也曾让这个民族情感浓烈的国度疯狂，但奥运主体育场也并未由此成了风景名胜。一位韩国记者打趣道：可能是我们的主体育场设计得没有“鸟巢”受欢迎吧。

按计划，“鸟巢”的首次商业演出权签给了一家日本乐团，这在民间引起争议，认为还是应该让中国人在这座充满自豪感的体育场首演。9月中旬，“鸟巢”经营方透露，原计划在国庆节期间举行的首场商业演出，由于“安全方面考虑”未获北京市治安总队批准，还好，中国人还有首演机会。经营者也曾接触过周杰伦、张惠妹等华人歌星的经纪公司，“鸟巢”200万的场地租金吓退了很多演出商。

不过“鸟巢”没什么好担心的，它每年的运营成本约7000万，按目前的趋势，仅销售价格50元的参观门票就足够盈利了。

高关注度的场馆日子都还好过，“水立方”变身魔力音乐厅，承接了郎朗的音乐会；五棵松篮球馆承接了 NBA 中国赛、冰上赛事和商业演出，其经营权签给了全球最大的体育娱乐集团——美国 AEG，他们的目标是每年承接百场以上的演出或比赛。

五棵松棒球场和老山自行车场等奥运场馆，最初就明智地定为临建场馆。因为商业前景暗淡，耗资 2 亿多的五棵松棒球场已于 2008 年年底率先拆除。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2001 年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北京以每年 3000 多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量向 2008 年挺进。“这样的竣工量超过了整个欧洲一年的总和”。奥运加速了北京的现代化，官方称原定 2010 年实现的初步现代化提前两年到来。人们并不一定知道，奥运对北京城市形态的改变，不仅仅是无数现代感建筑的集中崛起。

2004 年 7 月，雅典奥运会即将开幕，北京又掀起新一轮的人与推土机的角力。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在内的 19 位文化界人士致函世界遗产大会，呼吁“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周边环境的保护，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破坏”。

奥运将至，政府慢慢意识到“老北京”对世界更有吸引力，在被拆除 47 年之后，永定门得以在 2004 年复建，它位于全长 7.8 公里的明清中轴线的南端，北端的鼓楼依然健在。“老北京”本有 47 座城门楼、箭楼和角楼，到 21 世纪仅残存下 3 座。

北京喊出“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五千年”的口号。政府投入 3.3 亿元修复古建筑，是以前投入的上百倍。

新华社记者王军近些年来专注于北京古城保护的调查。他注意到这样的情况：2002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一年之后，25 位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人士联名致信中央高层，要求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认为这样的拆除“严重破坏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格局风貌”，并且“不符合‘人文奥运’的精神”。这封信导致古城之内 131 片危旧房改造项目被令暂停。

“你可以这样认为，”王军说，“是奥运会延缓了对古城的进一步拆除。”

2005 年 4 月 19 日，北京市政府对这些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 35 片撤销立项，66 片直接组织实施，30 片组织论证后实施。“继续实施危改可能再一次引发争论，但至少 35 片危改计划被撤销了。”王军说。

2002 年开始，有关方面开始推动修编《北京城市发展规划（2004-2020）》。以奥组委主席刘淇为代表的北京市新一任高层，推动了新规划的出台，规划中也充分尊重了奥运因素。至 2004 年，修编后的规划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批。新规划的亮点是提出“多中心”，有望打破北京城“单中心、摊大饼”的城市建设格局。

绿化是申奥承诺中的硬指标，北京拿出大片宝贵土地栽种花草树木，基本兑现了承诺。北京也把自己的最后一大块上佳地块给了奥运，尤其是国家森林公园，让祖国心脏的近旁有了一大片“绿肺”。不过它在规划图上的名字是：中央预留地块。

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推动下，北京大力兴建首钢，在奥林匹克的推动下，首钢搬迁的动议付诸实施。

毛泽东曾有言，站在北京城里要能看到工厂的烟囱；在一次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的时候，他心生忧虑，对下属说，北京的工人阶级太少了（当时的比重约为 4%），这哪里还像无产阶级的首都。他甚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怨气：是不是首都该搬家了？

领袖话音一落，一排排工厂（其中多为首钢这样的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的大烟囱很快矗立在古都北京的天际线上，产业工人也占到了首都居民的比重也随之大大增加。

正如龙永图说的，奥运是一个“健康有益的外力”——岂止普通的外力，简直是伟力——在它的推动下，争论多年的首钢搬迁最终破冰，2002 年开始，首钢逐渐完成减产、搬迁。

奥运申办成功后，北京城市规划上还有两个议题：北京区级行政区划的合理划分，中央

行政区外迁。这两件决定北京城未来命运的动议，因为难度更大，未能被奥林匹克推动，只能期待再出现什么伟大的力量了。

渐变

对中国而言，无形的遗产应该不止是巨大付出换回的辉煌如何被赞誉，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中国如何借助奥运而认同那些有光泽的价值观，如何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良性沟通。

奥运会过去了，牛皮癣一般的广告又爬满了电线杆和公交车站牌，市区主干路又成为巨型停车场，“蛋花汤”一般的空气又罩在人们的头顶……有些人感受到了一些改变，比如随地吐痰的少了，主动排队的多了，只是，这种变化不那么显著，并不是每个人都触摸得到。

奥运前，北京曾出台规定，商家不得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公共场所要严格禁烟或限烟，可惜随着奥运过去，它渐渐失去了约束力。

肖阳的感受是，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中国也还是那个中国，“中国什么都发生过，中国人什么都经历过，无论什么砸下去，也不会有多大波澜”。

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李红证实，在一些西方政客以及国际奥委会西方委员的头脑中，确实有过一种愿望或判断——假如把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中国，也会把西方的自由精神、民主政治带给中国，使这个国家发生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改变，就如同 1988 年奥运会对韩国的巨大改变。

在北京方面游说那些委员的话语里，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奥运会将让中国更开放，更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也承诺人权等方面的改善。

奥运会没有让中国天翻地覆，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确实已经或仍在悄然发生。

2008 年 7 月 31 日。不下十家海外媒体的网站在首页发布消息——本网在中国解封。此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承诺，前往北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享有进入所有网站的自由。这个草率的承诺后来让北京方面和国际奥委会都很为难。

北京方面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这就是 7 月 31 日的那个结果，但是，某些过于“敏感”的网站依旧不在解封之列。

罗格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与北京达成过任何协议，接受中国对互联网的限制，但他承认，国际奥委会委在中国网络自由问题上也许过于“天真”了。罗格同时认为，虽然中国在开放互联网问题上解决得并不完美，但是与奥运会以前相比却有了很大的进步。

是的，无论如何，奥运会的到来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管理思路的改变。

奥运会结束以后，7 月底解封的那批网站多数仍可进入，网民得以继续享受着奥运带来的好处——网络监管的尺度似乎真的有所放宽。12 月 18 日起，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读者突然发现自己无法顺利进入纽约时报的网站，时间超过三天。之前，BBC 中文网、美国之音、亚洲周刊已早一步被封，但 19 日即恢复正常。这扇门时而打开时而关闭，让人无所适从。

奥运会期间，几位负责接待国外媒体的大学生志愿者告诉《财经》实习记者刘京京，他们在培训中被“灌输”了很多要谨慎应对媒体的“技巧”。例如，不要主动与外国的记者交谈；记者问什么，都尽量以“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为由搪塞过去；当记者拍照时，志愿者绝对不能看着镜头——这样容易让人有“志愿者主动要求拍照”的误解，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也是在奥运会举行期间，国际奥委会表示反对中国当局拘留一名在北京采访一次亲西藏集会的英国记者。国际奥委会发言人说，国际奥委会不同意任何企图妨碍记者正常工作的做法。

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聘请的公关公司都在提醒中国官员，要与媒体进行良性互动。最终，他们的建言取得效果，某些奥运前颁行的措施，得以形成长效机制。

10月17日，温家宝签署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2004年5月23日，安德鲁设计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坍塌，中国人受到的震动仅次于法国人。此时，安德鲁的中国作品国家大剧院正在施工，同为欧洲大师设计的“鸟巢”已破土7个月，1800多根长38.3米、直径近1米的桩被打入地下。在“鸟巢”方案公布之初，就有一些专家指出它的安全隐忧，戴高乐机场事故重新唤起舆论对大型公共建筑安全问题的关注。“鸟巢”施工中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也令安全问题引起更多重视。

除了关注“鸟巢”设计的安全性，业界争论还触及一个理念问题——是否有必要为“贪大求异”而承担巨大的浪费？在对外公布的数据中，“鸟巢”的工程预算曾是35亿人民币，后来经过“瘦身”减少到大约31亿元。实际上，“鸟巢”开工以后预算多次追加，由35亿到大约50亿再到接近60亿。

奥运工程的造价之高惊动了国务院高层，总理温家宝亲自作出批示，强调要节俭办奥运。2007年7月30日，“鸟巢”悄然停工，开始回到图纸实施减肥手术。减肥的重点是取消可开启屋顶，也包括减少座席、停车位和用钢量。

“节俭办奥运”的新口号一出，其他一些奥运建设工地也相应调整。

根据原设计方案，主新闻中心（MPC）和国家会议中心建筑群的外饰面将设立两块大型标志牌，其中一块竖牌高达60米、宽7米左右，上面有“北京2008”等字样，另一块横牌高5.5米、长达120米，绘有“MPC”等标志。不过，作为耗资巨大的临时景观，这些设计在施工前被节俭思路取代。主新闻中心的内外装饰面积在8万平方米左右，仅花费了300万元左右，这样的价格仅够一个星级酒店几百平方米大堂的装饰费用。

五棵松篮球馆原设计有多层商业设施及大屏幕电视墙，后被取消；总建筑面积也由11.7万平方米降至6.3万平方米，用钢量由4万吨减少为5千吨。

北京奥运会让全世界都惊异于它的华丽、绚烂，标准之高让后来者望而兴叹，多数人并不知道，北京方面曾为“节俭办奥运”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他们节省了巨额的资金，忍痛割舍了一些更恢弘的创意。

体制优势也帮北京奥运会省下了难以估量的人力成本。“志愿者是奥林匹克的最大财富”，北京则拥有170万的志愿者。

开闭幕式的参演人员差不多3万人，都是军人和学生，相当于“志愿者”。2008年的太极拳表演，是少林寺附近的塔沟武校承担的，学校需要自己花钱包车把学生们运到北京，然后开始义务的训练。“能参加奥运演出，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在漫长的筹备期里，塔沟武校要这么激励学生，也要这么说服自己。

为开幕式演出提供设备支持的一个供应商透露，他们提供了2008件道具，最后取消了，费用也只能自己承担了。他们对此很是无奈。

除了重倡节俭之家风，漫长的筹备过程中，北京方面有一个理念上的重要修正，就是在2006年悄然把举办奥运会的目标由“历史上最出色”改为“有特色、高水平”。

奥运会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和顺畅的交通对生活如此重要。9月初，《新京报》的一份调查显示，对于单双号长期限行，有68.9%的人表示支持，而有车族对此的支持率竟也高达48.5%。虽然单双号限行没有真的延续到奥运以后，至少说明，多数北京人已愿意为环保让渡部分个人权益。

志愿者丢了

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12名志愿者代表，在闭幕式上获得国际奥委会新委员的献花。连苛刻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对日本媒体表示，最让他感动的是奥运会志愿者，他称赞那些年轻人“拥有梦想，让人充满期待。”

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民族主义，志愿者精神，长辈们为其眼里的年轻一代贴着标签，又很快以新的标签覆盖掉。他们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个时代的人群已难以简单描摹和定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年轻的志愿者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形象。

中国的奥运志愿者获得了海内外的颇多好评，这是他们付出后赢得的荣誉。好荣誉也应该部分地归于一种模式：阵容庞大，组织严密，责任落实，长期培训，这些都是其他奥运举办国难以拷贝的，是的，它也是中国式的，更接近于政治任务而非社会责任。

悉尼奥运会招募了4.7万名志愿者，雅典奥运会志愿者约为6万名，北京的数字是170万，超过这个巨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其中，包括大大超过往届的10万赛会志愿者，以及中国首创的40万城市志愿者、100万社会志愿者和20万拉拉队志愿者。

对于赛时志愿者，北京奥组委也考虑过依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招募，但最终放弃。一方面，能否招到足够多的合格的志愿者，值得担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么多来自社会的志愿者，如何“落实责任”确保安全。

最终，北京团市委书记担任起志愿者部的部长，招募工作主要以团委的渠道，把任务分派给北京的各个高校。成为志愿者的多为学生中的党员和干部，选拔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可靠”，“听话”。

个别高校曾把志愿者工作与分配、提拔、免试研究生等指标挂钩，经媒体报道后被紧急叫停。《财经》实习记者刘京京采访到的情况是，奥运会开始前，很多觉得自己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志愿者要求退出，有关方面甚至以“记档”挟持。

北京大学团委曾推出针对奥运志愿者的“快乐指数调查”，问题为：“今天你快乐吗？”曾有极个别同学亮出了低分。团委书记韩流毫不讳言，北大有一部分奥运志愿者最初报名的时候，看中的是“奥运”，而不是“志愿者”。“有的人误以为当了志愿者就像拿到了一张‘免费奥运门票’，有的人是为了看体育明星……”

对于这些年轻的志愿者而言，保持微笑是容易做到的，微笑时要露出哪几颗牙齿的规定也是容易记住的，但是让这些涉世不深的学生掌握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树立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并非若干次培训就能实现。

如果说奥运组织工作有什么明显的遗憾，应该就是志愿者的环节。赛会结束后，一些熟悉北京奥运筹备全过程的知情人士私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位于“鸟巢”旁边的国家体育馆是8月8日开幕式的运动员准备区，体育明星的密度超过了最晴朗时刻的夜空。入场仪式即将开始，队伍的通行却几乎因“粉丝”的蜂拥而堵塞。穿着志愿者服装的少男少女举着签名本和相机，涌向闪亮的明星，“不知道怎么聚集了这么多（志愿者），拦都拦不住。”一位工作人员抱怨道。

一些兴奋的志愿者也在抱怨：自己怎么就没带相机呢。还有一些起初守在自己岗位上的志愿者，则觉得自己因为遵守规则“吃了亏”，也动摇起来。

类似的追星场景，在整个奥运期间并不鲜见，开幕式前的那一幕，只不过最为壮观。许多时候，年轻的志愿者没有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暂时地“丢”了。而真正的志愿者精神，也在北京部分地丢失。

北京奥运的组织工作获得了空前的赞誉，虽然并不如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真正实现了“零投诉”，但庞大系统的运行确实没有出现大的纰漏。奥运期间，一位略显冒失的工作人员开车撞伤了一位运动员，影响了对方的比赛；个别国外运动员投诉班车晚点，耽误训练和比赛。这些都被看作白璧微瑕，在奥运总结中忽略未计。

人本精神的烛照

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国际奥委会一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仅从他们对开幕式节目的修改意见上，就可见一斑。

按照导演们最初的设想，从“鸟巢”的“地下宫殿”升起的不是巨型地球模型，而真的是一座仿制的中国宫殿的代表——故宫太和殿，国际奥委会的官员认为，当宫殿出现在体育场里，无法保证看台上各个位置的观众获得相同的视觉体验，这对他们不公平，建议取消；而在运动员入场环节，在跑道上搭建五座牌楼造型的“中国门”也曾是导演组颇为得意的创意，国际奥委会也投下反对票，因为它有点喧宾夺主，使全场焦点不易集中到运动员身上，而且也会遮挡部分观众的视线。

在与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协调委员会的沟通中，让北京奥组委感受很深的，就是奥运会极其尊重运动员、观众的主体地位。当然，要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奥运理念，并非朝夕之功。

8月22日下午，奥运开赛以来阳光最炽烈的一刻。45岁的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韩钢赶到北京西郊的老山山地车赛场，这天下午将是女子组决赛。

“奥运会在中国开，我才可能有机会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比赛，所以一定要来。”韩钢向别人说起自己前来观赛的心情，“下次（办奥运），以我这个年龄都未必赶得上。”

韩钢的兴奋在接近赛场的时候被阻止。一些志愿者出现在路口，他们通知观众：因为前一天连绵的雨水，场地泥泞，比赛推迟到23日上午进行。说改期就改期了？怎么没有必要的预案？怎么没有进行有效的通知？人们把怒气撒向年轻的志愿者，又很快觉得上午才接到通知的学生们也是那么无辜。

偶尔有个别工作人员出来，他们声言自己只是负责疏导的，不能做进一步的解释工作。他们甚至这样安慰失望的人们：“反正门票没作废，明天再来呗。而且，拿着门票，坐公交还是免费的。”

据说，当日上午的电视节目中，播出过一次比赛改期的通知，观众没有看到，好像怪不得别人了。

原定3点比赛，2点半的时候，八宝山地铁出口的告知者多起来，甚至一些粗通外语的老年人也被组织起来，他们举着两面分别是中英文的牌子，向行人展示，那些文字只负责解释，没有任何传达歉意的词句。

因为最近事务繁忙，韩钢是这天早晨才坐火车从包头赶来，而且买好了当晚返程的车票。几位台湾游客的情绪也很激动，他们将在23日飞回家乡，也肯定无缘比赛了。还有一些外国观众，在搞明白原委之后，耸耸肩，做个鬼脸，有的人表示要把票卖掉，因为明天还要看其他比赛呢。

韩钢说他不会卖掉那张门票，要留着做个纪念，纪念一次遗憾的奥运之旅。

8月21日的那场雨，为奥运会制造了一些麻烦。没想到的是，麻烦在22日延续，并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搞坏一些人的心情，比如韩钢。天意弄人，要怪就去怪那场该死的雨吧。

“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

因奥运会而赢得的广泛赞誉，也带来幸福的烦恼——西方世界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继日本2008年3月发放最后一笔对华贷款后，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愿意调整对华发展援助政策。9月底10月初，英国保守党和德国政府宣布，准备停止对华经济援助。欧盟也不断强调，在环保、外贸政策乃至人权等方面，对中国应该遵从发达国家的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大国感受到了中国迫近的脚步声，它们借助“大国责任”向中国施压，以便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这解读自有其道理，但也绝对不可否认，一个大国确实在

道义上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正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所言，“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

而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胡紫薇因感情纠葛而搅场 CCTV 发布会时引用的那句话：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

成为经济及影响力上的“大国”之后，充分获取了经济利益的中国确实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至少在环保上的责任，它无可推卸地要比以往担当更多。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呼吁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的声音越发高涨。

某些迹象表明，中国也确实愿意部分承担救世主的使命。胡锦涛在与布什的热线电话中就表示，与美国携手抵御金融危机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政府也曾对台湾、对港澳公开承诺，一定会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困境。

欧洲和美国都在盼着中国的大手笔，但那些熟知中国经济现状的人清楚，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中国有点有心无力。中投公司董事长兼 CEO 楼继伟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中国无法拯救世界，它如果能很好解决内需不足和生产衰退的问题，已经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了。

中国经济崛起后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学会了运用经济手段而非其他方式化解被动局势。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又有着财力最雄厚的国库，在应对国际危机方面，中国手里有一套特殊的扑克牌——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订单。中德关系紧张，就转身与法国谈合同；中法关系紧张，那么对不起，谈判暂停。中国人清楚，自己手里的蛋糕巨大，总会有外国大公司向政府施压。

这是新世界的游戏规则，经济实力比外交辞令更有效力，而奥运、人权及订单，其实都是政治家进行较量的游戏筹码。

张百发回忆说：“北京亚运会上，小平同志看到排球决赛现场有‘中国必胜’的横幅。他专门让人给我打电话，让把这个横幅摘下来，并且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总是中国必胜，不好’。”

邓小平总是以简单的语句陈述朴素的道理。他的意思很明白：大国要有大国的心态。然而 18 年过去了，中国的 GDP 又翻了两番还多，它却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整理一下风纪扣，在风力更猛的高处展示自己的大国风度。

举办奥运会，对于促成大国心态的尽快形成，无疑是一个难得契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奥运带给中国的最大影响，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将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始更好的良性互动。8 月初，即将以北京火炬手参加传递的他接受采访时，也着意谈到大国就要有大国的心态。“要放松，to enjoy!” 吴敬琏的这句话，说的未必只是自己对待传递的心态。

社会学家郑也夫说：“总不忘一段失意和受辱，是病态。这一次我们终于拿到第一，我预料，奥运对国人心理的最大影响，不是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民族心态在补偿后渐渐端正。我们能不能告别“愤青”，成为心态平和的成年人，这次奥运会是一种契机。”

邓小平曾言，要“对人民好一点”。以举办奥运为代表，中国为赢得世界瞩目而付出太多，现在该是转回身来的时候了。所谓大国责任，更应该体现在对本国国民的责任。

2008 年 9 月 7 日，69 岁的湖南农民付达信坐火车来到北京，一天以后，他持刀在北京站广场实施抢劫，随后他并没有逃跑，他等着警察赶来抓捕自己并最终如愿。在接受审讯和庭审的时候，付达信一再要求把自己的罪行搞得重一点，以便在监狱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个中国式的《警察与赞美诗》的故事，让舆论惊诧之余转而关注一个现实问题：几亿中国农民尚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障。

“波兰有 5% 的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农民养老保险，我国中央财政对此则没有一分钱。”¹¹

月 1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表示，即将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我国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意见，会安排部分中央财政用于农民养老保险。

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的全部社会保障支出中，占总人口 30% 的城镇居民消耗了 89%，而占 70% 的农民只能分配到 11%。

除了分配上缺乏基本的公平性，社会保障的整个蛋糕也小得可怜。2005 年，中国投入到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收入的 12%，而发达国家的数字一般在 30% 以上。

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都用四个字描述当下中国：国富民穷。

支撑这一论断的，是公开的几个方面的数据——

2005 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国民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不足 22%，而多数国家的分配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普遍都在 54%-65%，如日本 1999 年分配率为 54.18%，美国 2000 年分配率为 58.31%，德国 2000 年分配率为 53.84%，英国 2000 年分配率为 55.27%。

2005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透露，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 87.5%（留给社会的只有 12.5%）。同时，中国行政成本位居世界第一，从 1978 年至 2003 年的 25 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 87 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 4.71% 上升到 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 23% 的速度增长。

1978 年，中国的 GDP 为 3645.2 亿元，2007 年为 246619 亿元，剔除物价因素，GDP 大致增长了 15 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3.4 元增长为 13786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133.6 元增长为 4140 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了大约 9 倍和 7 倍。

据财政部介绍，2007 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 6000 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而美国同一年此三项上的开支占到联邦政府总开支的 61%。

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所罕见的，仅占 GDP 的 2-3%，低于联合国要求的 6%。中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 153 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 145 位。管理部门又将医疗、教育进行产业化，地方政府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操纵房地产。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高昂费用。

……

不仅如此，政府部门与民争利的事例时有发生，而弱势群体又缺乏良好的利益维护和诉求渠道，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就是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7月19日，云南发生孟连事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车损毁；11月，甘肃发生陇南事件，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历时四年专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全城罢工。四天之后，湖北省荆州市数百辆出租车集体停驶。11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和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各有上百名出租车司机停止营运。11月18日，部分“挂靠”在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客车司机集体罢运，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全州的县际客运秩序一度濒临瘫痪。20日，广东汕头1000多辆出租车罢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2008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规模及危害令人高度关注，而2009年也将是群体性事件多发之年。于建嵘把2008年的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为三类：云南孟连式的维权引发的冲突，贵州瓮安式的社会泄愤，以及湖南吉首式的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导致的骚乱。甘肃陇南。

秋季此起彼伏的出租车司机维权事件，事实上也应划入群体性事件的范畴。不过它与其他群体性事件有着明显区别，即呈现了一种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势。

一些中外学者担忧着中国接近0.45的基尼指数（它体现的是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它像报警灯一样刺目地闪烁。由于垄断行业和权利寻租空间的大量存在，中国社会无法避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

中共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让中国人民更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这一点上，中国显然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12月初，“鸟巢”运营商宣布，他们要向社会公开征集吉祥物，此前的消息，他们还计划拍卖“鸟巢”及场内诸多设施的冠名权，其中70000多普通席位已归属“中石化”，合同价值3000万。

十二月·纪念日

1980年，北京市民刘桂仙家的生活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五个孩子基本处于身体发育的旺盛时期，一家7口人依旧只能盖两床被子，吃饭则成了更大的难题。刘桂仙和丈夫感觉到了改革之风带来的轻微异动，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两人的厨艺开一家饭馆。那时候，北京的国营饭馆都寥若晨星，私营性质的则干脆一家都没有。与其说刘桂仙的勇气是春江水暖，毋宁说是生活所迫。

为了办执照，刘桂仙每天泡在工商部门的办公室里，面对一屋子人诧异与怀疑的目光；28年以后，她坐在自己的“悦宾饭店”里，每天面对一屋子满怀好奇的记者。她讲述艰辛

的创业：开张时只买得起一件作为次品处理的、少一层漆的“雪花”牌电冰箱，晚上一家人搭梯子爬到房顶的塑料棚过夜；现在她拥有四部汽车，给四个儿女都买了大房子。“悦宾”成为中国 30 年传奇故事的再合适不过的典型。

2008 年，中国以一年的时间纪念三十年的峥嵘岁月。到了 12 月份，宣传工具更是开足马力，带领国人进入时光隧道，看看 30 年的改革开放多么剧烈地影响了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媒体惯常的手段是对比，看，“戏匣子”变成了液晶电视，筒子楼变成了 CBD，肉票蛋票煤票变成了股票……

媒体拿出当年歌颂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巨大热情，颂扬邓小平带给中国真正的崛起。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改革，《时代》周刊的描述是：他使共产党中国“像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转弯”。即使在他离开 11 年后，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中国人仍生活在广义的邓小平时代。

河里的石头

2008 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党和政府用高规格的盛会纪念 30 年前这一天召开的 11 届三中全会。胡锦涛倡议向开国元勋致敬，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代领导集体致敬。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当然，掌声主要献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邓小平先后在 1978 年和 1992 年取得两场胜利，2008 年，他的接班人巩固了胜利成果。

中国的宣传语境下，改革开放的故事笼统地装进 30 年的包装袋里，事实上，假如要更客观、更清晰地评判中国的巨变进程，理应把这 30 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 1978 年到 1992 年（也有人认为是 1989 年），后一阶段则始于 1992 年。

11 届三中全会于 1978 年 12 月 22 日闭幕，后来有人注意到，“开放”一词在会议公报中甚至都没有出现过，“改革”也只提到一次。那次会议的真正主题，是给“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动者一个官方评价，然后把中国拉回到常识中运行，并务实地发展经济。

由于中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在农村被谨慎地推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增加粮食产量，是中国摆脱经济窘迫的必然选择。

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里的个体经济的萌芽，解放的是人的原始欲望。

邓小平说自己读书不多，他自己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他身后，改革标兵和万元户们摸着石头忐忑前行，总担心漩流泛起。1990 年代初，约一半的私营企业因担心政治气候突变而关门，刚成为“资本家”的希望集团老板刘永行和刘永好感觉“压力很大”，向县委领导表态，希望把企业送给国家；普通人对于先富起来的人态度暧昧，暗中的羡慕和表面的怀疑混杂在一起。

在意识形态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民众的忐忑不无道理，尽管他们还无法洞悉高层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怀疑和抵触。

1991 年和 1992 年的 1 月，年近九旬的邓小平先后跑到上海和深圳，看似到温暖的南方过春节，实则借助当地党委的喉舌《解放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发动了影响全国大局的理论攻势。

1978 年的 11 届三中全会并没有“统一思想”，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高层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未完全平息，而邓小平南巡之际，正是时代进退的节点。北京的喉舌已被一种声音主导，那就是“‘和平演变’不可不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谁都看得出来，所谓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矛头直指本该颐养天年的总设计师。

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退下来，连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也不再保留，但老人不会在这种危难时刻保持沉默，他故伎重演，像 1978 年的变革前夕一样，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向北京发出声音。

邓小平的南巡，后来被歌颂为“春天的故事”，不过从节气上而言，那恰是中国最冷的

冬天，对于中国 30 年的改革进程而言，也大致如此。

纪实作家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用了整整 70 页，描述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激战。

《邓小平文选》并未收录这样一段邓小平在上世纪 80 年代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这段谈话表明，风格务实的邓早就把意识形态问题丢在了一边，只是到了 1992 年，他才一锤定音，解开了改革开放道路上最沉重的思想羁绊。

铺天盖地的对改革开放 30 年的歌颂中，有一个事实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人们不再生活在无比压抑的政治空气中，至少在公共平台以外，人们可以百无禁忌地谈论政治。沈阳市区的八一公园很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城市里的中老年人（许多人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失业）骑着单车，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有的人大声地唱着二人转或京剧曲目，有的人则聚在一起大声谈论政治，他们针砭时弊，评价政府功过，臧否领袖人物，偶尔还夹杂着粗口。公园里也会出现一些恋爱中的年轻人，女孩在夏天穿上晚礼服一般的低胸吊带裙或露出完整大腿的超短裙，长久地地与男友拥抱热吻，并不躲避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

邓小平曾说，自己没什么理论，只是觉得要对人民好一点，事实也确实如此，1978 年以后的中国，人的自由度大大提升，人性被部分地释放。

改革开放 30 年的另一个易被忽略的伟大成就，就是中共历史上终于实现了权力的和平移交。

现在，胡锦涛延续着前辈开辟的道路，不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并不会在 2008 年结束，相反，河里的石头似乎比以往更多了，也更粗砺了。

当“疯跑”无法继续

纪念改革开放的大会上，胡锦涛的讲话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用一个简短的段落表达了“任重道远”的意思，让盛大的欢庆难得地具有了少许理性的色彩。不过，在贯穿 12 月份的颂歌大合唱中，给人的感觉依旧是只愿顾后，不愿瞻前，只说成就，不谈缺憾。

中共如此隆重地纪念改革开放 30 年，假如进行深层次的解读，无外乎传递两句潜台词：其一，向广大国民强调，我们的执政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其二，向保守派和怀疑论者强调，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没有回头路可走。

纪念的发起者自有他的考虑，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假如在锣鼓喧天的纪念之外，没有一个沉静思考的时间，终究是令人遗憾的。

舆论把这 30 年称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中国用 30 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历经 200 多年的工业革命，并非言过其实。不过，30 年的 GDP 疯跑，30 年的灵魂深处的天翻地覆，同样也在累积不安。

在当代中国，许多出生于 1960 年代以前的人视互联网为畏途，比他们再年长二十岁的人，对使用手机都有心理障碍。生活场景的变换之快，让这个习惯了几千年来缓慢节奏的国度眩晕。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Erik Izraelewicz）在他的《当中国改变世界》（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中表示担忧：过快的速度会导致裂变和严重的不平衡，这种疯狂的奔跑最终会撞到墙上，而且后果不是中国自己就可以承担的。

比速度之感更难应付的，是日渐凸显的体制之感。

2008 年，中国经济遭遇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疯跑”被迫减速，专家们则预言，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更寒冷的冬天。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间的深层矛盾，一个被预警多年的话题，以一种冷冰冰的方式摆在中国面前。

政治体制对市场经济的阻碍，连体制内的专家们也不再讳言。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

天勇就坦言：“经济有活力地进一步发展，阻碍来自于有关的政治体制。”在周天勇看来，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层次过多，部门过多，行政效率低下，寻租现象严重，都是目前政治体制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它导致投资和就业环境恶化，抑制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创业、创新和创造动力。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撰文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掌握了过大的资源支配权。

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什么前路崎岖？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观点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中国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的服务业“交易成本过高”。

严酷的现实面前，做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席卷过政府工作人员的下海潮，大学毕业生更是乐于去商海创世纪；到了21世纪初，最热门的考试变成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它持续升温，在2008年再次创下人数新高和录取比例的新低。年底进行的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首次突破100万，比上一年增加30%，平均录取比例为78比1。这不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就能简单解释的，民间的创业冲动正被扼杀。

一位中国记者向一位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征询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美国同行指一指自己的领带，正面是一排小雄，背面是几头牛。他以这个比喻说明，在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牛市或熊市，也可以自由地表达对驴（民主党）或象（共和党）的支持，他最后直白地总结道：“言论自由和政治多元化对我们来说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

一些自由市场理论的信奉者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块孤立的模具，它应该与自由精神、民主政治、法治环境相匹配。

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也认为，“在推动痛苦的改革的过程中，民主制度的效率可能比集中制度要低一些，但民主体制可以更好地保证改革的持久性。”

“春天的故事”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之路的全部命题。连看似盖棺定论的“姓社姓资”之争，也有了死灰复燃的苗头。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高尚全，2008年5月在官方期刊《改革内部参考》发表的文章称，越南的“思想障碍比我们少”，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上他们极少争论。同年6月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举了一个事例证明中共高层的思想禁锢：2007年，有170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其中许多是前中共高级官员），指责党领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邓小平生前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真正破冰，也最终成了这位风云人物辉煌一生的缺憾。没有人说得清，造成这种缺憾的因素是什么。他缺少的是时间，还是勇气？他等待的是机遇，还是阻力的消解？

假如一切顺遂，“总设计师”确有一份进程表。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邓曾经建议于2050年进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了”。

不过，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编写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也提供一份进程表，报告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至少需要60年，到2040年才能完全转型成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

谁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筹备并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关于“普世价值”的大争论在中共内部及公共平台上不断升温，它历时一年有余，但毕竟不是显性的争吵，不易为普通民众所察觉。

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温家宝提出：“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并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

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在谈到文化建设时，温家宝着重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2007年3月16日，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再次公开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这个鲜明的观点引起了思想界和理论界的注意，随后“百家争鸣”，出现了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

2008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刊登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署名文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文章中这样的表述引人关注：“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

领导人的表述，大多慎重而含蓄，而在舆论平台上，“普世价值”被明确放置，并成为争论的焦点。

四川汶川大地震救援进行的时候，新华网刊发署名言立仑的文章《中国在抗震救灾中诠释普世价值》（2008年05月30日）；

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评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中的一个段落这样写到——

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两篇文章真正引发了理论界和媒体的激烈争论。其中官方背景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网各执一端，显示出论战的不同寻常；

司马南连续发表回击文章。

200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发《北京日报》署名甄言的文章《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

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冯虞章的文章中称，没有超出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而现在还没有消灭阶级对立。普世价值、普世道德要成为可能，要到“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时代”。

9月17日，也就是冯虞章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发的一周以后，新华网发表了署名李民的文章《尊重普世价值，实现科学发展》，直接针对冯虞章的论点进行驳斥。文章认为，普世价值观并不玄奥，是很朴素的道理。“它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他的东西为本好，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自由比奴役好，法治比人治好，公正比歧视好，平等比特权好，尊重比歧视好，宽容比狭隘好，和谐比争斗好，理性比极端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

很快，理论界更有级别的人物出手了。

2008年7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就是不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价值观贬低为另类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存在和振兴的内在要求。”陈奎元的另一席话更让人感觉气氛紧张：“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

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

不久，曾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写下“三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对其观点提出质疑；

随后到来的是针对“普世价值”连珠炮般的回应——

2008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的文章《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

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天亮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一文；

2008年11月13日，社科院学报刊发了《“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危害》；

2008年11月16日，《求是》杂志刊登了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最新理论成果《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对“普世价值”进行了批判。熟悉当代中国政治气候的人不免猜测：这是普通的观点之争，还是背后另有深意？

由于邓小平在1992年的亲自出马，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烦恼不再困扰中国，但政治领域“姓社姓资”的纠缠依旧存在，10多年以后，这种纠缠以争论“普世价值”的方式凸显。

包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在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绝不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绝不照搬，这样的表态听起来更像是意气用事的“抵制”，并没有提供清晰的逻辑依据。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在提出未来两大目标之后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不折腾”，这种平白而尖利的表述，极少出现在中共的官方文字里，它如同一枚泡腾片投入水杯，立刻激起了舆论的沸沸扬扬，评论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不折腾”进行着五花八门的解读和意义延伸。

从胡锦涛讲话的语境上看，“折腾”应该是指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反复，甚或政治局势的动荡。

《南方周末》在评述邓小平历史作用的文章中指出：“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所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该报认为，改革以自身逻辑不断演化，形成了恢弘的自行衍生系统。

中国依然是一个多难之邦，但不可逆的趋势还是让人看得到更远处的希望。自行衍生系统的伟力，必将推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次第演进。也许你会觉得这推动有些缓慢，甚至，还要容忍出现反复，但重要的是，人们已不大可能掉转头，退回到30年前的那个中国。

尾声

wire 上的中国年

CCTV 新大楼的地面部分刚开始倾斜着生长的時候，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偶尔会接到市民的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那两幢楼给盖歪了。

北京绝对不缺少怪异而庞大的建筑，但 2008 年落成的 CCTV 新大楼却让之前的一切怪异都相形见绌。它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的笑柄，不过对于新大楼的拥有者而言，他们更愿意强调另一个事实：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 2007 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北京就占了三席，CCTV 新大楼位列其中。

膨胀，炫耀，不遗余力地吸引关注，它是 CCTV 新大楼的风格，其实也是当代中国的内心写照。几乎没有人怀疑，假如有一种方案是把大楼吊在空中，那么决策者会毫不犹豫地拍板。

CCTV 还没做到的事情，北京奥运做到了。

就像中国的功夫影片一样，2008 年，威亚（wire）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仅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上，高空特技就一再上演，演员们被吊在旋转的“地球”上，被吊在 30 吨的“记忆之塔”上。威亚上的演出，刺激，奇特，受人瞩目，但也惊心动魄。在 wire 上玩惊险，李宁用了 3 分 20 秒，点火瞬间还遇到小麻烦；残障运动员侯斌用了 5 分钟，疲劳到近乎绝望。

回望 2008 年年初，假如赵宝琴也能有一根威亚，生活该多么美好啊。需要交代一下，赵宝琴回到甘肃老家以后，始终筹措不到足够的钱完成剩下的手术，任由身体里一些碎裂的骨骼完成未必严丝合缝的再生。到了年底，这个坚强的女人已经可以扫院子了。

赵宝琴说不清该为命运欣慰还是哀伤。2008 年也让整个中国陷入复杂的情感体验——悲欣交集。

1949，1976，这些年份上，中国历史的改变是直观的、显性的。而 2008 年略有不同，虽发生那么多足够铭刻内心的大事件，历史面目并无显著改变。倘真有什么深刻变革，那也一定是悄然潜行、不易察觉的，比如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比如自信心与承受力。显性的与隐性的，你很难去比较，哪一种改变更为重要。

这一年，我们仰望星空，看到了“大国崛起”神话最耀眼的光环，略为晦气的是，经济衰退的阴影也同时浮现。一个符合光学原理的事实是，光环越眩目，与其比邻的阴影也就越突兀。

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自己必然要面对的麻烦，并不能嫁祸于大洋彼岸卷起的金融海啸。别忘了，股市、楼市泡沫的破碎，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的艰难，早就奥运会开始前就开始了。

奥运会对于 2008 年的中国有点“多余”，即使没有它，这一年也已足够刺激，足够典型，足够复杂。现在，宏大的奥运填充进来，这个箩筐里已经鼓胀得一塌糊涂。

2008 年，噩梦太多，闪亮的日子太少了一点，几乎只剩下那段大气晴朗、看得见火炬燃烧和火箭升空的夏天。李红的预言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奥运将成为镶嵌在中国人记忆里的明珠，越擦拭，越夺目。

奥运会也确实带给中国一些值得期许的新气象。四川大地震和问题奶粉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远较以往公开、透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9 月 29 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的奥运表彰大会的时候，击剑教练王海滨和其他人一样戴着大红花，他觉得很有趣：大红花，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让他惊讶的还有，要接受表彰的竟有那么多人，坐满了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已经足够恢弘，但是，在这个过于庞大的“中央之国”，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无缘戴上大红花。他们在这个特殊年份同样是付出甚多，所获甚少，但愿这只是特殊年份的特例。

平安夜的钟声如期敲响，这个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没有在中国遭到抵制，相反，它获得的待遇似乎比往年更高。挂满礼品盒的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形象不再只是商家招徕生意的法宝，连这个国家最新的标志——“鸟巢”也要对加入对耶稣的纪念。12月24日晚5点20分，北京市迄今为止最高的一棵圣诞树（38米）在“鸟巢”中央点亮，奥运福娃、圣诞老人站在了一起。

入夜，整个奥运中心区都恢复了奥运时期的照明，海蓝光泽的水立方，色彩绚烂的玲珑塔，射灯环绕的“鸟巢”，让游人恍如回归8月的梦幻时光。

值得注意的是，“鸟巢”的保安换上了“英式礼兵服”。

那些游人真是守规矩，没有人取下圣诞树上的礼品盒，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礼物。

人物列传

漫长的奥运备战周期里，他们看到儿子刘翔的方式与其他中国人没什么区别——通过无处不在的广告。

刘翔

国家的儿子

8月8日的“鸟巢”，开幕式盛大而炽烈，全世界震惊，全中国沉醉。

一个人们无暇理会的小遗憾是，刘翔没去现场，他仅仅是天坛公寓里的一名电视观众。从竞技的角度讲，刘翔无疑是鸟巢的男一号，他的缺席，让10天后的首演更加吊人胃口。

自8月8日起，中国人被强烈的幸福摇撼着，开幕式的澎湃还来不及回味，高潮迭起的

夺金快感就涌动而来。

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在开幕后第10天迎来又一高潮，中国代表团日进8金并一举超越上届金牌数，而菲尔普斯也完成独揽8金的神话，两项奥运史上了不起的记录被同一天改写，预示着这将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奥运会。

依旧是来不及回味。人们急切期待着翌日的又一个兴奋点——刘翔将在这天第一次参赛，时间是11点50分。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参观施工中的“鸟巢”时，曾对身边的刘淇说，能想象得到，如果刘翔在这里夺冠，现场气氛会有多热烈。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许多人在办公室里关注刘翔。上海民政局公务员刘占一，NBA中国的高级职员刘潇，百度公司开放办公区的白领们都在盯着电视屏幕。人们的心情轻松又庄重——比赛没有任何悬念，但这毕竟是刘翔在北京奥运的闪亮登场。

因为进不了奥运村，“翔之队”助理教练曹靖回到了上海，他知道刘翔的跟骨有点麻烦，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按15日他看到的情况，刘翔应该能够在前两枪咬咬牙顶下来。

刘学根和妻子8月8日坐火车赶到北京，现场观看了开幕式。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见到孩子了，但还是放弃去现场观战的想法，看看电视算了，毕竟这只是无关紧要的第一枪。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上海亲友团，要等到110米栏的决赛日去为刘翔助威。

CCTV一套的《全景奥运》和五套的《荣誉殿堂》，都是大型直播节目，他们的编导心思不在此刻的比赛，而是盘算着21日深夜，自己的节目如何在争夺刘翔的激战中胜出。

在互联网上，此前出售21日鸟巢门票的帖子，无一例外地标明“刘翔决赛门票”。在黑市上，它们被炒到票面价格的20倍以上。

几乎所有人都在想，这只是预赛，“随便混混”而已，是北京奥运两个高潮之间的惬意的间奏。孙海平却心事重重，那天随身携带了三份速效救心药。

田径比赛开赛后，CCTV专项记者冬日娜每天都要戴着耳机在鸟巢待命，她要关注所有比赛者，当然，要有超过一半的精力留给刘翔。

其他媒体也随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兴奋起来，美国《体育画报》派到北京10位摄影师，当日前往拍摄刘翔亮相的，就多达5位。

110米栏即将开始，冬日娜与后方做连线报道，现场山呼海啸，头顶的直升机盘旋轰鸣，她必须对着话筒大声喊，也需要编导在耳机里叫喊着把指令传给她。

耳机里怎么如此嘈杂啊？冬日娜仔细分辨了一下，终于搞明白，是直升机上的CCTV记者也在扯着嗓子与编导沟通，声音传到了她这里。紧张、忙乱、焦躁，一切都像电影里激战来临前的气氛渲染。

让我们跳过一些痛苦的神情和伤感的镜头，直抵那一幕：在第一个栏架前，刘翔撕掉道次布，揉成一团，转身离开赛场。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在《体育画报》前方和后方的采编中心，在上海民政局的内刊办公室，在NBA中国的写字间，在百度公司人头攒动的办公区，那一刻都陷入可怕的沉寂。人们依然以为，这个“国家的儿子”只是回去取一件遗忘的东西。

坐在鸟巢观看比赛的束一鸣描述说，广播宣布刘翔退赛，场内突然死一般静寂，之后就是一片哗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很多人当即哭起来，像是正遭遇巨大的哀伤。“好久一阵子，大家都这么站着，说不上来是在等什么。直到第六组都跑完了，还是有好些人这么站着。”

散场后，人们黑压压地聚集在鸟巢前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几乎每个人都在神情严肃地打电话，说着同一件事情：刘翔退赛了。这场景很像5月12日下午的北京，路边站满了打电话的人，都在谈论着那场剧烈的地震。

第一轮。退出。8月18日以前，没有人想过这个极端戏剧性的结局。

和刘翔师徒非常熟悉的《解放日报》记者张玮突然想起来，奥运前夕，孙海平一直在和他强调刘翔受伤的严重性，不过连张玮对此都有些将信将疑：“我多少觉得有点烟雾弹，这可能也是减压的一种手段。”

有些人试着做过一点心理准备：刘翔决赛中若输给罗伯斯，自己可以接受吗？赞助商们准备过卫冕成功或失败的不同的广告预案，却没有谁为退出做好准备。

身为非奥运赞助商，NIKE公司对签约运动员的奥运成绩尤为看重，而刘翔的成败无疑是他们最大的筹码。刘翔的退赛不仅让NIKE陷于被动，甚至被卷入“操纵刘翔退赛”的流言中。

超级偶像在瞬间崩塌了，而且许多人确信，背后存在着操纵。

刘翔并不是标准的80后时尚青年，他自己心中的偶像级影星，居然是周润发和林青霞，简直带有怀旧色彩。刘翔或许也有年轻的“偶像”——他的一位前队友说：“刘翔最喜欢的演员？那就是他自己喽。”

他的意思是，刘翔善于掩饰个人情感，还有几分自恋。

循着这样的判断，8月18日的退赛疑团也许更为浓重——刘翔的痛苦真的是表演的吗？或者，他有一点伤，但并不至于放弃比赛？

最耀眼的普通人

先让我们试图到未成名的刘翔那里寻找些头绪。

少年时代的刘翔，在教练和队友眼中属于“闷着皮”（上海话，换作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闷骚”）的男孩。惹点小麻烦，就露出怯懦的一面。

刘翔说自己从小就不爱讲话，还有点犟头犟脑，启蒙教练仲锁贵留意到他，是因为刘翔放学后自己在操场上漫无目的地傻跑，还跑得很带劲。小学三年级，刘翔早早开始了半专业训练，早期的项目是跳高。

在运动队里，大他两岁的冯霖毅把他当最好的兄弟，带着他一起淘气。

刘翔像个小马仔，很开心地跟在冯霖毅后面，冯霖毅欺负队友的时候，刘翔也顺便搞一下，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

不过，如果你以为刘翔仅仅是怯懦的马仔，那迟早要大跌眼镜的。

有一次，冯霖毅和刘翔又成为恶作剧的策划者，教练顾宝刚罚他们跑圈。刘翔的表现，不像是在接受惩罚，倒像是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决赛。他玩命一般地追着冯霖毅，煤渣铺就的跑道上扬起一路尘土。两个人几乎同时冲过终点，冯霖毅曾侧目瞥了小兄弟一下，刘翔的眼中迸发出平日看不到的亢奋，就如同被彻底激怒的公牛。

刘翔拼得太凶，以至到了终点竟收不住脚（也许是忘了？），一头撞向前方那堵砖墙，顿时鼻青脸肿，血流满面。

还有一次，冯霖毅和刘翔针对女生的恶作剧惹恼了柔道队的男生，他们伺机把刘翔单独围困在男厕所里，要狠狠报复一下。看到健硕的柔道男生，刘翔心里发毛，但他没有了退路，又绝不肯求饶。柔道男生训练有素，冲上来就要抱住刘翔的腿，刘翔抬起膝盖，猛地顶对方的鼻梁，随后扭打在一起。后来旁观的人告诉刘翔，那时他的表情极其可怕，两眼发红，像一头野兽，最后连柔道的人都怕了。

想象一下，当阿兰·约翰逊和罗伯斯挡在刘翔面前，但求一战，他们会不会像冯霖毅和柔道队男生一样，看到可怕的、充血的双眼？

在你的学生时代，班级里有没有这样的学生——

上课时要么捣乱，要么倒头昏睡；考试时抓耳挠腮，到处扒别人试卷；很直白地向异性同学表达好感，无所顾忌地嬉戏；运动会上鹤立鸡群，全班同学第一次为拥有这位同学感到

开心……你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却忘了这个同学的年龄，甚至没有真的把他当作班级的一员。

差不多，学生时代的刘翔，就是这样一个“随便混混”的体育特长生。读书是他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上海小有名气的宜川中学。

能有机会沾一沾重点中学的板凳——哪怕根本就没坐塌实过——对于刘翔已算幸运，很多专业体制下的运动员，甚至小学的学业都没有完成。

外号“奥特曼”。除了运动会，同学们只有在大扫除时才想起“奥特曼”——教室顶上的电风扇，始终安排这个瘦高个子的体育生。

冯霖毅天资聪慧，结束专业训练也比较早，他后来进入华东政法大学读书，还考到了律师证。少年时的体育生涯带给冯霖毅百般况味，他写了一本名叫《左右手》的纪实体小说，回忆自己与伙伴在体校的无知与张狂。冯霖毅说，他不认为那是一种对成长有益的环境，庆幸自己早早逃离，回到更正常的生活轨迹。

刘翔则沿着轨迹走下去，并到了这条轨迹可能抵达的最高点。

进入上海市级体校后，没有冯霖毅罩着，队里年纪最小的刘翔很快成为欺辱对象。他要给年纪大的队友捶腿，按摩，像佣人一样殷勤，但依然厄运难逃。有人偷偷把他的自行车轮胎戳破，有人在他的被子上浇水，大家“叠罗汉”时他总是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个，“最过分的一次，一个大我两岁的师兄，在一天早上，竟然把我的牙刷浸到小便池里！”

偶尔回到家庭，却并非刘翔的避风港，他从小面对的，是中国家庭中很典型的“严父慈母”模式，很容易让孩子无所适从。

在体校，教练对吉粉花很头疼，刘翔受点欺辱，她就跑到队里吵闹。倒是父亲刘学根更受教练们欢迎，他们的教育方式更接近。

刘翔回忆说，父亲的惩罚总是很严厉。“轻的请我‘吃毛栗子’（上海话，即用手指关节敲脑袋），严重一点的‘吃’耳光，级别再高，就是打屁股，打完之后罚跪。”体罚的轻重，与错误的轻重对等。

被控制，被塑造，然后被驱遣，以单调训练替代完整人生。在独特的举国体育体制下，刘翔的经历，其实与其他中国运动员没有本质不同，尽管他被打上最耀眼的光束。

超级身不由己

在上海普陀区 XX 名邸外的立交桥边，竖着一面很大的广告牌，上面有一张很灿烂的笑脸。出去买菜、烫头发、跳健美操时，55 岁的吉粉花时常会在那儿停留一会儿，出神地凝望，就像在端详自己久未谋面的儿子的照片。事实上，那确实是她的儿子，也确实久未谋面。

自从今年 5 月刘翔出国参赛，他就再也没回过上海的家。刘翔的伤病和巨大压力让刘学根夫妇揪心，但在有限的几次电话交流里，他们又不敢谈及这些。每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地说出，要尽量挑那些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

“他的私事我不好乱掺和。他现在国家的儿子，等过几年（国家把他）还给我再说吧。”接受采访的时候，吉粉花无奈地说，仿佛自己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母亲。

8 月 18 日上午 11 点 40 分，在电视机前，吉粉花痛哭失声，几近崩溃，当晚就被送回上海。遗憾的是，即使刘翔的北京奥运已经结束，吉粉花还是不能在这座城市见儿子一面。

曹靖在 8 月 18 日把自己灌醉了，然后大哭一场，他想到了过去的 4 年。“我一个边缘人，都感受到压力大得难以承受，可想而知，师傅和刘翔的处境。”他希望公众把刘翔和孙海平当作正常人看待，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不甘心，他们的博弈心态，他们的痛苦抉择，他们的哭泣，就都更容易理解了。

曹靖曾是孙海平的弟子，与刘翔也算师兄弟，他说刘翔最大的愿望，同时也最不切实际的愿望是——做回普通人。

刘翔很享受4年前的感觉。没有人把自己当回事，然后我突然冒出来，吓死你，这太刺激了，太符合刘翔的个性了。但是雅典之后，他成为“国家的儿子”，不再为自己活着，他把网名改为“超级身不由己”。

一切都在2004年的夏天突然改变。从雅典回到上海，熟悉的世界在刘翔眼里突然疯狂起来。

下了飞机，他无权回家，先要直接去出席政府的庆功会。

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刘翔透过车窗看到，马路边一家火锅店的店员，穿着制服，并排站在门口，拉起“某某火锅店，欢迎刘翔回家”的横幅，这让刘翔觉得哭笑不得。

在普陀区政府的欢迎仪式上，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响，即使它们稍稍平息，人们发现还是没法用接打手机——由于现场人太多，且密度极高，信号塞车了。

那时刘翔还住在一个小市民聚居的普通住宅区，但在9月3日，这里汇聚了几百名激动的围观者以及十几名警察，那景象，就好象上帝马上就要现身凡尘。在46号门楼下，警察实行管制，只出不进；每个楼层也布置三个警察。四楼的张伯伯，硬生生被拦在门外。他发急了：我住在楼上的，回家都不行？

警察也急了：这么多人都说是住在这里，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吗？

刘翔自己想回家都快成了奢望。激动的人群蜂拥如潮，刘翔觉得自己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他竟是被几个警察架着上楼的。即使这么混乱，刘翔还得提醒自己，要彬彬有礼。是啊，上帝怎么可以不耐烦？

刘翔确实像一个个好“演员”，他这样描述突然成名后的状况——无论对着谁，都要微笑、微笑、再微笑。稍显倦意，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不够礼貌。笑到后来，我的嘴角都快要抽筋了。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已经很程式化、很僵硬。

他成了中国出现在广告画面最多的运动员。到了2008年，刘翔广告代言的单价已达到1500万元，是5年前的40倍。他成为国内最值钱的运动明星，物质生活得以获得巨大改变的，何止是他和师傅孙海平？

当一个人失去自由的时候，他甚至想拿名与利去换回，这绝对算不上矫情。2004年9月之后的刘翔，正是这样。他曾在父亲面前泪流满面，说自己承受不起可怕的名人生活。

可是最终，他只能去承受。按刘翔自己的说法：“我宁愿自己受点累，也不愿意把时光的大钟一下子拨回到过去。我对父母说过，这条路，我是肯定要走下去了。”

他孝敬着父母，也把同样的“孝敬”给予了师父孙海平。

只有极少数的时候，他会小小地反抗一下。

有一次，刘学根的领导女儿办婚事，为了给领导撑面子，刘学根早早承诺下来，让刘翔出席婚礼。婚期临近，刘翔却死活不去，无奈之下，刘学根带上一幅印有儿子肖像的展板，摆放在婚礼现场。

父母把一切托付给了师父，孙海平则一直希望为弟子包办10个栏杆外的一切，他打理刘翔的财务，规定刘翔何时才允许恋爱，规划刘翔未来的职业。他屏蔽一切打扰，想让刘翔在真空中备战，不过，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闭塞本身就足以令人恐慌。

即使活在真空中，外界的巨大压力通过“翔之队”成员紧绷的神情，还是可以传导至刘翔内心。刘翔曾在赛前几天表示：“现在尽管我们是封闭训练，但外界的压力究竟有多大，我自己也感受得出来。”

真空包装的刘翔一直没机会成熟，2008年，父母和师父已无力阻挡厄运，刘翔真正迎来人生挑战。遗憾的是，与冯霖毅等朋友渐渐疏远后，刘翔已没什么朋友可以倾述烦恼。

孙海平说，他曾盼望北京奥运会在2007年举行，那时刘翔状态正好；他也盼望一觉醒来，2008年就已经过去了，因为感觉这一年“像在走钢丝”。

没想到竟是最坏的结果，钢丝断了，遭遇不幸的刘翔师徒又被千夫所指。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比赛，公众的这种猜测深深伤害了孙海平。刘翔的比赛，近乎国家使命，怎么会是一支“翔之队”能随便操纵的？

假如没有人抢跑

风起于青萍之末，让刘翔最终梦断北京的，或许只是几年前训练中磨起的一个水泡。它太容易被忽视了，于是果然被大大咧咧的刘翔忽视了。一个差不多直径 1 厘米的结痂，引发右脚跟骨骨膜的炎症，并在最最不恰当的时刻爆发，毁掉了庞大国土上 13 亿人的梦想。

刘翔是北京奥运惟一不允许缺席的那个人，没有谁敢承担责任，让他停下来根治一下。在“翔之队”的医务辞典里，有且只有一种方案，那就是“保守治疗”。

保守的结果本来看上去挺美，刘翔的伤情稳定，还在 8 月初跑到了 13 秒以内。事件的最大转折点，被认为出现在 8 月 16 日，在刘翔的最后一次赛前训练中，孙海平用了最大强度的力量，刘翔右脚上的“1 厘米”引信突然点燃。

人们忽视了这次偶然事故的必然一面——如果不使用最大强度的刺激，刘翔难以达到最佳状态，难以抗衡神勇的罗伯斯和奥利弗，谁都知道，对刘翔而言亚军都意味着失败。最大强度的那次训练，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不得不做出的赌博，投下去还有微小的成功概率。

伤病本身已经够让人头疼了，要命的是，在特殊的国情和体育体制下，一次比赛的意义被无限拔高。据《China Daily》等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官员曾对孙海平说，如果刘翔在北京得不到金牌，他此前的成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超级身不由己，一切都可以拿身不由己来解释了。

作为刘翔的期待者和拥戴者，他们也是如此——身不由己地被这个巨大的故事席卷着，直到身不由己地被电梯送上高空再疾速坠落，这么刺激的体验，堪比蹦极。

刘翔的教练和队友都认为，如果那一枪没有人抢跑，刘翔很可能就咬牙顶下来了。而顶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潜在危险是，跟腱断裂。现在看来，倒是该感谢那个抢跑的人，让刘翔终于没有顶下去，赌博适可而止地结束。

刘翔也要感谢自己。感谢他那上海式的“精明”。

典型的上海人；很精明，因此也很自我。这是一些熟悉刘翔的人的评价。刘翔从雅典奥运回来之后，冯霖毅去找他，想写一本关于刘翔的传记，刘翔的态度是：每个人成功都是自己奋斗的；体校的队友们为老教练祝寿，邀请刘翔出席，他委婉拒绝；一位启蒙教练甚至抱怨说，刘翔成名后，没有给母校任何回报。

在教练和队友眼中，刘翔的精明，也体现在极强的自控力。他清楚自己最想要什么，并可以为此放弃或忍耐。到上海市体校训练后，因为担心受伤影响跨栏，他丢下踢了很多年的足球；前队友曹靖回忆说，那时候，刘翔也曾跟大家偷偷出去打电子游戏，“但非常非常少”；刘翔生活规律，按时作息，自律得像一个职业运动员；雅典奥运以后，媒体传闻美国方面邀请刘翔前往训练，刘翔也确实很想尝试新生活，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孙海平身边；而从鸟巢的赛道离开，与当初的留下一样，都体现了这个年轻人理性、冷静的一面。

作为朋友，冬日娜非常支持刘翔的退赛抉择：“那并不是什么难以治愈的伤，没必要为此搭上自己的运动生命。”

某保险公司给刘翔的双腿估价 1350 万美元，或许也包括他的双脚吧。包括了又能怎样呢？还是不值得为一块金牌去玩命。这种境况，很有必要“自我”一下。刘翔已经失去了自由，没有资本再输掉同样宝贵的健康。

北京时间 12 月 6 日凌晨，在美国休斯敦，刘翔的脚跟切开一个 2 厘米的创口，北京奥运会的最大麻烦，终于被干掉了。克兰顿取出三粒钙化物和一块骨刺，也还了刘翔一个清白

——8月18日的痛苦并非表演。

这就是刘翔的2008年，故事里充满伤感和挫败，但找不到怯懦与欺瞒。

中国还需要代言吗

7月25日，刘翔登上了著名的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8月4日，美国另一本主流杂志《新闻周刊》也把刘翔请上封面。美国资深体育记者理查德说，美国人也非常关注刘翔，因为“奥运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承担过13亿人的梦想”，他们很想知道，他能在这13亿人圆梦吗？

13亿人的梦，哪怕每人只放一羽鸿毛在上面，也是不得了的重量，何况它不是鸿毛，是殷殷厚望；又何况，这是北京的奥运会。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竞技意义的北京奥运会历时大约13秒，将于2008年8月21日开始，也将于8月21日结束。

现在，这个日子提前了三天，改为8月18日。

若干年后，回顾北京奥运，什么是我们最难磨灭的记忆？

中国代表团夺金势头凶猛，所谓的中美争霸也早早失去悬念，激动人心啊，奥运史又被改写了。然而，日日凯歌高奏的北京奥运，长久持续的幸福，未必抵得过8月18日11点40分的片刻震荡。

有人说，刘翔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人意料的，只不过，这一次是向着人们不愿看到的方向。

刘翔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当下中国，一个需要代言人的中国。国家需要，商家需要，民族情感似乎也需要。在天安门前，当国家元首把火炬交到这个年轻人手里，那一刻对北京奥运充满象征意义。

刘翔成名后，吉粉花曾祈求媒体：“如果有一天刘翔不再优秀，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他。”现在，刘翔还没到不再优秀的那一天，一些人已经不打算原谅他了。

各种舆论平台上，许多人表达着对刘翔的理解与同情，几乎同样多的声音则认为，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愚弄。

表面上看，人们的愤怒来自一个言之凿凿的推测——刘翔为了商业利益而诈商，欺骗了全体中国人。而一个没有说出的隐含的愤恨是，刘翔的伤退搞坏了中国人在本届奥运会的大好心情。

中国人不该过分愤怒或沮丧，他们真需要有这么一个错愕的机会，以便从“有我中国强”的广告宣传语中醒来。

比起成功卫冕，8月18日的巨大挫折感，无疑更适合代表当下中国。国家的进步与国民心智的成熟，从来不是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完成的。

许多人不愿意去想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当刘翔是一个英雄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代表了我們；那么当他遭遇人生悲剧的时候，难道这悲剧就只代表他自己么？

如果悲剧不是带来切肤之痛，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么激动。

北京奥运会的进程表明，这个国家不仅需要金牌榜证明强大，它还需要一个具体的人，代言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把若干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那么把13亿人的希冀放在一个人身上，自然也是靠不住的。

法国《队报》田径记者米歇尔·卡罗说：“中国这么大，不需要仅仅一个形象让世界睁大眼睛。”他说在北京奥运会上，法国人对游泳名将马诺度寄予厚望，期待这位雅典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再夺三金，但是她什么都没拿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曾经为了爱情不惜远走意大利，也因此付出了代价。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引以为骄傲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是，

作为运动员，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开心的人。”

一个无法让母亲体会到自己是母亲的故事，无论被描绘得多么壮丽，都不值得传诵，也容易幻灭。

金晶

看，一个优秀公民

4月7日，金晶没有化妆，坐在车里安静地等待火炬的到来。事后回想起来，她很欣慰于自己的冷静，没有像某些火炬手那样，举火炬的时候激动到“大脑短路”。

中午12点30分，坐在轮椅上的金晶并未按时接到火炬，那是塞纳河边的一条街道，据说火炬要穿过戴安娜王妃出事的隧道。

周围一群人挥着“藏独”的旗帜振臂呐喊。在金晶的记忆里，偶尔有人冲进警戒线以内，“坐在我面前耍赖，让我挥旗，或者干脆就躺地上，什么招都有”。警察穷于应付。

几个披着雪山狮子旗的男人先后三次试图抢走金晶手里未及点燃的火炬，第二次抢得最凶，金晶记得头发好象被扯了一下，她还曾抬脚踢了一个戴着头巾的藏人，最后她弯下腰，紧紧抱住火炬……

金晶用力撕扯了几下，保住了火炬。戏剧性的结局是，那几秒钟的争夺，为金晶此后的生活上足了发条，直到现在，她每天忙个不停，也大多与那几秒钟有关。

“天使”与“汉奸”

金晶的电话在4月8日这一天几乎就没断过，全是记者的采访，全是差不多的问题。

一夜之间，关于“天使”的报道占据了电视、报纸、网络的重要位置，“残疾女火炬手勇护火炬”，“那一刻，我只想保护好火炬”，“想拿火炬，除非从我尸体爬过去”等词句应和着民众激越的情感。网络评论更是不吝溢美之辞——“金晶人美心更美，我们都支持你，祖国万岁”，“天使用残缺的翅膀捍卫文明的火焰，金晶用肩膀支撑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

一位佛山的网民留言说：她表现了我们中国人那种热爱祖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圣火，哪怕自己身有残疾。母爱是伟大的，她的精神超越母爱，超越凡人，我们永远记住她，中华儿女——金晶。

金晶瞬间被当做民族英雄，出去参加活动，别人介绍金晶通常是“最美的火炬手”。父亲不免反复提醒她，要谦虚，不要飘飘然。“我有什么好飘飘然的？”金晶反问父亲，“刚好在那个时段捧火炬的人是我，如果不是我，是别人，一样会那么做的。”

金晶后来请一个中专时的同学代行经纪人之职，还不忘叮嘱同学，别端架子，要善待与其联络的每个人。她的头脑里有一种意识——出名是偶然的，而且喧闹也很快就会过去，自己不该因这个意外而改变。

面对记者，金晶很坦率地透露，她有很多27岁女孩都有的困惑，“我要找份工作，我还没有男朋友。”她频频在媒体出现，依旧口无遮拦，谈及那个抢火炬的人，金晶说，他真是找错对象了，假如不是考虑影响不好，自己真想“揍扁”他。

“揍扁”在金晶这里更像是表达情绪的语气词，而非真实的暴力倾向。她说考虑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不妨“像唐僧一样”教育那个“可怜”的、戴头巾的藏人。

4月21日，法国参议院议长蓬斯莱前往上海看望金晶，并转交了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慰问信。白发苍苍的蓬斯莱几次谦恭地弯下腰，拥抱坐在轮椅上的金晶，并伸手为她整理怀中的花束，以免拍照时她的脸被遮挡。金晶说她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但法方的表态只有“遗憾”没有“道歉”，这也让她感到遗憾。

火炬传递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蔓延，网络上未经证实的传言指称法国国家乐福公司资助了反华组织“记者无疆界”，国内很快掀起抵制家乐福乃至抵制法货的浪潮。金晶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还有很多中国员工，不要给他们带来伤害。”这样的表态竟遭致谩骂。亲友对她说，政府还没表态呢，你别乱讲。还劝她那段时间别出门。金晶没觉得自己的表态有什么问题，她也不会因一些是是非非而对法国及法国人心生愤恨。

“汉奸”、“腿残脑也残”。收到一封来自宁波的匿名信，是金晶与法国议长会见的照片，打了一个叉，写着什么“现代汪精卫”，要求她向全国人民道歉。

一位厦门的网民留言说：没文化没头脑也来做火炬手。强烈要求大家把他的火炬抢下来！

一位湖北安陆的网民说：金奸，可怜，癌细胞转移到脑袋了！

一位苏州的网民说：看来不光腿残，脑也残了。

一位济南的网民说：金晶是个屁啊！帮家乐福说话。我看他是一个汉奸。

一位广州的网民说：金晶算个什么东西？给你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了。

即使这个时候，金晶还会上网去看评论，不担心会受到伤害，她清楚自己“既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也没那么差”。金晶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多数人只是一味谩骂而不讲道理？与刘翔见面的时候，她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两个上海年轻人都是一夜成名，都经历过挫折——如果“家乐福风波”算是挫折的话。

金晶经常要面对激动的民众，他们呼喊她的名字，希望合影，索取签名。在她就抵制说了几句话之前，那么多人要把她托举到圣坛上去，之后，那么多人要把她打到地狱里。没有人说得清，这是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群。

百毒不侵

生活中的金晶习惯于拄拐杖，走路的速度比旁边双腿健全的人们还快，曾有几次，金晶梦见了自己失去的右腿，醒来时并不会深陷感伤。

金晶1981年出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父亲是上海来的知青，母亲是当地人。成长的岁月在上海与安徽间、奶奶与父母间反复转换，她都很自如地适应着，即使一个恶性肿瘤的梦魇出现，也没改变她大大咧咧的性情。

一天，9岁的金晶坐在地上玩变形金刚，父亲走过来告诉她，为了保住她的命，右腿只能截肢。

“我稍微哭了一会，两个表弟来找我，就和他们玩去了。”她这样描述当时的反应。

金晶不觉得截肢之痛让自己产生挫折感，也没有什么自强不息的品质在闪耀光芒。“我的病发现得早，一切都顺利。很快又上学，也没有受人嘲笑歧视，想做的事都能做到。”

她从小特别爱打架，爱打抱不平，那么失去右腿之后呢？“还继续打呀。”

作化疗那一年，父亲动辄就带着女儿去看电影，金晶最喜欢的是《佐罗》，一个蒙面剑客，与邪恶作斗争，胜利后潇洒地用剑划出一个“Z”字，这一切真让人着迷。顺便被她爱上的，是浪漫国度法兰西和击剑这项优雅运动。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金晶进入上海轮椅击剑队。训练之余，她会与队友们打闹，打赢了就逼迫对方叫她“妈妈”。

金晶喜欢抱打不平。在公交车上遇到小偷，就对其怒目而视，还举起手机拍下对方的容貌。

她去南京参加一次比赛，有好几剑她都觉得裁判判错了，忍不住回过头问裁判：“刚才是不是判错了？”

结果裁判火了：“你这运动员怎么这样……”

金晶也火了，把剑往地上一扔，“我不打了，你们想赢就赢去。”

她渐渐发现运动队不美好的一面。南方某省队的女队员吃药，胡子都隐约可见，她觉得

挺难接受的。在上海队训练倒不需要吃药，不过成绩不好时教练会凶巴巴地说“养狗是要出去咬人的”。金晶渐渐对竞技体育失去兴趣，她从主力变成陪练，很快就选择了退役，留下的成绩单是亚运会银牌，世界杯第三。没什么遗憾，她觉得自己“本来也不是很努力”。

金晶去清华大学参加完一个活动，主持人对她说：“本来想煽情一把，结果被你弄得全场笑声从头到尾。”

知名的访谈记者王菲与金晶对话后的感受是，这姑娘竟能如此平静地对待自己的各种遭遇，她已经“百毒不侵”了。

不想要的名人生活

一夜成名之后，金晶只与联想公司签约，担任其公益大使。有过一些商家希望金晶代言产品，她觉得产品和自己在外界的形象不太符合，就拒绝了。一个被拒的商家居然施压说，你不答应，等我找到你的上级（压下来），最后还不是要答应。金晶回敬道，那你有本事去找好了。

本来我挺讨厌出名的，像我这个人，很喜欢自由自在。我对生活质量又不是要求非常高，我这人是能活着就挺好。有吃有喝有穿然后还能上上网，哎呀这生活就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经过这一次我发现，可能这段时间的出名还是有一点好处。

那天我在家里面，我妈就跟我说，你还是不要参加活动了，包括公益活动你也不要参加了。妈妈觉得我太累。我跟我妈说，趁我现在还有点能力、有点能量（帮别人），等这段时间过了，所有人把我遗忘的时候，我想帮也没得帮了，不如趁现在多帮点。

回去我可以继续想上班上班，想玩游戏玩游戏，想逛街逛街，哎呀，太舒服了。

金晶曾担任宾馆接线员，工作的单调孤寂与其性格反差太大，公司对她的表现也不甚满意。2007年，她参加联想公司赞助的奥运火炬手选拔，顺利当选。在此期间，她与宾馆的合同到期后失去了那份工作。

曾失去肢体，曾失去工作，生活多有磨难，似乎让她早早就清楚什么才是人生值得珍惜的。“现在这样，算什么生活啊？每天那么多无聊的应酬。”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安排的活动，大多临时通知，又不容商量，必须参加。

2008年年底，政府帮金晶安排了普陀区市政管理署的一个工作岗位，她希望生活逐渐回归常态。不过，各级残联、青联、妇联、体育局仍需要金晶出席各种活动，一些“年度人物”的颁奖礼等着她参加。

金晶头衔无数，媒体不吝把她描绘成“天使”。“天使”太飘渺，金晶只愿活在凡尘。她欣赏自己的美丽，常把半身艺术照贴在博客上；她的电脑硬盘里，存放着《蜡笔小新》等动画片；她喜欢唱李玟、王菲的歌，经常约好朋友一起去卡拉OK，她热衷于跟女伴儿逛街，买了可心的裤子就亲手把右腿改成适合的长度；她偏爱那种黑白相间的哈士奇狗，因为它“外在强健而内里温顺”。

金晶对于2008年的中国的意义，不在于具化了“天使”形象，而在于提供了一个优秀公民的范本，其理性、正直、达观、坦诚的品质在这个时代尤为珍贵。

我在报警点呆过5天，在拆迁办的水泥地上睡了四个月，在999急救中心呆过三个月，在拘留所40天，在大兴劳教所先是关了一年，第二次还不知要几个月。我们家还在盛地龙旅馆呆了差不多一年，在北沙滩鑫奥宾馆呆了一年出头，都是警察给安排的吧。

景雪自述

我的家没了

我以前是朝阳区洼里乡羊坊村的村民，2003年，我家的200多平米的房子被拆了，我成了流民。

1982年，经人撮合，我从河北保定嫁到洼里，他（指景雪的丈夫玉奎）刚从部队退伍下来，又成了农民。

嫁到他们家时，我才22岁，从娘家带了300斤米。那时村里人还要务农，我过日子仔细，又拼命挣钱，这些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在地里干活时我都曾经累昏过去。我的想法就是积攒一大笔钱，将来开个小煤场生产蜂窝煤。

后来城市发展了，村里的许多房子都租给了外地人，土地也都统一包出去了。大多数村民过的挺自在。你别看马德云（也是原羊坊村村民）现在和我们一样成了上访户，那时可会享受了。他家祖屋多，出租了好几间，每个月两三千块的租金收入，你看他，身上还有公子哥的影子呢。

我们家不一样，挣钱了，全都投入到盖房、装修上，1990年上边批了几间门市房，我也不租出去，自己干。开了一间57平米的小吃店，叫洼里羊坊小吃店，八九张桌子呢，还有一间开了副食店。2002年拆迁以前，我们家每年收入不少于10万，可这些年没什么积蓄，血汗钱都搭在房子上。到了2003年，一下全没了。

我们村的位置，紧挨着北五环，现在全是高楼了，听说只有元朝建的弥陀古寺还保留着。奥运会的时候，这里是媒体村，奥运结束，就作为商品房卖掉。

十多年前我就感觉到了，洼里这块地慢慢值钱了，就算不办奥运会，也迟早要被卖出去。

1998年，村里把各家的户口本都收上去了，说是要更新什么的，后来户口本再发下来，大家发现怎么都改成“非农”了？别以为“农转非”是什么好事，我们不是农民了，转成居民了，村里的土地也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哪怕土地的事情我们不追究，自己家的房子总不能忍让吧。

不久，大规模的奥运拆迁开始了。洼里乡村民要离开土地和祖屋，也要换一种方式活着了。

按规定，如果不去北辰公司上班，就一次性给付5万元就业安置费。许多人认命了，成了职工，也住进了安置的楼房。我不干，要求原地安置，而且面积上不能克扣。拆迁办确定的面积差太多了，马德云家有354平米，只给算257平米，他们家的宅基地是几代人传下来的，没有国民党的时候就有了。现在的政府也承认啊，房产证上还有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彭真的大印呢。我家有332平米，只给算169平米，补偿款才60.14万元，两处门市房分别是57平米和29平米，一厘米都没给算。

不仅面积上我们接受不了，补偿价格也特别低，平均下来，每平米才三千多块钱，当时这种地段的拆迁补偿应该五六千了。

我们不同意搬迁，就给我们断水断电，夜里还有人砸我们玻璃。

强拆的前一天，我去邻居家，他们说你请佛祖保佑吧，我就花1块钱买了一小把香，回去又花10块钱买了苹果、香蕉、葡萄。在每个窗户和门口都插一根香，并告诫小猫小狗小虫子，躲远点儿。这个算不上信仰，只是求佛祖保佑我们家平安。

强拆那天，雨大得像是随时会把天冲刷下来。几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连拉带拽，把我们一家三口拉上了警车，家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出来，全给埋了。我被他们拖着走，浑

身都是泥，把面包车的蓝色座套都弄脏了，拉我们的几个人抱怨说，妈的，给这点儿钱还不够洗车呢。

我记得面包车外面好象是亚运村交警队的字样。

拆房子的时候，他们没提供拆迁许可证，也没和我们签拆迁协议，直接就上推土机。我听说，按法律规定政府不能参与拆迁，那天法制办、公安局的人不是都参与了吗？

在抗争的过程中，我被打昏了，送到 999 急救中心，几个小时后才醒过来。家都没了，我们干脆就呆在急救中心里。

期间，我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被抓了进去，说是根据治安处罚条例多少条多少款，判我劳教一年。

当时我不明白自己是什么罪名，后来一查法律条文，居然是流氓罪。

在劳教所里，每个人都要定期写思想汇报，承认错误，表示接受改造。凡是“认罪”的，每个月发补助，多的七八十块，少的四五十块。我坚决不写，每次让我站在前面念思想汇报，我就把自己受的冤屈说一遍。我不接受改造，就没有补助，每个月只有 10 块的卫生纸钱。

后来所里的管教也有点同情我了，劝我在里面别闹，他们也不为难我，只要知道不是他们把我抓进来的就行。

出来以后，我继续上访，都这么惨了，被收进去也没啥可怕的。除非节假日，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出去上访，明知道没什么希望，还是要去。去国务院（信访办）的时候，有警车接送。去其他地方上访就坐公交车，我们这样的人一般都不买票，就说是上访的。奥运会快开始的时候，一些售票员的脸色不对劲了，说上边有规定，上访户照样得买票。

我们到处申冤，到处递材料，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像马德云说的，“强盗来抢，我可以和他干。可现在，我和谁干去？”

因为我们家是上访户，上边不给我们办社保。有一段时间，我每天 8 点以前出门，走 10 多里路，午饭的时候到乡政府，去“要饭”。最后他们没办法，答应给我一个月 400 块的生活费。

强拆之后我开始求佛，把佛珠什么的挂在床头。我还在一个本子上描字，有点像学生练书法的描红本，上面写的都是佛祖的话，我描字是为了心能静下来。我们家孩子他爸说我，写什么呀，心不静能写好吗？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一根筋，就不能放弃吗？我说我半辈子的血汗都没了，怎么会放弃？还有人劝我忍了吧，钱财没了，可以再去挣。我和他们说，没法忍，我再去挣，挣完了不还得被抢吗？

我前后被拘留四次，劳动教养两次。后来的这次劳教，一开始说是所外执行，也没说什么原因。到了 2008 年 7 月底，又把我收进去了。我一点儿都不意外。

在奥运村辖区里，一直还有两户没拆，因为一直有外国的记者盯着这事儿。

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做社会调查，知道了我们家的遭遇，就想帮着申冤。为了避免麻烦，他只能在回四川老家的时候，跑到网吧里发送邮件，向媒体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你说说，（他们这么强行拆迁）党中央不知道吗？

我在报警点呆过 5 天，在拆迁办的水泥地上睡了四个月，在 999 急救中心呆过三个月，在拘留所 40 天，在大兴劳教所先是关了一年，第二次还不知要几个月。我们家还在盛地龙旅馆呆了差不多一年，在北沙滩鑫奥宾馆呆了一年出头，都是警察给安排的吧。奥运结束后，孩子和他爸没有免费的地方住了，在外面租房子。

我和孩子他爸买不起菜和水果，每天就剥生洋葱吃，我还吃芦荟，这个对身体好。你

看我气色还不错吧，我还要继续和他们干呢，不会垮的。

吉米 (Jaime A. FlorCruz)

CNN 里的“观象斋”

2008 年 5 月 7 日晚上，雅宝路一家叫泰辣椒的泰国餐馆里，一群中外记者在聊天。中国知名媒体人程益中落座以后，见到老朋友吉米，他重新站起来，上身微微前倾：“吉米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抱歉。”

有人在旁边打趣：“他（程益中）代表中国人民向你道歉。”

吉米也大笑起来：“我接受，我接受！”

那时候，吉米所在的 CNN 正处于中国民众的愤怒声讨之中，舆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这家“反华媒体”向中国人民道歉。

一个“中国通”的审慎态度

吉米对中国社会的熟悉程度超过许多中国公民，他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在 30 年以上。

1971 年，20 岁的吉米作为菲律宾的“进步青年”和学生领袖到访红色中国，不料恰在此时，菲律宾横生政治风波，吉米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躲避政治迫害，他被迫滞留中国，那时“文革”依旧风起云涌，他得以在另一国度见证动荡的社会生活。

他在湖南衡阳做过“洋知青”，插队体验农村生活；不久去了山东烟台的渔业公司，参与下海捕捞；“文革”结束那年，他在北京大学完成了中国史的本科学业；中国兴起电视教英语的热潮时，他与彭文澜女士一起在中央电视台周末节目《星期英语》中教观众唱英文歌曲。

因为意外得到机会为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审判“四人帮”，他得以展现自己新闻方面的才华，不久成为《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并一直做到北京站负责人，2001 年起，吉米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担任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正是那一年，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

作为两次担任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的资深媒体人，吉米被同行视为地道的“中国通”，“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多次获得被点名的待遇——这对于外国记者而言无异于中了头彩。

“中国通”吉米多数时候与中国官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2008 年“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主持的新闻官明知道吉米会问及台湾和西藏问题，还是分配给他一个提问机会。

“3·14”事件最初被西方媒体抓住不放的时候，政府部门的官员曾私下找到吉米，他们说自己很“郁闷”，希望从这位资深记者那里得到建议。吉米已可以熟练驾驭中共的语言来说理，他的建议是记住毛泽东的话：要建立统一战线，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

不久，烈火烧向了 CNN，而且不仅来自民间。CNN 网站对一幅新闻照片的主观裁切竟让中国怒不可遏，有人在网上暗示，要对 CNN 使用暴力。以吉米对中国人的了解，估计人们只是口头发泄一下愤怒，不至于真的有什么极端举动。但是，出于慎重考虑，CNN 北京站并不宽敞的办公区间，还是雇了 6 名保卫人员。

是的，吉米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判断，因为它偶尔会被不可捉摸地推翻。他曾经为中国因发展经济而带来的进步感到欣慰，他热切地关注着北京奥运的进展，觉得这是一个中国被世界接纳、并进一步开放的绝佳机会。吉米说，相信中国人的自信会随之大大增强，就如同打了一支强心针。现在，这位新闻人虽然也为 CNN 同事的不职业行为懊恼，但他还是觉得，中国人的激动“与大国地位不成比例”。

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前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陷入僵局，吉米略显忧虑地说，自己之前对中国开放程度的判断，或许过于乐观了。就像他经常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古玩，虽然具备相当的鉴别能力，偶尔还是会看走眼。

这个“中国通”感到奇怪——对于中国而言，举办奥运会本来是对自身形象的美化，现在却变成了自我暴露弱点。吉米透过一系列事件修正着以往的判断，他发现“中国的开放还很脆弱”。

讨伐风暴

事态的严重程度看起来超出想象，很快，CNN 接到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直接把文字材料递给吉米，提醒他“不用做笔记”。从神情上分析，吉米觉得外交官们更像是被迫执行公务。

因为对新闻处理方式的异议，一国的外交部照会一家商业电视台的驻在机构，应属极其罕见的现象。

当然，怒火不仅烧向 CNN，它不过是“反华媒体”甚至“反华势力”的代表。

对于中国某些民众的反应，吉米尚可理解，他无法理解官方在危机出现后的处理方式。“奥运不是今年的重中之重吗？不是‘最大的政治’吗？为什么要制造对立？”在他看来，所谓“负面新闻”是承办奥运会必然要承担的代价。

对 CNN 的讨伐持续升温，在一些网上论坛里，CNN 北京办事处的办公电话被公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让吉米和他的同事不得安宁。最多时，他们一天接到的电话超过 100 个，后来索性把电话的铃声关了，只是还能看到电话上的红色小灯静默地闪烁不停。

有人发来漫漫无际的传真，直至耗光了机器里的传真纸，那传真多达 180 页，是一篇小说。

偶尔会有愤怒的中国人采取实际行动，几个学生拿着抗议横幅出现在 CNN 门口，很快被安保人员带走；一个送快递的人问 CNN 的员工，这个是照片造假的那个 CNN 么？还好，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没有当场把快递物品烧毁。

走在北京的街头，看到有人贩卖“做人不能太 CNN”的 T 恤，吉米也买了一件，选的是中国红的颜色，他要留作纪念。CNN 北京站的许多人也都买了。

出去采访，记者们不会携带有 CNN 的 LOGO 的物品，包括麦克风。一些本来已谈妥的采访也被对方突然推脱掉。

风暴中，吉米也感受到了温情的一面。一些政府的朋友发来短信，表示私人间的问候。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前一段在广东采访期间雇的司机也发来短信，希望吉米保重。

吉米偶尔会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可以理解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激动，这个阶段的人关心政治，参与国事，应该鼓励。不过，吉米希望年轻人能意识到，世界与人群不是非黑即白的，更多情况下，可能灰才是常态。

吉米曾有去大学搞座谈的想法，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自己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公关经理，只是一个记者而已，所有解释工作暂时交由 CNN 在香港的公关部门处理。

在韩国、日本等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家，经常进行负面报道的 CNN 偶尔也会收到个人名义的邮件、传真，表达质疑和不满，但绝对没有到这种群起声讨甚或进行人身威胁的程度。

中国在 1999 年爆发过大规模的反美浪潮，CNN 驻京机构也曾为之紧张，所不同的是，那时的矛头并非明确指向媒体。

2008 年 4 月，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把一个民意调查挂在首页：CNN 是否有资格报道北京奥运会？到处是抵制 CNN 的呼喊，事实上，中国境内的绝大多数公民没有资格收看到 CNN。1980 年代末，CNN 有条件地在中国境内落地。所谓的条件，是指三星级以上的宾馆、外国驻华机构、涉外国家机关才可以接收 CNN 的信号。多年以来，CNN 也希望扩

大在中国的收视人群，但苦于没有进展。

CNN 方面没有公开道歉，只是网站上那张激怒中国人的裁切图片悄然换成了全图，还有一点人们忽略了——下面的一段文字一直是注释全图的。

就在裁剪照片风波稍稍平息的时候，CNN 的“脱口秀”主持人、一向口无遮拦的卡弗蒂又发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议论，位于外交公寓的 CNN 驻京办事处又颠簸起来。

在泰辣椒餐厅的那次聚会上，人们谈到抵制一类的举动是弱者的反抗，吉米表示赞同，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他抬起手，模仿用手打自己嘴巴的动作：“阿 Q。”

批评并不意味着敌意

2003 年春季的一天，吉米与家人一起吃早餐，他讲起自己前一天去采访的护士，在完成辛劳甚至惊险的“非典”患者救治后，她们不敢回到家里休息，担心亲人受到传染。片刻的沉默后，一家人商量着能为被“非典”折磨的人们做些什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捐款吧，儿子和女儿也表示，会把零花钱捐出来。

接下来的问题难住了他们：把钱捐给谁？那时，并没有为社会捐赠设立合适的通道。吉米说，干脆以女儿美霞的名义写一封信，附上捐款，寄给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

13 岁的美霞用 10 分钟写了一封英文信——

亲爱的王岐山代市长：

我们热爱北京。我们希望看到它不再受到“非典”的折磨。我的父母吉米和安娜、我的弟弟约瑟夫和我一起祝愿您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为了表示支持，请接受我们家庭的捐款，聊表寸心。

您诚挚的米歇尔·弗洛克鲁兹（美霞 北京国际学校七年级学生）

2003 年 5 月 9 日

随信附上捐款 861 元人民币

吉米一家都把自己视为“北京居民”，他们也善于表达对北京、对中国的情感。吉米和美霞都曾参与奥运火炬手报名，并双双入选。2008 年 7 月 31 日，奥运火炬传递到河北唐山。100 多天以前，联想火炬手、中国姑娘金晶参与到境外火炬传递，现在，另一位联想火炬手美霞代表在华外国人，奔跑在唐山街头传递火炬。与金晶不同，美霞无须担心有人冲出来抢火炬，路边的群众安全得如同一幅壁画。

此前一天，吉米一家赶到唐山为美霞助威，但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被允许前往现场，只能留在宾馆里收看电视转播。

四川大地震之后，吉米感佩于这个国家瞬间凝聚起的巨大合力，以及政府的高效——这些也多少超乎他的想象——工作之外，他想更多表达自己对这个受难国度的关切。

按计划，吉米的传递是在 8 月 6 日的北京，6 月下旬，吉米宣布放弃火炬手资格，他希望把名额转赠给地震赈灾中有杰出贡献的人，“我们家有一个火炬手已经足够”。

吉米和他的家人对中国满怀情谊，他觉得这与工作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评判并无矛盾。同样的，对一个国家的负面报道未必就代表敌意。吉米说，CNN 不仅在中国关注许多负面新闻，在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

媒体是干什么的？在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仍有巨大分歧。在西方，媒体是起到社会监督和警示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而非宣传工具，另一方面，受众也天然地对负面新闻更感兴趣，批判的立场符合一家商业电视台的利益。而在中国，媒体更多的是作为喉舌而存在，负面新闻被称为“批评报道”。

我们的报道不为取悦也不为冒犯任何人。我们要忠于事实，并将其放在合适的大背景下，以求避免断章取义。我们的日常报道，每天发生的故事就好比一块块马赛克，有着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应该把它们拼到一起看。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但是在新闻报道方面还是存在共通性的，那就是国际通行的新闻准则与原则，同样也是我们遵守的。

这是吉米的态度。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调度着 20 多位记者报道比赛，也关注环保、人权、交通等各种问题。

吉米在北京的办公室不超过 10 平米，却摆满了中式古典家具及各种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艺术品，在旧货市场，他还淘到了民国时期的《人民日报》，著名文物学家王世襄先生专门为吉米题写了“观象斋”三个字。红木家具不仅摆在北京的家里，还出现在美国的家里，是专程从中国运过去的。

“观象斋”主人——用两年时间学习中国历史、又用 30 多年时间亲历中国当代史的资深记者——审慎地打量着这个巨变中的庞大国家。

中国既不像乐观主义者预计的，前途铺满玫瑰，也不像悲观主义者所说的，处处都是问题，它总是介于两者之间。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我们需要借助一个更广阔、更长远的时间框架。

2008 年 8 月初，在河南安阳做泥水匠的负房只找工头请假，说是去北京看奥运会。工头很生气：你吹什么牛逼呢！

他们

2007 年，画家苏坚看到一则北京可能在奥运期间赶走外地民工的消息，后来它被证实是一条“假新闻”。奥运前夕，政府确实没有出台任何驱逐民工的政策，只是绝大多数民工选择了“自愿”离开，因为工地、工厂大多停产、限产了，各种廉价出租屋也被清理了。

那条“假新闻”触动了农村长大的苏坚，接下来的一年，他的艺术活动与参与奥运工程的外地民工有关，也与梦幻有关。

2007 年 8 月，身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的苏坚利用假期赶到北京。他本来想进入“鸟巢”作画，但无法实现，最终靠亲友帮忙，求得奥林匹克公园施工方的通融，进入工地写生。

苏坚选择在红蓝白相间的塑料编织袋上作画，那是民工生活的一个标志性物品，苏坚知道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油画，他刻意挑战人们对这幅画的理解。画的名字叫《他们》，画家要强调这一点——这些工人属于另一个世界。巧合的是，2008 年上海的高考作文题也是“他们”。

时年 51 岁的王社起在画布前站了一天，第一个进入《他们》，随后张艳群、于庆祝、王

红涛、负房只也成为画中人。被苏坚选中的时候，王社起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包工头对他说，放心，这一天给你算工钱。后来到月底结算，包工头没有兑现那一天的工钱。

年轻的材料员张艳群不肯戴上画家准备好的黄色安全帽，他说黄色代表“最低等的工人”，他很想换上皮鞋，并询问“能不能帮我把头发多画一点？”

在工地担任保安员兼卖小商品的于庆祝对自己的肖像不满意：“苏老师，你好象把我的眼睛画歪了。”

苏坚和他的模特们说，如果这幅画卖出去，就请大家观看北京奥运会，住宾馆，吃大餐。工人们只把它当做一句玩笑，对于苏老师画完画带大家去“国展”看画展，他们已经很意外了。

画展现场让工人们大开眼界，观众里的黑人女孩和画布上裸露的人体，都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听到苏坚介绍说，有的画可以卖到几百万，工人们有点不敢相信。

苏坚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计划，希望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买家。他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思考终极问题的人，希望借这样的艺术活动表达他对社会的看法，并让更多的人不断加入进来。有买家通过中间人支付了32008元，买下了编制袋上的油画，苏坚说自己始终都不知道神秘买家到底是什么人。

工人们此时已离开奥林匹克公园的工地，四处找活干，苏坚通过短信告诉他们，画卖出去了，计划正式实施。他还给每个人买了一部“爱国者”数码相机。工人们觉得苏老师好象不是在忽悠自己。负房只的老婆曾问他：这有什么好看的？负房只说：你懂啥，奥运会，当然要去看。

没过多久，在连云港打工的王红涛给苏坚发来短信：苏老师，打扰你了，奥运我不看了，我们打工在农村，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何谈看奥运，别给我打电话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其他四个人愿意参与苏老师的活动，但仍然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美事将信将疑。

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了解到苏坚的活动，表示愿意帮忙运作，每个人只要支付400多元的保费，就能获得一张奥运门票（后来拿到的门票非常好，是“鸟巢”的，而且位置还不错，而且还有刘翔出场。看到确实不断有人加入这项艺术活动，苏坚很开心，而且对于没有基本保险的民工来说，给他们买保险本身也别有寓意。

门票直到7月底才到手，在此之前的几个月，苏坚不断接到“他们”的短信追问：苏老师，还有戏吗？

8月初，在河南安阳做泥水匠的负房只找工头请假，说是去北京看奥运会。工头很生气：你吹什么牛逼呢！

负房只解释了半天，工头最终答应了，还提前支给他200块工钱。负房只又向老婆要了100块钱，坐上了进京的火车。

8月16日上午9点。王社起漫无目的地绕着鸟巢溜达，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他早晨6点多就来了，还要一直这么溜达下去，直到下午两点，去鸟巢西南侧的北辰西桥集合。

王社起来自河北邢台南和县农村，这次到北京，他特意买了一件雪白的短袖亚麻衬衫，带领子的那种。不过走在人群中，皮肤黝黑而粗糙的他仍显得有些特别。特别之处也部分地来自他的眼神，对于周围的一切，他比别人更多一些好奇，尽管他曾在不远处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干过一年的活。

非常巧的是，王社起这时遇到了负房只，去年在北京打工时他们都是戴黄帽的低级工种——泥瓦工。

来自河南安阳农村的负房只没带任何行李，也没带手机和相机，不过他特意带上两包5块钱的红旗渠牌香烟，“平时抽的是3块钱的，这次来北京，得抽好点儿的，拿3块钱的烟请别人抽都不好意思。”

两个人围着“鸟巢”转了好几圈，午饭也没舍得吃。总算熬到了下午两点，王社起和负房只通过过街天桥走向集合地点，突然瞥见一些人在桥下举着乌黑的相机对着自己，接着，另一些人举着采访话筒就跑到了近前。王社起和负房只很窘迫地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如何应对。张艳群和于庆祝已经到了，也早被记者团团围住，除了那几句“很激动”、“为中国加油”，不知道还应该说什么。苏坚倒是很愿意看到民工们被记者包围，看着他们从错愕渐渐恢复平静。几天以后，工人们已经能滔滔不绝地与记者交流，不再说套话。

那天到场的记者多达三十人，引得路人都驻足观望，不知道几个民工模样的人有什么好采访的。

在北辰西桥，热闹延续了一个多小时，四位民工渐渐成为被记者们摆拍的道具。他们要按记者的设计摆出各种 POSE，甚至要回到来时的路上，表演自己怎么重新走过来。

8月17日上午安排的活动是游览八达岭长城。

登上长城，工人们不断按下快门，把平时不容易见到的外国人拍下来，皮肤黑的，身型肥硕的，衣着性感的，全都拍。苏坚发现几个工人对外国人的兴趣甚至大于长城风光，而且很想和老外合影，就有意鼓励他们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充当翻译。

一个电视台记者把摄像机借给张艳群，想以这个年轻工人的视角记录这次活动。张艳群很快就可以熟练使用摄像机和数码相机，他开始大胆地邀请漂亮的外国女孩合影，把手搭到对方的肩上。于庆祝、王社起也鼓起勇气加入进来……

晚上，苏坚带大家去著名的和平门烤鸭店吃大餐，两套烤鸭，若干配菜，花费2700多元，这是北京之行的最大一笔开销。工人们围着片皮鸭的师傅拍个不停，餐厅经理不断劝阻：我们这儿不让拍照。

8月18日上午10点，在鸟巢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来自河南的民工负房只举起一张白纸板，上面写着“我们是奥运主体工程的工人，目前在京观看奥运，我们希望有机会约会中外运动员，与他们合张影要个签名留念，希望热心人士能提供帮助。”

这是画家苏坚策划的一个小环节，他希望奥运民工能与公众达成一种互动。在美联社记者安娜(Anna)的帮助下，来自巴拿马的三级跳远选手桑兹愉快地为几位民工在衣服上签名。负责举牌的负房只没有让这位黑人选手签名，他说自己的衣服还要穿呢。有手机的工人都给家人打电话。

几位民工坐在远离跨栏跑道的另一侧看台。他们走进鸟巢的时候，已经有比赛在进行了，坐下之后，于庆祝显得最早适应了这个陌生而喧嚣的环境，负房只适应得慢一些，他坐在那里不吱声。不久，现场观众玩起了人浪。王社起等人愣了一下，不知道人们在干什么。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很开心地随着人浪站起，扬手，欢呼，然后坐下。

更多的时间里，四位奥运民工的注意力不在赛场内，他们高高地单手端着相机，拍着在他们看来新奇的东西，新奇的东西太多了，似乎怎么拍也拍不完。

11点半，刘翔出现在出口处，现场的欢呼就像雷声滚过天空。“刘翔，加油！”几位民工也跟着高喊。看到前面的第二排有几个空座位，负房只第一个走过去，于庆祝和张艳群也很快跟过去。年纪最大的王社起留在自己的座位上，依旧在摆弄“爱国者”，安娜在一旁的感觉是“他们好像更关心自己的相机”。

欢呼突然中止了，从周围观众的神情里，民工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刘翔退出了。他们也感到遗憾，但看起来失望程度不如周围的人。

刘翔退赛，“鸟巢”的许多观众也纷纷起身离开，看台变得有点空寂。“他们”还没有走，神情有些茫然。张艳群像是在问大家又像问自己：“我们该怎么办？”

8月19日下午的活动是观看蔡国强艺术展。于庆祝随便看一眼就出来了，他坐在路边点评那些停在门口的轿车。于庆祝并非农民工，而是黑龙江北安某工厂的下岗职工。这些天，他没少和名车合影。他希望自己什么时候也开辆车回黑龙江老家去，而且要开就开好车回去，“至少得是丰田”，那才显得有面子。

一辆很小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于庆祝瞟了一眼，“连个标志也没有，都不知道是什么车。”他显然不认识那辆 MINI Cooper。

在北京，负房只那300块钱几乎没怎么用，他只是吃烤鸭的间隙出去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又在前门附近花10块钱给自己的侄孙买了一个会发光的电动陀螺。在去看蔡国强艺术展的时候，负房只觉得无聊，把电动陀螺放在宽敞的大厅里旋转，并发出漂亮的光芒。

苏坚对蔡国强的艺术有点不以为然，他觉得同样是玩艺术，自己的玩法更有意思。苏坚时常会搞出一些行为艺术并由此在美术圈引起争议，他认为自己对现实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他们》的故事无疑是他多次“行为艺术”里影响最大的。

许多媒体把苏坚的活动解读为慈爱之心，是为奥运民工“做好事”，苏坚对此很无奈，不过既然作品已放在公共平台上，想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

那天晚上，苏坚接受工人的建议，买了5件奥运纪念T恤，单价98元，每人一件。其他人都很自豪地换上了T恤，负房只舍不得，他得把衣服保存好。

出了专卖店，几个人很快就走散了，这支只有5个人的团队总是难以统一行动。苏坚说，这些人好象没什么团队的概念。他还曾尝试让大家民主决策一些事情，比如第二天的行程，坐公交还是打车，每个人都固执己见，很难相互妥协。

23岁的张艳群穿着与城里孩子没什么区别的服装，挂着金项链，肚子很饱满。他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位于河北涿州的家离北京也最近，只一个小时车程。他小学都没读完就到北京打工。

他认为自己与另外三个人不一样，在奥林匹克公园的工地上，他和老板关系亲近，一起吃饭，三菜一汤，顿顿有肉吃。他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只需要签收运来的材料。在奥林匹克公园工地的那些日子，张艳群胖了20公斤。

看得出，于庆祝也认为自己很不同，他不是农民，社会经验也多。

年纪最大的王社起粗通文墨，还当过兵，大家对他比较尊重。王社起人也憨厚，即使对四个人里地位最低的负房只，他也很和气地对待。

酷热的夏天，负房只始终穿同一套衣裤、同一双袜子。于庆祝嫌负房只身上的味道难闻，坐出租车时没好气地说“脚太臭，他上来我就下去”。负房只赶紧坐上另一辆车，表情并无异样。

张艳群也故意不和于庆祝同乘出租车，不是嫌脚臭，而是觉得对方“抠门儿得很”。

在如何支配活动经费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分歧。于庆祝想把钱尽可能花掉，其他人则觉得，那是苏老师自己的钱，不能太过分。

在对一件事的判断上，几个人的意见难得地一致——他们私下猜测，认为活动的钱是苏老师自己掏的，他借着这个事炒做自己。至于为什么要炒做，他们猜不透。他们觉得不会有人买这样的东西，就算卖出去，苏老师为什么要花到他们身上？

苏坚与“他们”的北京四日游，先在一位市民提供的住宅里住了两天，又在一位酒店老板提供的免费客房住了两天。

那是一家准四星级的宾馆。王社起说：“这样的房间真是高级。”他对于“高级”客房的定义是——房间里有沙发和茶叶。他上次住“高级”房间得追溯到30年前。当时在太原某部队当兵的王社起到五台山出差，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的招待所，有沙发，有茶叶。

游览长城那天，王社起花了10元钱，穿上“龙袍”照了一张照片。在他看来，北京的

几天游玩，与当皇帝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8月20日早上，电视节目里到处是奥运会的画面，于庆祝和张艳群观看的却是一部没什么知名度的国产电影。和负房只、王社起一样，他们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等着苏坚来喊他们去吃早餐。

这是看奥运活动的最后一天，于庆祝、张艳群、负房只、王社起即将结束他们的北京之旅。

早餐是中西自助的，品种还算丰富。负房只吃了不少东西，让同伴印象深刻的是他消灭了两只猪脚，三个鸡蛋。吃完饭，《南方人物周刊》的摄影师姜晓明拉着他们去天安门广场拍照，工人们已经习惯于出现在摄像机和照相机前，有的人甚至开始抱怨并消极对待了，“也没什么好处，总拍我们干啥？”

中午，苏坚召集4位工人算账。他报销了每个人往返的路费、北京的出租车费，每人还补偿了一笔接受采访的电话费。于庆祝曾想把买烟的钱也报了，苏坚没有同意。有三个人都住在三五百公里之内的农村，只有于庆祝在大连市，有坐飞机回去的可能，他也确实向苏坚私下表达过这个意愿。算账的时候，苏坚当众问：“老于你打算怎么回去？”这个东北人反倒不好意思了，“我坐火车，坐火车。”

苏坚拿出签字笔，建议大家在前晚买的T恤上留言，四个工人都不愿自己那件98元的奥运纪念衫被破坏，最后只有苏坚的T恤上写满留言。苏坚一再强调：“不要写感谢我，也不要写虚的，写自己真实的愿望。”结果，王社起写的是：苏老师，我会一生记者（着）你；张艳群写的是：感谢苏老师；于庆祝写的是：为祖国加油；负房只不会写太多字，只写了自己的名字。

T恤上原本印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苏坚改成了“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张艳群回到自家院子的时候，父亲张桂良正忙着装修，其中一间将在半年后成为儿子的新房，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烙大饼。

“这涿州市长也没去看刘翔比赛吧？”张桂良笑着说。张艳群希望房间装修完以后把自己在鸟巢里的照片放大，挂到墙上，“看谁还敢说我吹牛逼”。

因为奥运前后不许施工，多数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村里像过年期间一样人丁兴旺。村民们大多不喜欢看奥运会转播，吃完午饭，他们就站在门口，等着凑够人数，好聚在槐树下打那种叫“升级”的扑克游戏。张桂良赶着家里的23只羊走出家门，偶尔有邻居问起他儿子去看奥运会的事，他就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让对方觉得自己很张扬。

东京对北京说

《体育画报》记者 关军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 关军 摄

山田直稔完全看不出是一位 82 岁的老人，在两国国技馆里，这位相扑爱好者攥着那把标志性的扇子，楼上楼下一溜烟地小跑，事实上并没有很紧急的事情。日本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副作用是，老年人要把自己激励得更有活力。

不断有人兴奋地拉住他要求签名，要求合影，即使白鹏力士此刻出现在人群中，受欢迎程度也不过如此吧。

“我是日本的奥林匹克大叔。”山田直稔喜欢反复向周围人强调这一点。“大叔”并非妄言，从 1964 年开始，他追随日本运动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比赛，尤其难得的是亲历了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世界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

在日本，山田直稔堪称现代奥运的见证人，这位木材厂老板的儿子、日本大学的建筑学毕业生，本应该有另一种成就，而改变他一生走向的，恰恰是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

1960 年，日本东京申办 1964 年奥运会终获成功，此前，他们两次与奥运擦肩而过。1940 年奥运会原本确定由东京承办，正推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毁约弃权，遭致那届奥运会流产；而在 1960 年第 17 届赛会的竞逐中，东京败给了罗马。

1964 年 10 月 10 日，日本与全世界都在期盼这个时刻，它也将是奥运会第一次来到亚洲。

日本几乎是亚洲大国中距离欧陆最远的一个，却也是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最早、最虔诚的一个。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经济窘迫，而比这更难忍受的，是在国际上被孤立、被疏离的处境。国际奥委会甚至一度将日本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在申办第 17 届奥运会输给罗马后，东京的申奥决心反倒更为坚决了，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

我查阅到了 1960 年 5 月 19 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的决议，摘录其中的一些字句，

可知政府方面在奥运上的诉求——

“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做出贡献。”

“战后，日本的形象不太好，日本人上下一心，希望让全世界重新看一下自己，日本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山田直稔对于那段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滋味印象深刻。

要解读战后日本，不妨先说说日本的“三种神器”，所谓三种神器，原指日本天皇手中代代流传的三件珍宝，到了现代社会，它的含义被演绎，并成为衡量日本人生活水准的真切可感的指标。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它们在日本被称为“三种神器”，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三大件”。

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

1964年4月，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三名日本战犯被遣返，他们是最后一批结束改造的二战战犯。不过，要真正摆脱二战阴影，走上国家正常化之路，日本人还要寄望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1964年10月10日，第18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国立竞技场开幕，74160人出席，日本天皇也御驾亲临。欢腾的日本民众不会忘记，21年前，也是在这里，日本天皇出席日军的“新徒出阵”仪式，接见两万多即将投入战争的新兵，鼓励他们在“圣战”中效忠。同一块体育场，物是人非，日本人希望借助喷气式飞机在天空划出的五环，驱除那场战争的阴霾。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举着火炬跑进会场——1960年代的火炬还很老土，远远望去，浓烟滚滚，简直像一只烟囱在移动——坂井登上火炬台，点燃了奥运主火炬和全日本的狂欢。事实上，在此之前，关于选拔怎样的一人点燃奥运主火炬，曾经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

广岛人坂井义则恰好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其父是当时的受难者，主办方希望由坂井义则点燃圣火，以表达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祈愿。日本人还通过奥运主会场的壁画传递这种姿态——那是世界上惟一尊没有翅膀的希腊胜利女神像，日本人的说法是，胜利女神没有翅膀，就可以把和平永远留在日本。

不过，火炬手的选择遭到了美国方面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有“祭奠军国主义”的意味，极力反对。在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支持坂井义则担任主火炬手。

在内心深处，战后的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有着对美国的强大国力乃至社会方式、价值观的推崇，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让他们不愿受制于美国。1960年代初期，日本和美国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的动议遭到80%以上的民众反对。反对风潮演变为著名的“安保运动”，620万人上街游行，6万商店关门罢市抗议。1964年3月24日，矛盾再次激化，美国驻日大使被一位日本少年用刀刺伤，幸未危及生命。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我曾问几个在北京生活或逗留过的韩国人、日本人，承办奥运会时期的汉城（今首尔）和东京，是怎样的景象？他们的回答是：和现在的北京差不多。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这几座城市对举办奥运有着近似的狂热，而剧烈变化着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带有几分野性。

1963-1964年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

上，竟挖出 10000 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计有 7000 多栋房屋、50000 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 1000 多人丧生。

日本作家开高建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把今日的东京轨道交通图竖起来，也许会有蜘蛛本能地爬上去。它是如此密集，承担起这座城市八成以上的交通任务。而奥运周期是轨道交通被突击建设的阶段，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也自此成为东京的方向。

此外，首都高速公路网一期工程、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承担国际航空的成田机场、标志性的东京电视塔，都在奥运周期内建成，而且大多是抢工期、突击完成。其中新干线 1964 年 7 月底竣工后试运行，其间多次出现脱轨等事故，终于赶在奥运会开幕前 9 天正式开通。

因为城市人口急速增长，1961-1964 年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后来，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大的都市面临许多问题，开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物价上扬，房价高企，东京处于非正常的亢奋状态。

显然，山田对中国的现实并不熟悉，他提醒说，北京奥运肯定改变城市面貌，也会有一个物价飞涨的阶段，因为当年的东京就是这样——事实上，北京早已进入这种状态。

2008 年年初，冰雪灾害让大半个南中国几近瘫痪，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承办奥运会前期也是天灾人祸不断。我更愿意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据《映像 100 年史》记载，1963 年-1964 年间，暴雪、地震、豪雨在东京及周边地区先后肆虐，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矿难、飞机失事、列车相撞、电厂爆炸等令人震惊的意外也在同期频繁发生。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 200 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 270 亿。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其实，那时候让民众支持奥运，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受浓重的东方国家主义影响，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传统，人们认为理应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做出奉献，及至个人牺牲。为了“国家大事”，一度在 1964 年前半年还很激烈的学生运动，在奥运开始前自动停息。

原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春昕曾做过东京奥运寻访，日本受访者向她描述当时的社会热情：每一个居民委员会要开会，每一个学校要训话，专门讲述奥运的意义；每一个有特长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每一个公司都要鼓励职工参与奥运会的工作。

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 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每年的 10 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68 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瘁，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巨大压力下的铃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竟奇迹般地铸造成功。铃木文吾后来曾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当时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却成为与奥运有关的一段佳话。

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门口。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那一年，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可以向世界各地传输奥运信号，实现了奥运史的第一次电视直播。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而让那些西方人惊叹的不止是这个东方民族的狂热，还有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开幕式结束后，偌大的体育场居然看不到一张废纸。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举国狂欢释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20年之后，女排题材的体育传奇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成为他们的民族强心剂，被强调的主题词同样是“拼搏”，这算不算东方式的巧合？

如同被毒瘾俘获，在经历了东京奥运赛场一个个激越瞬间、尤其是目睹日本女排夺冠之后，山田直稔深深迷恋上了体育带来的快感。东京奥运会之后，普通日本人渐渐平息了血脉的激荡，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以山田直稔为代表的一群人，却一直被那激情紧紧攥住。

由身后的家族企业做依托，经费不是山田发愁的事情。他组建了一个日本体育后援团，开始了全球化的粉丝行动。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镜头，感动了包括山田直稔在内的无数日本人。当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棋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都曾给奥运抹上过分浓烈的政治色彩。像所有国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举办国一样，日本争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称之为“粉饰太平”）。回望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得不承认，这项“形象工程”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确实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的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这一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办奥运会，外国人都进来了，我们很开心，日本人当时很希望与外国人交流。”山田直稔的话印证着日本人当年渴望对外交流的心态。

随着门户大开，日本人的生活也开始更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

新井一二三说，直到1950年代末，东京人的家庭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

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榻榻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榻榻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1966年，“披头士”乐队首次访问日本也被视为标志性事件，西方生活方式开始深入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反映当年世情的记录片里，街上的年轻人出现了怪异的“莫西干”发型，甚至一些学生夜不归宿的现象也成了社会问题。

现在的日本东京，正在全力申办2016年奥运会，第二个奥运梦，与1964年那一个有太多不同。他们的宣言变成：“值此‘都市的世纪’，希望借助都市之力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强烈地期待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奥运会与东京更深远的复兴及有力的促进运动联系起来，改变日本。”

SEIKO（精工）在奥运会前一年承担起计时设备的提供任务。他们做出了一个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要在奥运会上提供石英计时器。那时，人们还生活在机械表计时时代，而重量超过一吨的石英表只能用于天文。难道SEIKO要把庞然大物安放在赛场里？

奇迹在奥运开幕半年前发生，SEIKO居然推出一款精巧的石英精密计时器，人们不禁对着它惊呼：天啊，这东西只有3公斤！而这种表的计时精度也比机械表提高了一百倍。这段奥运传奇，被SEIKO视为企业腾飞的里程碑。而精巧、耐久、精密的日本工业产品，开始借助奥运会给世界以惊喜。

借助奥运，日本改善了自身形象，也获得了更开放的心态和国际性的视野。无法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日本企业，开始了商业上的疆土拓展。

事实上，以奥运为契机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与日本品牌，还远不止一家SEIKO，索尼、美津浓等许多品牌的全球化拓展，都是抓住了奥运这个天赐良机。

以奥运之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的高速发展，造就了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的阶段性繁荣。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让我们延续一下“三种神器”的故事——到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国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彩色电视、窗型冷气机、汽车非常普及，成为新“三种神器”。报纸上满眼都是汽车广告，鼓动日本国民赶快进入“My car”时代。

1962-1964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了10%，史称“奥林匹克景气”。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繁荣。从1954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奥运投资过热导致1965年出现半年左右的萧条期，随后又进入高速路。以此判断，夸大“奥运经济”对日本腾飞的助推力显然是不客观的。

日本的“北京奥运支持会”是一个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民间组织，其理事长冢大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单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举办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崛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身处战败阴影中的国家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城市而言，奥运会带给了战后日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动力”。

如果一定要为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寻找一些外部原因，奥运会的直接拉动作用甚至未必比得上“战争财”——越战、韩战的巨大军需，让日本工厂里的机器以更强的分贝日夜轰鸣。《日本历史》之现代卷记载，“韩战过后，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战前水平，国民收入急速上升”。

日本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没有造成悬殊的贫富分化。正如新井一二三所说：“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奥运会带来的全球性的游戏规则，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如今的日本，差不多成了世界上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度，而山田直稔说，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竞争的，经历了奥运，好像竞争的意识突然强烈起来，“我本人不喜欢竞争，为什么要那么大压力呢，大家开心就好。”但是，82岁的老人的态度有时略显矛盾，“日本现在在体育上不爱竞争了，没有进取心了，”这又是他不喜欢的。

所谓的“缺乏进取心”，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在追求体育的另一种境界。

不知道日本在奥运后的体育道路抉择，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1964年，日本在本土奥运会上奇迹般地获得16枚金牌，金牌数位列第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继续追逐“奥运争光”一类的梦想，而是借此完成了向大众体育的优雅转身。

对奥运的巨大关注也唤醒了普通人的体育热情。1957年，日本男性的体育参与率只有23%，奥运会后的196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为45%。而多数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妇女，是体育热的更重要的推动者。

公众的体育参与热情，无疑是首先被“东洋魔女”引燃的。身份为大阪一家纺织厂原料采购部经理的业余教练，带领纺织女工们，竟战胜了异常高大的、专业体制下的苏联女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英雄。日本女排的故事像一个丑小鸭的童话，使得普通民众发现，原来奥运民族英雄就出自身边，他们自己也可以投入到运动的乐趣与激情中。

奥运会后，日本盛行“妈妈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妈妈桑们钟爱，中国的许多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谋生，都以陪妈妈桑们打球为主业。

小野乔堪称当年日本的体操王子，曾获得过五枚奥运金牌，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作为运动员代表进行了宣誓。奥运会之后，他和妻子小野清子告别竞技体育，于1965年开办了日本第一家面向普通民众的体育俱乐部。渐渐地，大众化的运动俱乐部风靡日本，到1994年，这类俱乐部竟多达37万以上。

大众体育兴起的的同时，竞技体育也在被重新审视。

1968年1月9日，27岁的马拉松运动员圆谷幸吉在家中割颈自尽，他留下的遗书刺痛的不只是他的家人和亲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我太累了。”

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圆谷幸吉并不被人看好，却凭借超强的意志搏到一枚铜牌，其冲过终点后痛苦得满地翻滚的场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隐忍、执著的品质，圆谷成了那届奥运会的英雄。

不甘心铜牌，一定要为日本夺金，舆论在切盼，圆谷本人也不断自我施压。他一直进行着魔鬼式的、不尽科学的训练，伤病也随之增加。实力所限加之伤病之虞，让圆谷幸吉自感1968年奥运夺冠的梦想有点遥不可及，“英雄”终于精神崩溃。

当时日本体育的成绩主要由陆上自卫队支撑，圆谷幸吉也是一位自卫队选手，严酷的自卫队“强化选手训练”制度是竞技体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认为是杀死圆谷幸吉的祸首。这种体制类似于中国的所谓“专业体育”体制，当年《每日新闻》的体育记者冈野对那种训练并不陌生：“自卫队的训练方式和外界那种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是不一样的。不管队员压力是否太大，不管身体状况是否承受得起，都要进行艰苦训练。”

圆谷自杀事件让日本人大为震惊，各大媒体上，开始对锦标主义、奥运战略进行反思，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是，日本正“忘记体育的原点”。《朝日新闻》的评论是“无视人性

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痛斥锦标主义对人性的戕害。

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甚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名古屋申奥的运动。当名古屋市提出申奥，意外招致民众激烈反对，舆论普遍认为，应该把财政经费用于大众体育而非少数运动精英。

大阪也曾与北京一起竞逐 2008 年奥运会承办权，不过与名古屋那次申办一样，国内民众“动员力不足”，反对声浪巨大。虽然长野也曾在 1998 年举办冬奥会，但留给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仅仅是“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

奥运痴迷者山田直稔也在悄然转身，他最初只是一个体育民族主义者，满世界追着日本选手为他们加油，“做着做着，我发现世界和平很重要，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从此，这个不会外语的人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奥林匹克宣传大使，在东京一家咖啡店里，他兴奋地向我展示与几乎所有历任日本首相、与撒切尔夫人、萨马兰奇等名流的合影。在他那把金灿灿的扇子上，写着目前后援团的主旨：“笑脸的交流”。

时光进入 2008 年，热情的山田直稔先生有些焦虑，他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会给北京奥运带来麻烦，“我想官员和运动员吃住都没问题，但一般的游客呢，他们要面对昂贵的宾馆价格，他们能吃到与官员、运动员同样干净的东西么？”

更多的焦虑事关自身。他要延续“奥林匹克大叔”的故事，却全然不知道如何搞到北京奥运开、闭幕式的门票。他去中国驻日使馆，他求助于每一位遇到的中国朋友。最新的好消息是，CCTV 主持人崔永元欲邀请山田先生出席一档电视节目，将有一份奥运门票作为礼物赠送给老人。

在奥运方面，山田总是有着让人艳羡的好运气。2008 年，中国也有。

(本文部分资料借鉴了《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特此感谢)

感激

感谢所有关心、支持这本书的朋友。需要特别感谢的，是资深体育记者、主持人罗宏涛和 CCTV 驻北京奥组委特派联络员肖阳，他们以巨大的热忱，并利用自己深厚的阅历与资源，对我的采访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帮助。

在对火炬传递城市本溪的采写中，《南方周末》记者陈江与我相互协作，那部分报道中，至少有一半的成果来自他的勉力工作。在《他们》一文的报道中，与我一同采访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体育画报》的程益中、魏寒枫、侯飞等领导，都对我的采访和写作给予了巨大支持。

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妻子，为了我完成这本书，她要在家中承担更多，她要面对更多的孤寂，以及一些本不该她承受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感激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人，他们与我一起经历了 2008，也一起成就了这本书。他们理解并支持我的工作，其中有的人成为本书人物系列的主人公，有的只出现在某个章节和段落，有的没有出现却依旧给我教益和灵感。我为他们祝福。

附：受访者名录

李红 国际奥委会北京 2008 代表处首席代表，负责电视和市场服务的总经理

李柠 北京奥组委顾问，北京礼仪学院院长

刘爱杰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魏纪中 中体产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
Susan Brownell 中文名包苏姗，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中国体育研究专家，北京奥组委顾问
肖阳 CCTV 驻北京奥组委特派联络员，负责北京奥组委工作的影像记录

山田直稔 参加过 1964 至 2008 所有奥运会开闭幕式，在日本被誉为“奥林匹克叔叔”
石原慎太郎 日本东京都知事（书面采访）
田中修 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的特别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冬日娜 CCTV 田径专项记者，刘翔的好友
关庆丰 《北京青年报》记者
Richard 美国《体育画报》资深记者
Christian 《西南报》（SUD OUEST）的高级记者，北京奥运会报道者
Jaime A. FlorCruz 中文名吉米，CNN 北京记者站负责人，驻华首席记者
Adrian Geiges 中文名佳杰思，德国《明星》周刊（STERN）亚洲首席记者
王军 新华社记者，多年致力于北京古城保护、城市规划的调研

孙海平 刘翔的教练
博拉·米卢蒂诺维奇 著名足球教练，曾率领中国足球队打进世界杯
曹靖 孙海平的助理教练，曾是刘翔的队友
冯霖毅 前上海某体校跳高运动员，刘翔的队友
伏明霞 连续三届参加奥运会跳水比赛并获得四枚金牌，也因嫁给香港金融巨子梁锦松而引人关注
桑兰 北京残奥会形象大使
郑黎明 中国激流回旋队副领队，北京体育大学教师
王卫星 博士生导师，中国知名体能训练专家
仲锁贵 上海管弄新村小学体育教师，刘翔的启蒙教练

金晶 前国家残疾人击剑队队员，奥运火炬手
张学锋 奥运火炬手
姚革 前残疾运动员，奥运火炬手

陈娜娜 奥运颁奖引导员
吴虹 北京市民，北京职工文明拉拉队成员
吴洪珍 北京市民，奥运治安志愿者

Eric Abrahamsen 中文名锁柱子，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给英语国家
方寿威 北京市民，曾因奥运口号的权益问题起诉北京奥组委
荆继昌 北京大金丝胡同四合院“金丝居”的男主人，该住所主要接待外国观光客，被政府命名为“奥运人家”
王志喜 荆继昌的妻子
周洪涛 前外交官（已退休），“奥运人家”主人

道格拉斯 美国人，专程到中国购买奥运门票并观看比赛

孙爱珍 道格拉斯的妻子

韩钢 包头市某国有企业工人

韩珂 职员，北京奥运门票现场发售盛况的亲历者

马景雪 奥运拆迁户

李玉奎 马景雪的丈夫，奥运拆迁户

马德云 奥运拆迁户

苏向宇 奥运拆迁户

孟凡华、阎胜玉 北京市民，选择在奥运开幕当天登记结婚

那和利 新奥物业公司经理，奥运拆迁户，北京奥运火炬手

张艳群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王社起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于庆祝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负房只 奥运附属工程建设者，画作《他们》的原型之一

苏坚 广州美术学院教师，画作《他们》的作者

赵宝琴 农民工，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危难时刻的亲历者

魏二林 奥运安保参与者，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危难时刻的亲历者

覃爱玲 《南方周末》记者

罗布曲珍 拉萨某中学英语教师，藏族人

泽朗王清 “玛吉阿米”连锁餐饮企业的拥有者，藏族人

索朗 西藏邮区中心局业务员，藏族人

刘鉴强 旧金山火炬传递现场观众，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籍进修人员

马元江 四川大地震亲历者，创造了没有任何补给情况下生存 178 小时的奇迹

陈颖（四川大地震亲历者，马元江的妻子）

尹春龙 四川大地震志愿者，2008 年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十大杰出志愿者”之一

孙立 舞蹈专业学生，四川大地震亲历者，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的排练

贺一民 武警指挥学院大校，先后参与汶川和北川的救援

梁欢 四川大地震亲历者，北川中学学生

张建芳 自由职业者，2008 年一直在北京寻觅工作机遇，曾寄望通过北京奥运会改变个人职业和命运

张宁 体育经纪公司经理，2007 年至 2008 年致力于发掘奥运商机

黄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奥运办公室主任

李宁 前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奥运会主火炬点燃者

（注：另有少数受访者，要求隐去姓名）

本书中关于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描述，参照了中国国内公信力较强的《财经》、《南方周

末》、《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美国《华尔街日报》、《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谨致谢忱。